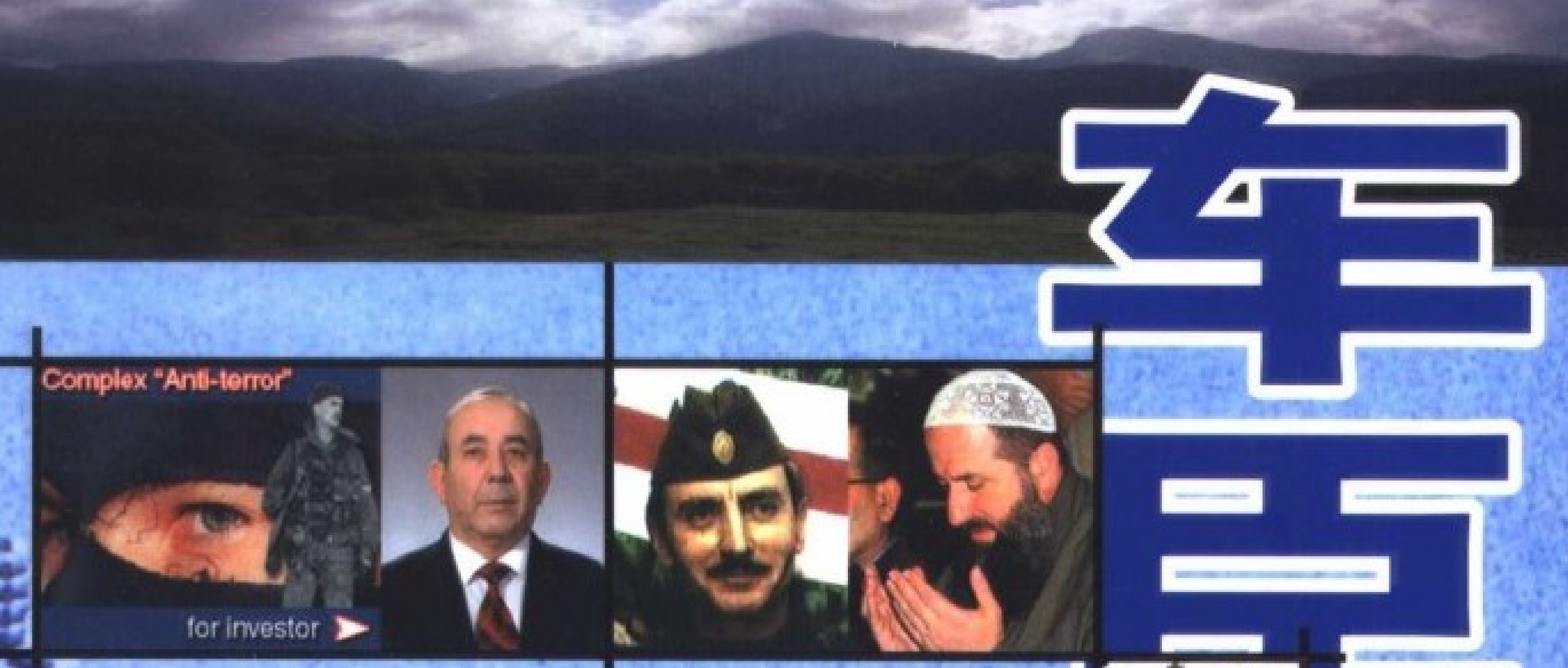


如何看未来

侯艾君 著





车臣是俄罗斯的政治黑洞，也是权力的祭坛。

车臣是苏联解体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车臣，甚至也是外部势力削弱俄罗斯的阴谋，

是大国争夺高加索的一个步骤。

世界知识出版社

ISBN 7-5012-2691-1

9 787501 226917 >

ISBN 7-5012-2691-1/D·556

定价：39.00 元

车臣始末

侯艾君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车臣始末 / 侯艾君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11
ISBN 7-5012-2691-1

Ⅰ.车… Ⅱ.侯… Ⅲ.车臣问题-研究
Ⅳ.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6425 号

车臣始末

Chechen Shimuo

责任编辑	郭宝珍　孙　潜
封面设计	郭宝珍
责任出版	唐　萍
责任校对	王　铮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电话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010）65265923
邮政编码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印张	970×640　1/16　21¼印张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一版　200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吴恩远

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位于高加索山脉北侧，与格鲁吉亚隔山为邻，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一百万。但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区，近年来在世界各类报刊媒体上，“车臣”一词可说是曝光最为频繁的字眼之一：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俄罗斯政府为了避免国家的分裂，出动数十万军队对车臣先后发动了两次战争，以伤亡数万人的代价，虽然消灭了非法武装的主体，但那里的斗争至今没有平息，局势依然动荡不安。更为使人痛心的是恐怖事件层出不穷，车臣非法武装分子活动猖獗，袭击俄军哨所，炸毁军车……每每伤及无辜。其中较为重大的事件就有：2002年8月，俄军一架米-26直升机被车臣武装分子击落，造成100多名军人丧生；2002年10月23日，数十名车臣武装分子在莫斯科杜布罗夫卡剧院将800多名正在观看演出的观众和演职人员劫为人质，130名人质不幸丧生；2003年12月6日，俄罗斯南部接近车臣地区的一列行驶中的客运火车发生炸弹爆炸案，至少40人死亡，150人受伤；2004年2月，莫斯科地铁爆炸，造成39人死亡；5月9日胜利日庆祝活动中，车臣非法武装在格罗兹尼再次制造恐怖爆炸事件，车臣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卡迪罗夫和俄高加索联合集群司令巴拉罗夫被炸身亡……就在今年（2005年）10月，约150名车臣武装分子对俄罗斯南部城市纳尔奇克的军警机构发动闪电袭击，并与安全部队发生枪战，造成至少12名平民死亡，64人受伤……

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恐怖事件，无法不引起世人的揪心。人们关注车臣问题，不仅是好奇，而是出于对那里所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伤及大量无辜百姓的人文关怀；是对苏联解体后，国际格局的重新组合对世界局势发展影响的重新思考；更是试图吸收和汲取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和教训。

我想，这就是侯艾君博士这本《车臣始末》著作出版的现实意义。

可以从多个方面、多种角度分析车臣问题，如关于车臣问题的现状、车臣问题的前景等等。本书作者的重点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结合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国际政治理论、地缘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考察车臣危机的根源、实质；论述车臣危机对车臣地区、俄罗斯社会政治所导致的后果；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现状及前景。

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详细探讨了导致车臣危机的根源。

第一，历史根源。作者从19世纪沙米尔建立教权国家以及反抗俄罗斯侵略的历史，揭示了车臣与俄罗斯的历史恩怨；30年代不考虑车臣人民的传统习俗和固有生活方式，强制集体化破坏了当地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招致当地人的反抗；1944年将整个车臣民族流放、之后又为其平反、允许其返回，产生许多遗留问题，导致消极后果……这是导致今天车臣危机的深刻的历史根源。

对这一点，当今许多史学家也都是注意到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停留在车臣民族的“离心”倾向这个结论上，而是注意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即车臣民族在十月革命归并苏维埃政权后，由于社会经济所取得的重大发展而具有的“向心”倾向。在苏联时期，车臣民族进步迅速。车臣初步建立起包括石油开采、石油加工等在内的工业体系；文化教育迅速发展，建立了许多学校、研究所。使大多数车臣人摆脱了文盲状态，1920年到1940年，识字率从0.8%上升为85%，社会生活也得到长足发展。这是一种辩证分析的态度。

即便对于当今大肆渲染的流放车臣民族事件，作者也不囿于固有结论，而是对该一事件作了仔细考察，从而澄清了许多历史事实：指出这一事件事出有因。在卫国战争前后，苏联领导人把曾经投敌叛国的车臣人、不仅是车臣人，也包括叛国的俄罗斯人流放。但车臣人几乎是整个民族被流放，这是苏联领导人的责任，作者也

对此进行了分析。所以，作者认为，虽然历史因素具有导致车臣走向分裂的前提，但是，危机的直接原因却来自现实。因为“历史上的消极因素可以通过现实中高超的政治技巧和得当的政策加以扭转和纠正”，这个结论颇有见地。

第二，现实因素。本书认为，现实因素才是引发车臣危机的直接原因。作者明确指出：“车臣危机的公开爆发，首先源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由于他主张的不受限制的“公开性”，对车臣历史的片面解释使苏共置于被审判、谴责的地位；车臣各种政治反对派的公开涌现极大地削弱了车臣共和国党政机构的权威性；车臣分裂派领袖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政治利益，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利用苏联解体进程中的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社会的混乱无序状况，挑战俄罗斯中央的主权。所以，是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带来的消极后果激发了车臣民族主义情绪的恶性膨胀，影响了车臣社会政治进程。

作者还指出，另一现实因素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联盟国家主权的削弱。戈尔巴乔夫在欲与各加盟共和国共同签署“新联盟”的条约中，由于给予自治共和国与加盟共和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而煽动起了民族分裂情绪；而当时身为俄罗斯联邦首脑的叶利钦则对各自治共和国允诺“你们想要多少主权，就可以拿多少”，实质上是对苏联宪法的致命一击，使原本摇摇欲坠的联盟国家雪上加霜。

此外，俄罗斯当局在两次车臣战争中指挥不当、应对乏力等等情况，也是造成今日车臣民族矛盾尖锐的现实因素。

第三，外部因素。尽管内因是车臣危机的决定性原因，但绝不可忽视外部因素——主要指西方国家在其中的作用。作者特别分析了西方国家的“西化战略”。指出：西方情报部门的意图是：引爆“车臣革命”的“民族炸弹”，从而在北高加索地区引发连锁反应。表现在：促使车臣民族矛盾激化、为反对派提供资金、甚至直接出面庇护分裂分子，等等。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车臣问题之所以呈现出如此复杂的局面，与大国在高加索地区的争夺紧密相关。

之外，作者在书中还分析了影响车臣危机的宗教、文化差异等等因素，向读者全方位地揭示了车臣危机产生、发展的根源。

在此基础上，作者预示了解决车臣危机的前景：俄罗斯民族和车臣民族都需要走出车臣问题的死胡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残

酷的民族对抗对双方都没有益处。作者指出："杜达耶夫等车臣分裂分子导致的后果是悲剧性的。车臣民族并没有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相反，却变成少数政治精英和利益集团手中的筹码，并在民族冲突中蒙受巨大损失，元气大伤。"车臣民族的前景决不是如分裂分子所鼓吹的"与俄罗斯血战到底"，"恐怖袭击这种自杀式方式不仅为车臣人招致恶名，也导致玉石俱焚"；同时俄罗斯当局在解决车臣问题上政策也应当更为灵活。作者指出："只有实现车臣民族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性和解才是解决车臣问题的唯一出路。"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利用他在吉尔吉斯斯坦留学期间所搜集的资料写作而成。作者用功甚勤，治学严谨。所以，本书无论在学术深度上、资料运用上都达到一定水准，值得一读。

前言

车臣危机是苏联解体前后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一。在苏联解体前后，以杜达耶夫为首的车臣民族分离势力提出了主权要求，并逐渐发展成为与俄罗斯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车臣成了广受关注的热点地区。在俄罗斯所有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克里木鞑靼人问题、鞑靼斯坦危机等等）中，车臣危机的爆发最为激烈、持久，对于俄罗斯国内社会政治进程、民族进程、以及俄罗斯国家在未来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车臣的历史及其现实就需要重新研究。深入探讨车臣问题，对于考察苏联解体原因及其后果、俄罗斯的现状，具有重要的理论认识价值；对于其他存在着民族问题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如何妥善地解决民族问题、防止民族冲突，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车臣”。

史学家对于车臣民族历史的研究可以说是由来已久。由于车臣人是一个文化长期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因此，考察车臣民族的起源以及其早期历史

发展状况，就有赖于其他文化较为发达的相邻民族的记载；对这些资料的运用，还要看该相邻民族的历史、起源是否得到研究，该相邻民族与被研究民族的关系是敌对还是友好；而且，这些记载可能充满误解和成见，所关注的方面琐碎、残缺，其反映该民族的历史面貌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依赖考古发现，或者将考古成果和文字材料结合起来。当然，在特定的情况下应有所侧重。

作为高加索地区众多民族中的成员之一，车臣民族的历史向来被作为高加索地区，或北高加索地区发展史的一部分而被提及。车臣人进入俄罗斯历史学家的视野，并且受到关注，是在19世纪。当时俄罗斯帝国正在向南扩张，并与伊朗、土耳其等大国展开激烈争夺，但是，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却并非一路奏凯，“顽劣”而“未开化”的山民对俄罗斯军队的推进造成很大威胁。在军事行动的前夕、乃至军事行动中，俄罗斯都进行了一些考察。这些考察报告服务于什么目的，是不言而喻的。除指挥官的作战报告、政客的回忆录以外，还有文人墨客的吟咏，旅行家的游记见闻等等，也程度不同地反映了车臣的历史片段。普希金、莱蒙托夫、格里鲍耶多夫等俄罗斯作家都对高加索充满深情，写下了热情洋溢的作品；阿·伊·波列扎耶夫、伊·瓦·拉多日尼茨基、阿·阿·费特等人也在自己的诗作中，对车臣和达吉斯坦美丽的自然风光大加赞美。今天看来，这些文献多半已经失去当时所应具有的意义，但却依旧是研究车臣历史必不可少的资料；此外，一些史学家、思想家，如丹尼列夫斯基等人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车臣或者北高加索，其思想甚至在当代也得到回响。

苏联时期，涌现出许多研究车臣问题的专著，多数是关于车臣的起源、语言、人种、以及其在远古时期所达到的物质文化程度、车臣人民在俄罗斯历次革命中所进行的斗争和取得的胜利。应该说，这些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该时期里，甚至还形成了“高加索学”（кавказоведение）这样一门专门学问，一些研究高加索问题的学者成为高加索问题专家，并因之而著称。但是，总体说来，在整个苏联时期，北高加索问题或者车臣问题较为敏感，较少被过问。这并不是说，有关车臣历史或现状的问题不那么重要，而是因为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苏联的社会政治空气逐渐紧张，许多研究领域成为禁区。著名的高加索问题专家阿·尼·亨科就因为

"反苏宣传和沙文主义"于1938年被逮捕[1]，其他研究高加索历史以及其他民族问题的民族学家的命运也与此类似。1944年车臣和其他民族一起被流放之后，将车臣问题或北高加索问题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在政治上就更加危险。苏联国内的许多民族问题，连俄罗斯人自身都对其都不很了解。当一个问题真正重要的时候，该问题却正是因为重要而犯忌。因此，苏联学者对于车臣或者北高加索地区历史的选题，仅仅限于对于其中世纪历史甚至是远古历史的研究，其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在于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方面。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如B. П. 阿列克谢耶夫《高加索各民族的起源》(莫斯科1974年出版)等。受到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以及苏联政府对历史学家的授意，这些学术研究题材狭窄，除了关注北高加索各民族的"劳动传统、爱国传统、解放传统"之外，更多的是阐述"劳动群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状况"，同时还研究了邻国对北高加索的时常入侵，如"各民族在许多世纪里反抗阿拉伯和蒙古—鞑靼侵略者、伊朗、奥斯曼帝国和克里木汗国的斗争"[2]。在这些反抗斗争中，俄罗斯"保护这些地区和国家的人民不受外来侵略"；同时，这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这些地区加入俄罗斯帝国所具有的客观上的进步后果"[3]。在对北高加索地区各民族历史的研究过程中，过多地强调苏联各民族的共性。忽视，甚至无视这些民族所走过的独特道路，以及这些民族在归并俄罗斯帝国(和加入苏联)之前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以及由此而来的民族自我意识。因此，所有的研究最终都以论述十月革命对于少数民族的伟大历史意义为归宿——教条主义对苏联史学研究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同苏联国内大多数的较晚加入俄罗斯或苏联的民族的历史一样，对北高加索民族的历史研究被可悲地意识形态化。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在整个苏联时期，也培养了一批车臣民族的知识分子，车臣民族、乃至北高加索地区的知识分子对于本民族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到苏联政权接近垮台的那些年代里，他们陆续地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除了莫斯科以外，一些重要的学术书籍正是在格罗兹尼和马哈奇卡拉等地出版的。除了那些怀有政治动机、企图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为某种工具或进身之阶的学者外，车臣乃至北高加索地区学者的研究成果非

常值得重视，是研究该地区各民族历史问题的学术中心。苏联解体后，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出版了许多选题、资料、观点都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成果，如：论文集《车臣—印古什伊斯兰教历史》（格罗兹尼1992年出版）、瓦希德·阿卡耶夫《民塔—哈吉：生平与学说》等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这些穆斯林地区的出版物以及学术会议、讨论会、圆桌会议证明，当代俄罗斯的穆斯林地区在学术上并非是浅尝辄止的。"[4]

苏联解体后，车臣问题不言而喻地在俄罗斯受到了极大重视。俄罗斯许多地区出现民族问题甚至民族危机、爆发冲突。在一个时期内，许多人担心俄罗斯再次面临解体的危险。车臣危机不仅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它也是社会与国家的冲突、地方与中央的冲突，不同社会体制之间的矛盾的典型案例。车臣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重要的范例和模式。车臣危机的爆发及其持续，其深度与广度都表明：车臣与俄罗斯需进一步融合，车臣社会与整个俄罗斯社会并非完全一体、同质，而外部世界，包括俄罗斯在内对于车臣社会也缺乏足够了解。由于这种现实需求，俄罗斯国内，包括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出版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车臣危机是苏联历史、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分析车臣危机可以见微知著；反过来，当代国际政治的某些重要方面也在车臣危机中巨细无遗地显露出来。

在这一时期，俄罗斯有关车臣问题的学术研究的功利性极其明显，那就是：为解决车臣危机这一现实问题提供思路和决策。有关车臣问题或其他民族问题的学术出版物非常之多，表明俄罗斯对车臣危机的关注程度在提高，学术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有人说，近10年来，有关车臣的文献和出版物，超过了过去所有时代的数量。在所有这些相关出版物中，较为重要的著作可以简单地加以分类。

一、继续出版有关19世纪高加索战争的回忆录、军事报告等经典文献，如：《高加索：土地与鲜血》（圣彼得堡2000年出版），以及多卷本的《高加索战争回忆录》，据该书主编的说法，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让人们，尤其是俄罗斯军方掌握有关车臣的知识，用知识武装起来，吸取在19世纪里俄罗斯帝国军队在高加索战争期间的惨痛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是由于现实问题而产生的历史感使然。

二、苏联通史（或俄罗斯通史）、或关于苏联（俄罗斯）某一

方面的专门史，较有代表性的是这样几种：维尔特《苏维埃国家史1900—1991》（莫斯科1995年出版）、杰弗里·霍斯金《苏联史：1917—1991》（莫斯科1995年出版）、《19世纪到20世纪初俄罗斯史》（莫斯科2000年出版）、理查德·萨克华《俄罗斯政治与社会》（伦敦与纽约1996年出版）等等。

三、论述俄罗斯境内的民族问题或者其他社会政治问题，如冲突学等的专题学术著作，如《有过这样的事情：1919—1952苏联的民族镇压》（莫斯科1993年出版）、《苏联和后苏联国家中的民族史》（莫斯科，1999年出版）、《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群众骚乱：1953年到80年代初》（新西伯利亚1999年出版）、《危机民族》（莫斯科1993年出版）、《冲突民族与民族冲突》（莫斯科1994年出版）、《欧亚地带的民族与地区冲突》（莫斯科1997年出版）《俄罗斯帝国的民族边疆区：管理体制的出现与发展》（莫斯科1997年出版）等等。这类著作大多涉及车臣问题，或北高加索问题。

四、政治法律文献汇编，包括车臣独立，或者说“车臣革命”前后，有关各方签订的协议、俄罗斯政府和车臣共和国方面发表的命令、宣言、声明等，如《俄罗斯与车臣：文献可以证明1990—1997》（莫斯科1997年出版）、《车臣战争中的记者：事实、文件、证据。1994年11月到1995年12月》（莫斯科1995年出版），以及一些专门机构所做的统计、专题性调查报告，如《高加索战争的无名士兵：1994—1996年间俄罗斯军队的损失：牺牲，失踪，被俘》（莫斯科1997年出版）、《俄罗斯与车臣：错误与罪行的链条》（莫斯科1998年出版）。

五、当代的战争亲历者撰写的回忆录：如格那迪·特罗舍夫的《我所亲历的车臣战争》，其中披露了战争爆发、乃至战争进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和作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的风云人物们的一些生动描述和刻画。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车臣问题的专门著述开始不断发表，如《车臣共和国：寻求政治调解的意识形态》、《车臣：从冲突到稳定、重建问题》（2001年出版）、《五年之后的车臣：圆桌会议资料集》（2000年出版），等等。除专著外，还有大量论文、文章等，都从不同角度对车臣历史和现状做了深入探讨，几乎已涉及车臣问

题的所有方面。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代俄罗斯，由于车臣战争，以车臣战争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开始兴起。这方面有许多著作，而且还将越来越多，如：诗集《“车臣”时代：关于车臣的诗篇以及其他》、长篇小说《我参加了这场战争》、尤里·康德拉切夫回忆录《格罗兹尼：一年中的几天》、苏丹·雅舒尔卡耶夫《一位车臣作家的日记》，等等。

但是，至今为止，很少对车臣危机所涉及的所有问题和方面，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专题研究，也没有作者从车臣—俄罗斯关系史这样一个宏观角度进行分析。

俄罗斯学者是车臣问题的主要研究者，但是，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不单是俄罗斯学者，西方学者也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对于掌握并采用第一手资料来说，西方学者相对于俄罗斯学者并无太大优势，其学术成果的价值主要在于超越俄罗斯内部社会冲突的西方世界的独特视角，其选题往往新颖且具有前瞻性，以及西方学者所采用的方法论。我国学者的研究实际上较为薄弱。在很长时期里，我国国民缺乏关于车臣以及车臣民族的知识。除了大量时事报道以外，只有一些零星的论文和文章及一些译著问世；至今没有一部有关该问题的基础性著作。此外，以往有关车臣问题的文章，往往是在研究苏联特定历史时期民族政策时，被作为一个具体部分而简单涉及。近年来我国学者开始关注车臣问题，但是，往往只限于特定的选题范围，如军事方面：将其作为反恐战争的典型案例来进行战略、战术分析。

在研究过程中，我深深感到，所有资料都有两种缺陷：一、是资料太多。最近几年，关于车臣问题的出版物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要完全彻底地将所有这些材料都阅读、消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我写下这番话的时候，不知又有多少新出版物面世了；二、是资料太少。要对某个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又显得资料不足。车臣问题又千头万绪。由于种种现实的困难，我们无法亲自走进车臣人的生活，感受车臣社会状况。那么，对我们而言，一些资料实际上就是二手的，很难成为支撑我们观点的血肉。

在参考文献的选取方面，按照出版形式来划分，可以分为传统出版物和电子出版物两部分。传统出版物主要是各个时期公开出版的研究成果，专门性学术著作、论文。今天，电子出版物已经成为

从事研究工作的重要资料来源。如果在俄罗斯网站的有关搜索引擎，键入有关车臣问题的关键词，相关网页数以万计。在因特网上，除了时事报道、论文、政论、文章外，还可以检索、下载许多严肃的学术著作。

对于材料的征引，作者的首要依据，是该资料的学术性。对于时事报道，主要用以补充说明车臣问题的最新进展，以期互相引证、互相补充。这些报道往往着重于重大事件中一些个人，一些具体方面，而这些具体、细微的方面又折射出了动荡时代的个人、乃至民族的难测命运，更接近历史真实；但是，由于受到一些财团或组织的控制，一些传媒具有某种显而易见的倾向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失实的。对其立场和观点，也需要分析、比较和鉴别。除了俄罗斯官方、以及俄罗斯学者的论著以外，作者还将俄罗斯反战派别，如维权组织等的出版物、车臣族学者、车臣分裂武装的出版物，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西方出版物和西方媒体舆论等作为资料来源，以图互相比照，避免偏听偏信。

车臣战争爆发至今已经十年过去了，至今也并没有在完全的意义上结束，而有关车臣问题仍然存在许多认识的盲点。在很长的时期内，车臣危机爆发的一些台前幕后，大约对于许多当代人来说，都将是一个谜。它涉及一些肮脏的阴谋，涉及至今仍然活跃的某些集团和个人。若是公布将会彻底推翻以往的宣传和定论，一些人将因之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即或是俄罗斯学者，我们无法获知这些致命的秘密。它对于普通人而言，具有震撼性的认识价值，而对于当事人，则宁愿其在记忆中速朽。

本书试图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国际政治理论、地缘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解决以下主要问题：考察车臣危机的根源、实质，并做出学理分析和解释；论述车臣危机对车臣与俄罗斯的社会政治所导致的后果；分析其现状及前景。

本书全面考察了导致车臣危机爆发的各种因素，并将其明确归结为五个因素。当然，所有这几个因素并非平均发挥作用，而是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阶段上，分别起了不同作用。

历史因素：19 世纪沙米尔建立教权国家以及反抗俄罗斯侵略的历史意义；1944 年流放、以及之后又为其平反、允许其返回，导致消极后果，产生许多遗留问题。车臣危机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但

是，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却来自现实。历史因素是个前提和客观存在，但是，不能自然地决定政治进程；而且，历史上的消极因素可以通过现实中高超的政治技巧和得当的政策加以扭转和纠正。

现实因素：现实因素，才是引发车臣危机的直接原因。车臣分裂派领袖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政治利益，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利用苏联解体进程中的混乱状况，挑战俄罗斯中央的主权。车臣危机始于戈尔巴乔夫改革，那些导致苏联解体的因素，也是引发车臣危机的重要原因。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带来的消极后果影响了车臣社会政治进程，而苏联和俄罗斯政治家的政治斗争也为车臣危机的发展推波助澜，使车臣危机难以解决。

伊斯兰因素：伊斯兰教作为车臣人的主要信仰，是车臣民族认同的一部分，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内外压力，导致车臣走向伊斯兰激进化。

文化差异：车臣民族有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距离现代文明还有相当差距，因此很难融入俄罗斯社会；而俄罗斯社会对车臣人的成见和偏见，也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外部因素：车臣危机的爆发、发展等各个阶段，都有外部势力参与，主要是伊斯兰势力和西方势力。当然，外部因素是通过车臣和俄罗斯内部的因素发挥作用的。

车臣危机折射出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国家深刻的民族进程，表明俄罗斯国家政治控制力的相对，或绝对下降。俄罗斯军队在车臣的挫折，以及俄罗斯社会为车臣危机与战争付出的沉重代价，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民族遭受的苦难的缩影。

车臣危机并非一个孤立、毫无联系的个案。车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乃是从近代以来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在俄罗斯帝国征服车臣乃至整个高加索地区之前，车臣是孤立地、独自发展自己的历史的话，那么，从其被纳入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到被征服，就再也没有与整个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脱离过干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爆发的车臣危机，是苏联留下的痛苦的遗产，也是俄罗斯国家独立后政治生活中一处流血的伤口，一道死结。车臣危机的爆发、发展乃至最终解决，都是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将决定俄罗斯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历史命运。

车臣问题也不是单纯的俄罗斯国内政治问题，必须将其与大国在高加索地区的争夺结合起来，才能看得更清楚。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加索地区形成了地缘政治真空，于是美国、土耳其、伊朗等国家挤了进来，与俄罗斯展开争夺。车臣本身属于高加索地区，与高加索的社会政治进程、与大国在高加索地区的活动紧密关联。车臣只是大国角逐的环节之一；在车臣之后，还有一些地区也存在类似问题。本书详细考察了外高加索三国的地缘政治状况，对车臣问题乃至俄罗斯国家的影响。

高加索统一，是涉及包括车臣在内的整个高加索地区的重要问题。高加索统一的方案，关系俄罗斯等国家的战略利益。本书对高加索统一的历史，包括其构想和政治运动进行详细考察，对当代高加索统一的理论和实践做出分析，指出其实质。

由于所研究的问题头绪繁多，为了论述便利，本书不仅仅以时间为线索，而且还将依据论述的逻辑层次，分别展开，安排章节，而在内容有交叉的个别地方则前后详略互见，以便读者能够形成总体的观念。

车臣危机一直是国际政治焦点之一。车臣发生的事件影响了国际政治进程，即使最遥远的外国也能感受到这种影响。当本书即将完成的时候，距离骇人听闻的别斯兰事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车臣已经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似乎只有车臣或俄罗斯某地发生了惊人的恐怖事件，才能引起他们的短暂关注。然而，当代的任何重大事件都需要经过时间的积淀才能够看得清楚。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对于车臣问题进行历史分析，也许才逐渐具备了一些条件。

注　释：

〔1〕T. M. Швецова, Репрессированные этнографы, M, 1999, C. 106.

〔2〕Дмитрий Фурман, Азербайджан и Россия :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M, 2001, C. 3.

〔3〕同 1, C. 5.

〔4〕A. Малашенко, Исламск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M, 1998, C. 13.

目　录

前　言 / 9

第一章　车臣人的起源与早期俄罗斯—车臣关系 / 1

1 车臣人概况

3 车臣人：从蒙影中走来

6 大国关系中的车臣人

9 高加索战争前车臣的经济社会状况

11 伊斯兰教传入车臣与车臣的伊斯兰化

13 早期俄罗斯—车臣关系

第二章　沙米尔伊玛玛特（имамат）与车臣归并俄罗斯 / 20

21 沙米尔及其伊玛玛特（имамат）

28 沙米尔伊玛玛特解体及车臣归并俄罗斯

31 俄罗斯帝国对车臣和北高加索的管理

第三章　十月革命后车臣的政治法律地位：1917—1944 / 36

37 艾米尔国

39 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山民联合同盟（1917—1918）
41 山民共和国（1918—1920）
45 苏联时期车臣的行政建制

第四章 流放车臣人：原因、历史事实与后果 / 49
49 斯大林流放各民族的阶段及其背景
53 车臣人叛变情形严重
60 流放车臣人的步骤
63 车臣人在流放地
66 车臣人的平反与返乡
70 流放导致的严重后果
74 平反：走向另一个极端

第五章 车臣危机中的现实因素 / 79
80 车臣的经济危机
83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车臣政治失控
87 民族主义：车臣人的双刃剑
93 莫斯科：车臣危机的策源地

第六章 车臣危机：阶段、特点 / 100
100 “车臣革命”
115 危机各阶段

第七章 车臣危机中的伊斯兰因素 / 140
140 俄罗斯：伊斯兰复兴
145 瓦哈比派与车臣的伊斯兰激进化
152 车臣伊斯兰激进化：实质与后果

第八章　俄罗斯人眼中的车臣人：文化差异与政治学 / 159

第九章　车臣危机与外部因素 / 173

173 车臣危机是西方的阴谋

176 高加索地区对车臣问题的态度

179 反俄宣传：台前与幕后

184 车臣分裂派的资金来源

187 西方、俄罗斯、伊斯兰世界：文明的冲突

第十章　车臣危机的后果 / 201

202 车臣：俄罗斯滑向谷底

206 车臣的人权状况

209 车臣决定俄罗斯的命运？

212 军事手段的相对性

214 车臣与恐怖主义

220 当代俄罗斯的车臣回忆

第十一章　车臣的现状与前景 / 226

226 俄罗斯重新控制车臣

229 卡迪罗夫、马斯哈多夫及其他

236 恐怖升级：别斯兰人质事件

241 俄罗斯：别斯兰之后

244 车臣的前景

第十二章　大国在高加索的争夺：现状与前景 / 249

249 车臣在高加索的链条上

253 高加索：大国角逐的前沿
257 外高加索国家概观
260 外高加索三国的地缘政治现状
280 问题与前景

第十三章 高加索统一：构想、实践及前景 / 286
287 高加索统一：思想及其历史回顾
290 一体化的现实需求
295 “高加索邦联”与高加索统一方案
301 高加索统一：现实性及其前景

车臣历史大事记 / 308

参考文献 / 312

第一章

车臣人的起源与早期俄罗斯—车臣关系

车臣人概况

车臣人，是北高加索地区众多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在现代，所谓的车臣人有多种划分方法：比如，按照所生活的地域，可分为山地车臣人和平原车臣人；或者用组成车臣社会的各个泰普（相当于部族，部落）来加以区分。今天的车臣人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境内；此外，在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北奥塞梯共和国、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卡尔梅克、伏尔加格勒、阿斯特拉罕、萨拉托夫、秋明、莫斯科等地都有车臣人聚居区。按照1989年最后一次全苏人口统计的结果，俄罗斯联邦境内总共有车臣人898999人，占苏联车臣人的94%。主要居住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境内，总共为734501人，占苏联车臣人总数的76.8%。在俄罗斯联邦以外，车臣人的分布情况是：哈萨克斯坦49500人，吉尔吉斯26000人，乌克兰18000人。除了前苏联地区以外，在约旦、土耳其等国家也有少量车臣人的后代[1]。实际上，在许多个世纪里，车臣人几乎很少迁居到高加索地区以外。俄罗斯境外的车臣人多半是在

俄罗斯帝国征服高加索之后、以及苏联时期的民族迁徙导致的结果。土耳其、约旦等国的车臣人是1864年沙皇俄国组织迁徙所造成的，而中亚各国的车臣人则是1944年前后苏联政府流放车臣人的结果。1991年1月进行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人口统计表明：车臣境内人口总共1270429人，其中车臣人734501人，印古什人163762人，俄罗斯人293771人，亚美尼亚人14824人，乌克兰人12637人，犹太人2651人，白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口为2577人。到1991年车臣宣布独立前后，车臣领导人以及媒体谈到车臣人口的时候，通常都号称100万人，当然，包括了车臣以及整个俄罗斯境内外的车臣族。“100万车臣人”，成为20世纪90年代车臣民族意识或潜意识的一部分[2]。

在俄罗斯对车臣的征服过程中，按照聚居地区，将车臣人划分为好几个集团：如阿尔金人、阿塔金人、那兹兰人、卡拉布拉克人、杰拉西人等等；但是，这些划分办法只对俄罗斯人有意义，车臣人从来不这样区分自己的民族因为这些名称实际上表明了车臣民族起源时的不同分支。车臣人自称诺赫奇（нохчий，复数）或者诺赫乔（нохчо，单数），所有的“诺赫奇”都讲车臣语或车臣方言。

车臣的俄语称呼（чечня）是如何起源的？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车臣”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俄罗斯文献中是在1708年[3]，而在18到19世纪的文献中就成为对居住在东起阿克塞河，西到弗尔坦戈河范围内居民的主要称呼。从18世纪起，格鲁吉亚和西欧的文献中也开始使用这一称呼。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是：它得名于位于格罗兹尼东南，阿尔贡河岸上的名为车臣的村庄。此处是历史上车臣的“国家会议”所在地。车臣历史上有几个知名的“国家会议”召开地，会议的召开地随着车臣所面临威胁的来自方向而改变。在整个17世纪到18世纪里，会议召开地选在车臣村，是由于来自诺盖汗和卡尔梅克汗——稍后是由于来自俄罗斯帝国——的威胁。

由于不同民族语言的发音规则不同，车臣人的邻族对车臣人也有不同称谓：高加索的突厥民族称车臣人为“萨桑人”；卡巴尔达人称车臣人为“沙裳人”；奥塞梯人称车臣人为“嚓仓人”；列兹金人称车臣人为“恰呛人”；格鲁吉亚人称做“切切尼人”或者“基斯梯人”；诺盖人称做“舍申人”，等等，不一而足[4]。“车臣人”的不同发音让人联想起与之发音相近的一个表示社会阶层的词汇，即“萨珊人”或者“塞森人”，这个词在欧亚许多民族的词汇中都曾出现过。正如古埃及的那木虎集团以及俄罗斯的哥萨克一样，在伊朗，“萨珊”是一个军人—养马

者阶层，是一个社会阶层的名称。在蒙古语中，“塞森”也是一个具有某种权威涵义的词汇，意味着“显赫，杰出”。在特定历史时期，用类似术语作为族名较为常见：强调某种特殊性，用做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自称，是一个趋势。例如，德语“法兰克”一词，意为“自由人”，而这就成为法兰西人的自我称谓。

在12世纪，车臣人曾经建立过自己的王朝，并与格鲁吉亚国家联系紧密；对于格鲁吉亚皇室来说，与这个车臣王朝联姻，是很尊贵的事情。在当时，格鲁吉亚称车臣人为“杜尔祖克人”或者“祖尔祖克人”。车臣人称自己为诺赫奇（нохчий 复数）或者诺赫乔（нохчо 单数），这个称谓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在车臣人生活中复活了[5]。在车臣人的记忆中，有这样的观点，即：诺赫奇只是山地车臣人称呼“平地”居民的。有关这些称谓的起源，也有不同的说法。车臣民族学家C. A. 哈西耶夫认为，“诺赫奇”的词源大约来自“耕地者”、“庄稼人”这样一些词，这种推断的依据在于车臣人邻族的族名特点：当时，车臣人称阿瓦尔人为“需犁”（сюйли，意为“牧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车臣人的族名来自车臣神话。在一则神话中，一名车臣男孩出生时，一手拿着铁器（象征勇武），另一手拿着奶酥（象征好客），而车臣语“诺赫”（нох）即意为奶酥。

车臣人称车臣语言为那赫民族的语言，那赫语言源自远古中亚和外高加索的胡里特—乌拉尔图语，属于高加索语言体系。北高加索语系分两支：西高加索和东高加索语。西高加索语系包括阿布哈兹—亚迪格，东高加索语系则包括那赫—达吉斯坦语系。车臣语、印古什语、和巴茨比语属于活着的那赫（нах）语。车臣人与印古什人互称“瓦依那赫”（Вайнах），“瓦依”（Вай）意为“我们的”，“那赫”（нах）意为“人们”，而“瓦依那赫”可以译为“自己人”。属于西高加索语系的有亚迪格、卡巴尔达、乌贝赫、阿巴金、阿布哈兹以及赫梯等语言。东高加索语系包括3支：1. 东部语支，或列兹金—达尔金语；2. 中部语支，或阿瓦尔—安多切兹—拉克语；3. 西部语支，或那赫语：包括车臣语、印古什语、巴茨比语等3种。而在现代，操西部语言的人数是最多的[6]。

车臣人：从蒙影中走来

车臣民族是有自己独立的历史的。车臣人的早期历史湮灭无闻，是因为车臣人长期在偏远的山区从事游牧，没有文字，不能记载自己的历

史，也没有像其他一些民族那样，留下宏大的史诗，或者有关民族起源和发展历史的神话传说，如藏族的《江格尔》，吉尔吉斯人的《玛纳斯》等等。仅有的一些传说也都没有提及车臣人的起源以及俄罗斯人出现在高加索之前车臣人的发展状况，也许车臣人确实缺乏历史感：他们的传说简单而贫乏，且往往并不标示特定的时空范围，而且这些传说仅涉及车臣中部。车臣人的起源问题，就像一团迷雾一样难于索解。当代车臣人有一个口传的传说，是这样讲述车臣民族的发展过程的：大约2000多年前，若干个山地家庭从伊奇凯里（Ичкерия）车臣东南部山区中走出来，沿松日河各支流定居。据说，他们的先人是一个叫阿里·阿拉布的人，因为在家乡犯了罪，逃亡于此，但是，他在居民中威望很高，受人尊敬。他的儿子叫纳奇虎（Наҳхоо），因为膂力超人、勇敢无畏，被称为图尔帕尔（“壮士”），由他奠定了部落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逐渐繁衍为一个大的民族；所以至今车臣人都认为伊奇凯里群山是车臣民族的发祥地，摇篮[7]，将其视为自己的先祖。还有人则认为，车臣人祖先乃是匈奴人中的一支，最早生活在中国长城以北，从事游牧并从农业居民那里抢掠。由于中国军队的抗击，匈奴被迫从中国境内退了出去，向西伯利亚和西方迁徙，其数量估计在几万到12万之间，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这是很大的数目。“他们就像一群摆脱报复的狼群一样。其中一支越过伏尔加河后，以狼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大部分人都在伏尔加河附近定居，成为哈扎尔人的祖先，并与伏尔加河流域以及高加索的游牧民混杂在一起。最初是阿瓦尔汗国的一部分，阿瓦尔汗国解体后，加入了哈扎尔汗国。车臣人就是从这支匈奴人起源的”[8]。这是有关车臣民族起源最明确、同时也是最大胆的假说。诚然，包括古米廖夫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横跨欧亚大陆的所谓“大草原”乃是许多民族的发祥地；但是，假说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来证实。

公元1世纪的古希腊《地理学》中曾经提到瓦依那赫人这个民族共同体。他们最早生活在中高加索，是中高加索的古老居民，从氏族部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些部落创造了古老的卡雅肯特—哈喇乔依文化，该时期属于青铜时代晚期、铁器时代早期。有人推断，创造科帮文化的一些部落也参与了瓦依那赫民族起源的进程。7世纪的《亚美尼亚地理》一书中，讲到瓦依那赫民族的居住范围与今天的范围大体一致。可见，由于地理环境、经济方式、生活方式的特点，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瓦依那赫民族的居住地域没有太大变动。到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瓦依那赫民族与斯基泰人联系密切。至今在北高加索地区还有斯基泰人留下的许

多遗迹，以及一些与斯基泰人有关的考古遗存。后来，瓦依那赫人与萨尔马特人、阿兰人的联系较为密切。在文献中，最早提到的车臣境内的国家，乃是中世纪早期9到12世纪建立的阿兰人国家，其范围主要限于平原和山麓地区和谢里尔国家，在高山区。公元8世纪到公元10世纪，阿兰人国家的统治范围就包括车臣的平原地区。匈奴人兴起之后，开始袭扰瓦依那赫部落，平原和山麓的瓦依那赫人逃往山区，他们在山麓的土地随即被哈扎尔人、突厥人、阿兰人占据。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车臣人是面目不清的，外界对于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概念。直到16、17世纪，甚至更晚，车臣人都没有文字，因此，苏联历史学家主要倚重的是北高加索的历史遗存，考古学成为研究车臣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和手段；此外，有关俄罗斯与该地区其他民族关系的文献资料也零碎地涉及车臣的社会发展状况；但是，这些资料给研究者们带来许多困难，他们往往陷入古代文献关于车臣（北高加索地区）的地名以及其他名称的迷宫中难以自拔。

在文化相对先进的相邻民族的记载中，对车臣人的记载充满偏见，认为车臣人是一个“强盗”和“盗贼”的民族：他们是一些掠夺和袭击的好手，是一帮没有名目的人群，人们对他们的了解就是“山民”，或者用“切尔克斯人”——高加索民族之一笼统地称呼所有的山地民族和部落，直到19世纪都是如此。

13世纪的鞑靼—蒙古征服，也将一部分车臣领土归入金帐汗国，由于鞑靼—蒙古人几乎征服、统治整个亚欧大陆，俄罗斯人和车臣人被纳入同一个帝国，两个民族就有更多接触和交往的可能。史书记载，著名的征服者帖木儿远征俄罗斯的时候，曾经经过高加索地区，而且，帖木儿军队中就有包括切尔克斯人在内的许多民族。据说，由于切尔克斯人烧了亚速海与库班河之间的牧场，导致帖木儿的战马挨饿，帖木儿对切尔克斯人展开报复，将那里的堡寨击毁[9]。经过帖木儿征服，此前建立的车臣人早期封建国家西姆西姆就解体了。一直到16世纪甚至18世纪，史书中记载了车臣境内的几个较大的封建公国：奥克茨和车臣，但是，整个车臣各部仍旧处于分裂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车臣各部往往成为卡尔梅克人、卡巴尔达人、诺盖人等相邻民族的袭击对象。直到18世纪末期，车臣人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统一国家，这是车臣人长期不够强大的原因之一，也是车臣人进步缓慢的重要原因。

16世纪下半期，捷列克河和松日河交汇处出现了大批哥萨克，车臣人开始与俄罗斯人有了接触。到18世纪初，哥萨克已经在这里站稳脚

跟，建立了许多军屯。一些因血亲复仇而逃亡的车臣人也移居到哥萨克中间。

17 到 18 世纪，车臣社会发生分化，主要在平原地区，出现了贵族群体，称为“爱利”，即大公。自由农民自称“乌兹金”，似乎是全体平等的。但是，在他们中间也发生了分化，一些人被认为是“最好的”，或“当官的人”[10]。18 世纪，“乌兹金”上层拥有大量土地，剥削穷人和农奴“好劳仆”。村镇长老拥有很大的权威，其权力在很多情况下是世袭的。16 到 18 世纪里，毛拉（Мулла，阿拉伯语，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等宗教人士开始在社会中享有特权，清真寺有自己的资产：土地和牲畜。18 世纪里，宗教界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宗教上层人士想用教法取代习惯法。即使是大公，也必须听从大家族和富有家族代表的会议所作的决定。大公常常担当村庄首领，同时，大家族有权在领地内设立公堂并收取罚金，还有自己的卫兵和藩属。这样，就在大公周围形成了一个管理者阶层：形成了大公的行政机构。

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上，17 世纪中期，车臣境内出现了图尔罗夫公国。与俄罗斯历史上的“瓦良格人应邀为王”的故事类似，应车臣人之邀，达吉斯坦大公图尔罗夫家族来到车臣，统治车臣人。但是，车臣人并不总是听从他们，常常将他们杀死或驱逐，这些情节也与古罗斯的历史何其相似！在图尔罗夫家族的统治下，车臣人强大起来，但是，车臣人强大起来之后，也开始对周围部落实施抢掠，那些原来欺凌过车臣人的库梅克人、卡巴尔达人、卡尔梅克人和诺盖人都对车臣人感到畏惧。

大国关系中的车臣人

中世纪的外国作者说，山民是一些好战的人们，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随着高加索周边各国的兴起，北高加索各民族开始在该地区的国际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初，高加索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北高加索西部的沿岸地区，1502 年在伊朗和阿塞拜疆境内出现了一个强国，开始对高加索发动进攻。同时，在克里木鞑靼人、俄罗斯、山民的联合打击下，大帐汗国，即金帐汗国的继承者灭亡了。作为军事力量来源和进一步征服的根据地，各大国都极力拉拢北高加索地区。同时，北高加索内部也不断发生纷争和内讧，内讧双方常常去争取邻近大国的支持，而大国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也乐于加以利用，积极介入内讧。

置身诸大国之间，山民们通常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在他们看来，遥远的俄罗斯的威胁要小于紧邻的土耳其和波斯，甚至可以作为自己的盟友。16 世纪 40、50 年代，为了抵御奥斯曼帝国及其藩属克里木汗国的入侵，山民们站在俄罗斯方面，最终导致俄罗斯在与金帐汗国继承人之间的战争中获胜，获得了通向里海和北高加索的出海口。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活动随即积极起来。1557 年，俄罗斯与卡巴尔达、切尔克斯、亚迪格的个别公国建立友好关系。1567 年，在松日河注入捷列克河的地区建立了一个俄罗斯要塞，俄罗斯与瓦依那赫人从此建立了政治联系，一些瓦依那赫部族成为俄罗斯在北高加索的盟友。

1571 年和 1578、1579 年，土耳其要求撤除要塞，阿金人（车臣人的一支）接受了俄罗斯的哥萨克。16 世纪 70、80 年代，阿金人的统治者甚至同哥萨克一道，参加了反土耳其的军事行动，打击在达吉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土军。



捷列克河要塞上的俄罗斯人

1588、1589 年，俄罗斯在捷列克河河谷重建要塞，车臣首领谢赫—穆尔扎恢复了与莫斯科的联系，并且在俄罗斯发展与北高加索诸公国以及与格鲁吉亚、阿瓦尔汗国的政治关系方面起着重要的联系作用。1588—1589 年，瓦依那赫人向莫斯科派出一个官方使团，并且签署了一个正式条约，谢赫—穆尔扎与莫斯科的藩属关系正式确立。1596 年谢赫—穆尔扎被打死，许多车臣家庭逃到捷列克河上的俄罗斯要塞避难。当时，车臣东部的居民已被认为是俄罗斯臣民。17 世纪 50 年代，阿尔

贡高地曾经派使团前往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的乌斯宾大教堂向沙皇宣誓效忠。

1603 年到 1639 年的伊朗战争改变了北高加索的形势，同时也决定了瓦依那赫人的政治路线。1604 年到 1605 年，车臣东部居民消灭了试图侵占达吉斯坦北部的俄罗斯军队，但是，北高加索人并不愿意将俄罗斯的势力完全排挤出去：波兰—瑞典战争期间，俄罗斯军队在捷列克河上的实力很弱，山民们援助他们粮食并给予政治支持。

当时，在争夺高加索的斗争中，伊朗、土耳其占优势，而山民们想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17 世纪 20 年代，伊朗对土耳其发动战争，企图控制卡巴尔达、达吉斯坦、车臣—印古什的土地，但是遭到失败。山民们还打退了克里木汗国的袭击。1639 年，伊朗—土耳其战争结束，双方签订了和约，划分了在高加索的势力范围。伊朗企图确立自己在北高加索的盟主地位，而土耳其和克里木汗想占据从黑海到卡巴尔达之间的地区，俄罗斯则想占据车臣—印古什、卡巴尔达、达吉斯坦[11]。

17 世纪 30、40 年代，反抗伊朗侵略的格鲁吉亚皇帝藏在靠近格鲁吉亚的车臣—印古什山区，车臣人、图希诺人、赫夫苏尔人和奥塞梯山民为其提供庇护和各种支持。

大国争夺，需要借助山民们的军事、政治力量，山民们则周旋于大国之间。1651 年到 1653 年，由于松日河的俄罗斯要塞问题，车臣—印古什人卷入俄罗斯—伊朗的大规模冲突。达吉斯坦封建领主的武装与伊朗军队一起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两次征服，一些瓦依那赫人参加了反俄行动，松日河要塞被拆除，伊朗的影响加强。1659 年，北高加索爆发了反对伊朗暴政的起义，起义山民遭到失败。

奥斯曼帝国虽然与俄罗斯等划分了势力范围，但坚持要控制达吉斯坦和瓦依那赫人的土地，甚至计划建立要塞：土耳其当时在北高加索的黑海沿岸以及外高加索，尤其是在格鲁吉亚占优势。考虑到奥斯曼帝国在此地的利益，俄罗斯着力同瓦依那赫人保持友好关系，以便维持平衡。1726 年，圣十字要塞接待了来自车臣平原村镇的代表，格鲁吉亚流亡皇帝也促成了俄罗斯与瓦依那赫人的良好关系。同时，车臣山民继续对俄罗斯的据点发动袭击。1732 年，科赫将军率军队前去镇压山民起义，结果被歼灭。1733 年，克里木汗国皇子率军队从车臣前往外高加索，车臣民兵武装加入其间，联合武装消灭了俄军。1735 年，俄罗斯被迫接受伊朗的要求，将边界移到捷列克河上。奥斯曼帝国宣称自己是达吉斯坦的庇护者，并派克里木汗率领八万军队到北高加索。克里木汗企图征服沿

途所有的山地民族，他要求瓦依那赫人援助并归顺。车臣尽管与克里木人有盟友关系，但是没有听从，并发动了游击战争。克里木汗接近了松日河，在通往汉卡拉峡谷的入口处设营地，遭到车臣民兵伏击，损失惨重[12]。克里木汗被迫放弃征服山民的尝试。

除了政治关系外，车臣人与俄罗斯的商贸关系也得到迅速发展。沙皇行政机构首次许可瓦依那赫人到基兹里亚尔要塞。哥萨克与山民们的贸易活跃，无须纳税。18 世纪 40 年代，山民们更加渴望建立友好关系，许多车臣部族成为俄罗斯的臣民。1748 年，沙皇外务委员会决定：车臣上层开始领取固定薪金。

18 世纪的最后 25 年中，许多车臣村庄都加入了俄罗斯国籍，表明俄罗斯在该地区影响扩大。沙皇行政机关还同平原车臣人订立了专门条约，保护通商。1783 年，俄罗斯征服了库班和克里木；同年又与格鲁吉亚建立了同盟。1783 年，沙皇军队两次侵入车臣—印古什平原，与车臣人发生了激战。

1785 年到 1791 年爆发的“先知”曼苏尔起义和 1787 年到 1791 年的俄—土战争，极大地影响了北高加索各民族的政治进程，俄罗斯征服北高加索的计划被迫推迟。俄罗斯（特别是在沙皇保罗一世的时候）打算按照联邦制原则在高加索建立一个对俄罗斯友好的国家。于是，1801 年俄罗斯将格鲁吉亚东部吞并，沙皇就开始重新制定从政治、经济和行政上完全征服山民的计划。

高加索战争前车臣的经济社会状况

在任何地方，自然地理条件都决定着人们的经济活动的方式和面貌，而对于车臣先民们的经济或社会活动来说，地理因素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北高加索地区的地形分为平原、山区、高山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车臣人在平原地区从事农业耕作，而在山地则放牧。16 到 18 世纪，瓦依那赫人主要从事放牧和农业。平原和山麓的自然条件适于种植，并且可以稳定地获得较好的收成。山地和平原借助一些器具进行人工灌溉。由于土地奇缺，山民们还必须垦荒，有时候大小“不超过一顶斗篷大小”[13]。车臣人养牛、马、兔，车臣山民主要放牧，然后用肉、油脂、骨头与平原居民换取粮食和手工艺品。车臣人还从天然或人工的油井里开采石油，用于医治皮肤病、润滑车轮，或者运到俄罗斯市场上出卖。

到18世纪末期，农业成为车臣平原地区的主要经济形式。平原车臣人播种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十分丰富，包括小麦、大麦、黍、玉米、黑麦、烟草、大麻等等，甚至还有蔬菜和瓜果：黄瓜、南瓜、西瓜和洋葱。但是，农业并非车臣人经济活动的全部，在一些地方，畜牧业占主导地位。资料表明：19世纪40年代，仅仅是捷列克河上游地区的一些车臣人就有20多万只羊，平均每家有100多只。平原地区的车臣人向库梅克人进贡绵羊，而且他们的主要食物是肉食，可见，车臣人的经济活动是农业和牧业并重，相互补充，而在具体的地方则有所偏重。农业是车臣人较为熟悉的和擅长的领域，而且收获较有保障，但畜牧业就是另一回事情。车臣境内森林茂密，没有优良牧场，发展畜牧业受到制约。

大约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车臣人从高加索山脉北坡移居到松日河与捷列克河之间、古杰尔梅斯与佛尔坦戈河之间的地区，开始了新的经济活动。这里的自然条件不同于山区，而车臣人就是这样赶着羊群来到了平原。至少在移居的初期，畜牧业是车臣人的主要经济部门。有研究者指出，来到平原的车臣人将畜牧业作为必需的生存手段，首先从事畜牧业[14]。山脚下的地理条件要求车臣人采用新的耕作方法，而习惯于山地条件的车臣人掌握新的耕作方法还需要时间。此外，山麓的土地是生地，需要长期开发才能播种收获。直到19世纪初期，车臣平原的土地状况仍旧不适合种植农作物。高加索战争的参加者回忆说，在从格罗兹尼到沙米尔官邸的广大地区，遍布密密麻麻、难以通行的森林，这些地区是典型的硫磺地，不适合种植。为了养活牲畜，也为了防范偷窃牲畜等现实威胁，车臣人结成一些小型农庄，但是车臣人的农业生产技术还是非常之低。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的结论是：到19世纪上半期，车臣人的经济活动仍旧以牧业为主要特色，而农业和牧业并存[15]。车臣人始终没有将自己的经济活动彻底转向农业，直到高加索战争之后，车臣社会才出现了商品货币关系。

由于经济活动形式的变化，车臣人的社会组织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在车臣山区，一直存在着由几个相邻村社组成的所谓“自由社会”。在车臣乃至北高加索地区，最典型的社会组织方式就是所谓的泰普结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一个宗法制的社会集团；泰普之下则是若干个大小家庭。车臣社会还盛行血亲复仇。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实际上是适应了当时极为低下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通过泰普组织，保护因生产力低下而导致的脆弱的经济。此外，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作为经济生活的补充的话，那也许就是北高加索山民中盛行的“掠夺经济”：不同泰普、

不同民族之间互相攻掠，抢夺牛羊财物，而且在山民社会中，观念上并不以为耻辱；而那些从事掠夺常常有所斩获者，往往被同族人视为英雄——确实，他们是一些以此为荣为乐的好汉。车臣人在小范围内，通常是以氏族部落为单位，建立起了有效的组织，但是总体看却是四分五裂，又身处许多具有攻击性的民族或部落，如库梅克人、诺盖人、卡巴尔达人中间，随时会遭受侵害。为此吃过许多苦头：曾经有一段时间，来自车臣邻族的骑士好汉将掠夺、打劫车臣人视为一个真正的节日[16]。处在这种生存环境下，车臣人开始认同这种弱肉强食的哲学。19 世纪上半期，随着经济发展，“自由社会”内部发生了分化。村社首领、宗教人士、军事领袖等组成了车臣社会的上层，他们经济上富足优越，可以自由分配财富，社会地位显赫，但是渴望更加优裕的生活，并且以血亲关系为拖累，希图摆脱。还有一些普通平民，靠勤恳劳作为生；此外，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陷入贫困的成员，从而就会导致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组织的变化。

宗教人士与世俗政治人物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宗教界人士在社会中享有很高威望，主管着信徒的精神生活，裁决诉讼，等等，希望建立教法以维持社会秩序；而汗和别克则竭力保留习惯法来组织社会生活。同时，汗与别克之间以及各“自由社会”成员间经常因财产、土地发生纠纷。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甚至发展为武装冲突，因而就出现了政治危机。随着危机状况的不断发展，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社会就需要一个统一、稳固的政权来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结束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否则社会就会在无休止的冲突中毁灭。同时，来自北方的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也正在持续其征服进程，逐渐向北高加索地区推进，这对于北高加索各部落是一个现实威胁。俄罗斯威胁成为一个催化剂，外敌当前，北高加索各个部落统一和联合的趋势加快。在与俄罗斯敌人的斗争过程中，北高加索各部落萌发民族意识，逐渐形成民族。

伊斯兰教传入车臣与车臣的伊斯兰化

在伊斯兰教传入车臣之前，车臣人和北高加索的许多民族一样，盛行各种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在车臣人乃至整个瓦依那赫人崇拜的神灵中间，主要有独眼的叶尔塔（Елта，野兽的驯服者、猎神）；以及哀特（Этер，亡人之神，时间的统治者）；还有塞拉（Села，火神）；等等。而在所有这些神灵中至高无上的神灵，是德拉神（Дела），是其他一切

神灵之父，甚至在车臣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德拉神就被用来标示真主安拉[17]。这些神灵崇拜，反映了车臣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生活，也是车臣人在特定的经济文化发展阶段上所形成的世界观。车臣人乃至整个瓦依那赫人的神灵崇拜，其思想基础和前提是万物有灵论。每一个车臣的泰普、村庄都有自己的庇护者。这一庇护者或者是神灵，或者是逝去的先祖。在车臣人或瓦依那赫人的村庄里，通常都为这些神灵或先祖建有神庙，以便能够护佑自己。在车臣人看来，甚至群山自身也有灵性，车臣人常常怀着敬畏，供奉祭品，特别是在举行葬礼时。除此而外，车臣人还崇拜各种繁琐、复杂的、或善或恶的精灵或魔鬼；车臣人相信：这些精灵或魔鬼能够依据人们的行为，决定对人是进行帮助还是加以惩罚。

伊斯兰教传入北高加索是在公元8世纪，阿拉伯向东发动征服战争的时期。伊斯兰教在车臣的传播是一个长期逐步的过程。在此前后，基督教也曾在这些地区传播，格鲁吉亚受到很大影响；但是，随着伊斯兰教在此地的大规模传播，基督教很快就趋于式微。各地车臣人对伊斯兰教信仰的接受情况是不平衡的。车臣东南部的居民更早接受伊斯兰教，18世纪末、19世纪初，伊斯兰教在平原车臣的中部和东部已经站稳脚跟；而在车臣山区，传统的神灵崇拜依旧有很强的生命力。大批车臣居民接受伊斯兰教是在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在伊斯兰教传入车臣之后，伊斯兰教与车臣人的神灵崇拜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较量，两者奇特地结合起来，这些从其神话传说也可以得到印证。与接受伊斯兰教之前相比，其神话传说发生了很大改变，显现出伊斯兰教义的主旨；同时，伊斯兰教的许多教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认为，一方面，这是车臣人在接受伊斯兰教的时候，按照自己的传统观念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另一方面，为使车臣人容易接受，最初的伊斯兰教传教士做出局部“修正”，适应车臣人的精神和感情需要。19世纪上半期，北高加索各民族为了反抗共同的敌人——沙皇俄国的殖民侵略，以伊斯兰教为思想武器联合起来，这种情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运用伊斯兰教术语和教义来解释与沙皇俄国侵略者的斗争，更多居民开始接受伊斯兰教。车臣以及整个北高加索的伊斯兰化进程，由于来自俄罗斯的外部压力而加快了。但是，俄罗斯对北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化感到不安，设法使其回到在外部干预之前的社会文化体系。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车臣人接受的是伊斯兰教苏非派，该派别对于伊斯兰教的关系，正如密宗之于佛教，而不是别的派别。苏非派

注重内心的沉思冥想，体验最细微的心理感受。其修习方式为紧密跟从导师（谢赫），学习如何从自私之我、尘俗之我中超脱，寻求真正的存在，并最终融入真理。苏非派的修炼有一定的仪式或程序，如祈祷、念颂（称为寄克尔，зикр），目的在于祛除人内心的不良欲念和慌乱、恐惧等感情。苏非派强调对导师的无条件信从。由于这种师承关系，就在车臣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个教团或兄弟会[18]。在其他伊斯兰国家或地区，这种会社组织只在早期阶段存在；而在车臣，甚至一直到20世纪都还在出现一些新的苏非教团。

伊斯兰教在何种程度上决定并影响着车臣社会法律制度，是反映车臣伊斯兰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自然地理等方面的原因，伊斯兰教在车臣各地的发展并不平衡。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车臣社会盛行习惯法。一些学者认为，在车臣，民事案件都依据教法解决，而刑事案件依据习惯法判断；这在一些地区，主要是平原地区基本上是如此，但是，这一笼统判断还不能准确反映当时车臣的伊斯兰化程度的全貌。在诸如血亲复仇等问题上，传统习俗——习惯法与伊斯兰教教法发生冲突，如：习惯法要求杀人者及其家族都要承担集体责任；而教法则往往禁止这样做。教法许可杀人凶手向受害者家属支付一定的赎金作为了结，而传统的看法会认为这是一种羞辱[19]。

伊斯兰教不仅包括道德说教，而且还是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学说的意识形态体系。在伊斯兰教学说中，包含着一切承担国家功能的原则。伊斯兰教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在信仰的基础上制订了调节国家和经济生活的原则，形成了政权体系，从而就巩固了法律原则和法规，加强了国家的法制化和村社的生活秩序。车臣实现伊斯兰化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它彻底改变了车臣的社会文化面貌，甚至也标志着车臣人走上新的民族文化发展阶段，并与整个伊斯兰世界联为一体。但是，在很长的时期里，甚至直到当代，车臣人对伊斯兰教的接受都较为表面化；在日常生活中，传统习俗、神灵崇拜时代的痕迹仍旧顽强地保留了下来。每到车臣民族的历史转折关头，而且往往由于外部因素，车臣社会都会进一步走向伊斯兰化，伊斯兰信仰会被强调并被用做凝聚民族和动员社会的思想工具。

早期俄罗斯—车臣关系

如前所述，车臣人与俄罗斯人的最早交往大致开始于16世纪中期。

在当时，这些居住在今天车臣人乃至整个瓦依那赫民族所居住的地区的部落，与当代车臣人有一定的渊源，但并非民族意义上的车臣人；准确地说，应该是今天车臣民族的先祖之一。当时的文献里并不称为“车臣人”，而称为奥科基人（ококи），即阿金人（аккинцы）、施布特人（шибуты），即沙托依人（шатойцы）等。遭受鞑靼人袭扰的俄罗斯国家，希望找到盟友共同对付鞑靼人，就主动与高加索各部落建立联系。同时，高加索部落领主因饱受克里木鞑靼袭扰之苦，也希望得到俄罗斯的庇护，捍卫自己的领地。这样，第一批俄罗斯哥萨克就移居捷列克河流域[20]，车臣人的先祖与俄罗斯人有了最初的直接接触。俄罗斯政府扶植卡巴尔达大公，并借助后者推行自己的政策。1588 年到 1589 年间，俄罗斯还在捷列克河的下游建立了捷列克城（Терский），该城市当时只具有军事和交通功能；而且在土耳其的压力之下曾数次拆而又建、建而又拆。此后，俄罗斯在北高加索地区陆续修筑了许多要塞，这些要塞“主要具有战略和政治意义，部分地具有经济意义”[21]；但是，看起来，当时俄罗斯的外交重点并不在于高加索，由于空间距离遥远，可以说是鞭长莫及。通常说来，车臣与俄罗斯国家发生接触是在 1722 年。在此之前，俄罗斯对车臣人几乎没什么了解。18 世纪 70 年代去过北高加索的研究者 И. А. 居尔登施特写到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他们没有学校，没有文字，没有书籍，没有消息”[22]，因此无法深入到他们的历史中去。

俄罗斯国家与车臣人的第一次接触，就是充满血与火的冲突。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俄国在高加索的政策开始积极起来。1722 年，在北方战争结束之后的第二年，彼得大帝立即移师南下，对伊朗控制下的高加索地区进行远征，目的是防止奥斯曼帝国武力占领这一地区；对当地的自然财富进行殖民；在连接欧洲和东方的商路上站稳脚跟；夺取山民的土地和外高加索。俄罗斯帝国远征军的骑兵从阿斯特拉罕前往德尔本特时，经过达吉斯坦，先头部队遭到安德列耶夫村，即今天达吉斯坦西边的恩德列伊的村民袭击。俄军在等主力部队赶到之后，就对村民展开进攻，甚至可以说是屠杀。结果，半数村民被杀掉，这个拥有 2000 多户村民的村庄被彻底摧毁[23]。

当时，车臣人在逐渐强大后，驱逐了来自达吉斯坦的大公；这样，车臣人就更加直接地与俄罗斯人面对，并深深地感到俄罗斯的压力。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政治态势是：俄罗斯正在与土耳其、伊朗进行争夺，车臣作为俄罗斯与其他大国争夺的必经之地，不可避免地卷入其间；虽然

此时的俄—车关系并不具有征服与被征服的性质，而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必然的。沙皇政府同大公和富有车臣人之间维持友谊，给他们提供金钱和军事援助，借他们之手控制车臣。1732 年，一万多名武装山民爆发起义，在车臣村附近集结，起义者打死了车臣大公，科赫将军率领沙皇军队前往镇压，被歼灭。1757 年到 1758 年爆发了大规模起义，起义的中心仍然是车臣村。起义领导人到处散发书信，号召山民武装起来，同入侵的沙皇军队斗争。1758 年，弗劳恩道夫将军率领 5000—6000 人的军队开进车臣，经过短暂战斗后占领了村庄，但是却发现村庄早已空无一人。弗劳恩道夫被迫撤回，并公开承认：起义者没有屈服。

此后，俄军对车臣发动了数次军事考察，仅 1770 年就进行了三次，并在车臣境内的重要通道建立了若干要塞，作为未来军事进攻的据点。同时，车臣人不断袭击俄军，使得俄军防不胜防，吃尽苦头。反过来，俄罗斯军队就更加频繁地发动军事行动。1783 年，俄罗斯军队首次对车臣地区的一些村庄进行征服，村庄长老被迫对俄罗斯宣誓效忠；但是这并不表示车臣人对俄罗斯彻底屈服，而是在俄罗斯军事高压之下被迫做出的姿态。同时，俄罗斯对车臣以及北高加索一些地区的另一个策略是：拉拢那些忠于俄罗斯的大公、领主以及其他当地上层人物，或者安置一个忠于俄罗斯的异族大公和领主，间接地控制这些民族或部落。车臣人不断地驱逐那些异族大公，俄罗斯却无论如何都要扶植那些虽然不受当地人民欢迎、但却忠于俄罗斯的大公和领主；而大公和领主也希望倚重俄罗斯的力量，维持自己的地位。由于大公们的俄罗斯背景，车臣与俄罗斯的矛盾就更加尖锐。1785 年，北高加索地区爆发了“先知”曼素尔领导的起义，起义是在宗教旗帜下发动的，曼素尔号召人民进行针对异教徒的“圣战”，得到北高加索各民族和部落的支持。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这次起义首次提出北高加索各民族联合的问题，表明这次起义的发动是由于外部敌人的压力，而且也表明北高加索穆斯林民族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而俄罗斯也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了对高加索的现行政策的危机。在车臣，乃至北高加索各个民族的反封建、反俄斗争中，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之下，车臣人逐渐萌生了民族意识，并且形成了车臣语，语言是形成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可以说，在原先氏族部落的基础上，已经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车臣民族。



曼素尔

在18世纪下半期，俄罗斯对高加索的彻底征服多半是一种构想，从俄罗斯当时的内政外交形势来看，俄罗斯受到土耳其、波斯、英国、法国等诸多方面力量的牵制，征服高加索力不从心，需要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但是俄罗斯不放弃将车臣纳入自己版图的计划。1781年，车臣的大部分地区都归并俄罗斯帝国，双方签订专门文件，规定：大部分“瓦依那赫社会”都对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宣誓效忠。但是，这一文件并不具有真正的政治意义，其效力取决于现实的政治实践。1807年，俄罗斯将车臣人托付卡尔梅克警官监管[24]，这就表明，俄罗斯帝国当时尚无力对车臣实施直接有效的政治控制。

1801年，亲俄势力在格鲁吉亚占据优势，格鲁吉亚首先采取了归并



A. П. 叶尔莫罗夫

俄罗斯的政治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俄罗斯，唤起了俄罗斯对拥有整个高加索地区的现实渴望。格鲁吉亚归并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具有深刻政治后果的、实质性的事件，它使得高加索的地缘政治平衡被打破，俄罗斯帝国在继续推进过程中就拥有一个稳固、可靠的立足点，俄罗斯军队立即进入格鲁吉亚；同时，格鲁吉亚归并事件对于其他民族心理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起到了某种示范作用，外高加索其他部分加入俄罗斯帝国就被提上日程。在与土耳其和伊朗的争夺中，形势向着俄罗斯一方倾斜；而后二者则在与俄罗斯的战略竞争中日益处于不利地位。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被打败以后，俄罗斯在欧洲的威望空前提高，在政治和军事上也更加强大；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行动就明显积极起来。

在早期俄罗斯—车臣关系中，车臣人像一切北高加索山民一样，主动袭扰和抢掠俄罗斯人，而俄罗斯军队也对车臣发动了残酷无情的军事行动。总起来看，当时俄罗斯与车臣人的冲突往往具有偶然性，很多情况下只是因为俄罗斯军队开往格鲁吉亚等地，须借道车臣等原因。在18世纪下半期之前，俄罗斯与车臣基本上相安无事，而俄罗斯帝国对车臣的政策也相对温和。20世纪90年代有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车臣的关系可以归结为400年（或200年）持续不断的战争，这是车臣分裂派炮制的政治神话。但是，随着俄罗斯在外高加索的军事进展和日益深厚的政治存在，冲突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俄罗斯军队毕竟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高加索的。有人将1817年，著名的叶尔莫罗夫出现在高加索的政治舞台上的年份作为这种变化的分界线；认为此前俄罗斯军队的行动是防御性的，是为了对山民进行惩罚和威慑，而此后则具有主动进攻的性质[25]。确实，以叶尔莫罗夫为代表的强硬派人物的军事行动的目标，是把山民们从其居住的平原土地上排挤到山区，从而占据他们的肥沃土地，因而山民们的反抗行动就具有保卫家园的性质。在叶尔莫罗夫时期，俄罗斯军队对车臣人采取了有效的战术，例如砍光森林，使车臣人失去藏身之所，难以隐蔽，在一定时期里使俄罗斯军队得到安宁。叶尔莫罗夫的强硬政策使俄罗斯与山民之间的斗争极为残酷，山民们对俄罗斯人怀有深刻的仇恨；而其对车臣人的残酷无情，以及车臣人对叶尔莫罗夫的深深畏惧也留在意识中。至今流传的叶尔莫罗夫时代的车臣古老民歌中都有相关内容[26]：

往森林里逃吧，我的家人！

保重，妻子；保重，孩子们
俄罗斯敌人为我们布下罗网
叶尔莫罗夫发动了战争
他在森林里也能把你们找到

后来，在关于俄罗斯征服北高加索的问题上，连苏联最著名的高加索问题专家波克罗夫斯基也认为：高加索战争是最不具有殖民色彩的战争。但是，按照俄罗斯帝国的发展历史，数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四处扩张，表现出惊人的殖民扩张能力；从俄罗斯与车臣的分量对比（他们绝非同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和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看，俄罗斯与车臣之间注定不可能有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中世纪以来的国际政治现实表明，在多数情况下，民族之间的交往都是一种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是社会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

注　释：

〔1〕P. A. Агеева, Какого мы роду – племени? Народы России: имена и судьбы., M, 2000, C. 377.

〔2〕有人曾问杜达耶夫："乔哈尔·穆萨耶维奇，车臣人中有多少将军?"杜达耶夫发出诱人的微笑："每一个车臣人都是将军。如果你不信，请走到任意一个车臣人面前，对他说：你不是将军。你就会看到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只不过是第一百万零一个"。Алла Дудаева, Джохар Дудаев: Миллион первый, M, 2003, C. 12.

〔3〕同注释〔1〕, C. 379。

〔4〕P. A. Агеева., Какого мы роду – племени? Народы России: имена и судьбы., M, 2000, C. 379.

〔5〕Ян Чеснов, Быть Чеченцем: личность и этническая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я народа, http://www. sakharov – center. ru

〔6〕Зулай Хамидова, Борьба за язык (Проблем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чеченского языка), http://www. sakharov – center. ru

〔7〕А. Бли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чечня: война 200 лет,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2000, C. 19.

〔8〕Сергей Благоволин, тейповоеи род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 чеченцев, http://voskres. orthodoxy. ru/

〔9〕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314页。

〔10〕Я. Ахмадов, История Чечни с древи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VIII века,

http://www.chechnyafree.ru/

〔11〕Я. Ахмадов, История Чечни с древи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VIII века, http://www.chechnyafree.ru/index.

〔12〕Я. Ахмадов, История Чечни с древи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VIII века, http://www.chechnyafree.ru/index.

〔13〕同注释〔12〕。

〔14〕A. H. Тогешвелл,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народов Кавказа, Тбилиси, 1988, C.214.

〔15〕同注释〔14〕, C.216。

〔16〕A. Бли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чечня: война 200 лет,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2000, C.20.

〔17〕Анна Зелькина, Ислам в Чечне д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завоевания, http://www.sakharov - center.ru

〔18〕Ислам и чеченский этнос, http://www.chechen.org

〔19〕Анна Зелькина, Ислам в Чечне д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завоевания, http://www.sakharov - center.ru

〔20〕Зулай Хамидова, Борьба за язык (Проблем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чеченского языка), http://www.sakharov - center.ru

〔21〕E. H. Кушева, Народы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и их связи с Россией в 16—17 вв, M, 1963, C.326.

〔22〕A. B. Бирюков, Российско - чече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18 века до середины 19 век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2, C.44.

〔23〕同注释〔22〕, C.44。

〔24〕C. Г. Агаджан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краи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M, 1997, C.297.

〔25〕A. Бли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Чечня: война 200 лет,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2000, C.47.

〔26〕同注释〔25〕, C.76。

第二章

沙米尔伊玛玛特（имамат）与车臣归并俄罗斯

高加索包括黑海、亚速海、里海之间的地带，分为外高加索或者称南高加索和北高加索，两者之间以高加索山脉作为分界线。北高加索各民族直接与俄罗斯帝国相邻，而外高加索则与土耳其和伊朗为邻。高加索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战略上的要地，许多重要的商路从这里经过，这里居住着许多宗教、语言、文化都极其不同的民族。由于地区大国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经常爆发战争，高加索人民陷于苦海，该地区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阻碍了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波斯都加入了在高加索地区的竞争行列，在该地区形成了一个大国的三角。按照苏联时期历史著作的说法，当时的伊朗和土耳其对待高加索民族异常残酷，为了摆脱伊朗和土耳其的控制，高加索人民向俄罗斯沙皇寻求庇护，都表示愿意加入俄罗斯[1]。实际上，当时的俄罗斯在与伊朗和土耳其的竞争中力不从心，需要韬光养晦；此外，一些高加索弱小民族出于现实原因，被迫在大国之间周旋，今日投靠土耳其、明日投靠俄罗斯，是常见现象，也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且，

往往也是国内各政治派别争夺权力的反映。从政治和法律角度来说，一份向俄罗斯称臣的降表，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中世纪的国际法或交往惯例表明：这些文件是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的，它只是表明某个时期角逐该地区领导地位的大国的势力消长。俄罗斯本身也知道这些都并不长久，俄罗斯的势力要在这里扎根，必须把主要的竞争对手排挤出去。在高加索民族中，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也由于民族心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民族持亲俄罗斯立场，而那些突厥语族或穆斯林民族则与俄罗斯较为疏远，通常持亲土耳其或亲伊朗的立场。

俄罗斯对整个高加索地区的征服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01年到1813年。在这个阶段，格鲁吉亚东部首先归并俄罗斯。接着，俄罗斯将整个外高加索地区的大部分占领；第二个阶段从1813年到1829年，俄罗斯征服了亚美尼亚东部和阿哈齐哈地区；第三个阶段从1830年到1864年，俄罗斯将包括车臣在内的整个北高加索的主要地区都加以占领，这一过程称为高加索战争。

沙米尔及其伊玛玛特（имамат）

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俄罗斯征服高加索地区的态势已很明显。由于内部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以及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车臣等北高加索民族在反封建、反抗俄罗斯殖民人侵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条件逐渐成熟，一种被称为“穆里德主义”或“穆里德派”（мюридизм）的思潮在北高加索地区逐渐盛行。该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达吉斯坦宗教领袖穆罕默德·雅拉各斯基和卡吉—穆拉，他们都是著名宗教领袖札马鲁丁思想的追随者。穆里德主义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它是与北高加索地区那些复杂而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分不开的。由于社会不公，一些贫民继续贫困化，引起了下层人民的严重不满；因此，那些经济政治地位低下的阶层希图借助宗教政治运动来变革社会。从此，穆里德宗教政治思潮逐渐发展为强大的穆里德运动。

穆里德宗教学说的规则包括：穆里德（мюрид，学生）必须严格服从导师（“谢赫”）的意志，其首要原则是必须认真遵守一切宗教要求，而且，穆里德应将自己置于一切神造生物之下：“最强大的高官和最不幸的孤儿对他来说都是平等的”。穆里德派的社会政治主张主要包括：在伊斯兰教基础上不断实现宗教完善；对俄罗斯“异教徒”发动“圣战”，将异教徒全部消灭或使其改宗伊斯兰教，等等。穆里德对于首领

具有盲目遵从的一面，而“这样的原则可以被用来达到任何政治目标”[2]。运动发起者的最终目标是：用暴力手段在所有山地民族中确立伊斯兰教法。运动的参加者是一些宗教人士以及大量自由农民，其影响主要在车臣和达吉斯坦山区，奥塞梯人和卡巴尔达人等不接受穆里德学说。在很大程度上，穆里德派思潮和运动是由一些狂热的宗教人士发起的，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该思潮和运动的影响下，山地民族在反抗俄罗斯征服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形成统一国家的基础。在这种形势下，沙米尔作为一个拥有威望的领袖，适时地出现在北高加索地区的政治舞台上。

1798 年，沙米尔出生于阿瓦尔的一个村庄吉木拉，是当时宗教领袖伊玛目卡吉—穆拉最亲密的追随者，并在反俄斗争中不断成长起来，赢得威望。1832 年，卡吉—穆拉在与俄罗斯军队作战时战死，当时沙米尔本来要继承卡吉—穆拉担任伊玛目（имам，阿拉伯语，清真寺的神职人员领导人或社区的世俗以及宗教领袖，相当于“教长”），但是沙米尔身受重伤，必须治疗半年，因此，哈木扎特—别克就成为第二任伊玛目。1834 年，在与俄罗斯殊死斗争的危难之秋，第二任伊玛目哈木扎特—别克在一次阴谋中被杀害，沙米尔被推举为第三任伊玛目。沙米尔继承了卡吉—穆拉的思想和路线，其政治目标是：将车臣和达吉斯坦联合起来，使整个北高加索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进行反封建、反殖民斗争；建立一套在教法基础上运转的国家机构；履行自己作为达吉斯坦、车臣和切尔克斯宗教领



沙米尔

袖的宗教使命，根除习惯法（адат）；建立伊斯兰教法；提高伊玛目政权的威望。为此，沙米尔号召对俄罗斯异教徒发动“圣战”。在沙米尔时期，在反对俄罗斯帝国殖民征服的基础上，北高加索各民族空前地团结起来。

实行教法以取代习惯法，是将山民们组织起来对抗沙皇制度的重要手段。伊斯兰教政治法律规则的确立，对于车臣等民族来说是一件大事。由于19世纪初反封建和反殖民斗争的高涨，北高加索各地到处都实行了教法，作为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军事生活规则。伊玛目集多种功能于一身：既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

沙米尔伊玛玛特（имамат，穆斯林神权国家的通称，大约意为“教长国”）的疆域，包括车臣南部和达吉斯坦北部的一些地区：整个达吉斯坦山区、整个车臣山区以及车臣平原的一部分；共约1000平方公里土地。境内的40万人口都是伊玛目的臣民。沙米尔国家建有国库、国都，并有作为国家象征物的国旗等，沙米尔官邸先后设在阿胡尔戈、贡尼布等地。伊玛玛特的最高权力机关是首脑会议（Диван－хан），由以学识渊博而知名的阿利姆（алим，穆斯林神职人员）组成。遵照沙米尔制订的原则，首脑会议下设各部：负责税收、军事、社会秩序，以及监督教法执行情况、诉讼事务、鼓励学术和学者、基督教事务、宗教宽容等；此外，还有一个关于特别重要的事务的会议。首脑会议依据集体协商的原则做出决定，只有类似采取军事行动或其他特别重大的问题，才由伊玛目做出决定。为了便于管理，伊玛玛特被划分为几个军区（或称那依布区，наибства），伊玛玛特的建制前后数次改变：分为三个或四个军区——最多时达到30个[3]。担任军区总督的，是沙米尔的那依布（наиб，意为“副手”），由伊玛目任命并经首脑会议批准，其职责包括：管理军区、收税、监督教法是否得到严格执行。每个那依布手下有穆福提，领导审判活动，解释教法，并解决针对教法出现的一些有争议的案件。最初那依布有权任命穆福提（муфтий，源自阿拉伯语，穆斯林神职人员，有权就伊斯兰教的宗教和法律等方面的问题做出决断）、审讯居民直至判处死刑；后来，判死刑须得到沙米尔批准。那依布们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但无权擅自采取大规模征讨行动。伊玛目规定：伊玛目的命令必须绝对执行，无论是口头的、书面的、还是用其他什么符号表达的，也无论是否符合接到命令的人的想法，甚至哪怕执行人认为自己比伊玛目更聪明、更能自制、更信仰宗教。还对那依布的职责做出具体规定：不许一身二任，不准同时拥有审判权和军事权，那依布专门负责军事事

务，将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分开，确认了山民们此前选择的管理模式的有效性。另外，伊玛目还在那依布之上设立督军（мудир），那依布服从督军。督军的人选多是一些最服从伊玛目的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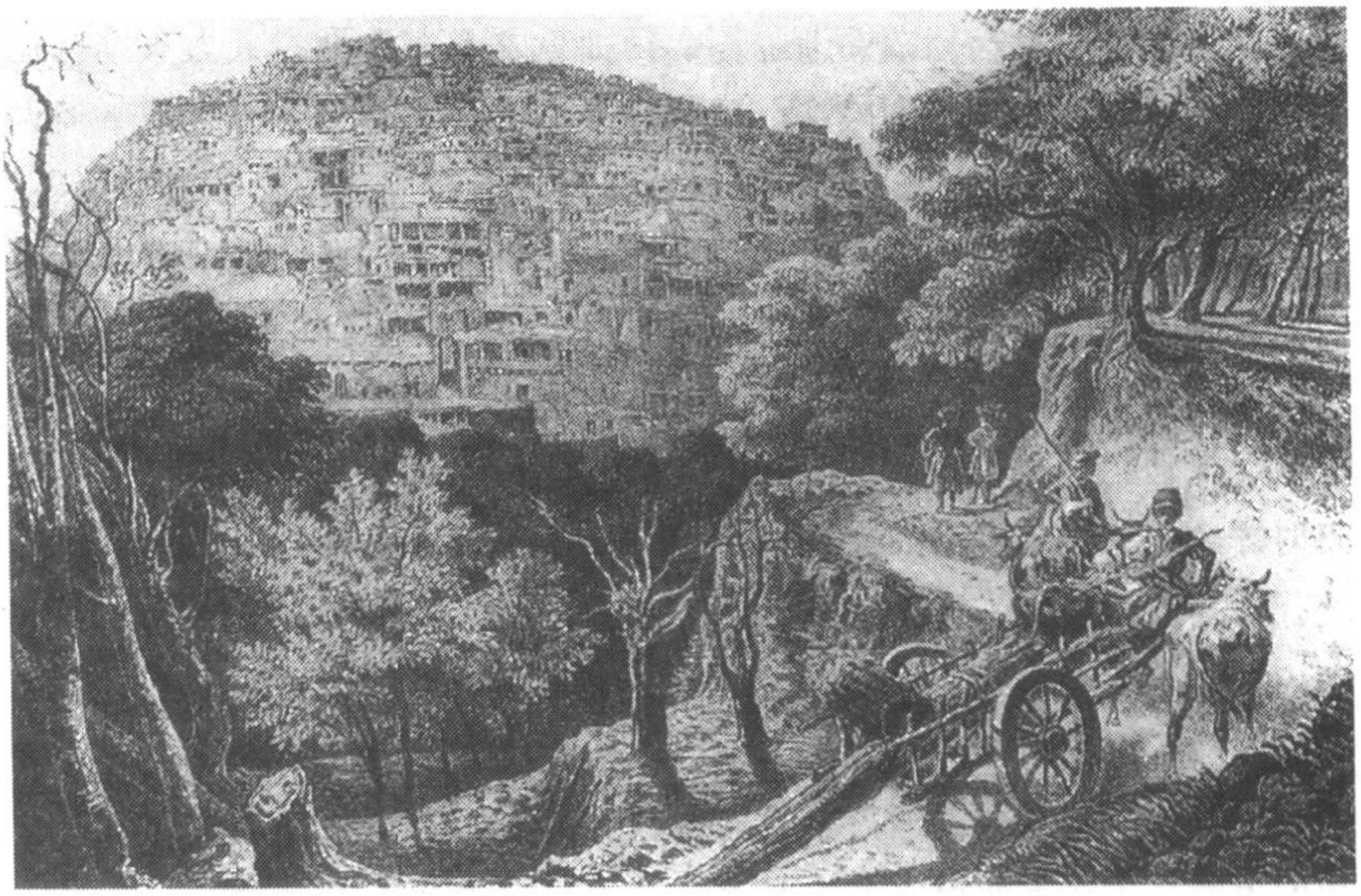


沙米尔的穆里德们

穆里德是那依布们最亲近的助手，每一个那依布手下都有100到300个穆里德从事行政事务，类似那依布的卫队；他们可以从那依布们那里领到生活和参战所需的一切。一些基层指挥官从穆里德中间选拔：五百人长、百人长、十人长。那依布之下还设立专门人员，负责执行那依布的决定，并严格监督穆斯林完成宗教职责。有时候那依布养活着穆里德的所有家人。沙米尔将许多出身下层的有才干的贫苦农民任命或提拔为那依布："为了得到那依布的称号，不需要出身高贵氏族，只需要有能力、尽心、忠于伊玛目。"[4]沙米尔所亲信的穆里德们将近400人担任军事行政机构的官员，他们通常是一些异常勇敢而无限忠实的人，这些穆里德们是沙米尔的统治基础。沙米尔将军政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沙米尔还自己编订一部法律《尼扎穆》（низам，阿拉伯语，意为"秩序"），于1847年出版，作为对教法的补充。其中有各种决议和措施，完全符合教法的精神。沙米尔自己认为：《尼扎穆》是涉及边疆安全、国民福祉和增强反抗外敌手段的各种政府决议汇编。所有这些原则都将教法的普遍原则具体化，适应各种条件和具体情况。

沙米尔放弃了习惯法，但是保留了习惯法的基础部分，及传统的山民村社，因为沙米尔政权的支柱，并非居住在封建主统治区的山民。这

些山民本身也会服从沙皇俄国。只有那些爱好自由的“自由社会”才是沙米尔的支柱。有人指出：经常起来斗争、并支持山民运动的，并非按照民族界限或地理界限划分的，恰恰是高加索的那些此前保持独立的山民村社[5]。山民村社是山民们传统的基层组织，这种传统甚至在进行残酷斗争的时候，也是不可侵犯的。村社作为许多个联盟组成伊玛玛特，但是伊玛玛特行政疆域系统并非像传统那样自下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完全服从于伊玛目的强硬意志。



达吉斯坦的堡寨具有军事功能

在沙米尔时期，很少召开那依布的会议，而是实施极为独裁的统治。沙米尔严格实施教法，对违反教法教规的行为处罚极为严厉。此外，沙米尔还建立了类似秘密警察的制度，对人民进行严密监视，并需将异常情况及时报告沙米尔本人，以此树立起伊玛目的绝对权威，并努力营造一种威严的气氛。

包括车臣在内的北高加索地区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一个历史上真正的国家，除了该地区各个山地民族和部落自身的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以外，外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与该地区长期以来的大国争夺势力范围、与俄罗斯帝国在该地区的征服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人认为：这个政治组织是一个强大的反抗体系，其四分五裂的各部分都靠严格的宗教学说而得到巩固[6]。在沙米尔伊玛玛特中，生活着几十个操不同语言的民族和部落；反俄斗争和经济生活的共同需要，促使沙米尔及其穆里德们将阿拉伯语作为伊玛玛特各民族人民的交流工

具。沙米尔及其穆里德们用阿拉伯语书写宣言和法律文件，用阿拉伯语通信。许多人不懂阿拉伯语，沙米尔就按照车臣语的发音，用阿拉伯字体创造出独特的车臣文字，这一文字体系甚至沿用到1926年[7]。

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整个达吉斯坦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遍布武装修士的修道院。对于其臣民们来说，除了伊玛目的命令以外，更无其他法律，伊玛目沙米尔在境内对臣民进行严酷统治，对外则同俄罗斯帝国进行军事斗争。由于战争逐年进行，看不到尽头，人民感到疲惫，不满情绪越来越严重，社会反抗逐渐加剧，因而就常常需要通过武力来维持社会秩序。沙米尔实施严刑峻法，常常将罪人的头颅割下示众。他曾经说过："说实话，我对山民用了严酷措施，好多人按照我的命令被杀死了。我杀死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忠于俄罗斯人；您知道，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这一点。我杀死他们是由于他们卑污的天性：热衷于偷盗和打劫。"[8]沙米尔相信山民们天生酗酒、打劫杀人和淫乱。他管理的是一个下流的民族，抢劫犯。这些人"只有在看到头上悬挂着已经砍掉几颗脑袋的军刀时才会做一些善事。如果我用另一套办法行事，我就必须向真主做出交代，而他就会因为我没有严厉惩罚自己的民族而惩罚我"[9]。

沙米尔伊玛玛特是一个军政合一、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沙米尔完全摧毁了以前的旧制度体系，采用了全新的制度，使那些氏族贵族和封建主遭到沉重打击；消灭了封建特权，解放了农民和奴隶，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达吉斯坦农民的要求。由于沙米尔推行的政策使山民社会中的氏族土地被剥夺，使原有的氏族部落联系基本上都已经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村社上层迅速发展起来。大氏族控制较小的氏族，当沙米尔伊玛玛特灭亡之后，沙皇政府仍旧极力保持沙米尔留下的管理机构，任命了沙米尔时期的那依布统治车臣人。同时，在沙皇俄国与土耳其等国家的争夺中，沙米尔的活动符合了俄罗斯敌人的利益，对俄罗斯帝国积极的扩张势头是一个极大的牵制；因此，英国等西方列强都倾向于利用这一势力。

在与俄罗斯帝国的对抗中，沙米尔认识到自己力量单薄，一直希望高加索山民能够进一步联合起来。1842年，沙米尔派出使者，前往亚迪格，说服他们统一在一个政权下，但是没有成功。中高加索的卡巴尔达和奥塞梯将东高加索和西高加索分割开来，当地贵族的利益更多地与沙皇政府联系在一起，而不愿意服从沙米尔伊玛玛特；高加索中部成为不可克服的障碍，沙米尔的战略计划最终没有能够实现。

沙米尔感到保持国家独立越来越困难，而伊朗信仰什叶派，逊尼派

的高加索山民对其存有戒心。因此，沙米尔希望得到土耳其的援助。实际上，从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沙米尔就已经开始与土耳其有了接触，随着伊玛玛特内部矛盾的加深，沙米尔越来越积极地与土耳其苏丹联系，并为此进行了多次谈判，但是没有任何结果。其主要原因是：沙米尔从来就不想对土耳其表示顺从，而只想建立一种同盟关系。沙米尔认识到，与土耳其合作，就意味着完全归顺土耳其，而归顺土耳其就是归顺了英国，而英国是一个与俄罗斯帝国一样的“异教徒”国家；与其如此，那么，高加索群山与英国的联系还少于与俄罗斯帝国的联系，沙米尔最终对来自土耳其的援助不抱任何希望。

沙米尔的政治活动以及沙米尔伊玛玛特的存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沙米尔伊玛玛特为维持生存而斗争，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1834年到1839年）。

第二个时期，是沙米尔及其伊玛玛特在军事、政治上的巅峰时期。整个19世纪40年代沙米尔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辉煌的胜利。在这一时期，车臣以及达吉斯坦山地、达吉斯坦高地、阿瓦尔等地区都爆发了起义，并归附了伊玛玛特，沙米尔在军事上对俄罗斯处于主动进攻的态势。

第三个时期，是逐渐走向衰亡的时期（1850年到1859年）。

沙米尔政权的性质和特点，以及面对俄罗斯强敌，就决定了他只能依靠在军事上不断进展来维持政权；一旦军事上受挫，伊玛玛特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但是，即使是在军事上最为辉煌的时候，危机也一直存在。沙米尔伊玛玛特的存在和活动，是俄罗斯征服整个高加索地区的最大、同时也是最后的障碍。对于相对强大得多的俄罗斯帝国来说，她可以用许多手段围困和打击沙米尔伊玛玛特。除了军事行动以外，俄罗斯帝国还用种种手段孤立伊玛玛特：从经济上吸引山民；对沙米尔周围的重要将领加以收买，进行分化、瓦解，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沙皇政府还采取了怀柔政策，试图只付出较小的代价就征服北高加索。一方面，俄罗斯军队将车臣人赶到山里；另一方面，又同伊玛玛特有选择地发展商业关系，意在使沙米尔的军事积极性减弱，软化沙米尔的立场，使他不那么咄咄逼人。此外，俄罗斯政府还将沙米尔的儿子札马鲁丁，于1839年扣做人质送到俄罗斯贵胄军官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想要把札马鲁丁培养成高加索的行政长官。出身高加索，却接受俄式教育，忠于俄国，这正是俄罗斯帝国所需要的人选。但是，这位未来高加索行政长官的最佳人选却在被迫返回车臣之后，由于生活方式骤然改变而患病死去，沙皇政府的这一计划落空。然而，札马鲁丁对于俄罗斯的种种观念

却深深地影响了其父。

沙米尔伊玛玛特解体及车臣归并俄罗斯

19 世纪 50 年代初，沙米尔伊玛玛特的形势开始稳定，但其内部却露出败相。因争夺权力而导致的纷争不断，他那些忠勇无畏的那依布们纷纷离他而去。1856 年克里木战争结束以后，俄罗斯帝国迅速将注意力转到高加索战线，俄罗斯军队准备更加充分，武器装备也更加精良，沙米尔在军事上一再受挫。俄军从四面八方将伊玛玛特团团包围，形成合围之势，伊玛玛特开始了灭亡进程。1856 年，巴里亚京斯基率领大军开入车臣，人群从四面八方向他涌去。这位俄罗斯将军温和地接待他们，并且送给他们礼物。这些礼物是他们在沙米尔那里从来没有见过的。沙米尔成了孤家寡人。这些人忘记了沙米尔，也忘记了曾经对他宣誓效忠。甚至连沙米尔最亲近的人，包括自己的孩子都想投靠俄罗斯[10]。1858 年，车臣投降，接着，军事要地阿尔贡峡谷被俄军攻占。1859 年 7 月，维杰诺（沙米尔伊玛玛特原首都）也被俄军攻占，沙米尔最终被困在一座孤城贡尼布，身边只有 400 个最忠实的穆里德。俄军与沙米尔进行谈判，沙米尔提出了俄军不可接受的条件，于是俄军继续攻城。在弹尽援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1859 年 8 月 25 日，沙米尔放下武器，向俄军投降，沙米尔伊玛玛特随之解体。1864 年，俄罗斯军队征服了北高加索西部地区，高加索战争最终结束。

沙米尔失败的原因有哪些呢？按照著名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的观点，沙米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1. 达吉斯坦贵族反对穆里德们的民主要求；2. 俄罗斯军队重新武装（克里木战争以后，俄罗斯军队引进了滑膛武器，对山民形成很大优势）；3. 最后，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车臣脱离伊玛玛特[11]。车臣是沙米尔军事开支的重要来源，由于沙米尔的严刑峻法，车臣人抗议声越来越大，然而，每次尝试反抗都被残酷镇压，并且往往牵连家族甚至村庄，这就使沙米尔成为一个具有异族人色彩的统治者，造成某种政治上的弱势。车臣穆里德们感到不满，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社会目标没有达到：他们想要消除贵族和贱民、贫民和富人之间的差别，但是没能实现。他们想要将车臣古老的习惯法废除，用教法（шариат）取而代之，这对于车臣的“自由社会”却是不能忍受的；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却利用了这个机会，采取了高明的手法，很快就在格罗兹尼专门为不满教法的人们开设了按照习惯法裁决的法庭，于是很

多车臣人就跑到俄罗斯人那边去了。这样，沙米尔就丧失了统治基础，也失去了维持军事行动的基础。

沙米尔伊玛玛特的败亡，其内部因素似乎也是决定性的。由于沙米尔独断专制，一些那依布不堪忍受，就背叛了沙米尔投靠俄罗斯方面。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军事将领哈吉穆拉特叛逃俄罗斯的事件（俄罗斯著名作家托尔斯泰曾经以此真实事件为原型，创作了小说《哈吉穆拉特》），而随即又有一些那依布步其后尘：如乌玛雅罗夫，吉比特—马哈木等。伊玛玛特从内部解体的过程早就开始了，而且其势头无法遏制："无论是逮捕，撤换纳依布；还是劝说，都不能阻止伊玛玛特分裂的进程。"[12]当沙米尔撤换了原来的那依布、或者这些那依布背叛之后，新任命的那依布们缺乏原来纳依布的斗志，而且新人往往缺乏19世纪40年代积累的宝贵的军事经验；同时，山民社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到需要与俄罗斯加强经济联系，俄罗斯帝国双管齐下的政策得到成功。此外，从根本上说，沙米尔伊玛玛特毕竟是一个地域狭窄、地理环境不利、军事政治资源有限的国家，如果不能争取到强大的外援，与俄罗斯的斗争就很难长久维持。在（1853年到1856年）克里木战争期间，实力衰弱的伊玛玛特并不能给土耳其实质性的支持，尽管双方曾经有约在先；而当伊玛玛特处境艰难的时候，也没有得到，而且多半也不可能得到土耳其的有力支持，从而，沙米尔的失败就已注定。

沙米尔伊玛玛特的灭亡，标志着沙皇俄国征服高加索的战略已经完成，整个高加索地区完全归属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但是，车臣人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反抗活动仍旧坚持到1864年切尔克斯人被最终征服。在沙米尔被俘、伊玛玛特宣告终结以后，车臣山民基本上都放下了武器，大规模的抵抗结束，但是，一些零星的抵抗持续了几十年。

沙米尔被俘之后，本人得到了俄罗斯沙皇的优待和礼遇，沙皇为沙米尔及其家人提供的养老金是每年10000—15000卢布；但是，金鸟笼依旧是鸟笼，沙米尔念念不忘的是前往麦加朝圣。经过一番辗转周折，在巴里亚京斯基的大力相助下，沙米尔的麦加朝圣计划终于成行。穆斯林世界对沙米尔的崇敬无以复加，朝觐的信徒争相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沙米尔在那里祷告反省，并在那里度过余生。1871年2月4日，在伊斯兰圣城麦地那，沙米尔走完他的人生，并被安葬在那里。沙米尔在身后留下致后代的遗言，回顾和总结了自己的生平和活动，为自己辩护，同时也号召后代继续战斗："不要忘记，对于沙米尔及其追随者们，没有比自己民族的命运更神圣的了。"[13]

如何评价作为历史人物的沙米尔？沙米尔首先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肯定，但是在苏联时期对他的评价却不断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配合苏联政府对高加索地区的民族政策，适应苏联政府的政治需要。对于这一过程，爱德华·拉津斯基剧本中的主人公曾经生动地描述了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遭遇："我的第一部著作是关于沙米尔的。沙米尔是一位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但是观点变了……在19世纪30年代末，他开始被认为是一名帝国主义间谍。我承认了自己错了。后来，战争时期，他又成了解放运动的领袖。于是我承认，我承认我关于沙米尔是解放运动的领袖的观点是错的。后来，在1949年，他又成了间谍，我又承认我错了……我那么多次地犯错误，终于有一次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是个错误。"[14]沙米尔无疑是包括车臣在内的北高加索各个民族反抗沙皇俄国殖民人侵和统治的著名领袖，这是对沙米尔军事政治活动的基本评价。车臣以及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各部落开始反抗俄罗斯帝国的殖民征服，建立独立国家的政治进程，始于18世纪末期的谢赫·曼素尔时期，完成于沙米尔时期；从山地民族具有反俄意识，并形成思潮和运动，一直到沙米尔时期建立了包括北高加索各部落在内的独立国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并在沙米尔时期达到顶峰之后，开始急剧下降；随即，车臣并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车臣历史就成为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波克罗夫斯基曾评价说：这是高加索山民的政治创造性在任何时候所能达到的最高点[15]。在沙米尔领导的起义队伍中，有车臣人、达尔金人、库梅克人、列兹金人、塔巴萨郎人、印古什人、切尔克斯人等，他们迸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为了自己的命运而战斗，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联合起来，在一定的时期和范围内改变了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共同落后局面，这是北高加索山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沙米尔伊玛玛特的存在和活动，体现了北高加索各族人民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水平，对凝聚北高加索各民族反抗沙皇殖民征服的斗争、推动北高加索人民走向历史进步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说，该时期是北高加索民族历史上的英雄时代。

同时，沙米尔的政治抱负又具有某种理想主义或者乌托邦色彩。他力图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实践自己的宗教政治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教是他用以号召人民、与东正教的沙皇俄国对抗的主要意识形态。因此，有人说沙米尔国家是"伊斯兰半月对沙皇双头鹰的对抗"。沙米尔事实上建立起了严酷的君主制，伊玛玛特具有强烈的军事专制色彩，符合一些研究者所谓的"早期国家"所具有的一切特征：

全民武装，政权的军事功能至上，等等[16]；具有落后性。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沙米尔具有那个时代一切人物所具有的时代局限性和缺点。

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沙米尔成为历史人物之后，往往就为后来的人们出于政治目的而对其随意涂抹留下空间，最后面目全非。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车臣乃至北高加索地区的政治生活中流行的那些神话，就是一个证明。这是从对沙米尔的肯定方面又走到了极端。

俄罗斯帝国对车臣和北高加索的管理

经过几十年的高加索战争，沙皇政府领教了山民热爱自由、不畏强暴的坚强意志，对北高加索地区开始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怀柔政策；此外，多年的战争对该地区造成了巨大破坏，必须给以一段时间恢复和重建。到高加索战争后期，俄罗斯具有远见卓识的国务活动家巴里亚京斯基出现在高加索的舞台上。他认识到必须与山民达成和解，主张用和平方式使山民归顺俄罗斯。有人说，高加索战争没有胜利者。武力并不能征服山民的意志，而只会激起更激烈的反抗。实际上，俄罗斯能够最终让高加索山民放下武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加索战争后期高明的政治、外交手段。俄罗斯赢得了军事行动，但是对山民的让步也很大。高加索战争顺利结束后，俄国政府对山民采取了比较恰当的政策，与巴里亚京斯基本人有着极大关系。正是在巴里亚京斯基卓有成效的活动下，沙米尔主动投诚。沙皇政府对沙米尔没有处罚，更没有处决，而是采取了极为宽大的政策，给以优厚待遇。这一高明举措奠定了沙皇政府对高加索政策成功的基础。

巴里亚京斯基不但是一位有谋略的将军，还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改革家。他推行的政策，是北高加索的边疆区政治管理体制历史上的里程碑，以后经过改革和完善，成为俄罗斯边疆地区管理体制的基础。1860 年，他发表，并在北高加索地区散发了《致车臣人民的宣言》。《宣言》以沙皇的名义宣布：原谅车臣人的一切敌对行动，车臣人拥有与俄罗斯帝国其他臣民相同的权利。《宣言》声称：保障山民的信仰自由；禁止强制征兵；车臣平原和山区都永远属于车臣人；尊重车臣人随身带刀的传统；车臣人在 5 年内无须纳税，等等。《宣言》除对车臣民族宣布军事行动结束，号召和解妥协以外，实际上也是对车臣人要求进行战后重建、休养生息的呼声的回应。俄罗斯帝国认识到车臣社会的独特性，而保持该社会稳定的途径，就是不改变其生活方式。这些内容所体现出

来的一整套行政管理制度，大致保持到十月革命前，甚至直到1926年。

1860年2月20日，俄罗斯帝国建立了库班河州和捷列克河州。捷列克河州分为六个军区：卡巴尔达、阿尔贡、车臣、伊奇凯里等。在这一时期，俄罗斯帝国政府对车臣采取了宽松政策，当局对车臣的内部生活干预很少，车臣人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这是俄罗斯帝国对北高加索政策的成功之处。车臣人在俄罗斯帝国的范围内，缓慢地进步着；但是，他们仍旧像过去时代那样，经常小股地纠集在一起，去偷盗、杀害俄罗斯哥萨克居民，赶走哥萨克的牲畜。

同时，沙皇政府大规模运用移民作为政治手段，甚至不惜施展阴谋，与土耳其达成龌龊的交易。在19世纪50、60年代，为了尽快结束高加索西部的战争，俄罗斯帝国与土耳其进行谈判，将高加索的穆斯林迁徙到土耳其境内；作为交换，将土耳其境内的斯拉夫人迁徙到高加索。俄国政府将其视为一个重要战略步骤。俄国驻高加索总督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致信军部领导人。信中称：高加索战争的结束，取决于我们多快和以什么条件将敌对民族转送到奥斯曼帝国[17]。1860年，两国政府签署协议，开始从高加索向土耳其移民。俄罗斯甚至还获得土方同意，将这些高加索人安置在土耳其内地而不是邻近高加索的地方。俄罗斯和土耳其都希望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是一个自然进程，即并非两国政府强迫，而是他们自愿移民，以免在未来承担后果。1861年到1862年间，有10万名高加索人以去麦加朝圣的名义前往土耳其，并得到安置；这些高加索人被统称为“切尔克斯人”，实际上包括北高加索的许多民族。1863年以后，经过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协议，俄罗斯帝国继续向土耳其迁徙“切尔克斯人”，而土耳其也有自己的需要：把这些“切尔克斯人”分散安置到那些统治薄弱、穆斯林人口不足的地方，如巴尔干半岛等地，利用他们镇压国内冲突和反抗。相应地，俄罗斯将一些土耳其南部的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迁徙到高加索的黑海沿岸地区。在整个时期里，奥斯曼帝国接收来自北高加索的移民大约180万人，也有资料说是275万人[18]。

在俄罗斯帝国对高加索边疆地区的管理体系中，哥萨克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在其中承担了特殊的政治功能。俄罗斯帝国将哥萨克作为对抗和制约高加索当地居民的工具。在这方面，沙皇政府有明确的政策和指示。1857年，高加索军总司令部长官米留京致函军部大臣车尔尼雪夫，提出“关于在高加索发展俄罗斯哥萨克居民以及迁徙部分土著部落的办法”。这一建议得到沙皇政府的原则同意；亚历山大二世作出批示：对此完全

同意[19]。1862 年，沙皇政府发布命令，按照预先拟订的计划，大批地迁徙哥萨克居民到高加索地区，沙皇政府拨出专款，安置移民，并对移民给予税收优惠，等等。对内地省份的俄罗斯人移居高加索千方百计地加以鼓励。由于沙皇的政策导向，导致在短时间内外来移民急剧增加，造成当地人口密集而土地稀缺的形势。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的矛盾和纷争不断。

从高加索战争结束直到 1917 年十月革命爆发，俄罗斯帝国对高加索的政策经历了许多变化。1881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后，亚历山大三世即位。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沙皇政府的政策发生了重大逆转，开始了史称的“反改革”时期。体现在对高加索边疆地区的变化，就是加强对高加索的控制，废除特殊的“管辖区”制度，将高加索变成一个普通的行政疆域单位。具体做法是：废除管辖区，将管理从前管辖区的特权转归中央政府以及督军办公厅。1888 年，沙皇政府发布命令，将高加索边区和军队的管辖权交给军部以及军部在高加索的代表——军区指挥官。高加索地区建立起了警察统治，并纳入全俄罗斯政治轨道，而在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实践过程中，哥萨克被政府视为可靠的支柱。1889 年、1897 年和 1900 年沙皇政府先后颁布专门法律，对移民的哥萨克阶层给予各种优惠，哥萨克居民大批迁入高加索。同时，沙皇政府加快了对高加索地区的“俄罗斯化”进程。此前，非东正教信仰的居民享有的某种程度上的优惠和自治，这时被“残暴地缩减、甚至被完全废除了”[20]。俄国政府逐步将在俄罗斯内地实施的法律向高加索地区推行，山民的生活越来越受到政府的干预和干涉，也受到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影响。俄罗斯政府极力使山民对俄罗斯政府产生归依感，似乎征服高加索乃是俄罗斯疆域的自然延伸。可以说，这是真正的帝国主义政策。这些措施招致高加索山民的激烈反抗，高加索地区矛盾重重，充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帝国政府认识到：过早废除高加索管辖区体制是错误和缺乏远见的，决定恢复高加索管辖区制，起用一些政治经验丰富的国务活动家，如洛里斯—麦利科夫、沃龙佐夫—达什科夫等人担任总督。又回复到 19 世纪 40、50 年代的政策，给当地人民以某种自治，在一定程度上使高加索地区恢复原有的平衡和安宁；但是，随着 1914 年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俄罗斯参战，这一进程又被打破。

对于高加索地区来说，一个极为核心、同时也是困扰高加索人民的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土地改革问题。1906 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捷列克州山区土地的使用和土地所有权问题，并准备了方案，准备在 1913

年交国家杜马讨论；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得这一问题被搁置起来，不了了之。

1861 年改革以后，俄罗斯的土地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在北高加索地区，由于从来就缺少某种形式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所以在这些地区很快就建立起了企业和牧场，成为俄罗斯重要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基地[21]。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一进程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俄罗斯帝国在南部边疆进行资本主义经济建设：铺设铁路、开凿油井（掀起了“石油狂热”）、建立资本主义工矿企业，使北高加索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在原先军事要塞的基础上，该地区的第 1 批城市发展起来，如：1870 年，格罗兹尼获得了城市地位，成为车臣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中心。

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的殖民征服都有其两重性：一方面，是对当地人民的武力征服；另一方面，是作为先进文明为落后民族和地区带来的进步后果。车臣归并俄罗斯，就使得车臣的发展被纳入了俄罗斯的轨道，步入了走向进步的进程。俄罗斯在北高加索地区开办许多世俗学校，用俄语对北高加索地区的青年进行教育，使当地青年学习并接受俄罗斯文化。截止到 1897 年，达吉斯坦山民中掌握俄罗斯语言文化的人口有 244.7 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有 24.4 万人，居住在农村的有 220.3 万人。当然，掌握口语的人口比掌握文字的人口要多得多。随着俄罗斯工业的发展，1905 年以后，许多山民进入城市和工业区打工，修建弗拉季高加索铁路、基兹里亚尔葡萄种植园、格罗兹尼和巴库的石油工业等等。“高加索的城市人口，从 1863 年的 35 万人增加到 1897 年的 90 万人左右”[22]。打工经历，是山民获得现代意识的重要途径。列宁曾经指出，“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落后、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里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23]。打工提高了人口的文化和觉悟，也深刻地改变了车臣的社会面貌。车臣与北高加索其他民族一起，开始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直到 1917 年俄罗斯帝国爆发革命。

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导致了当地大量农民失去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的贫困化。

注　释：

〔1〕В. А. Ферод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 – начала 20вв., М, 2000, С. 185.

〔2〕Н. И. Покровский, Кавказские войны и имамат Шамиля, М, 2000, С.

156.
〔3〕http://www.yassen.ru/kawkas－istoria
〔4〕Н. И. Покровский, Кавказские войны и имамат Шамиля, М, 2000, С. 339.
〔5〕http://www.yassen.ru/kawkas－istoria
〔6〕同注释〔5〕。
〔7〕Зулай Хамидова, Борьба за язык (Проблем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чеченского языка), www.sakharov－center.ru.
〔8〕Д. И. Олейников, Шамиль//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6, №5、6, С.69.
〔9〕同注释〔8〕, С.69。
〔10〕А. В. Бирюков, Российско－чече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18 века до середины 19 век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2, С.56.
〔11〕Н. И. Покровский, Кавказские войны и имамат Шамиля, М, 2000, С.347.
〔12〕Н. И. Покровский, Кавказские войны и имамат Шамиля, М, 2000, С.339.
〔13〕Юсуп Дадаев, По тропам Шамилевских сражений, Махачкала , 1997, С.237.
〔14〕Джеффри Хоскинг,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17－1991, М, 1995, С.255.
〔15〕Д. И. Олейников, Шамиль//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6, №5、6, С.70.
〔16〕Л. С. Гатагова, Россия и Северный кавказ: 400 лет войны? М, 1998, С. 26.
〔17〕Высылка немусульман из Осма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http://kavkaz.memo.ru/
〔18〕同注释〔17〕。
〔19〕С. Г. Агаджан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краи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М, 1997, С.309.
〔20〕С. Г. Агаджан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краи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М, 1997, С.311.
〔21〕А. Н. Сахар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ии. С начала 18 до конца 19 века, М, 1996, С.405.
〔22〕《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1992年出版，547页。
〔23〕《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1992年出版，530页。

第三章

十月革命后车臣的政治法律地位：1917—1944

在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帝国加紧对高加索地区的“俄罗斯化”进程，加强了对高加索人民的控制，破坏了高加索山民的内部生活；同时，资本主义在高加索的发展，使许多人失去土地，生活日益贫困。对于原本就缺少土地的北高加索地区来说，这一矛盾就尤为尖锐，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本已提上日程的土地改革问题被无限期搁置起来。沙皇政府对高加索边疆区的政策，导致了高加索人民的不满，这里积存了许多矛盾：高加索山民之间的矛盾；高加索山民与哥萨克的矛盾；当地居民与中央政府的矛盾，等等。到20世纪初期，高加索地区已是危机重重。

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沙皇专制制度垮台，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各族人民迸发出了政治热情，他们渴望借机摆脱束缚，走向独立。在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直到1920年国内战争结束这一时期，整个高加索地区都呈现出旧制度灭亡、新制度和新政权尚未建立的一个过渡时期，处于无政府状态。布尔什维克试图利用其他民族的力量，将沙皇政府推翻，并为此开始宣传工作。1917年11月2日，通过了《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通告俄

罗斯各地，宣言提到这样一些原则：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各民族有获得主权的平等权利；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前途，包括从俄罗斯分离并建立独立国家；废除一切有关宗教和民族运动的禁令；居住在俄罗斯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有权在任何机关中参加工作，并相互协作[1]，等等。宣言的这些精神对于高加索等少数民族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由于高加索各部分之间，在历史、地理、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存在天然联系，因而，一些高加索民族领袖利用各种政治资源，尝试建立独立国家。在这一地区，曾经考虑过几种建国方案，并且有过勇敢的政治实践。

艾米尔国

一种方案，是建立一个“东南联邦同盟”，加入其间的有顿河、库班河、捷列克河州的哥萨克军队和山地民族。他们通过了《哥萨克军队、高加索山民和草原自由民族的东南同盟联合政府宣言》，《宣言》声明：“保障所有成员其内部生活完全独立”，同盟有责任协助各成员筹建作为未来俄罗斯民主联邦共和国的一个独立邦内部的管理制度[2]。1918年3月3日，捷列克河各民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捷列克河共和国”。1918年5月间，捷列克河各民族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撤销松日河沿线的4个军镇，并将土地无偿转交给印古什人和车臣人，而将原先占有这些土地的哥萨克人迁居到山区。布尔什维克在捷列克河地区执行的政策引起哥萨克不满，哥萨克认为这些土地是自己的，是他们在高加索战争中用“鲜血”换来的；但是，山民们却感到欢欣鼓舞，认为这是消除了一个世纪以来的不公正。哥萨克成了革命中的被剥夺者，而布尔什维克则得到了山民们无保留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哥萨克选择了发动叛乱。在哥萨克采取了坚决行动之后，布尔什维克保持了短时期的政权，随后就被白军的“志愿军”打败。于是，以邓尼金等人为首的“白色运动”与苏维埃的红色运动展开了拉锯战。1919年1月23日，白军攻占格罗兹尼，白色势力逐渐取得优势。白色政权对山民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给予最大限度的自治，将卡巴尔达、奥塞梯、印古什、车臣和达吉斯坦划作单独的区，由民选政府进行管理。在政府之下，由山民自己选出最有威望的人士成立特别委员会，处理地方自治事务；完全保留教法和教法法庭，等等。但是，邓尼金严厉反对山民从俄罗斯独立出去的主张，并对那些有独立倾向的山民代表发出战争威胁。

北高加索地区的和平和安宁并没有保持很久。1919 年夏天，车臣和达吉斯坦发生了叛乱。在苏联时期的历史书中，叛乱原因被说成是山民们反对恢复革命前的反动制度，但是，实际上，叛乱的原因主要在于：1. 白军对山民实行动员政策。山民们认为白军动员他们参军是危险的，其目的是与他们仇视的异教徒融合在一起，最终被俄罗斯化；2. 白军对躲藏在山里的布尔什维克定期进行围剿。白军要求山民积极配合，交出布尔什维克，甚至威胁说，如果不将这些人交出，就将村庄毁灭[3]，而这种威胁在山民们看来是实实在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激起了山民反抗。为了反对共同敌人，山民与布尔什维克在叛乱中联合起来，成为一次真正的战争，被称为当代“第二次高加索战争”。随着“第二次高加索战争”的爆发，白色政权对山民的民族政策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山民实施严酷统治，并频繁地使用武力，因此白色运动在北高加索地区就没有得到支持，其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在 1918 年到 1920 年之间，尽管“白色运动”给山民以很多自治权，但是山民们已经想要走得更远，他们提出要建立完全独立的“教法君主国”，出于对伊斯兰主义在俄罗斯南部地区扩散的担忧，白色政权对山民的行动不予承认。

在内战时期激化的民族矛盾，被各个政治派别利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车臣等北高加索民族追求独立，布尔什维克则想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政治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和伊斯兰势力奇特地结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白色运动”。参加反对白色势力斗争的两派领导人，有以基卡罗和谢里波夫为首的车臣布尔什维克；伊斯兰宗教组织的领导人则有谢赫·乌孙-哈吉及其宰相（同时又是“北高加索艾米尔国”军队指挥官）狄斯宁斯基。艾米尔国初步具有国家应该具有的一切特征：艾米尔国设计了自己的国旗，旗帜类似于沙米尔时代的绿色三角形状；甚至还发行了钱币；建立了约一万多人的强大的近卫军，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表明教法国家的建国现实。乌孙-哈吉等人主张建立单独的、其居民完全是穆斯林的独立国家，实质是追求民族自决。在乌孙-哈吉和狄斯宁斯基的《致相邻的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宣言》中宣称，沙皇俄国解体使得穆斯林民族实现民族自决，穆斯林民族摆脱了沙皇制度的枷锁；“多年的苦难表明，每个民族都只能单独生活”，“我们不要求自治，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教法君主制国家”[4]。

1919 年 5 月，乌孙-哈吉就宣布对“志愿军”（白军）和捷列克河哥萨克发动“圣战”；与此同时，莫斯科的苏维埃政府也派来代表，声明完全保障山民们实现民族自决。实际上，与山民们联合，符合红军现

实的军事、政治利益。当时，白军前锋已经抵达图拉，而山民起义则大大动摇了白军的后方，迫使其减轻对红军的压力。起义者与哥萨克的战斗及其残酷，经过反复较量之后，到1919年底，起义者已经控制了北高加索大部分地区，邓尼金的白军节节败退。1920年初，红军在内战中已经逐渐占据主动地位，白军控制下的许多城市和据点已经被红军占领。3月份，白军势力被从高加索地区清除出去，随即马上就被红军和起义者们占据。从此，白色运动结束，红军开进格罗兹尼，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穆斯林民族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同盟军，对于打败白色力量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随着红军的胜利，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的运动却也走到尽头。穆斯林起义者面临的命运是：要么迁徙，要么加入到红军中，向红军投诚。许多起义者进行誓死抵抗，但是遭到红军的残酷镇压。在苏维埃建立政权前夕，艾米尔国的领袖大艾米尔乌孙－哈吉死去，而以狄斯宁斯基大公为首的艾米尔国政府成员也被布尔什维克全数枪毙。北高加索穆斯林民族追求建立独立国家的政治运动遭到挫折，仍旧留在苏维埃俄国。

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山民联合同盟（1917—1918）

1917年2月革命以后，沙皇专制制度垮台，受到革命的鼓舞，也受到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的影响，北高加索地区的各族人民政治热情高涨，开始了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尝试。3月间，山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弗拉季高加索召开会议，决定召开北高加索地区的山地民族代表大会，商讨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事宜。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从3月到5月，他们开始准备、起草了许多文件：包括宪法、政治纲领、地方自治改革、地方司法、学校教育等方案。1917年5月1日到10日，召开山地民族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高加索各省、边疆区以及达吉斯坦的代表。会上讨论了所有这些政治文件，会后成立了“北高加索山民联合同盟临时中央委员会”。在9月之后，又有阿布哈兹加入其间，因而这一名称就变更为“北高加索、达吉斯坦、阿布哈兹山民联合同盟”。组成这个临时政府（1917年11月以后被称为“山民政府”）的成员，是各个山地民族的知识分子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尚在建设中的政府就明确表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将山民共和国布尔什维化。当时，车臣和达吉斯坦的穆斯林代表极力主张在北高加索恢复沙米

尔时代的伊玛玛特，认为这是抑制布尔什维主义、克服无政府状态和解体的惟一办法。为此，9月2日，又在达吉斯坦的偏僻山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那日木京·格琴斯基和乌孙-哈吉对代表们解释说：远离城市和军队，可以不受压力地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会上分裂为水火不相容的两派：一派主张建立教权国，主要是宗教界人士；另一派主张建立世俗政权，主要是知识分子。主张建立世俗政权的代表在会上处于某种劣势。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来自宗教界的代表全部当选，而“世俗派”代表因不满大会的议程而中途退场，大会陷于停顿。剩下的代表主要是穆斯林神职人员，因为交通不便而滞留在维杰诺村，他们又召开了大会。在这次会上，来自阿瓦尔州的那日木京·格琴斯基被推选为车臣和达吉斯坦的穆福提。此人是一个阿拉伯语专家，精通伊斯兰教法[5]。

1917年8月2日，弗拉季高加索成立了“东南同盟”，加入其间的有顿河、库班河、捷列克河、阿斯特拉罕的哥萨克，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山民，以及卡尔梅克人、诺盖人等。随后，在11月16日，在叶卡特琳娜达尔成立了哥萨克军队、高加索山民以及草原自由民族联合政府，山民政府也加入其间。山民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在未来的“俄罗斯联邦民主共和国”的范围内建立北高加索民族地域自治。至此，“山地民族联合同盟”已经不再独立存在；但是，同盟在其短暂的存在时期里，确定了主要活动方向，制定了许多法律，确立起地方自治制度，通过了地方法院和国民教育的改革方案，并通过一部宪法，得到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的赞许。

“同盟”努力解决北高加索地区久已存在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冲突，并在山民与哥萨克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宣布居住在北高加索地区的俄罗斯所有民族不分族属和信仰，一律自由、平等、和睦相处，实际上也是对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治支持；而“同盟”也将临时政府视为在制宪会议召开之前俄罗斯的惟一合法政府。

“同盟”对北高加索地区的土地问题相当重视。在1917年5月的代表大会上，“山民同盟”的报告中指出，土地原则上属于“劳动居民”；但是，鉴于土地问题事关重大，将土地问题留待制宪会议最终解决。在制宪会议召开之前，山民所占有的土地和森林，归其所有；从山民以及组成“联合同盟”的各民族没收充公的土地森林和水源应立即返还；对无地和少地的山民，以及加入同盟的其他民族，由公家土地给予保障[6]。但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就成为群

众对山民政府失望的主要原因之一。

“山地民族同盟”制定的国民教育改革纲领，体现了“山地民族同盟”政治举措的历史进步性。在同盟的政治纲领中，包括如何推行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以及各种不同层次教育的措施；主张在初级教育中实行普及、义务和免费教育；在山地民族中培训教师，包括女教师；在学校中学习几种语言：母语、俄语、阿拉伯语、突厥语等。

“山地民族联合同盟”的建立，是北高加索各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重大政治实践。有人认为，这是“继沙米尔伊玛玛特之后，高加索山地民族在北高加索建立自己统一国家的首次尝试”[7]，而随后建立的山民共和国则是这一进程的继续。

1917 年 11 月，山民同盟原来认可的中央政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十月革命所推翻；北高加索中央委员会于 1917 年 11 月 20 日宣布脱离俄罗斯，成立独立国家。该决定在北高加索人内部引起矛盾，俄罗斯人、哥萨克人联合起来反对这一决定，甚至成立了自卫队，而布尔什维克也派人到北高加索进行活动。1918 年 3 月，以哥萨克为主体的捷列克河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山地民族联合同盟”的原来的成员逃到孟什维克领导下的格鲁吉亚，山民共和国政府实际上已经解体。

山民共和国（1918—1920）

十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覆灭，政权转到布尔什维克手中，俄罗斯国内战争开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布尔什维克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列强的包围和封锁之中，国内则有来自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武装集团的威胁，而后者得到列强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必须巩固自己的政权。布尔什维克希望山民政府成为自己反“白色运动”的同盟军，白色势力则希望在俄罗斯恢复旧秩序。1917 年 12 月 19 日，布尔什维克发表了由列宁和斯大林签名的致俄罗斯穆斯林民族的呼吁书，向俄罗斯穆斯林（伏尔加河鞑靼人、吉尔吉斯人、西伯利亚人、突厥斯坦人、高加索突厥人、鞑靼人以及北高加索人）保证：他们在宗教信仰和民族生活等方面不受任何迫害，苏维埃政府会对他们提供保护。同时，苏维埃政府期待着来自穆斯林的物质和精神支持。

但是，山民政府还是决定建立独立国家。在这期间，德国和土耳其正在入侵外高加索。1918 年 4 月，“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山民联合同盟”向一些欧洲国家发出呼吁，请他们承认山民共和国政府，得到德国支持。

德国政府代表冯·罗索夫将军提议同盟成立“山民共和国”政府，以便允许其作为会议代表，参加5月即将在巴统召开的国际会议。1918年5月11日，山民共和国在第比利斯宣布成立政府，并通过了《独立宣言》：“高加索山民政府享有彼得格勒政府所承认的、前帝国境内所有民族自由建设自己政治前景的权利”，“北高加索山民同盟决定脱离俄罗斯，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8]。山民共和国政府首先得到德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的承认，并首先与德国政府签订建立友好关系的条约。5月13日，山民共和国经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伯爵送达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政府一份照会，照会除了重申《独立宣言》的精神外，并申明：从即日起，“独立的高加索同盟国家视自己为合法建立的”[9]；但是，俄罗斯政府代表越飞奉命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声称这些高加索民族和部落早已表示要与俄罗斯保持不可分割的联系，“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将以最坚决的方式，反对一小撮人践踏自己民族意志和篡夺权力的尝试”[10]；苏俄拒绝承认山民共和国。山民共和国主席切尔莫耶夫向土耳其求助，以便同苏俄进行斗争。土耳其政府提供武器、技术和交通工具，帮助山民共和国政府武装自己的军队。尽管照例遭到苏俄政府的抗议，但是土耳其派出军队援助山民共和国，土耳其将军还被任命为山民共和国军队的指挥官。1918年10月10日，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德尔本特，并在山民共和国政府所在的一座大楼里升起山民共和国的旗帜。此后，山民共和国以及土耳其军队还在军事上继续取得进展；与此同时，捷列克河州布尔什维克的状况很不利，希望同山民政府达成妥协。双方在第比利斯进行谈判，但是，山民政府方面提出了布尔什维克难以接受的条件，即完全放弃苏维埃政权，等等[11]。

11月24日，山民政府呼吁共和国国民团结在政府周围，帮助山民政府，直到召开真正的国民代表大会，那时山民政府就将全权转交给代表大会。同时还表示，政府必须在“把土地给劳动居民”的原则上解决土地问题；承认俄语是官方语言；尊重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发展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权利；保障公民的权利和集会罢工的自由；实行8小时工作制；恢复城市自治和地方自治；与各民族和睦相处，等等[12]。

支持山民共和国的国家中，除了土耳其以外，还有阿塞拜疆。阿塞拜疆曾经两次为山民共和国提供巨额贷款，但是，这些政治和财政支持的分量仍然不够，对于山民共和国来说，得到列强的承认和支持，始终是他们外交活动的中心目标。为此，山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巴马托夫多次前往欧洲，与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代表进行接触，寻求

支持，但是都遭到拒绝。

值得一提的是，还在成立之初，山民政府就表示，北高加索已经实现了独立，下一步，就是与外高加索各国进行谈判，进一步实现整个高加索的统一。当时，外高加索也在为统一而斗争。当李沃夫成为俄罗斯临时政府总理之后，来自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代表团拜访了他，表示希望独立。随后，组成一个“南高加索特别委员会”，承担政府职能，目标是在南高加索地区建立一个联邦国家。在建立国家之前，他们几次呼吁奥斯曼帝国提供援助，同时，南高加索委员会（主要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还要求土耳其归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革命后土耳其所占的领土——卡尔斯、巴统等地，引起了土耳其的不满。土耳其表示打算与俄罗斯进行谈判，而不是与尚未建立的南高加索政府谈判；格鲁吉亚代表团随即声明：土耳其是格鲁吉亚的威胁，并离开了谈判桌。随后，格鲁吉亚与德国签署了协议，1918 年 5 月 26 日，格鲁吉亚脱离南高加索联邦，宣布独立。5 月 28 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同时宣布独立。

1918 年 6 月，土耳其政府承认三国独立，条件是三国承认现有边界，同时还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山民共和国提议三国联合为“高加索邦联”。德国虽与土耳其有合作关系，但是它有自己的政治目的，想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确立自己的影响。由于确定亚美尼亚对一些土耳其领土拥有权利，就出现了紧张局势，各方互不信任，邦联最终没能建立。

1919 年，北高加索再次提议南高加索与其实现统一。对南高加索各国来说，与北高加索共和国签订类似条约极为有利，因为任何来自俄罗斯的打击，必定是首先针对北高加索的。山民共和国与南高加索三国在第比利斯举行谈判，签署了备忘录。四方达成了军事协议：在遇到外敌入侵时，各国军队联合对敌；同时，要交换外交情报、签署关税条约、发行统一货币。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美尼亚持亲俄罗斯立场，对土耳其抱有敌意，对建立邦联的构想很冷淡。提出了各种借口，成立邦联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决定北高加索山民共和国前途的，有诸多外部因素，其中之一是邓尼金，邓尼金的白色运动正是发端于北高加索周边的哥萨克各州；其次是布尔什维克政府，以及西方列强。首先对山民政府发动打击的，就是邓尼金。邓尼金反对布尔什维克，曾经得到一些山民的支持，但是，他的最终目标却是恢复君主制，他也不允许山民走向独立，提出了“为了统一、不可分的俄罗斯”的口号，将山民们的独立愿望视为“民族主义

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布尔什维克则刚刚取得政权不久，必须镇压白色运动，消灭邓尼金势力，但是也不会放弃高加索，尤其，红军需要借助北高加索山民的力量打败邓尼金。而列强则想将山民共和国的活动纳入他们的战略计划。1918 年 11 月 27 日到 29 日，山民共和国与协约国代表进行谈判，后者提出，独立问题将提交巴黎和会进行讨论；在此之前，山民政府应该与捷列克河地区的哥萨克组成联合政府，支持邓尼金，反对苏维埃政权。在英国的参与下，山民共和国于 12 月进行了改组，吸收哥萨克代表，组成联合政府；但是，邓尼金对这一联合政府不予承认。于是，山民共和国的军队就归英国将军指挥，与布尔什维克作战。由于财政拮据以及来自邓尼金的大举进攻，山民共和国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在此后很长时间里，邓尼金一直是山民共和国的经常威胁。1919 年 2 月，邓尼金甚至占领了山民共和国的领土，建立了一些地方政权，而且得到英国承认。2 月 16 日，邓尼金的将军沙梯罗夫逼迫山民共和国交出政权，山民共和国政府陷入危机。

1919 年 4 月，山民共和国开始解决土地问题。在制宪会议召开之前，山民共和国政府先将国家土地给无地和少地的群众使用，许多代表提出，应该将土地社会化。但是山民共和国政府认为该计划不可能实现，就推迟作出这一决定。山民共和国议会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共和国政府没有实行，群众因此而感到失望。形势逐渐恶化，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在增强，而山民共和国的威信在降低；山民共和国发出动员令，对付邓尼金的“志愿军”，许多居民拒绝服从[13]。许多民族之所以不支持山地共和国政府，还由于他们想要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惯。在这种情况下，达吉斯坦首先独立出来，成立了自治的“达吉斯坦临时政府”，并且得到英国指挥官的承认。在这一点上，英国与邓尼金的立场有某种一致之处：他们都希望看到山民共和国分裂为几个民族自治单位。

山民共和国废除了议会中达吉斯坦代表团的提案，不承认达吉斯坦自治，于是达吉斯坦代表不再参加议会的活动，议会主席被迫宣布暂时解散议会。1919 年 5 月 24 日，政权转到邓尼金手中，山民共和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濒临瘫痪，被迫宣布自动解散，个别政府成员和议会成员移居第比利斯，于 1919 年 9 月召开了高加索山地民族代表大会，准备进行反对邓尼金势力的斗争。10 月份，成立了“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国防委员会”，委员会号召同邓尼金进行斗争，并呼吁列强采取措施，清除邓尼金势力。从此，在反邓尼金的共同斗争中，穆斯林与布尔什维克等各

派力量联合起来。1919 年 11 月，邓尼金的势力已经崩溃，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在北高加索建立了政权。在布尔什维克胜利之后，许多山民共和国议会和政府成员移居土耳其，还有一些人则移居欧洲其他国家。

这样，在北高加索境内建立独立国家的尝试最终没能成功，原因主要是：山民共和国自身力量弱小，在成立之初就面临（布尔什维克和邓尼金）的外来威胁；没有得到列强的政治承认，缺乏足够的外来支持；而且，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无政府状态下，动员群众非常困难；同时，由于山民共和国政府难以实现原来主张的政策，推迟了北高加索人民最迫切的土地问题的解决，人民感到失望，山民共和国因此陷于困境。随着苏维埃政权的确立，山民共和国的政治活动就走到尽头。在多种政治力量角力的背景下，作为参加角力的一方，北高加索山民付出的代价最大，政治贡献最多，处境最为不利，得到的也最少；而红军则在艰难的国内战争中，得到山民的可贵相助。最终结果表明：角力各方的最大受益者，乃是布尔什维克政权。



在内战期间，车臣人阿斯兰别克·谢里波夫、俄罗斯人尼古拉·基卡罗、印古什人加普尔·阿赫列夫并肩战斗。

苏联时期车臣的行政建制

在国内战争时期，在布尔什维克、白色运动等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展开的政治、军事角逐，使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某种变迁。在旧的沙皇制度已经覆灭，而新制度尚未建立这一过渡时期里，北高加索地区处于深刻的社会政治进程中。各种社会政治力量都想填补由于革命而在北高加索地区造成的一时真空，各派政治力量的矛盾都纠结在一起，而且需要照顾各个民族在各方面的利益：遵从山民们的传统，保护俄罗斯居民，特别是哥萨克的利益，制止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残杀，而这只有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才能做到。

北高加索各族人民的政治运动表明，他们虽然有建立独立国家的热情和渴望，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不足，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不能独立主宰自己的命运。山地民族走过了相似的发展道路，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

但是，缺乏能够联合各民族的思想武器，伊斯兰教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在政治斗争中，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团结对敌的精神，使个别民族的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也难以期待有力的外部援助。因此，在追求民族自决的斗争中，遭到挫折。一些穆斯林民族的代表仍旧像沙米尔时代一样，提出“圣战”的口号，号召建立政教合一的教法国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很难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认同。而对于北高加索地区的山地民族来说，布尔什维克主张的共产主义与山民世代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因此本能地加以排斥和拒绝。实际上，任何政治势力和集团想要在北高加索地区建立统治，都必须尊重他们的民族传统。

与沙米尔时期相比，北高加索山地民族的政治水平毕竟有了很大提高，具有历史进步性，然而，苏联时期的历史著作却很少提到这一点。通常说来，苏联历史学家在论述该时期的历史时，往往倾向于将这些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阶段的地位和作用歪曲、贬低，或者绝口不提。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苏俄在北高加索建立了几个民族自治区：1920年建立了达吉斯坦自治区，1920年11月17日建立了山民自治区，加入其间的有车臣人、奥塞梯人、印古什人、卡巴尔达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依人、哥萨克等。苏俄政府还打算建立一个山民自治共和国。这一构想是由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提出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山民知识分子反对派建立独立的山民共和国的思想，并抵消其影响。1921年1月21日，苏俄政府下令，建立一个包括卡巴尔达人、俄罗斯人、奥塞梯人、车臣人、印古什人、诺盖人、卡拉恰依人等民族在内的“山民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共和国隶属于俄罗斯联邦。这一政治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强制性。为了体现所有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共和国是按照领土原则，而不是民族原则建立的，也没有按照境内人口占多数的民族来命名共和国。与此同时，这些民族中有一些派别主张建立独立国家，但是，也有人主张完全与俄罗斯联合。由于北高加索多数民族都愿意在自己单独的民族国家中生活，斯大林政府便很快放弃了将山地民族在一个国家中联合起来的想法。1921年到1922年间，苏俄政府在对北高加索地区继续划界的过程中，从山民共和国中划出卡巴尔达、卡拉恰依—切尔克斯以及车臣自治州，1924年又将北奥塞梯和印古什自治州划出去，作为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州。从此，山民共和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1924年7月7日，苏联政府发布命令，山民共和国被正式废除。

废除山民共和国，以及由此而来的民族地区的重新划分，导致了该

地区民族主义趋势加强，车臣表现得尤为突出。重新划分出来的这些民族更加强化了自己的民族意识，民族间矛盾进一步加深。北高加索地区人口密集，土地不充裕，各个民族自治单位都觊觎其他民族自治地区的土地，希望得到更多的民族生存空间。为此，矛盾和冲突接连不断。苏维埃政府不止一次地帮助解决各民族之间（车臣和印古什、车臣与格鲁吉亚、印古什与奥塞梯、印古什与格鲁吉亚、印古什与卡巴尔达等）因争夺土地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与此同时，还开始了艰难繁琐的民族划界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压制这些民族的独立倾向的，是在俄罗斯全境都建立并巩固了自己权力的强大的苏维埃政府，以及斯大林等领导人坚决强硬的民族政策。

十月革命以后北高加索地区的政治运动表明，包括车臣在内的北高加索各民族，有不同于国内其他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历史经验。这是苏联领导人在决定车臣，乃至北高加索民族地区的政治法律地位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民族意识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些民族的社会政治生活。加入或者退出苏联或俄罗斯，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民族的历史命运。北高加索地区既没有分裂成若干小国家，也没有完全实现一体化。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对这些地区实行民族自治政策，给予其较高的政治法律地位，适应这些民族的要求，为这些民族走向历史进步创造条件。但是，接着在 20 年代末期进行的强制集体化，却没有考虑他们的传统习俗和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生活，招致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尤以车臣为最。造成该地区人民与苏联政府长期的紧张和对立。从十月革命之后直到 30 年代，车臣地区对苏联政府的反抗一直时断时续：从 1929 年到 1930 年，车臣发动了反对苏联政府的暴动，最后被强力镇压下去。在此期间，车臣地区损失大量人口，这是苏联政府不顾及民族和地区特点而导致的悲剧事件。

在以后的岁月里，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的政治法律地位多次发生变化。1934 年 1 月 15 日，按照苏联政府的命令，车臣自治州和印古什自治州被合并成为车臣—印古什自治州，行政中心为格罗兹尼。1936 年 12 月 5 日，又将车臣—印古什自治州升格为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该自治共和国一直存在到 1944 年。1944 年，苏联政府将车臣民族集体流放，并撤销自治共和国的建制。直到 1957 年赫鲁晓夫为车臣民族平反，才恢复了自治共和国的建制。车臣的政治法律地位几经变换反复，充满不稳定性。

注　释：

〔1〕Суверенная Северо－Кавказ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http://www.kafkas.org.tr/

〔2〕А. Бли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Чечня: война 200 ле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0, С. 156.

〔3〕А. Бли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Чечня: война 200 ле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0, С. 163.

〔4〕同注释〔3〕, С. 164。

〔5〕М. Д. Бутаев, Союз обьединенных горцев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и Дагестана 1917—1918. Гор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1918—1920гг., Махачкала, 1994, С. 63.

〔6〕М. Д. Бутаев, Союз обьединенных горцев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и Дагестана 1917—1918. Гор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1918—1920гг., Махачкала, 1994, С. 45.

〔7〕同注释〔6〕, С. 36。

〔8〕М. Д. Бутаев, Союз обьединенных горцев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и Дагестана 1917—1918. Гор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1918—1920гг., Махачкала, 1994, С. 121.

〔9〕同注释〔8〕, С. 124。

〔10〕同注释〔8〕, С. 125。

〔11〕同注释〔8〕, С. 164。

〔12〕同注释〔8〕, С. 172。

〔13〕М. Д. Бутаев, Союз обьединенных горцев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и Дагестана 1917—1918. Гор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191—1920гг., Махачкала, 1994. , С. 264.

第四章

流放车臣人：原因、历史事实与后果

长期以来，有关1944年流放车臣人的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研究。在苏联时期，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开始不再有人为的障碍，但是仅仅限于有关流放过程的局部资料和史实的披露。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陆续披露一些档案材料，俄罗斯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日渐深入。我国学者则对此问题很少有专门研究，只是将其作为苏联或俄罗斯民族问题的一个部分而提及，且语焉不详。然而，对于探究车臣危机的历史根源来说，流放车臣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斯大林流放各民族的阶段及其背景

苏联政府流放车臣民族，有其特定的历史传统和时代背景。

在沙皇时代，将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亚乃极其常见之事，而将整个民族集体进行流放，尽管极为罕见，但也确有先例。如前所述，在高加索战争结束前后，俄罗斯帝国政府曾与土耳其达成协议，将数百万高加索穆斯

林人口迁徙到土耳其境内。但是，较之于苏联时期，沙皇时期大规模迁徙高加索民族，其悲剧色彩仍然淡了许多。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斯大林政府将富农加以流放，以推进全盘集体化，而在三四十年代开始对一些民族加以流放：如波兰人、日耳曼人、朝鲜人、日本人、华人、克里木鞑靼人等。当然，这与镇压富农这些情况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其原因和背景都是不同的。据统计，苏联政府从30到50年代总共将15个民族和600多个分属不同民族的居民群体流放，总计3226340人，另一种说法是流放3441582人[1]。整个北高加索地区是所有被流放民族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地区，几乎涉及该地区的每一个民族。

1949年的统计表明，全国共有250万“特别移民流刑犯”，其中日耳曼人最多，占110万；还有一些从前的富农，占总数的5%[2]。

首先必须澄清一个事实，即斯大林并非特意迫害俄罗斯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实际上，从30年代到50年代苏联所采取的镇压措施来分析比较，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30年代流放富农是以阶级来做划分的，而流放某些特定的民族群体，同样并非依据其民族属性。斯大林流放的，除了如车臣人、克里木鞑靼人等少数民族以外，还有俄罗斯族。在卫国战争期间，俄罗斯人投敌叛变的情形也不在少数，最为著名的就是弗拉索夫将军。因此，当战争结束前后，这些人理所当然地遭到镇压。从1946年到1947年间，有148079名这样的弗拉索夫分子和其他叛变分子被流放，成为特别移民流刑犯[3]。当然，整个民族被集体流放的，基本上都是穆斯林民族，总共有7个：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木鞑靼人、卡拉恰依人、格鲁吉亚梅斯赫廷人、卡尔梅克人、巴尔卡尔人。为什么都是穆斯林民族，同样需要具体研究；但决不是由于斯大林单单镇压或迫害穆斯林民族。

其次，当时其他一些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国家也都采取过类似措施：美国在战时1942年2月19日也曾将12万日本人强制迁徙，其中2/3是美国公民，其余的也都有合法居住权。

日本在1932年征服朝鲜后，曾经将朝鲜人从朝鲜半岛迁徙到萨哈林岛，目的在于削弱朝鲜民族的反抗能力。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将萨哈林岛上的日本人撤出，剩下将近5万朝鲜人听凭命运的摆布。他们自然成了苏联公民。

为何要流放远东朝鲜人，以及少量日本人和中国人？30年代后半期，苏联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当时正在开展“大清洗”。同时，

日本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苏联对远东地区的安全较为担忧，担心在未来被迫在东西两面与法西斯作战。当时远东地区确实有大量日本间谍在活动，这是事实。苏联政府担心与日本邻近的远东地区的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参与日本间谍机构的颠覆破坏活动，当时不断收到类似情况的报告，因此，决定在1937年8、9月份将他们强制迁徙。同时，日本的做法也促使苏联政府采取相应的步骤：日本在征服朝鲜之后，将朝鲜北部与苏联毗邻地区的大批朝鲜人迁徙到了萨哈林岛[4]。

在二战前夕，苏联进行了建立“东方战线”的军事行动。1939年，苏联和德国侵入波兰，并将波兰加以划分，分别占领，也将波兰人大批迁徙到了苏联内地。显然，这是出于占领和控制波兰，削弱其反抗力量的需要。可以参照的是，当时纳粹德国也采取了强制迁徙波兰人的措施。当然，除迁徙外，还进行了大规模屠杀。

苏联通过各种方式合并了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为了防止这些与俄罗斯人的民族心理迥异的民族的反抗，苏联政府将这些国家中非共产党的政治派别的领导人、活动家、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加以驱逐，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在1941年6月14日到15日的一夜之间，将近6万多名爱沙尼亚人、3万4千名拉托维亚人、3万8千名立陶宛人被流放。

苏联政府流放日耳曼人的目的，显然是由于当时苏联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将与敌国主体民族属性相同的日耳曼人强制迁徙到苏联腹地，防止这些人在德国占领状态下成为“第五纵队”。

因此，40年代苏联政府流放这些民族，在当时来说具有某些特殊的时代背景，即为了国防需要，防御外敌入侵。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斯大林政府强制迁徙各个民族有一些共同特点；但是，也还有一些差别，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类：惩罚性警察式镇压和国家行政强制性。对于日耳曼人、车臣人、克里木鞑靼人的流放，可以视为惩罚性警察式镇压；而对于朝鲜人、华人的迁徙，则属于国家行政强制性质，两者受到的待遇是有差别的。总体上来说，他们在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都比较低，受到各种限制，如身份证、居住地的选择等。车臣人、印古什人被称为“特别移民流刑犯”，在一定的情境下，几乎等同于“罪犯”、“叛徒”等。实际上是被剥夺了公民待遇，人身自由受到某种限制，须在警察机关的监督和监视下进行劳动改造，无权选择居住地，无权参军保卫国家，已经参军的要复员，且持续时间特别长，以车臣人、印古什人为例，1944年流放，直到1957

年才从流放地返回。而以朝鲜人为例，许多苏联官员认为他们不是特别移民流刑犯，不是因投敌叛变而被镇压的，而是苏联政府为了清理与日本接壤的边境地区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他们从来没有像车臣人那样，在警察局登记，而且，在中亚流放地，所有朝鲜人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都得到安排，有他们自己的集体农庄等[5]。

在被强迫迁徙的民族中，大多是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乌克兰民族之所以能够免遭这种命运，只是因为他们人口太多，无处驱赶[6]。

为什么将车臣人加以流放呢？当年苏联政府的说法是由于车臣人投靠德国军队，叛变国家。但是，学术界的观点却极为纷纭。克里木鞑靼人、车臣人等民族是在1944年被流放的，而直到1946年6月25日，苏联《消息报》才刊载一个简短的声明称，由于克里木鞑靼人、车臣人等与德国法西斯合作，因此将他们加以流放。有关流放的原因在其后又众说纷纭。这首先是有关车臣人和克里木鞑靼人叛变的真实情形一直不为人所知。因此，普通苏联人虽然知道克里木鞑靼人、车臣人叛变国家，却了解很少，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苏联又一直是学术禁区；其次，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产生了严重影响。从那时开始，流放车臣人等民族往往就成为一些人所谓斯大林镇压人民、迫害少数民族的佐证。如："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队和苏联红军的后备军为什么要把几十万无辜的人们运送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将士兵从前线撤回，占用几千节车厢，将铁路堵塞？至今也还不清楚。但是，在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关于一些民族的代表上书德国占领当局，请求给他们自治地位的报告后，领袖这时就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或者，斯大林希望遏制那些小民族，彻底摧毁他们的独立愿望，巩固自己的帝国。"[7]

一种说法认为，由于经济形势恶化以及各民族争夺包括土地在内的生存资源，北高加索地区在卫国战争之前就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宗教冲突，这就使北高加索成为苏联国内一个最不安定的地区。将一些在冲突和争端中较为活跃的民族流放，是一个可以选择的解决争端和冲突的办法。

该作者还认为，卫国战争期间北高加索的匪帮活动猖獗，也加剧了苏联政府的担忧。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后，苏联摧毁了9161个武装集团，共54130人，其中北高加索地区占17563人。而1944年上半年，苏联境内活动的团伙就有1727个共10994人，其中北高加索地区占145个，

3144 人[8]。

此外，也有人认为是出于国防的考虑，当外敌入侵的时候，提防国内潜在敌人的反叛。一位学者指出：在外来危险面前，当局表现出了对潜在的内部敌人的不信任（美国、德国等国家都曾经采取过类似措施）[9]。

俄罗斯史学家爱德华·拉津斯基则认为，之所以流放车臣人，是为了防范因战争而高涨的车臣民族主义。诚然，在战争期间，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几乎苏联的所有民族都曾民族意识高涨[10]。

英国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认为，这是斯大林个人泄愤的举动。由于这些民族在30年代的集体化过程中，对苏联政府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抗拒，因而使斯大林极为恼怒[11]。而车臣族政治学家阿弗图尔汉诺夫认为，斯大林这么做，是要实现这样一些政治目标：在未来与西方的冲突中，将高加索变成一个安全稳固的后方，以免高加索成为一个针对苏联宗主国体制内部的全高加索民族阵线；夺取高加索的石油财富；不仅将高加索作为一个避免内部危险的战略基地，而且还要把它变成一个未来对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印度扩张的战略平台[12]。

车臣人叛变情形严重

投降、投靠德国的苏联公民或侨民，是一个包括许多民族在内、规模极其庞大的群体，这些人在战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但是，所有这些与德国合作的苏联公民或侨民，其动机和原因都极为不同，需要具体分析。由于俄罗斯至今只开放了少量的档案资料，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具体困难。



与德国合作的弗拉索夫将军。

与德国合作的苏联侨民，有这样几类：1. 在后方为德国人服务的志愿者，在作坊、厨房等处工作。到1943年，已经超过50万人；2. 战斗人员，在1942年正式建立。在战争期间，德国总共

建立了90个步兵营，其中有中亚地区民族组成的26个突厥斯坦营，15个阿塞拜疆营，13个格鲁吉亚营，12个亚美尼亚营，9个北高加索营，8个克里木鞑靼营，7个由伏尔加河鞑靼人以及伏尔加河地区和乌拉尔地区民族组成的营。每个营大致为1000人，其中4%是德国人，军官几乎全是德国人。此外，1942年，德国A集团军的战区建立了一支卡尔梅克人骑兵军团，计有5000人。1941年秋天，建立了哥萨克百人队，1942年已有4个哥萨克团。1943年，建立了“第一哥萨克师”，由德国冯·潘维茨将军指挥。德国学者认为，到1944年中期，德国军队指挥着200个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等组成的营[13]。

除上述与德国合作的苏联侨民外，在苏德前线以及其他战场上，在不同时期里，还活动着如“俄罗斯民族人民军”、“俄罗斯解放人民军”、第十五哥萨克骑兵军团、多马诺夫将军的哥萨克阵营等。多数是由革命前沙皇军队的将军倡议建立，并在他们的指挥下行动。到战争末期，有许多苏联侨民大批地加入进来。1944年底，开始建立“俄罗斯解放军”，但是德国不允许弗拉索夫联合并指挥所有与德国合作的俄罗斯人和苏联公民，而只允许建立3个师。

在苏联的德占区，特别是在克里木半岛、乌克兰西部地区、高加索地区，与德国合作的苏联公民就更多。在卫国战争前后，确实有为数众多的车臣人与印古什人、鞑靼人一起，做了德国军队的奸细，甚至参加了德国军队。近年来俄罗斯陆续披露了许多新的档案材料，由这些材料可知，车臣等民族的叛变情形颇为严重。

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境内，仅仅从1941年7月到1944年间，国家安全机关就消灭了197个匪帮，总共4532人（657人被打死，2762人被活捉，1113人认罪）。参加匪帮反对红军而死伤的，是战场上阵亡的车臣族红军数目的两倍。这还不包括参加到德国军队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战争时期，如果没有当地居民的帮助甚至参与，



1942年9月，参加德军的高加索人。

匪帮的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多数当地居民都犯有过错[14]。

最为严重的是在战争期间，车臣发生了暴动。哈桑·伊斯拉伊罗夫（又称捷罗耶夫），生于1910年，1929年加入了联共（布），同年进入顿河—罗斯托夫党校学习，1933年被派到斯大林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深造。1935年因触犯俄罗斯联邦刑法，被判在劳改营监禁5年。但他在1937年已经获得自由，随即回到北高加索，担任律师。苏德战争爆发后，哈桑·伊斯拉伊罗夫与其弟弟侯赛因一起从事非法活动，为发动大暴动做准备。在各村镇多次召开会议，并建立了小分队。暴动日期最初定于1941年秋天，即德军抵近车臣境内时。由于德军闪击战失灵，被迫推迟到1942年1月。由于暴动者纪律低下，联系不畅，推迟叛乱未能成功，形势失控。个别小组提前行动，而且相互之间没能联合起来。但是，暴动仍造成了一定破坏，先期赶来镇压的部分行动人员被缴械或被打死。1942年1月28日，哈桑·伊斯拉伊罗夫在奥尔忠尼启则，今弗拉季高加索召开会议，成立“高加索兄弟特别党”，规定了章程和纲领，目标是：接受德意志帝国的委托，在高加索建立一个联邦制共和国，甚至还规定了象征物：徽章。随后，为了在未来取悦于德国主人，哈桑·伊斯拉伊罗夫将该组织更名为“高加索兄弟国家社会主义党”，其成员很快达到5000人。

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境内的另一个重要的反苏组织，是成立于1941年11月的所谓“车臣—山民国家社会主义地下组织”，领导人是麦尔别克·谢里波夫。此人生于1905年，曾加入苏共，因反苏宣传被捕，1939年被释放，随即担任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林业委员会主席，社会地位很高。麦尔别克·谢里波夫网罗了大批逃兵、流亡刑事犯、匪首等。1942年8月，战线逼近车臣，谢里波夫与当地泰普长老、宗教领袖等建立联系，通过他们发动居民制造反苏叛乱。在一些地区，叛乱者袭击了党政机关，抢掠财产，但被驻军击退。谢里波夫企图同哈桑·伊斯拉伊罗夫会合，但是没能成功。同年11月，叛乱被平定。

同年10月，还发生了德国军官李凯尔特组织的叛乱。空投到车臣境内的一小队伞兵，与当地匪帮首领拉苏·萨哈波夫联合起来，人数达400人，用德军的武器装备起来，发起叛乱，许多村庄卷入。这次叛乱被军队迅速平定，李凯尔特本人也被打死。

除了普通车臣居民热烈欢迎德国占领军以外，大批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甚至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与德国合作。比较充分地论述车臣形势，同时也预示着车臣人被流放命运的，是贝利亚致斯大林的报告《论车

臣—印古什共和国地区的形势》：

共和国总计有居民点2288个，战争期间损失人口25886人，剩下705814人。印古什人和车臣人总共大约45万人。境内有38个派别，人数大约2万多人积极进行反苏宣传，庇护德国伞兵。1942年8、9月份战线逼近的时候，德国人开始空投伞兵，并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这些伞兵通常都与当地匪帮结合在一起。有80多名联共（布）成员放弃工作逃走，其中包括：16名地区联共（布）委员会领导人，8名地区执行委员会领导工作者，14名集体农庄主席。按照德国情报机关的指令，与德国伞兵有关系的、有威望的反苏分子于1942年10月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各地组织了反苏暴动。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对苏联政权的态度直观地体现在：逃服兵役和开小差。1941年8月第一次动员的时候，应征召的8000人中，有719人开小差。1941年10月，4733人中，有362人逃避征兵。1942年1月，为补足民族师的兵员，仅仅能够征召到员额的50%。1942年3月，14576人中，有13560人逃服兵役和开小差，他们逃进山中，与匪帮会合。1943年，3000名志愿人员中，逃服兵役者占1870人。阿拉乌金·哈穆切夫和阿布杜拉希曼·别尔托耶夫领导的车臣团伙窝藏了德国伞兵兰格，并将他转移。这些罪犯们得到了骑士勋章，并被转投到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境内组织武装暴动。1943年9、10月份，243人改邪归正。到11月1日，有35个匪帮组织，共245人，以及单独的匪徒43人。4000多名曾在1941年到1942年间武装暴动的参加者停止了积极活动，但却拒不交出武器，藏匿起来，以便在德国人对高加索发动新进攻时用于新的武装暴动[15]。

面对猖獗的匪帮活动，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干什么呢？当时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是谢·伊·阿尔波加切夫大尉。1941年7月15日的会议记录表明，就同共和国内匪帮和开小差行为作斗争的局势听取了此人的汇报之后，党委会议极为不满，认为由于他的不作为，导致共和国内匪帮猖獗。但是此后，1941年的8月初，此人被指责仍然逃避同匪帮的斗争，并企图推诿职责。匪帮不仅没有被消灭，活动反倒更加猖獗了。最后，在一次对匪帮的突击行动中，查获伊斯拉伊罗夫·捷罗耶夫的信件，其中有与谢·伊·阿尔波加切夫的往来通信，阿尔波加切夫因此暴露。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捷罗耶夫（即哈桑·伊斯拉伊罗夫），向你问好！我非常难过，你的山民们早于约定时间发动了起义。我担心，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工作人员将会被揭发。为了真主，请信守誓言，不要

对任何人把我们说出去。你已经被揭发。请深藏在地下行动，不要被逮捕。知道吗，你会被枪毙。请你只通过可靠助手和我保持联系。请你给我写一封怀有敌意的信，尽可能地威胁我，而我也将追捕你，烧你们家的房子，逮捕你的某个亲戚，时时刻刻反对你。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你我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并互相迫害。你不认识奥尔忠尼启则的那些盖世太保间谍，通过他们我曾经告诉过你，要把我们所有反苏工作的资料寄出。请把这次起义的结果写一个材料给我，我会立即按地址寄到德国。请当着送信人的面把信撕了。非常紧急，我很担心”[16]。

这封信表明，此人与匪帮互为表里，串通一气，并且在与德国人合作。在共和国的党政部门中，这并非个别现象。各级工作人员中都有这样的叛变者，如：内务人民委员会斯塔罗—禹尔惕区处领导艾里穆扎耶夫、沙罗依地区领导人帕沙耶夫、伊图穆—卡林地区领导人梅日耶夫、沙托依地区领导人伊萨耶夫、伊图穆—卡林地区警察局领导人哈萨耶夫、切别罗依地区领导人伊萨耶夫、内务人民委员会近郊区歼灭营指挥官奥尔茨汉诺夫等。

科布罗夫的手记中写到：1942 年 8、9 月间，当战线逼近的时候，80 多名联共（布）党员丢下工作逃走了，其中包括 16 名联共（布）区党委领导人、8 名州执行委员会领导人，以及 14 名集体农庄主席。而普通工作人员也有各种类似情形。

当时，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包括 24 个区和格罗兹尼市，其中有 2/3 的区党委第一书记逃走。伊图穆—卡林地区的情形尤为“突出”：区党委第一书记唐吉耶夫、第二书记萨德科夫等党的工作人员都去参加了匪帮。近一半的当地党委门口都贴着告示：区党委关门——所有人都去参加匪帮[17]。

知识分子也纷纷叛变。报纸《列宁的道路》编辑艾利斯别克·铁木耳卡耶夫与阿弗托尔汉诺夫投靠了德国人，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羌塔耶娃和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会委员达卡耶娃都与谢里波夫、阿弗托尔汉诺夫有联系，了解他们的犯罪活动，并为他们提供协助。

普通居民藏匿德国伞兵。在战线逼近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时候，德国军队开始空投成小组的伞兵和间谍到共和国境内，当地居民善意地对待他们。空投的间谍们的任务是：建立并加强匪帮和叛乱活动，吸引大队红军，破坏重要通道，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等。从被捕的德国间谍奥斯曼·古贝（此人原来是达吉斯坦的阿瓦尔人，生于 1892 年，1915 年志愿加入俄军作战，国内战争期间在邓尼金军中服役，1919 年 10 月开

小差，1921 年前往土耳其，1938 年因从事反苏活动被驱逐。卫国战争爆发后，奥斯曼·古贝在德国间谍学校中接受训练，被德国情报机关派回北高加索。德国人对他抱有很大希望，想让他做北高加索总督，但是，他与他的小分队都在 1943 年被捕）的口供中，也反映出当时与德国人合作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非常之多：

在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中间，我可以不费力地找到所需要的人。他们准备叛变，转到德国人方面来，并为其效劳。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有什么可不满的？在苏联政府时期，他们过上富裕、小康的生活。当我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境内待了 4 个多月之后，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要重复的是，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什么都不需要。我想起了德国和土耳其的山民侨民的艰难条件和日常的困苦生活，使我触目惊心。我没有找到别的解释。这些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就是痴迷于对自己祖国的叛变情绪、自私自利的打算，希望在德国人统治下保留自己一点残余的福利作为补偿，为占领者提供服务，并为其留下现有的牲畜、食品、土地和一部分住所[18]。

那么，是否有大量车臣人在红军中为国战斗呢？

1942 年 2 月初，成立了 12 个步兵营，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境内还成立了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车臣人、印古什人等组成的第 242 山地步兵师和 317 步兵师。许多车臣人递交了申请书，志愿参加红军，表示希望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祖国。但是，按照科布罗夫的报告，1942 年服兵役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中开小差的达到 93%，而在那些车臣志愿军中，1943 年，3000 名志愿军中开小差的车臣人达到 1870 人。另外一个数字是，当流放的时候，从前线回到北高加索的车臣族军官 710 人，中士 1696 人，列兵 6488 人[19]。

那么，怎样看待大批车臣人等苏联公民与德国合作这一现象？

导致车臣人投敌附逆的原因，在于德国人处心积虑的策动，是当时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在发挥作用（与战争初期正面战场上德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可以说，在这条战线上，德国人也迅速取得了成就）。当卫国战争爆发前后，土耳其和外高加索地区被外国间谍作为基地，为德国在这一地区进行间谍活动、破坏活动以及为在苏联红军的后方组织叛乱做准备。德国的战略家们对策动苏联穆斯林高度重视。1933 年纳粹上台之后，立即同来自苏联的民族主义思想、反俄情绪最强烈的侨民进行接触。德国人可以有多种选择，在侨民中间，有许多流亡政府成员、各种委员会，甚至于 1918 年到 1921 年间的独立国家政府的许多领导人还

都活着：如阿塞拜疆总统列苏尔扎得·艾米尔·贝依、格鲁吉亚总统诺依·若尔丹尼亚、北高加索共和国总统扎巴基·瓦桑·基雷等人。

1942 年战争爆发之后，德国将侨民工作直接控制起来。被占领的东方领土部与军事指挥机关共同负责这一事务，而在国外则由安全局负责。法西斯德国以穆斯林的“保护者”和“解放者”自居，将包括车臣人在内的北高加索穆斯林作为自己的潜在盟友；培训车臣人等苏联侨民，让其回到苏联境内与苏联政府为敌，并且希望土耳其站到德国一边来[20]。这对于苏联来说，后果是极其凶险的。

许多苏联侨民之所以与德国合作，是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德国的目标，是推翻苏联的斯大林政权，并在战争胜利后允许他们实现独立。弗拉索夫希望在德国的帮助下，建立反斯大林的俄罗斯政府和军队。从 1942 年起，德国境内成立了各种“民族委员会”：北高加索、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卡拉恰依、鞑靼、卡尔梅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

德国阴谋策动的切入点，在于苏联的弱点，即高加索民族的历史经验、民族意识，以及苏联政府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全盘集体化时期对高加索各民族政策方面犯下的严重错误，其意识形态是反布尔什维克主义。

在苏联，背叛国家乃是个人名誉上的奇耻大辱，是莫大的罪名，但是，要求那些本来就对苏联心怀不满的车臣人忠于国家，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意义。与德国合作的苏联人中，许多是因沙皇俄国征服、十月革命、全盘集体化等事件而在不同时期流亡国外的高加索侨民，其中有一个重要人物萨伊德·沙米尔，是 19 世纪高加索战争期间北高加索民族领袖沙米尔的孙子，以及苏军战俘，德国情报部门正是借助他们来打开缺口。当外敌入侵的时候，对苏联政府不满的人就将德国人视为自己的“解放者”，实际上是充当了法西斯德国的工具，客观上成为德国的“第五纵队”。

对于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卫国战争的苏联政府来说，局势复杂、动荡的北高加索地区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隐患。匪帮肆虐以及大批车臣人投靠德国人的严重事件，是一些确凿无疑的事实。但是，导致这种形势的产生，有一些复杂的原因。在古代和中世纪，车臣人素有从邻族掠夺人质和牲畜的传统，并以此为荣。这是车臣各地出现土匪现象的一个重要前提，按照文明社会的道德去衡量这些行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俄罗斯帝国征服、统治的 100 多年时间，对于使车臣社会与俄罗斯社会实现一体化、成为一个与俄罗斯同质的社会来说，仍显得短暂了些。历史表明，

异质文明若要同化伊斯兰文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东正教文明不能，苏维埃文明也不能。

卫国战争初期德国长驱直入和苏联大规模失利，包括车臣人在内的许多人都误判了形势。在外国入侵的形势下，本来就有离心倾向的车臣地区，形势显得更加严峻。



汉帕沙·努拉基洛夫

但是，仍有许多车臣人参加了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战斗，并且有出色表现。于是，一方面，是大量车臣人和高加索人参加了德国军队，获得第三帝国的奖章；另一方面，也有许多高加索人获得苏联“保卫高加索”奖章。36 名车臣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其中，著名的车臣族勇士汗帕沙·努拉基罗夫一人在战争期间就消灭了 950 名德国人[21]。

在导致车臣人被流放的所有原因中，究竟什么是决定性因素并不重要。但是，苏联政府对于车臣民族以及北高加索其他民族，特别是印古什民族确实抱有深深的成见。1948 年，苏共中央决议中曾写到：“还在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岁月里，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就是北高加索各民族之间建立友谊的障碍”[22]。在流放前夕，车臣人中间一直有一种传言：苏联政府想把车臣人装上火车沉入里海，或者派军队将其全部炸死，然后诬称是德国军队干的。最早得到这一消息、并告知车臣人的阿塞拜疆人被克格勃逮捕并判刑[23]。传言真伪，有待新材料来证实。在卫国战争后期、苏联已经胜利在望的时候，车臣人和其他民族，多数是穆斯林民族一起被流放，除了形势的必需，显然还具有某种惩罚性质，同时也表明苏联领导人有较为长远的考虑。流放车臣人，乃是一个深谋远虑的计划和步骤，是用“斯大林方式”完全、彻底地解决“车臣问题”或“北高加索问题”。“北高加索问题”是一个虚拟或假设的概念，但也是存在的。为了稳定地区形势才作出了最后尝试。所谓因车臣人叛变而将其流放，乃是一个方便理由。直到 1948 年 11 月 24 日，苏共还作出秘密决议，强调迁徙车臣人、印古什人等特别移民是永远的，他们无权返回原来的居住地；擅自离开者，要罚做 20 年苦役[24]。

流放车臣人的步骤

正如一位作者所写的那样，大规模的叛变，就应该报之以大规模的

流放。随着苏联红军在北高加索地区的胜利，1943 年 1、2 月间，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境内的德国人侵者被彻底肃清，共和国已经计划恢复国民经济。就在这时，苏联政府开始拟订流放各民族的计划。1943 年底，强制移民计划最终确定，苏联政府开始部署协调运输事宜：抽调、集结专用列车和汽车等等，许多地方领导人都已得知此事。苏联政府流放车臣等民族的决定，并没有在报纸上公布。索尔仁尼琴在自己的小说中写到，之所以没有将流放波罗的海各民族的决议在报纸上公布，是为了避免损害苏联国家的声誉和让西方敌人没有可乘之机[25]。直到 1946 年 6 月 26 日，《消息报》才公布命令，称“大量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受德国间谍的教唆，自愿依附德国人组织的武装，并与德国的武装力量一起拿起武器反对红军。执行德国的指令，他们组织了匪帮，这些匪帮从后方进攻苏联政府。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大部分居民对这些祖国的叛徒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因此，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应予以撤销，并将居民加以流放”[26]。

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流放，是贯彻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的意志，而具体负责人则是贝利亚。由贝利亚亲自坐镇北高加索，并定期向斯大林汇报流放行动的进展情况。苏联政府对流放行动做了具体周详的安排。调集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 19000 名工作人员。他们大多在以前都参加过强迁卡拉恰依人和卡尔梅克人的行动。在迁移车臣人、印古什人之后，他们还将完成迁移巴尔卡尔人的行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 10 万名军人也参加了这一行动[27]。另外，还吸收了邻近的 6000—7000 名达吉斯坦人和 3000 多名奥塞梯人参加流放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行动。强制流放行动完全是按照完成一次重大军事行动的要求来规划和部署的，行动代号为“扁豆”。在俄语里，“扁豆”一词与“车臣人”发音接近。

车臣人是怎样前往流放地的呢？按照当事人的回忆，1944 年的 2 月 23 日，车臣人被从各个偏僻角落里用汽车和马车集中到铁路上，然后他们将被运送到遥远的地方听凭命运的摆布。在强行迁徙时，发生过海巴赫村那样的悲剧事件：在将车臣人强行迁走后的两三天，一些因种种原因落在后面的老弱妇孺以及沿途行人总共约 700 人，被赶往海巴赫村的一个羊圈里，活活烧死[28]。每个家庭只准随身携带 20 公斤行李物品，一些房屋被放火烧掉，为让他们永远不能再回来。山里只剩下一些废墟和塔楼，守望着这方世界。他们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用包裹严实的运货火车运走。当时是冬天，依照高加索人的习惯，这些被临时集中起

来的人们穿着单薄。在长达两个多星期的旅行中，由于寒冷、饥饿、环境肮脏，开始流行疾病，许多人死于伤寒[29]。被流放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总数约为46万人。而另一件报告中称，运送特别移民的列车总共180辆，每辆65节车厢，被流放的人数为493269人（平均每辆列车运送2740人）[30]。

按照特种移民管理部门的统计，从1943年到1949年，安置车臣、印古什、卡拉恰依和巴尔卡尔人移民共计608749人，自己前去流放地的有27530人，因各种原因减员184556人[31]。致贝利亚的报告中称：在运送途中出生56人，因病住院285人，死亡1272人。而1943年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死亡率为13.2人/1000人。死亡原因为本身体弱多病者以及瘟疫的流行等，甚至因为瘟疫的蔓延，只好将一些车厢脱挂[32]。与车臣、印古什等民族被一起流放的，还有一些其他民族的一些成员，当时没有人去注意这些人的族属，如阿瓦尔人、库梅克人、犹太人等等，总共500人。在向政府上书之后，他们大多被送回原地[33]。流放行动从2月23日持续到3月18日。1944年4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布移民工作结束，但是，强迁行动实际上一直持续到1945年。除了普通车臣和印古什居民以外，那些在军队中服役、在各地劳改营服刑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也在被流放之列。从前线召回的车臣、印古什等民族的军官和战士共计：军官5943人，中士20209人，列兵130691人。他们被剥夺军人资格，禁止佩戴肩章和携带武器。

需要说明的是，那些在卫国战争中立下战功的车臣族军人，并没有被流放，但是不许住在高加索。此外，那些与别的民族通婚的车臣和印古什妇女也没有被流放。

与此同时，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建制被撤销，不复存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建立格罗兹尼州，将其划入俄罗斯联邦。在强制移民行动完成以后，1944年6月19日，格罗兹尼州党委决定，将该州境内的所有居民点更名，以便永远消除关于车臣人的记忆。在将车臣人、印古什人迁出之后，共和国境内几乎变空，迫切需要迁入新的人口。苏联政府也为此花费很大力气，到1945年10月，格罗兹尼州接受了大量来自邻近各州和共和国的迁入人口，前后共计15200户家庭。

流放车臣人、印古什人等民族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立竿见影的。在1944年流放前，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内有4000多名30年代培养的车臣、印古什民族的技术人员和专家。他们被流放，就严重影响了当地石油工业的发展。1944年，当地的石油开采速度立即下降了，很多油井没有完

成开采计划，农牧业受到了显著影响，牛都被转运到其他共和国，造成很大的损失。在流放车臣人、印古什人的过程中，大批历史文献和文物被毁灭。

车臣人在流放地

这些被流放民族实际上是被剥夺了公民权，在政治声誉方面，则成为国家公敌，成为介于犯人和公民之间的“特种犯人”。在车臣、印古什等民族的“特种移民”中，有411000名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安置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有85500名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有120名车臣人，108名印古什人；其余则分散在西伯利亚等地[34]。这些外来的特种移民在流放地的生活极其艰难。流放之前苏联政府对此并没有考虑，这样一大批外来人口，居住问题无疑是难以解决的。到1946年7月，阿莫林州只建起了拟建的1000所房屋中的28所，塔尔迪—库尔干纳州拟建1400所房屋，只建起23所，而其他地区则对此根本未予考虑。在吉尔吉斯等地，“特种移民”寄人篱下，形似难民。移民管理机构对他们严格监视，管制他们的生活和劳动。内务人民委员会，后来是内务部在“特种移民”居住地区设立了多达2679个特别管理站，每一个站管理300人到1000人，不包括未成年人。此外，还通过在流刑犯中任命组长来进行互相监督、监视。1949年，苏联政府还对“特种移民”进行了彻底清查、统计。

在高压之下，车臣人学会了两面派做法。他们认识到自己无力与政府对抗，因而佯装驯顺。例如，在哈萨克斯坦库斯塔纳州的“红星”集体农庄的一次会议上，一个车臣人发言说：“政府把我们迁居到哈萨克斯坦是对的。我们的共和国被废除了，我们也知道不让我们回高加索了。因此我们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必须用全部力量，在巩固苏维埃国家的事业中表现自己的忠诚，永远在这里建设自己的生活。”[35]表面上，他们声称，认识到自己的民族在苏联人民面前是有过错的，因此来到这里是为了进行改造，多多生产。然而，他们的真实想法却并非如此。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回到高加索的想法，甚至不切实际地希望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对苏联施加压力，以便能够回到原来的居住地。在流放地的严酷环境中，在背负着叛卖国家的恶名的情况下，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一起，忍气吞声，在远离故乡的地方进行艰苦改造。大多数山地民族被安置到哈萨克平原，从事自己不熟悉的农业，许多人从草原逃走，迁居到城市的

贫民窟[36]。在哈萨克斯坦，车臣人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带到当地，并且继续保持原有的社会组织、习俗和传统。毛拉是车臣人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物，是当地社会中的另一个社会的领袖。车臣人与其他民族，包括当地人和其他被流放民族隔绝开来。即使在哈萨克斯坦当地，车臣人也像在北高加索时那样，鄙视教育，得过且过，依旧偷窃，甚至抢掠，而且还盛行血亲复仇[37]。苏联法律对他们不能进行有效约束，因而其他民族对车臣人也感到某种畏惧。

车臣人与印古什人是两个同源的兄弟民族，因此他们有共同的命运[38]。来到流放地之后，都身处逆境，车臣人与印古什人之间经常发生争吵和不睦，两者互相埋怨，争论在流放中谁的过错更大。1946 年 8 月，当时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在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的报告中说，一些过去在苏联党政机关中身居高位的印古什人在言谈中称，要不是和车臣人联合在一起，印古什人就不会被流放。印古什人认为，是车臣人最先组织匪帮，并且帮助德国人使北高加索投降。由此，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互相敌视[39]。

对于哈萨克本地居民来说，车臣人是外来人。他们的大量到来，就势必要和当地的居民争夺资源，在经济上对他们无疑是一个威胁。加之，车臣人背负着有罪民族的头衔，在当地人看来无疑是二等公民，理应受到歧视。与在北高加索故乡相比，车臣人在中亚几乎沦为社会底层。斯大林死后直到 60 年代，苏联境内的骚动与动乱层出不穷，民族之间的矛盾与纠纷也接连不断，甚至多次发生群殴和械斗。而在有记载的若干次骚乱中，车臣人与其他民族的骚乱与冲突最多[40]。见下表：

暴力冲突的爆发地	冲突次数
处女地和新建地	14 次
北高加索（有返乡民族参加）	6 次
卡尔梅克	2 次
爱沙尼亚	2 次
总　计	24 次
“可疑的”民族冲突	11 次
民族暴行	2 次

暴力冲突的爆发地	冲突次数
1　俄罗斯人	19 次
2　车臣人	14 次
3　印古什人	5 次
4　卡尔梅克人	2 次
5　奥塞梯人	2 次
6　爱沙尼亚人	2 次
7　乌兹别克人	1 次
8　阿塞拜疆人	1 次
9　阿瓦尔人	1 次
10　亚美尼亚人	1 次
11　哈萨克人	1 次
12　保加尔人	1 次
冲突双方	**冲突次数**
俄罗斯人与车臣人、印古什人	13 次
俄罗斯人与其他民族的冲突（卡尔梅克人、乌兹别克人、阿塞拜疆人、爱沙尼亚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尔人）	7 次
车臣人、印古什人与其他民族	3 次
其　他	1 次

（“可疑”的民族冲突是指那些具有某种民族冲突意味的，但是在文献中说法不一的冲突）。

车臣人还面临来到哈萨克斯坦的其他外来人的歧视。在 50 年代中期，车臣人被取消一些限制。同时，又有许多人来到新垦地，形成一股新的移民潮，其中以俄罗斯人为最多。在这种情况下，矛盾根源就产生了。在更多的情况下，车臣人以及其他被流放民族显然都是受害者。苏联政府的移民政策，是造成哈萨克斯坦当地社会不稳定的根源。1954 年，俄罗斯人与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发生冲突，原因是车臣族学生在学校里被称作“祖国的叛徒”，最后发展为群殴。1955 年，又发生了俄罗斯

人与车臣人的冲突，俄罗斯族流氓甚至袭击了车臣人在其间躲避的警察局。

苏联政府为什么要将这些民族流放到中亚呢？将全体车臣人从其世代居住的地方迁走，迁徙到完全陌生的异乡，就等于摧毁其一切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使车臣人失去了与国家对抗的条件，无法兴风作浪。此外，也不排除苏联领导人还有其他意图。当时，乌兹别克斯坦书记尤素波夫在塔什干党委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说，从西部来的移民潮，是因战争形势引起的[41]；而据研究强制迁徙朝鲜民族问题的学者的观点，则是“苏联的中亚需要朝鲜人。似乎是为了让那些被社会主义集体化弄得荒无人烟的广阔土地恢复生机”[42]。客观地说，被流放民族和当地居民一起，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包括朝鲜人、乌克兰人、车臣人、克里木鞑靼人等都是苏联劳动大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说过，乌兹别克斯坦是由流放到此的克里木鞑靼人建设的。当然，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

车臣人的平反与返乡

车臣民族的平反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早在 1954 年、1955 年、1956 年上半年，苏联政府就陆续取消对日耳曼人、克里木鞑靼人、卡尔梅克人、巴尔卡尔人的特别流刑登记，但是对于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依人的监视却非常持久。1954 年取消了对 16 岁以下的车臣青少年的某些行政限制。1955 年 3 月 10 日，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卡拉恰依人得到身份证。随后，1955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做出决议，取消对苏共党员的限制。可以说，这是一些比较谨慎而步伐较小的举措。当卫国战争已经结束将近 10 年之后，继续将几个民族视为政治犯，不给公民待遇，已经不合时宜，将原来所做的扭转过来就成为必然。苏联政府甚至已经做好准备，打算恢复车臣等民族的自治地位。内务部长杜多罗夫却提出质疑。1956 年 6 月，杜多罗夫写道：“考虑到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迁出之前居住的土地已经住满了人，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从前的疆界内恢复自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未必能够实现，因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回到原来的居住地必然会引起一系列不希望发生的后果。”[43]与此同时，他又提出：在哈萨克斯坦或者吉尔吉斯为车臣人建立一个自治州。可是，这是一个更不现实的构想。实际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报告中，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和对其民族政策的批判，

就意味着将取消这项政策。苏共二十大之后，1956 年 7 月 16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别格夫联合签署，撤销对特别移民区的限制，撤销苏联内务部机关对于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依人的行政监视。同时也规定，对他们在迁出时候被没收的财产不予归还，而且，这些移民“无权返回迁出地”。此后，中亚的车臣移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方面已相当自由，他们无须每天生活在内务部人员的监视之下，也无须向当地机关定期报告自己没有逃走。这项命令对车臣、印古什等民族心理上的鼓舞以及政治象征意义尤其巨大。这一时期，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思乡情绪萌发，开始以各种借口返回北高加索。对此，苏联政府已经再不能用武力来阻止，但是，仍旧采用警察手段来遏制返乡的热潮。

1957 年 1 月 9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又发布命令，首次认定，1944 年 3 月 7 日发布的关于废除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及其行政建制的命令，以及 1956 年的命令中禁止车臣人、印古什人返回从前居住地的条款均告失效。为给车臣—印古什民族的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承认必须恢复车臣—印古什民族的民族自治”。这实际上是对车臣—印古什民族在得到消息之后，自发返回故土的现实的默许和确认。内务部长杜多罗夫在给勃列日涅夫的报告中说，随着春季到来，大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开始自发地返回北高加索故乡，因为他们害怕错过春耕时间。他们变卖了家产，同时，当地的工厂、企业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也就顺理成章地将他们开除了；而这样就使他们更加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返乡队伍中。于是，一方面，在中亚流放地，车臣人、印古什人变卖家产，离开工作岗位，“坐在手提箱上”，急于回到北高加索，造成当地的紧张局势；另一方面，在北高加索地区，由于车臣人、印古什人大量返回，而他们在被流放之前的土地已经被来自俄罗斯内地的移民占据，这就使车臣返乡者与现在的当地居民产生新的矛盾。于是，在中亚和北高加索两个地方都形成了紧张形势。

但是，车臣人的返乡热情并不因此而减弱。在这种情况下，负责车臣人返乡事宜的组织委员会趁机将其作为一个发财机会。获得一个官方许可的返乡证平均要花 2000 卢布，这就等于是在车臣人被流放之后又被搜刮了一次。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认为，那些组委会成员（从前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领导人），也是流放他们的同谋，这些情况被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传言不断夸大，因而对当局失去信任，政府已经不能控制局势。苏联政府就采取了另一种对策，即对那些按规定返乡的人给以种种好处

和优惠，给以大笔安家贷款，获得牲畜，等等，但是收效甚微。在第一次取消对车臣民族的禁令之后，尽管没有政府许可，而他们返乡的迫切心情已经无法遏抑。这使苏联政府感到了巨大压力，于是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自治共和国地位的恢复做出了具体规定。苏联政府为车臣人返乡设定的计划，往往落后于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思乡心切驱使下的自发行动。例如，按照1957年的计划，应该回迁17000个家庭，但是实际上在1957年之前就已经有34635个家庭返回。1957年，在赫鲁晓夫的主导下，苏联政府决定为那些在卫国战争期间被惩罚的民族予以平反，恢复车臣人的自治共和国地位。这些措施必然涉及那些在斯大林时期与流放相关的人员和执行者，这显然是一个敏感问题，因此在政府和党内照例要遇到许多压力。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宣布废除1944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的《关于嘉奖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命令》，这是对历史上苏联政策的否定。

车臣人陆续回来后，格罗兹尼州党委书记雅科夫列夫称：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返回是一个大错误。地方政府对俄罗斯联邦的法令又有了修正案：1958年7月16日，达吉斯坦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对返乡的车臣居民实行严格的身份证制度。为此采用了专门证件（持有这样证件的人不得到原先生活的村镇），不许车臣人去世代居住的达吉斯坦哈萨维尤特地区。有人取道巴库，从那里擅自进入哈萨维尤特，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被判刑。在这一地区，车臣人反倒成为少数民族或者外来人——此后苏联的学术著作或者工具书中，在介绍达吉斯坦原住民的时候，车臣人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极小，而且是作为原住民以外的“其他民族”被提及的。车臣人的返乡进程一直持续到1959年春天，内务部人员还在捕捉车臣“逃亡者”。大部分都选择回到北高加索，也有一些人则选择留在当地。但是，留下来的人就成为哈萨克斯坦境内后来发生的反印古什人骚乱的受害者。

车臣人是如此珍视自己的故土，许多人将在流放地死去的亲人的尸骨运回，为的是将他们葬在故乡。许多人回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缮祖先的坟茔。

而回到北高加索的居民的情况又怎样呢？这些返乡的前“特种移民”坚决要求只回到祖祖辈辈居住过的地方：“住在迁出之前居住过的那些村庄，甚至是自己的房子里”[44]。这就涉及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在他们迁出之后，那些村庄和房屋已经被外来人所占据，而这就势必发生矛盾和冲突。被流放民族从中亚大规模返回，导致了本来就人多地少

的北高加索地区显得更加紧张。在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大批返回北高加索的过程中，车臣共和国政府部门并没有作出及时调整、采取积极措施，来应对这变化了的形势。大批人口返回车臣，1957 年一年内就涌入近 20 万人，对土地等生存资源的争夺就更加激烈，几乎是一场人口爆炸。与此同时，迅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车臣的治安状况迅速恶化，犯罪率骤然攀升[45]。共和国境内的谋杀案在一年内增长了一倍，而抢夺和流氓行为则增长了两倍。经常有因为住宅和土地而发生的争执和群殴，其中包括车臣人与军人之间的争执。1958 年，车臣共和国境内一半的犯罪案件发生在格罗兹尼。1958 年，格罗兹尼市在 8 个月之内就发生了 10 起谋杀案，15 起强奸案，36 起强盗袭击案件，122 起盗窃国家和社会财产案件，240 起盗窃个人财产案件，180 起流氓行为。在上半年，警察局登记在册的破坏社会秩序者有 5438 人，街上拘押了 2670 名醉鬼，415 名乞丐和流浪汉，60 名无人赡养者和 421 名无人监护的儿童[46]。

车臣人所犯的罪行，多数具有激进的民族主义性质，目的在于恐吓车臣人以外的居民，使他们离开住宅。1957 年，逃到车臣共和国境外的俄罗斯人、奥塞梯人、阿瓦尔人、乌克兰人等总共有 113000 人，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居民忍无可忍，开始起来保护自己。而一次偶然事件，终于成为引爆俄罗斯人针对车臣人骚乱的导火线。

1958 年 8 月 23 日晚上，在格罗兹尼郊区，一个车臣人在不清醒的状态下与一名俄罗斯青年发生争执。车臣人用刀刺伤了俄罗斯青年的腹部，但是并不致命。随后，这名车臣人与自己的朋友在路上拦住了化工厂工人叶甫盖尼·斯捷帕申，后者被连刺数刀后死去。尽管警察立即将凶手抓住，但是，郁积许久的俄罗斯族对这件事的反应却超乎寻常：大批群众为死者送行，并在市中心的列宁广场集会，要求政府保护他们不受车臣人的侵害。一些集会者闯入州党委，试图强行将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拖到广场上。人群里甚至有人喊：让车臣人滚出格罗兹尼！让赫鲁晓夫来见我们，我们和他谈谈！格罗兹尼州万岁！[47]集会人群超过 5000 人，其中多数是 25 岁以下的青年男女。人群还袭击了军警的车辆，向州党委投掷石块。警察驱散了人群，并拘押了 40 名参加者。第二天，人们再次集会，政府领导人出面劝说，但是没有人听从。到中午时分，已经聚集了近万人。集会者要求释放前一天扣留的人，并将车臣人从格罗兹尼迁出去。有两名车臣人被人群痛殴，其中一名很快死去。有人提出要求，将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更名为格罗兹尼州或“多民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车臣—印古什人口在共和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得超过 10%；

从其他共和国将各民族的“进步共青团员”迁来，开发格罗兹尼的财富和发展农业。一些领导人遭到痛打。第二天，警察局搜捕，上百名参加骚乱的积极分子被抓，这些人分别被判徒刑（从1年到10年不等）。骚乱通过高压暂时平息了，但是，苏联政府没有对事件做出准确定性，只说是“在沙文主义和反苏口号下的流氓和刑事犯罪行为”。这种息事宁人的做法，显然是害怕这些民族矛盾被继续政治化，实际上只是使民族矛盾潜伏下来。这次反车臣人暴乱和骚动，是50年代苏联社会爆发的大规模骚乱之一。

车臣人回到北高加索之后，在与竞争者的斗争中，采取了逐步排挤的办法，使竞争者将与车臣人共同生活视为畏途，从而被迫让步迁走。由于车臣人在民族冲突中的高度组织性，以及捍卫自己利益时表现出来的不顾一切的坚决意志，竞争者们感到惧怕，纷纷退却，车臣人成为这场“神经战”的胜利者。从当时的许多机密文件可以看到，许多俄罗斯人感到苦不堪言，纷纷发出抱怨，并向苏联政府提出申诉，要求国家介入，调解矛盾，或者干脆要求从当地迁走。

资料表明，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车臣共和国内的民族矛盾加剧，经常发生车臣人针对其他民族，尤其是俄罗斯族的挑衅、流氓滋事行为。1970年到1973年间，仅仅格罗兹尼的松日河区，就有9000名俄罗斯人被迫离开车臣—印古什共和国[48]。这些矛盾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90年代。

流放导致的严重后果

由于为数众多的车臣等民族的成员背叛国家，致使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木鞑靼人被全体流放，他们遭到如此对待并非纯然无辜。如果将十月革命以来北高加索地区，特别是车臣持续不断的叛乱、动荡的形势前后联系在一起，那么，流放的积极作用在于：惩戒了投敌附逆行为，以儆效尤；摧毁了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从而使其无法与苏联政府对抗；稳定了苏联西部和高加索地区的局势，保证了卫国战争的顺利进行和取得最终胜利——当然，这些效果是通过高压手段实现的。但是，将车臣人全部流放，显然不是最佳的办法；而在将其流放10年之后又为其平反，允许其从流放地返回，从政治角度来说，同样缺乏深思熟虑。我们认为，就为被镇压民族平反这一事实来看，赫鲁晓夫的做法显然缺乏政治远见，远远逊于斯大林。其揭露、否定斯大林以及为车臣等民族

平反的做法，同时也否定了自身，带来了许多消极的政治后果，其政治效果需要重新估计。而所有这些举措加在一起，就是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错误。

惩罚本身只是手段之一，何况还是流放。惩罚手段本身并不能培养起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的认同感和忠诚感。将车臣人全体流放，只能在车臣人心灵中埋下仇恨和屈辱。流放在很大程度上使车臣人对苏联政府的怨恨变成对俄罗斯民族的仇恨。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心目中，苏联政府是俄罗斯人的政府。但是，流放却使车臣人走向内部团结。有人说，流放的时候，车臣人是四分五裂，而返回时，则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作为一个外部因素，车臣民族的宗教信仰状况发生了某种变化。车臣、达吉斯坦的苏非教派得到迅猛，甚至是病态的发展，走向封闭、隐秘和极端。在苏联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仍旧能够在地下状态中顽强地生存和发展。90 年代发现，车臣以及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竟然保留了许多中世纪的宗教典籍。流放和迫害导致了这些民族自我意识的强化，即使在流放地，他们也尽力保持自己语言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以此作为对抗“俄罗斯化”的手段。以后，当这个国家有任何的政治举措或者社会变动时，最敏感的往往就是这些弱小民族。流放是所有车臣人的共同命运。从普通民众到民族精英，几乎与生俱来地都刻上了流放的烙印。看一下 90 年代活跃在车臣政治舞台上的政治人物：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扬达尔比耶夫等人的履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出生在中亚的车臣人。

怎样估计全体流放车臣民族的政治后果呢？车臣人被流放是车臣人被征服以来所遭受的苦难的继续。车臣民族的损失非常巨大：在 19 世纪沙米尔领导的反抗沙皇俄国的战争期间，车臣人死去将近 10 万人；1936 年到 1938 年的苏联大清洗中，车臣地区有 8 万人被处决，而这是当时车臣人口总数的 1/4[49]；据内务部特种移民管理局的统计，1944 年的流放导致 46 万车臣人口中有 144704 人死去[50]。流放车臣人的错误民族政策使苏联业已存在的复杂的民族形势更加复杂。有人甚至认为，斯大林政府流放少数民族，直接导致苏联解体。“集体流放整个克里木鞑靼民族，以及许多高加索和伏尔加河地区的小民族被称为是苏联帝国崩溃的开始”[51]。我们认为，斯大林流放车臣等民族，确实造成许多消极后果。但是，我们决不认为，流放这些民族必然会导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虽然有历史根源，但是，直接原因却来自现实。

流放、遣返，这一系列过程，还导致车臣人整体在经济上受到巨大损害，很长时期都难以恢复元气，其消极后果在 90 年代都可以看得

出来。

1991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发表宣言，承认针对一些民族的镇压行动是非法、有罪的；1991 年 4 月 26 日，俄罗斯联邦通过法律，为被镇压民族平反，其中首次对“被镇压民族”的概念做出明确界定。6 月 6 日，做出决议，废除苏联国防委员会当年的相关决议以及苏联政府针对被强制迁徙民族的决定。由于被流放民族返回原居住地，并且苏联政府给他们恢复了 1944 年之前的建制，再次引起一系列复杂问题。1944 年之后，北高加索地区的居民分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流放地返回的原住民现在变成了外来人，而且他们都要求回到自己或者自己祖先原来居住的地方。苏联政府基本上按照 1944 年之前的情况为各个共和国和自治地区划分疆界，恢复他们原有的建制和称号，但是也有一些例外，这反映并照顾了 1944 年以后这里变化了的现实。比如，卡拉恰依自治州恢复为卡拉恰依—切尔克斯自治州；原来的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的巴尔卡尔地区，改在一些卡巴尔达居民占优势的新的地区内部恢复；原属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普里哥德内地区仍旧留在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内；原属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阿乌霍夫地区也没有恢复，留在了达吉斯坦共和国之内，而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之内又增加了以前不属于车臣—印古什，而是原属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些哥萨克地区，如纳乌、谢尔科夫、卡尔加林[52]。车臣和达吉斯坦的土地因之而扩大许多：1934 年，车臣的土地面积为 11100 平方公里，到 1991 年的时候，则为 19300 平方公里，增长 75%；1955 年，达吉斯坦的土地面积为 38200 平方公里，到 1991 年为 50300 平方公里，增长了 33.8%[53]。增加的土地，来自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且主要是平原的土地。将俄罗斯族自治单位，主要是哥萨克的土地交给车臣人。由此，部分山民就变成了平原居民，这对于遭受 10 多年流放的车臣人来说，不失为一种物质补偿。

这样的处理让人觉得，这种做法似乎是有意安排的：即不让某个民族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而是让各民族互相牵制，插花状杂居，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沿袭了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但其结果却正好相反：因为没有一方面会觉得满意。1944 年流放所导致的领土变更，带来很多隐患，是造成整个北高加索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流放事件对于车臣人的心理影响在于：在很长时期里，都在车臣人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一种命运无定的感觉，民族精神趋于内敛，甚至也发生了某种扭曲，这是一种严重的“流放综合症”。弱者容易认

同强者的哲学。由于自己的苦难经历，在问到自己最想干什么的时候，几乎每个车臣人，甚至每个小孩都会回答说：在克格勃工作![54]。1990年对俄罗斯和哈萨克的车臣人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对于“人生中什么最重要，物质还是精神?”问题的回答，大多数年龄在60到80之间的受调查者都认为，精神要高于物质。那些年龄较轻的受调查者则稍有差别。这其中的原因，除了车臣社会的传统以外，主要在于：经历过1944年流放的那些人体会到，不论你用几代人的时间积累财富，财富都可能在一瞬间丧失。而在1995年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认为“精神要高于物质”的人们中，除了老人以外，连年轻人也越来越多。这是因为，经历了战争，很多人认识到，在战争中，富人和穷人都是一样的，而且富人比穷人失去的更多[55]。

车臣民族的反抗精神和不屈意志也在流放中得到体现。当流放开始后，有一些人继续留在山中发动游击战争进行抵抗，抵抗运动竟然持续了30年。1974年，苏联政府才逮捕了最后一个车臣游击队员。

从1928年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到1937年的大清洗，到1944年对车臣人的流放，再到1956年以后车臣人的返乡，甚至直到90年代，可以说，苏联政府对车臣的政策几乎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这些错误的政策给车臣民族造成了无尽的苦难，加深了对于苏联政府的仇怨，增长了离心倾向。当90年代到来时，1944年的许多受害者还健在。高加索人是长寿的，而对于那些痛苦的记忆来说，长寿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们的后代也已经成长起来，作为车臣民族苦难象征的1944年，距离他们不到两代人的时间。每一个车臣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前代人（父辈、祖父辈）那里了解自己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这是一些很难平复的心理创伤。正如苏联诗人钦吉兹·艾特玛托夫所说的那样，那些被流放民族至今都“拖着灾难和痛苦的裙裾”。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说得好：有多少民族被流放，将来就会写出多少部史诗。在90年代的北高加索地区，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仍旧重复着史诗般的1944年的主题，那是被流放民族共同的苦难。巴尔卡尔的艺术家还将那段历史在银幕上重现，那就是在当时很有名气的电影《寒冷》。

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的历史记忆，1944年的流放是对车臣民族感情和尊严的戕害，它变成了一种“情感记忆”。历史不单写在纸上，它也活在人的心灵中。当然，我们始终不认为，1944年的流放事件必然会导致1991年的车臣危机。流放事件是导致车臣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其直接原因却来自现实。但是，这种历史记忆极容易被某些人或势力所利用，

使其变成民族主义宣传的工具，用于鼓动民族感情，其动员社会的能量是难以估量的。

当俄罗斯已经独立以后，俄罗斯政府对车臣等民族依旧负有政治、道义和法律上的责任，而这是当年苏联政府对车臣等民族所犯错误的遗留。2001 年 2 月 12 日，乌克兰的车臣人代表团向俄罗斯驻敖德萨领事馆提出申请，要求俄罗斯对在 1944 年被流放的所有车臣人及其家庭做出赔偿；同年 2 月 24 日，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甚至还对 1944 年的流放事件开展纪念活动；2004 年继续举行纪念活动[56]。当代俄罗斯政治家们应该具有历史感，他们比斯大林乃至后来的领导人更有优势，他们来得及总结足够的教训：在车臣问题上不允许再犯一点错误，否则就会付出巨大代价。遗憾的是，历史的发展却总是不能尽如人愿，充满了盲目性。

平反：走向另一个极端

今天，流放车臣人事件已经过去了 60 年，但对该问题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当代车臣历史是苏联历史的一部分，因此，车臣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整个苏联历史研究中都存在的问题。至今为止，俄罗斯仍然很难客观地、不受政治局势左右地看待历史问题。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苏联的历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没有了从前意识形态的束缚，却又受到新的意识形态，如戈尔巴乔夫的“不留历史空白点”运动的影响，其特点就是：不再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历史歌功颂德，而专门去揭露苏共历史的阴暗面，一味地否定和抨击，对苏联时期的错误无限夸大、渲染，几乎是一种反苏、反共的歇斯底里。而针对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所采取的平反举措，同样也有考虑不周、缺乏深思熟虑、矫枉过正的弊端。在苏联，每到领导人变换、时代更迭的转折点，就用历史做文章，赚取政治资本。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叶利钦等人，都曾实行平反。但是，联系到苏联解体的原因，则平反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效果需要重新估计。这些举措要么是服务于政治斗争需要，如赫鲁晓夫用“揭露”和“平反”两手打击政治对手；要么就是政治作秀，为自己捞取政治声誉，人为地煽动、迎合某些消极的社会情绪，平反进程成为一场追赶时髦的政治运动，成为政治家达到某些并不磊落的政治目标或打击异己，或转移视线，消解现实的社会政治危机，减轻舆论压力的手段。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被镇压民族平反的时候，他们多半都已经不了解斯大林将一些民族流放的背景和历史前提。

苏共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而平反运动否定了苏共历史，同时也就间接地否定了主持平反者自身。斯大林时期犯过错误，甚至是极为严重的错误，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斯大林之后主持平反的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则将平反运动带到另一个极端，不加分析地实行一刀切，似乎斯大林的一切举措都是罪过。举例来说，1996 年，因在卫国战争期间屠杀苏联人民而被苏联政府处决的法西斯德国将军冯·潘维茨，由叶利钦政府予以平反[57]。俄罗斯政府为什么这么做？原来，这是叶利钦为与德国交好而做出的政治姿态。为冯·潘维茨平反，正好与叶利钦访问德国的时间一致。但是，为潘维茨将军平反毫无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类似案例表明：这些平反过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拨乱反正，而是为了解决苏联和俄罗斯社会中的现实问题。

苏联解体至今的 10 多年间，俄罗斯民族为自己的盲目极端付出了巨大的历史代价，在遭受深重苦难、有过切肤之痛之后，反共、反斯大林的意识形态能量已经释放完毕，俄罗斯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并陆续地纠正一些错误，如对从前遭到诟病的斯大林时期的一些举措公布新材料、提出新看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应该说，这些现象仍然是与俄罗斯今日的政治经济形势、国际局势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俄罗斯国民对普京的认可、对强权的崇拜，是由于现实中俄罗斯国力衰弱、国际地位下降、北约东扩、车臣危机等，导致俄罗斯的民族感情受到刺激和伤害。俄罗斯学术界开始转变，但是至今为止，仍然处于这一转变过程中。对于斯大林流放车臣人等历史问题都有许多新的档案材料在公布，但是，这些新材料的公布仍然不够完整、系统。许多档案材料仍然没有解密，而且在不同的时期里，许多档案材料被人为销毁，难以窥见历史全貌。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只能等待时日。

注　释：

〔1〕Н. Ф. Бугай. , Правда о депортации чеченского и ингушского нар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0, №. 7, С. 44.

〔2〕Н. Верт. ,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1991, М, 1995, С. 340.

〔3〕Н. М. Раманичев, Власов и другие, http://archive. 1september. ru/his/

〔4〕Н. Ф. Бугай, Выселение корейцев с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4, No5, С. 142.

〔5〕同注释〔4〕, С. 142。

〔6〕《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年出

版，42 页。

〔7〕О. А. Поливанов.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17—1945, 1997. С. 128.

〔8〕Н. Ф. Бугай, Правда о депортации чеченского и ингушского нар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0, №. 7. С. 38.

〔9〕А. Н. Сахар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оссия. 20 век, М, 1999, С. 381.

〔10〕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0 年出版，37 页。

〔11〕Джеффри Хоскинг,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17—1991, М, 2000, С. 261.

〔12〕А. Авторханов, убийство чечено－ингуш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Народоубийство в СССР, http://www. chechnyafree. ru/

〔13〕Н. М. Раманичев, Власов и другие, http://archive. 1september. ru/his

〔14〕Игорь Пыхалов, Кавказские орлы Третьего Рейха//Спецназ России, 2001, №61, С. 18.

〔15〕Влада Селина, Депортация Чеченцев ингушей, http://rusich. by. ru/

〔16〕Влада Селина, Депортация Чеченцев ингушей, http://rusich. by. ru

〔17〕同注释〔16〕。

〔18〕Влада Селина, Депортация Чеченцев ингушей, http://rusich. by. ru

〔19〕同注释〔18〕。

〔20〕Лев Соцков, Неизвестный сепаратизм, М, 2003, С. 24.

〔21〕Николай Зенькович, Тайны уходящего века, М, 2003, С. 446.

〔22〕Н. Ф. Бугай, Правда о депортации чеченского и ингушского нар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 7 (1990), С. 33.

〔23〕Алла Дудаева, Джохар Дудаев: Миллион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2003. , С. 31.

〔24〕http://www. hrono. ru/sobyt/1917chec. html

〔25〕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册，田大畏译，群众出版社 1996 年出版，461 页。

〔26〕А. Авторханов, убийство чечено－ингуш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Народоубийство в СССР, http://www. chechnyafree. ru/

〔27〕Светлана Алиева, Так это был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репрессии в СССР 1919—1952гг. М, 1993, Том 2, С. 169.

〔28〕同注释〔27〕, С. 175。

〔29〕Светлана Алиева, Так это был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репрессии в СССР 1919—1952гг.. М, 1993, Том 2 , С. 222.

〔30〕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ктно Народному комиссару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Союза ССР Генеральному комиссар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http://www. memo. ru/hr/hotpoints/

〔31〕Н. Ф. Бугай. , Правда о депортации чеченского и ингушского народов//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0, №. 7, С. 40.

〔32〕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ктно Народному комиссару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Союза ССР Генеральному комиссар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http://www.memo.ru/hr/hotpoints/.
〔33〕同注释〔32〕, C.40。
〔34〕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Иосифа Сталина, http://www.memo.ru/hr/hotpoints/
〔35〕Козлов. В. А, 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е. 1953 – начала 80 годо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9, C.105.
〔36〕Джеффри Хоскинг,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17—1991, M, 2000, C.261.
〔37〕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册,田大畏译,群众出版社1996年出版,472页。
〔38〕有学者认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是同一个民族。他们确实在语言、文化、民族心理等方面都非常相近,但实际上,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别,他们是两个民族而不是一个民族。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关系,类似我国境内的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之间的关系。
〔39〕同注释〔35〕, C.122。
〔40〕同注释〔35〕, C.101。
〔41〕A. H. Сахаров, Россия 20 века. Судьба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M, 1994. , C.508.
〔42〕H. Ф. Бугай., Высе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их корейцев с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 5, 1994, C.145.
〔43〕B. A. Козлов, 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е. 1953 – начала 80 годо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9, C.110.
〔44〕Козлов. В. А, 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е. 1953 – начала 80 годо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9, C.122.
〔45〕http://samara.slavrus.net/
〔46〕同注释〔44〕, C.134。
〔47〕Олег Матвеев, 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http://www.pnp.ru/pg_nomers/22782.htm
〔48〕Секрет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КПСС: чеченцы и ингуши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их, http://www.presscenter.ru
〔49〕Алла Языкова, Чеченская война: неизвлеченный урок, Открытая политика, №3、4 (2001), C.72.
〔50〕Бугай. Н. Ф, Правда о депортации чеченского и ингушского нар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0, №7, C.33.
〔51〕A. Р. Вяткин, Э. С. Кульпин, Крымские татары: проблемы репатриации, M, 1997, C.24.

〔52〕А. Искандарян, Чече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провал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кавказе, М, 1995, С. 37.

〔53〕А. В. Пиночетов, Предали, http://lindex. narod. ru

〔54〕А. Максимов. , Между катастрофами: Чечня 20 лет назад//Открытая политика, 2001, №3、4 , С. 77.

〔55〕Залпа Берсанова, Система ценностей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чеченцев, http://www. sakharov - center. ru

〔56〕http://www. infocenter. ru

〔57〕Александр Улитвинов, Ради друга Гельмута, http://nvo. ng. ru/

第五章

车臣危机中的现实因素

车臣危机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但是，导致其爆发的直接原因却来自现实。车臣危机乃是苏联社会分崩离析状况的一个缩影。可以说，在苏联解体前后，苏联社会无处不存在社会政治问题，车臣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变得突出，并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危机。车臣危机既是苏联解体的一部分，又因苏联解体而加剧。

在很长时期里，车臣人都没有建立起统一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严重制约了车臣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沙米尔时期和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短暂的建国尝试，是车臣民族在政治上的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从车臣民族的整个历史来看，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民族或部落先后掀起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浪潮，而车臣人作为高加索民族，走在大多数民族国家建国进程之后，并且，历次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政治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激进自由主义改革，预示着苏联即将发生一场“革命”。因此，到苏联解体前后，车臣人依旧有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历史紧迫感。从一定程度上说，车臣社会发生的变动，也是历史意识

在当代的回响。

车臣的经济危机

从归并俄罗斯帝国开始，车臣民族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在苏联时期，尽管存在着各种问题，但车臣民族进步尤其迅速：车臣初步建立起了包括石油开采、石油加工等在内的经济体系，文化教育发展迅速，建立了许多学校、研究所等教育机构。在苏联的前20年间，就使大多数车臣人口基本上扫除了文盲，识字率从1920年的0.8%发展为1940年的85%。一大批车臣民族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各种文化、艺术都得到长足发展[1]。这是车臣在20世纪90年代走向独立的物质前提，也是车臣和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卷入车臣危机的原始动力，从反面也表明车臣在苏联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车臣的社会经济仍旧没有完全融入苏联，或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实现真正的一体化。

在苏联的整个国民经济综合体中，各加盟共和国可以说是一些互相独立的经济实体。苏联政府很少考虑各个民族地区自身的特点，而对其经济发展进行了一成不变的计划和指令。对于某些具体地区来说，苏联的经济发展向来遭到诟病，被称为“殖民地经济”。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活动服从中央的统一指令，商业贸易活动只限于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进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商贸活动，占加盟共和国的商贸活动总量的85%到90%以上，尽管与苏联以外的国家进行这种贸易更为有利可图。而且，加盟共和国无权独立进行对外贸易，只能通过特定的专门机构来进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所有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中，国际贸易在国家经济增长中占很大比重。在这种体制之下，各加盟共和国的具体经济利益蒙受损失。苏联政府没有照顾到各加盟共和国的利益，尤其是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利益，或者说，没有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之间作出适当平衡。加盟共和国之间、加盟共和国与中央之间的经济结构越来越变形，相互之间的独立程度也不断加强。俄罗斯的独立程度更加明显，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经济联系最少；因为它有丰富的资源，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对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依赖程度很小。

而地方领导人无论是为了个人政绩，还是出于私利的驱使，都渴望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如果把车臣追求独立视为相对于俄罗斯联邦中央的地方主义，那么，车臣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一个地区，渴望自主

地参与国际经济进程，就涉及车臣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功能仍旧非常重要，民族之间的竞争仍旧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展开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2]。从一定程度上说，作为一个自治共和国，车臣也和加盟共和国一样，渴望利用自己的资源和经济优势自主地参加全球经济，也可以说是对席卷全球的经济一体化浪潮本能或有意识的反应；而车臣政治精英鼓吹独立，在某种程度上与这种挑战和需要具有某种交叉重合之处。可以说，全球化浪潮早就露出端倪。苏联没有对全球化作出积极有力的回应，其对于各个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意义值得重新估计。而车臣人建立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愿望，是一个后进民族在政治、经济诸领域取得一定进步之后，在思想和意识方面的自然反映。

苏联解体之前，各加盟共和国就很少向联盟中央上缴利税，大部分自行截留，中央财政十分困难，因而其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能力也就大大下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联邦与联邦各行政主体之间签署条约，将自主权下放给地方，这是对各地越来越强烈的独立呼声的回应，是对现实的迎合；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地方的发展问题，相反却使问题激化。

北高加索地区是一个多民族、人多少地的地区。北高加索地区的领土占俄罗斯领土的 2.1%，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 11.8%。到 1990 年前夕，在苏联各行政主体中，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第 73 位。车臣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工业和农业两个方面。农业主要包括种植谷物、大米、向日葵、果树、葡萄、蔬菜，以及养猪、长毛兔、牛等等；工业则主要包括石油开采、石油加工、石油化工、机械制造（医疗器械、石油机械）、建材生产（主要是水泥）等[3]。在北高加索地区，农业人口在全部居民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之高，这种情况以当地原始居民最为突出[4]。该地区的支柱产业主要是农业、石油开采、石油加工等等，而石油工业的发展，占用了更多的土地，土地问题更加尖锐；而工业又无法吸纳太多劳动力，就业形势严峻。官方资料表明：在危机之前，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有 10 万名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按照非官方资料，实际上该指标已经达到 20 万人，占全部劳动人口的 30%[5]。这些人成为失业者，也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和以后“车臣革命”的主要参加者。

1991 年 10 月，杜达耶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车臣永远不会留在俄罗斯内，除非俄罗斯愿意与车臣一起分享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即将车臣人拥有的土地从现有的 0.2 公顷扩大到俄罗斯的人均 16 公顷；同时，俄罗斯还愿意与车臣分享武装力量、军事技术、黄金储备等[6]。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了车臣的社会经济问题。

1957 年以后，被流放民族从流放地大批返回。与此同时，俄语居民纷纷离开该地区。结果，非俄罗斯居民占据了当地管理机关和服务行业的重要位置，而俄罗斯族则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排挤。1988 年到 1990 年间，由于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购买力上升，引起房屋价格迅速膨胀，致使许多俄语居民离开共和国。在 1994 年夏天之前，车臣共和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大大高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在许多车臣人看来，俄罗斯对车臣所做的，只是大肆地开发和掠夺车臣的自然资源，而车臣能够取得较高的生活水平，除了车臣居民的辛勤劳动以外，还在于宣布独立之后带来的更大的自主权导致的良好结果。

通常说来，凡是人口过分密集的社会多半不稳定，而北高加索地区就是一个人口稠密而社会不稳定的地区。经济形势恶化，失业率提高，犯罪现象严重，使各民族的社会心理发生了变化。人们将经济形势恶化和自己遭受的贫困归罪于与自己有领土争端的民族和共和国。这样，各民族之间的仇怨越来越深刻，难以化解，形成恶性循环；而人们从现实中看不到摆脱危机和困境的出路，普遍将这一切归罪于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官僚体制。苏联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所推行的经济、政治改革，并没有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直接影响了这些民族地区对苏联的信心。有人认为，苏联解体并非因为“民族压迫或伊斯兰教扩张，而是因为苏联改革失败，经济陷入困境，政府威信扫地”[7]。

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进行的包括“休克疗法”在内的激进市场改革，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人民普遍贫困化。由于北高加索地区人多地少，实行土地私有化会导致许多人失去土地，失业问题加重。在苏联时期，高加索地区劳动力可向其他地区转移，到中亚、俄罗斯腹地去打工。苏联解体之后，各加盟共和国变成了独立国家，为打工者抬高了门槛，在很大程度上堵绝了他们的出路。

1993 年以来的几年间，从北高加索地区迁出 300 万到 400 万人，涌向俄罗斯。由于这些流民并不一定全是高素质的人，因此就造成更多消极接触的可能性。在俄罗斯南部地区所做的社会调查表明，许多当地人将经济恶化归罪于高加索人[8]。车臣的城市化进程缓慢，许多乡村人口

分布在山区，而山区又不能养活足够多的人口。一直到90年代为止，许多车臣青年人都很少接受教育，他们向往的职业往往是汽车司机之类，这种情况其实是潜伏的社会隐患。到车臣战争爆发后，许多车臣人之所以拿起武器、成为车臣战士，并非都是为了“圣战”，而是为了生计，为了拿到稳定的薪金。据说，90%有劳动能力的车臣人都没有工作。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像其他地区一样，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境内的“影子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共和国境内形成了一个企业家阶层，他们占据了石油、金融、商业等关键部门，将民族资源和财富“私有化”，当时的口号是：“一切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并且资助一些自己中意的政治人物，操纵政治进程。

高加索地区的民族问题颇为严重。1944年，一些民族被强制迁居后，原来属于本民族自治地区的土地被邻近民族重新划分。从1957年以后直到苏联解体，政府开始逐步给这些被镇压民族平反；但是，苏联政府，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政府却无力恢复1944年之前的疆界，无法去改变那已经改变了的现实。于是，该地区的民族矛盾开始迅速加剧。在苏联时期，民族间疆界划分是人为完成的，随着苏联解体、各个共和国“主权化”之后，民族之间的关系变成国家间的关系，这些共和国的领导人都无一例外地进行着激烈的权力斗争。追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实现所谓的“社会公正”，乃是高加索各民族的共同愿望；但这一过程只会导致新的不公正产生。这样，在该地区的许多民族之间都存在矛盾、争端和冲突，作为矛盾和冲突的调解人，俄罗斯政府体会到了无力感：它已经无法吸引这些地区和为他们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只能在冲突要到无法收拾的时候，动用军队来平息。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车臣政治失控

在苏联解体前后，车臣作为一个自治共和国，像各加盟共和国一样，出现了从俄罗斯联邦分离出去的趋势。这种趋势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改革进程与苏联解体的进程相一致。可以说，车臣危机的公开爆发，首先导因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在此之前，并不是说苏联不存在民族问题。实际上，苏联的民族问题从来就没有完全平息过，而是由于苏联的集权体制将许多社会政治问题掩盖、积压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民族问题与其他社会政治问题一起，以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形式存在着。正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的影

响下，许多积压的问题被释放出来。因为戈尔巴乔夫迎合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主张，走上了官方自由主义的道路，他鼓励对这些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例如，他主张不留历史“空白点”，于是，诸如二战时期的“卡廷森林事件”等许多原本绝对禁止讨论的历史问题，都被披露出来。对于车臣人来说，则诸如高加索战争、1944 年流放车臣人的事件这样一些敏感问题，也可以进行公开讨论。当时，主管共和国意识形态的专家，是维诺格拉多夫教授。他还是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主管宣传、创作、出版等活动的检察官。此人还在极力维护车臣人所仇视的“车臣自愿并入俄罗斯”的观点。然而，车臣知识分子却借戈尔巴乔夫改革之便，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证据确凿的批驳。同时，车臣知识分子更加积极地研究瓦依那赫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而这些学术研究，往往针对的却是政治现实。对于历史问题的探讨，也就使苏共站在被道义谴责的一面，而车臣人等被镇压民族却感觉到，他们是被冤屈的无辜受害者，自己在道义上要比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高明。

除了与波兰相关的“卡廷森林”事件以外，苏联境内许多地方都开始清算历史，如车臣境内发生的海巴赫事件。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政府还将骸骨发掘出来，举行隆重仪式，重新下葬；吉尔吉斯境内琼·大石群葬坑被发现。琼·大石群葬坑，位于今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西南 12 公里处。1938 年 11 月 6 日，包括当时的吉尔吉斯共和国党委书记等人在内的 137 人被秘密枪毙，等等。对历史的重新发现，引起社会舆论的喧嚣与骚动。一般来说，这些骇人听闻的悲剧事件无疑是客观事实，但是，为什么所有这些事件在这一时期被同时披露出来？其意图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时间来回答。我们可以确定的只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举措，带来极为消极的后果。“公开性”举措败坏了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自身的声誉。历史事件的披露，使苏联政府面临社会舆论的压力，而随后开始的一连串平反进程，只是进一步确认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非道义性。

苏联的国家制度结构使地方政治精英有实力主导独立运动，而中央政府则无力遏制，因为苏联宪法和法律缺乏制约机制，在宪法条文中埋下“定时炸弹”。在理论上，各加盟共和国拥有自由分离权，但从来没有实现分离的现实可能性：在政权强大的时候，这些似乎都是确切无疑的；而当政权衰弱时，每走一步都要考虑法律效力。于是发现，所谓对于保持苏联统一国家的无争议的法律和政治基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加盟共和国及其内部建立的官吏法律体制，虽然受到现实政权的约束，

但在结构上却完全类似联盟中央的体制，都倾向于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法主体行动——至少从国际法的形式上的要求来看是如此”[9]。苏联宪法第72条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拥有自由分离权，1990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限制了这一权利，但却将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10]。苏联多年的联邦制实践，只是让一些地方领导人坐大，中央政府很容易被架空。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俄罗斯联邦对联盟中央的致命一击就证明了这一点。

自由主义政治改革本身削弱了苏联政府的政治控制能力，苏联社会开始了非一体化进程。这些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同样也造成了车臣民族自我意识的高涨。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地方上的政治反对派。随着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推进，“公开性”与民主化已经深入人心，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成立了许多非政府组织，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非政府政治组织具有强烈的反对派色彩，政治主张日渐激进。由于俄罗斯领导人与联盟中央专注于国内政治斗争，车臣的各派政治力量越来越走向自主行动。车臣民众将共和国不容乐观的局势归咎于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一些激进的政治力量主张将共产主义体制推翻。1988年夏天，许多民间团体正式联合为“协助改革同盟”，并且仿照波罗的海国家的模式，后来改造成为“车臣—印古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人民阵线”，其领袖是比苏尔丹诺夫，该人民阵线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一些贫困的下层人民。

1988年，共和国政府计划在古杰尔梅斯附近建立一个生产赖氨酸的生化厂，但是政府计划从共和国之外请有专业技能的人员，而无意解决共和国内的就业问题。以鲁斯兰·艾兹布拉托夫为首的一些专家将有关该产品有害健康的资料公布，掀起轩然大波，社会空气长期紧张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爆发了几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抗议这一计划，要求立即停建该生化厂[11]。这次环保运动很快就具有了政治性质，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保护环境，实则是那些对社会不满的力量将此作为一个宣泄愤懑情绪的出口，借机发作。从此以后，在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动辄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成为车臣民众实现政治表达的一个主要形式。

戈尔巴乔夫改革导致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党政机关内部发生分化：一派是较为保守的传统派，他们往往思想僵化，年龄偏大，因而被视为顽固分子；另一派则积极欢迎改革，受过良好教育，年富力强，具有参政热情，两派之间形成了对立竞争。这样一来，原来以法捷耶夫为首的党政机关受到民间团体和党政机关内部的双重压力——具体体现在1989

年联盟人民代表的候选人提名的问题上。在这次选举中，进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不仅有当然人选——共和国党政机关负责人法捷耶夫，还有一些独立候选人，如萨兰别克·哈吉耶夫教授、作家阿布扎尔·埃达米罗夫等，表明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这些民间候选人进入共和国政治生活，民众要求进一步实行政治改革，实现充分的民主化。



多库·扎夫加耶夫

1989年6月，共和国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并作出决定：苏共中央推荐的共和国第一书记候选人谢苗诺夫被否决，原本是副书记的车臣人多库·扎夫加耶夫获胜，成为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车臣族第一书记，这是史无前例的。多库·扎夫加耶夫当选共和国第一书记，被视为共和国改革派来之不易的胜利，扎夫加耶夫本人被视为改革派的象征，人民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解决共和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在他执政的两年多时间里，开始着手解决一些问题，包括：放松对媒体的限制，允许发表反对现存体制的言论，以前的极“左”意识形态领导人维诺格拉多夫受到批判，失去影响；实行宗教自由政策，建立起独立的宗教管理机构，兴建清真寺，允许穆斯林去麦加朝圣，等等，开始了共和国政治生活的自由化时期。扎夫加耶夫当选这一事实，表明了苏共政治控制能力的下降，而其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举措，为激进政治力量发展壮大提供了可能性，苏共对局势进一步失控。1990年初，为了在与政敌（民族激进分子）的斗争中取得主动，多库·扎夫加耶夫发动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借机将自己的亲信和同乡安排到关键职位上。但是，多库·扎夫加耶夫以家族（泰普）支持作为统治基础，并继续运用官僚手法，与新的社会政治形势不相符合，只会导致社会分裂和权力争夺加剧，招致很多社会组织和派别的反对；而由他亲手扶植起来的杜达耶夫则不断上升，并得到将军军衔。这样，扎夫加耶夫就成了由苏联的旧体制向民主制转变过程中的过渡人物。

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民主化过程中，车臣民族精英日渐上升，许多车臣人活跃在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比较知名和显赫的车臣人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石油化工部部长萨兰别克·哈吉耶夫教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教授，等等。苏联军队中出现了一批出身车臣民族的将军和军官，如

杜达耶夫、阿斯兰别克·阿斯兰汉诺夫、瓦哈·伊布拉希莫夫等。有人曾做过统计，从沙皇时代一直到苏联解体，车臣族的将军共有25人。其中，有一些据认为是在“车臣革命”后，俄罗斯政府“为了宣传目的”而提拔的车臣族将军，总共有15人[12]。车臣社会形成了一个民族精英阶层，他们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成就。这样，一些车臣人产生了民族优越感。可以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后，车臣民族达到历史上发展最为良好的时期。另一个瓦依那赫民族印古什人的民族精英，也开始建立一些非政府组织，政治活动日渐积极。1989年9月8日到9日，激进派在格罗兹尼召开了第二届印古什民族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一个独立于车臣的自治共和国，留在苏联[13]。

从80年代末开始，莫斯科等城市出现了车臣黑帮。这些组织能量巨大，从事贩毒、服务业等。许多饭店、企业、银行等都有车臣黑帮的背景，他们与车臣联系紧密，经常往车臣寄回大量金钱。苏联解体之后，车臣当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监狱大门，将4000多名职业罪犯释放，其中许多犯罪集团头目进入车臣政府，并同莫斯科等城市的犯罪集团保持联系，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车臣人为主体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有强大的后盾，他们得到某些俄罗斯政府官员、国家安全部门军官们的庇护，同时也就直接间接地庇护着车臣的政府——杜达耶夫集团。车臣黑帮通过这些头面人物按部就班地行动，并向高官们行贿。警察部门对车臣黑帮打击不力，常常是刚刚得到黑帮头目的线索，而后者立即就逃回车臣[14]。杜达耶夫政府可以廉价地，甚或是无偿地开采千百万吨石油。来自西西伯利亚的石油经车臣运往诺沃罗西斯克；而来自巴库的里海石油也流经车臣[15]。这些石油运到国际市场，换取巨额资金，流入车臣，也流入了领导人的口袋里。

民族主义：车臣人的双刃剑

现在，有关民族主义的概念和定义有成百上千种，这就表明，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民族主义是多么难以把握。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思想感情，“民族主义可以说是每个人与一定领土上有组织的政治集体明显地密切结合。民族感情的根源在于每个人都有一种心理上的要求，要使自己成为某个政治实体的成员”[16]。而按照德国诗人、哲学家赫尔德的观点，民族主义起源于一种对于人群的归属感。如果没有可以归属的群体，人会觉得自己没有依靠，孤单，渺小[17]。民族主义还是一种思

潮和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便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18]。在苏联解体前后，民族主义是苏联各民族实现身份认同的方式。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民族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国际政治现实。随着苏联解体，民族主义就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散开来，其实，并非苏联解体产生了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导致苏联解体。在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里，从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民族问题，而民族问题的处理得当与否，在于能否执行较为成功的民族政策。苏联政府在对车臣的民族政策方面曾犯下严重错误。戈尔巴乔夫承认，民族问题是苏联政府关注得很少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每当苏联或俄罗斯历史重大转折的关头，都会出现民族主义高涨的趋势：1917 年革命、1945 年世界大战结束、1991 年苏联解体。美国学者预言，在 21 世纪，全球还将产生许多新国家。这样，现有的国家数目将继续扩大，而这种国际范围内的政治变化，其驱动力就是民族主义。

在苏联境内，有许多沙皇俄国，以及苏联在各个历史时期征服或归并的少数民族。尽管经过苏联时期的快速发展，许多民族地区仍然相对落后。苏联政府执行民族平等的政策，在某些方面特意照顾少数民族，或给予优待条件，其他加盟共和国甚至拥有比俄罗斯联邦更多的自主权。这些做法，是基于这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落后于俄罗斯民族这样一个前提，客观上则维护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优越感。关于大俄罗斯主义问题，学界已经强调得很多。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民族对这种照顾少数民族的做法也未必满意。俄国自由民主党党首日里诺夫斯基在《俄罗斯的命运》中就曾经写到：他上学时，少数民族的同学只须很低的成绩就可以上莫斯科大学。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带着毡子，一抖落，里边什么都有，并且在很多方面都享有优先和优惠。对此，感到很不服气。一定程度上，作为主体民族的俄罗斯民族会感到这是一种“逆歧视”。罗素曾经说过，民族主义是被刺激而产生的，即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是源自另一个民族对自己民族的“异族感”。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强化了另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刺激了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结果，俄罗斯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和隔阂越来越深，产生了民族敌视，并形成某种恶性循环。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经预见到，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未来一个时期将会重新高涨。“有一种危险，它是对俄罗斯普世主义和俄罗斯民族在世界上的使命的背叛”[19]。俄罗斯学者阿歇泽尔也曾经预言，“首先，可以预料，对于 1917 年的政变的意识形态翻转过来，即放弃国际主义，宁可转向斯拉夫主义，而不会转向西方主义”[20]；“其次，

俄罗斯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在缓慢地继续……对米赛亚思想的疲惫，以及类似在中国和埃及所发生的事件的痛楚，和认为所有人都在剥削我们的观点，都在增加”[21]。在苏联解体之初，很多俄罗斯人竟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不必为别人充当奶牛了。



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和国

苏联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与这些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说，在苏联解体前夕，各加盟共和国以及其他民族地区，独立历史越久，其分离倾向就越强烈；反之则弱一些。一些共和国是在加入苏联之前曾经有独立建国历史的，如波罗的海三国等等；还有一些是在加入苏联之前并没有独立建国历史、或建国历史非常短暂的，如白俄罗斯等；另外一类，如车臣则介于两者之间。即使在苏联最为强大的时期，包括车臣人在内的穆斯林民族尽量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特色，并且其民族意识由于苏联政府对车臣人的流放而得到强化。尽管掌握俄语的穆斯林民族人口在增长，但是，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尽量少用俄语，使用俄语对他们来说是很不情愿的事情。在自己的共和国里，他们都只用当地语言，并且不愿意到别的共和国里去，也不愿意和自己共和国以外的人通婚。而车臣民族一直保留着关于俄国征服、1944 年被流放的历史记忆。19 世纪的沙皇将军就曾经这样说到车臣人：他们什么也没有忘记，却什么也没有学会。车臣人的民族意识具有深刻的历史基础和前提。

人口的民族构成，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最初，俄罗斯族（俄语居民）在北高加索地区各民族中占多数，相当于该地区总人口的 1/5；但是，到 70 年代以后，俄罗斯的人口增长率降低，增长速度放慢，而与此相对的，是非俄罗斯族的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增长率提高。人口数量较少的民族往往会感受到被人口较多的民族同化的危险，因而，急剧提高出生率还具有另一种社会学、政治学的意义，即：以此来对抗同化。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人口所占比例的提高，该民族就会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其后果是少数民族对俄语居民造成压力[22]。

北高加索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复兴，首先是因为大众的精神和感情需求，而在苏联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意识往往表现在对历史的态度上。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苏联各地都出现了“历史热”，北高加索地区也

不例外。北高加索各民族从来就对本民族历史极为倾心。对历史的重新认识，表明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某些微妙变化和人民精神生活重心的转移。其次，北高加索地区民族意识复兴，受到当地政府以及政治精英的大力支持和倡导，甚至授意。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们鼓励当地知识分子，特别是历史工作者在人民中间普及历史知识。

民族主义高涨，也表现在意识形态转向，以及媒体的宣传主题发生的重大变化。媒体在北高加索各民族历史记忆的复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媒体对历史问题表现出极大兴趣：电台、电视、报纸杂志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历史题材的内容。北高加索地区发行了大量宣传品，达吉斯坦共和国尤为突出。这些历史方面的内容，涉及民族起源、语言、文化、文字、文献和建筑，等等。有关高加索战争以及北高加索各民族的领袖沙米尔的内容，是一个广受关注的历史问题，也是必不可少的绝好题材。在车臣等北高加索民族看来，高加索战争乃是北高加索各族人民反抗沙皇俄国的英勇斗争。相应地，就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沙米尔是北高加索民族反抗沙皇俄国侵略的领袖，一位民族英雄。当然，北高加索一些民族对沙米尔也有不同看法。在一份名为《沙米尔的传说》的小册子中写到："沙米尔还在幼年时就明白，俄国专制制度和沙皇的将军们准备对山民们做什么。他听说——后来则是看见——沙皇军队烧毁村庄，毁掉耕地和园林，赶走牲畜，杀害百姓。在沙米尔的心中，对殖民者的仇恨很早就觉醒了。于是，他决定为了民族的自由献出自己的一生。"[23]在北高加索地区民族主义上升的背景下，俄罗斯帝国征服北高加索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1994 年，几乎所有北高加索共和国都举行庆祝活动，纪念高加索战争结束 130 周年。北高加索各民族感兴趣的另一个历史问题，是 1944 年对该地区各民族的大规模流放事件；对该事件的探讨，其主题和宗旨主要是否定苏联政府的民族政策，抨击斯大林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和迫害。而对类似历史问题的探讨，针对的却是现实政治。

你夺去了我们的黎明，斯大林
你夺去了我们的黄昏，斯大林
你夺去了我们的祖国，斯大林
但愿上帝把你藏在棺材中

让你失去黎明，斯大林

让你失去黄昏，斯大林
让你失去最宝贵的东西
就像我们失去自己的土地

难道我们能够忘记那个早晨
难道我们能够忘记那个傍晚
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故土
和那个黑色的日子

不论我们在故土生活多久
我们都永远不会忘记
牛叫，狗吠
孩子和老人的哭泣

这是1991年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传唱的一首歌曲，从这些文字中，可以体会到一个民族心灵的创痛，重要的是，只要一触动它，历史记忆就会复苏，从而就具有了动员社会意识的功能[24]。1944年对车臣人的流放事件，在1991年车臣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在于：它很容易被某些个人或势力利用，号召和动员普通车臣民众，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车臣的民族主义表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车臣政府通过决议，改车臣语为官方语言，希望借此发展本民族文化。需要说明的是：苏联解体后，包括车臣在内的21个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共和国先后发表了对俄罗斯联邦的主权宣言，并通过立法，将各自治共和国内主体民族的语言和俄语并列为平等的官方语言。但是，有两个共和国只规定了一种语言，即主体民族的语言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即车臣和提瓦（Тыва）[25]。当然，尽管车臣政府提倡推广车臣语言、发展本民族文化，但是，多数车臣人只会说车臣语，而不会写。此外，俄语本来就是一种比车臣语言信息量大得多的重要语言。俄罗斯联邦教育部规定，各共和国须用相同的教科书，但是可以教授本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化等。北高加索地区的学校里开设各种有关本民族历史、文化、乡土地理、民俗的课程，意在唤起人们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例如，亚迪格共和国的学校里开设了“亚迪格礼节”的课程；达吉斯坦的学校里开设了“达吉斯坦各民族的文化与传统”；车臣在这方面则走得更远。车臣拒绝联邦政府编订的统一的历史教科书，而是编订了按照自己的理解解释和讲述的车

臣历史，以及车臣—俄罗斯关系历史的教科书。在这个版本的教科书里，车臣—俄罗斯关系的实质，被概括为车臣对俄罗斯持续400年的、不妥协的反殖民战争[26]。这样的历史研究具有“政治订货”的特色。与此同时，车臣共和国开始了恢复传统（再传统化）的过程，包括恢复许多中世纪的风俗和传统，如车臣社会的习惯法在高加索战争之前即已存在等等。

车臣宣布独立前后，除了所谓的独立出版物，如《车臣之声》等等以外，甚至官方媒体也公然进行反俄宣传，灌输车臣民族对俄罗斯民族的种族优越感，煽动反俄、仇俄情绪。同时，政治领导人在其中也起了关键作用。在电视台的一次直播节目中，“高加索各民族邦联”领袖索斯兰别科夫眼含泪水，发表了深情的讲话，称俄罗斯民族是劣等人，号召车臣人“不要让俄罗斯人的笑声和歌声在山民的大地上响起”[27]。

从90年代初开始，车臣人对原来的街道、广场、城市的名称进行了大规模更换，清除了殖民战争和沙皇俄国统治时期的一些地名，消除沙皇俄国时期乃至苏联政府统治的政治影响，例如，将高加索战争期间的沙皇将军叶尔莫洛夫的纪念碑摧毁，等等。俄罗斯政府对车臣采取政治举措后，就更加激化了那里的民族情绪。1991年11月，车臣《自由报》写道：“在300年时间里，俄罗斯建立了一个大殖民帝国。这个奴役与强权的时期在历史上罕有其匹”，“我们的遗言是：通过追究那些制造邪恶与暴力的人的最高责任，将恐惧和痛苦带给野兽和对各族人民施加暴力的洞穴——莫斯科，从而作用于核危险的根源”[28]，署名是车臣共和国总统和车臣共和国议会。这是对俄罗斯决定在车臣实行紧急状态的回应。

与此同时，车臣共和国境内不断发生针对俄罗斯人的暴力事件：强奸、杀害，等等，性质极为残忍、野蛮。车臣人对俄语居民进行排挤，通常其手法是：到俄罗斯族居民家里去，要求主人以低廉到荒唐的价格出让家产；许多俄罗斯族居民为此精神失常或者死去。车臣和印古什有许多俄罗斯族奴隶，他们被引诱给以饱食和工资，然后被迫干农活或在家内劳动，命运非常悲惨。据说，车臣的富有家庭都有这种俄罗斯奴隶，他们被严加看管，甚至可以转卖。如果试图逃走就遭到毒打，甚至被打死。在这一时期里，车臣已经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车臣的俄罗斯族居民处于无保护的状况。尽管当地车臣人也遭受苦难，但是相对俄罗斯人来说情况仍旧好得多，因为车臣人有自己的血亲组织——泰普，可以保护车臣人不受侵害。对于冒犯者来说，血亲复仇具有威慑作用。车臣发生的排挤、残害俄罗斯族居民的事件，不啻是一次民族清洗。

在这期间，对于这种严重的种族排挤现象，俄罗斯媒体表现得较为沉默、畏苒，以致当地俄罗斯族居民发出抱怨，认为俄罗斯政府不关心车臣境内俄罗斯族的命运，将他们出卖了；而对于俄罗斯媒体有关车臣的报道，他们也表示不满。车臣的哥萨克向俄罗斯政府发出呼吁："我们请求俄罗斯的电视转达我们的呼声！""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们将命运和性命托付给你，可是现在俄罗斯人发生了什么事情？"[29]真实报道车臣的暴力排俄事件的记者，往往受到生命威胁。在1993年4月5日夜间，因为如实报道了车臣发生的事件，格罗兹尼《时事快递》的记者德米特里·克里克利扬茨被人杀害。

对于政治后进的民族来说，民族主义是凝聚车臣民族的重要思想武器。车臣人是较晚归并俄罗斯帝国的少数民族，因而具有较为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也是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给予其较高程度的自治地位的原因和依据。与其他较早归并俄罗斯（苏联）的民族不同，车臣民族具有独特的民族意识和历史经验，这是俄罗斯帝国（苏联）政府在决定车臣的政治法律地位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车臣民族主义的发展走向极端，变成了民族沙文主义，对于车臣民族自身有害无益。沙米尔曾经有一句名言：小民族要有长剑，但是，小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却不是长剑，它往往只会导致悲剧性的结局。

莫斯科：车臣危机的策源地

必须将车臣危机放在苏联解体前后的整个形势中考察，特别是当时苏联国内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在苏联解体前夕，许多行政主体都曾向中央发难，要求主权，车臣与鞑靼则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车臣，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鞑靼就置身权力斗争的漩涡，甚至是在浪尖上，一些政治家正好可以将其用作斗争工具。车臣、鞑靼问题都曾经是苏联中央和俄罗斯政治家手中的筹码：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都曾将鞑靼问题和车臣危机视为打击对方的手段。

在双方的斗争中，戈尔巴乔夫处于不利地位，而叶利钦占了上风。戈尔巴乔夫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叶利钦是直接选举产生的，比前者更具合法性。在苏共中央的支持下，出台了一个"自治化计划"，将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共和国的法律地位升格为加盟共和国，以便削弱俄罗斯和叶利钦。1990年4月26日，苏共中央出台了相关法律，开始实施自治化。如果该计划实施，俄罗斯将失去51%的领土及其以上的资

源[30]。作为回应，为保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俄罗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6月12日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的《国家主权宣言》，但是，其中只字未提脱离苏联，而是强调留在苏联。

在形势发生逆转的情况下，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都对地方作出许诺，以寻求支持。车臣危机成为政治斗争的人质。鞑靼提出主权要求，首先得到叶利钦的明确支持。1990年，身为俄联邦总统的叶利钦访问了鞑靼，并声称："我认为鞑靼人民有权决定自己需要何种形式的自治，"[31]他还发出鼓动性的呼吁：你们想要多少主权，就可以拿多少！而戈尔巴乔夫则试图在新联盟条约中，给予自治共和国以加盟共和国的地位，让自治共和国领导人与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平起平坐。在叶利钦发表这些声明之后，俄罗斯联邦各行政主体纷纷发表主权宣言，被称为"主权大检阅"。车臣并非惟一这样做的行政主体，但是，与其他行政主体不同的是：其他主体多数意在表示获得更多自主权的姿态，只有宣言性质，而车臣则想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实现"民族自决"。

1990年6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其发表的《主权宣言》对车臣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那些反对叶利钦提高俄罗斯联邦国家地位的人，首先利用这一计划作为武器，致力于提高自己在俄罗斯联邦内部的地位[32]，这就为车臣的政治精英实现分裂提供了现实的政治机会。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联盟中央产生了深刻矛盾。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书记扎夫加耶夫一直是所谓的"中央派"，配合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对后者予以支持。但是，共和国内部的激进民族主义派别成为扎夫加耶夫有力的竞争对手，他们以攻击扎夫加耶夫政府作为自己存在和扩大影响的手段。在内外压力下，扎夫加耶夫于1990年11月主持通过了主权宣言，宣布车臣是一个主权国家，尽管此后共和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并没有发生变化，扎夫加耶夫实际上也是抱着观望态度。当然，对于车臣分裂运动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扎夫加耶夫此举一石两鸟：一则使反对派失去攻击自己的借口；二则借以避开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实际上是被迫在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寻求平衡。1991年夏天，举行了俄罗斯总统选举，扎夫加耶夫出人意料地支持了叶利钦。可以说，除了叶利钦的家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外，只有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有这么多人为叶利钦投票，这是非常有力的支持。

此后，扎夫加耶夫与俄罗斯中央发生了冲突，这就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也就间接地影响了车臣的命运。作为当事人，扎夫加耶夫后来回

忆说，在他担任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第一书记的时候，他发现，在共和国政府成员中，除了他一个车臣人外，几乎没有一个车臣人或印古什人担任部长；在一些大企业、铁路部门中，也没有车臣人，更不用说克格勃、内务部了。扎夫加耶夫认为，这是对车臣民族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在他看来，仍然是1944年流放的后果。他希望俄罗斯中央政府能够通过为被镇压民族平反的法律，为车臣、印古什民族正名，恢复历史公正。在多次请求未果之后，扎夫加耶夫提出：如果不通过该法律，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将不参加3月17日举行的全民公决。扎夫加耶夫的这些举措，被某些人刻意解读为扎夫加耶夫不服从叶利钦的政策和命令，而扎夫加耶夫被叶利钦视为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对某些人有利[33]。到1991年秋天，莫斯科的一些车臣人利用近水楼台的便利，还在提醒叶利钦，不要忘记扎夫加耶夫在1991年春天的图谋。联系到后来的政治进程，可以说，扎夫加耶夫成了第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1990年杜达耶夫即已登上政治舞台，叶利钦并未加以反对，而是将其视为自己的盟友。正是叶利钦的亲信根那迪·布尔布利斯设法将杜达耶夫从爱沙尼亚弄回格罗兹尼的。在俄罗斯政坛，一直存在各种政治传言：如杜达耶夫与叶利钦有某种协议，是被特意派回车臣发动民族分裂运动的；而苏军从车臣撤出的时候，受命将武器留在车臣，等等。艾哈迈德·卡迪罗夫一直坚持：杜达耶夫正是在莫斯科被人灌了迷魂汤，并且有文件可以证实。莫斯科的一些政治家使杜达耶夫成为领袖。车臣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了主权之后，有代表到格罗兹尼，要求扎夫加耶夫下台。卡迪罗夫说，莫斯科的一些人准备发动第一次高加索战争，为此一些人赚了千百万美金[34]。

1991年8月，苏联已经处于混乱局面，戈尔巴乔夫和一些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意识到，苏联作为一个联邦国家已经很难维持，其分崩离析的前景已经非常明显。迫不得已，戈尔巴乔夫想要签署一个新的联盟条约，准备给予加盟共和国更多的自主权。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8·19”未遂政变，该事件的失败表明了危机形势已经无可挽回，而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一些人也借机发动了推翻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党政机构的政变。在这次事件之后，以共和国书记多库·扎夫加耶夫为首的共产党政权转到了“车臣民族全民代表大会”手中。在这个过程中，扎夫加耶夫未得到联邦中央的支持，而以杜达耶夫为首的车臣激进派上了台。从而，苏联中央和俄罗斯对车臣失去控制。由于杜达耶夫等人的分裂趋势日益明显，车臣独立，首先危害的是俄罗斯联邦的利益，叶利钦对车臣分裂的态度发生转变。车臣举行了非法的总统选举之后，1991

年11月7日，叶利钦发布命令，决定在车臣实行紧急状态，但是，这一举措没有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下的强力部门，苏联内务部领导人瓦·巴拉尼科夫、克格勃领导人瓦·伊万年科都拒绝支持该行动。原来，戈尔巴乔夫要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哈斯布拉托夫后来证实，戈尔巴乔夫直截了当地对叶利钦说："您当时也不允许我在立陶宛实行同样的紧急状态。您还记得吗？我们当时是多么愤怒！"有人认为，或许，正是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态度，促使叶利钦决定与其他几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一起于12月7日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35]。而该协定的签署，就意味着苏联已经实质上解体，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举行一个宣布解体的仪式。

除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外，另外一些领导人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当时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叶利钦、鲁茨科依、哈斯布拉托夫之间的权力争夺非常激烈，出身车臣族的哈斯布拉托夫将车臣视为自己从政的资本，极力反对车臣—印古什从俄罗斯分离出去，正是在他极力主张并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客观上导致扎夫加耶夫被迫离职，车臣激进派上台。从车臣危机走向武装冲突的过程中，俄罗斯政府前后矛盾、反复无常的立场和行动，是导致危机向严重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后，俄罗斯联邦与苏联中央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停止，因而对车臣发生的变化几乎无暇顾及，而车臣的变局正是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完成的。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存在着多种社会问题：经济恶化、犯罪率居高不下、民族矛盾和冲突频发等。车臣危机和鞑靼危机的解决，取决于当时国内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和政治家的优先考虑。对于那些视权力为生命的政客来说，一些矛盾和危机正好可以为自己牟取私利而加以利用。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家倾向于操纵和利用车臣危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1991年10月14日，杜达耶夫在车臣总统选举后不久，接受了记者采访。在采访中，杜达耶夫像以往一样，表示车臣走向独立的道路是"依照国际法准则和民主规则"。同时，杜达耶夫不同寻常地称"但是，有人却试图将武力和挑唆的道路强加给我们"，包括俄罗斯国家高层领导人在内的一些人千方百计"将另一种不该属于我们的道路强加给我们：恐怖主义的道路、冒险主义的道路、宗教教派主义的道路"。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我们与进步人类和世界文明隔绝开来，把我们塑造成为一个怪物的形象，贪婪嗜血"[36]。杜达耶夫还称：我是一个牺牲品，但是一个"有意识"的牺牲品。

车臣危机的迅速发展并最终失控，也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争

夺权力的恶果。为了政治斗争，政治家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却真正是难以想像的。

1995年4月5日的《俄罗斯报》披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格罗兹尼的“尼索”银行（杜达耶夫在该银行有自己的账户）发现了一批文件，其中一件是给杜达耶夫的一封信，落款是“高加索各民族邦联”主席索斯兰别科夫：

车臣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表示，准备在车臣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建立全方位关系方面，包括俄罗斯方面承认车臣共和国的手续，与车臣共和国合作。全部工作估计要5万美元。需1万美元预付金，用于开展工作。

请拨上述数额的钱，以便同“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签订协议。

主席 IO. 索斯兰别科夫[37]

且加盖了主席印章。接着是另一份文件：

经济与财政部长阿布巴卡罗夫：

命令：为与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签署协议，请拨1万美元给议会外交委员会。

车臣共和国议会主席艾哈迈多夫

此外，还有一份协议，签订日期是1992年12月10日，协议一方为“C与C”公司，公司代表为总经理 III. M. 斯莫特里茨基；另一方则为车臣共和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代表为主席索斯兰别科夫。协议内容是：订货人委托（并接收），而执行人承担（转交）科研工作，“研究相互关系的观点：车臣与俄罗斯联邦中央；俄罗斯联邦中央与车臣；高加索地区国家与高加索各民族邦联”。接下来，协议还规定了完成全部工作和各个部分的日期、交接方式；价钱为5万美元，并在签署协议之日起3天内，交1万美元作为预付金。还特别规定了一条：用美元现金支付，其上还有索斯兰别科夫的亲笔签字。并且还可以知道：签订协议的当日，1万美元的定金就已经交接。协议还注明协议双方的地址：订货人在格罗兹尼胜利大街40号；执行人则在莫斯科波罗夫大街6号，36号房间。签名加盖的印章名称是：莫斯科，行政西区3号，“C与C”有限责任互助会。

大约许多人都会对这批文件感到大惑不解。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证明这批文件是伪造的。如果这些文件属实，那么它可以表明：与车臣政府谈判的，是一个有能量的组织，能够完成合同中所委托的“任务”，该公司也不可能是专门骗取钱财的皮包公司，因为毕竟车臣共和国政府并非傻瓜。其次，如果说这个公司只是挂着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名义的一个分支机构或子公司，那么，车臣议会不可能相信这个公司有能力做到协议规定的内容，帮助他们得到俄罗斯的承认。此外，1992 年 12 月的时候，苏联已经解体，戈尔巴乔夫及其时代已经终结，那么，这个公司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要冒险去帮助车臣从事分裂活动？这些文件暴露出了俄罗斯政治生活中最黑暗、秘密的一面，因此，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披露。

注　释：

〔1〕Г. З. Анчабадзе, Вайнахи (чеченцы и ингуши), Тбилиси, 2002. С.63.

〔2〕甘阳编选《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出版，74 页。

〔3〕Чеченцы и Чечня, http://www.hronos.km.ru/etnosy/chech.html

〔4〕В. Г. Бабаков, Кризисные этносы, М, 1993, С.90.

〔5〕Г. З. Анчабадзе, Вайнахи (чеченцы и ингуши), Тбилиси, 2002. С.65.

〔6〕Петр Акопов, Я знаю, что я жертва//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5 июля 1998.

〔7〕艾里克·霍克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出版，201 页。

〔8〕А. Аймермахера,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их , М, 1999, С.111.

〔9〕Орлов, Черкасов, Россия—Чечня: цепь ошибок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М, 1998, С.91.

〔10〕В. А. Михайл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 1997, С.392.

〔11〕Георгий Дерлугьян, Чечен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Чеченская история, http://www.sakharov-center.ru

〔12〕Гилани Турашев, Сколько генералов-чеченцев в России? http://www.daymohk.info/cgi-bin/

〔13〕Джабраил Гакаев, Путъ к Чече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http://www.sakharov-center.ru

〔14〕П. Хлебников, Крестный отец Кремля Борис Березовский, 2000, С.18.

〔15〕П. Хлебников, Крестный отец Кремля Борис Березовский, 2000, С, 44.

〔16〕威廉·奥尔森等：《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王沿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18 页。

〔17〕刘军宁主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 1998 年出版，214 页。
〔18〕戴维·米勒等著：《布莱克维尔政治学大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492 页。
〔19〕Н. Бердяев,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М, 1991, С. 305.
〔20〕А. С. Ахиезер, Россия: крит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том 1,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7, С. 348.
〔21〕А. С. Ахиезер, Россия: крит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том 1,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7, С. 349.
〔22〕Л. М. Дробижева, Конфликтные этносы и этносн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М, 1994, С. 131.
〔23〕А. Аймермахера,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их , М, 1999, С. 259.
〔24〕Светлана Алиева, Так это было: Репрессия народов в СССР 1919—1952гг, том 2, М, 1993, С. 173.
〔25〕Л. М. Дробижева, Конфликтные этносы и этносн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М, 1994, С. 21.
〔26〕А. Аймермахера,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их, М, 1999, С. 264.
〔27〕Письма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о массовом насил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 , http://www. inforsetre. ru/win/user/
〔28〕И. Р. Шафаревич,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 в переломе тысячалетия, М, 2000, С. 315.
〔29〕Письма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о массовом насил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 http://www. inforsetre. ru/win/user/
〔30〕С. М. Шахрай, Мифы и факты распада Союза ССР, http://www. nasledie. ru/persstr/persona/shahrai
〔31〕Ф. Х. Мухаметшин, Суверенный Татарстан, М, 1997. С. 49.
〔32〕Орлов, Черкасов, Россия—Чечня: цепь ошибок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М, 1998, С. 91.
〔33〕Б. Н. Зенькович , Тайны уходящего века, М, 2000, С. 389.
〔34〕http://txt. newsru. com/russia/
〔35〕Джабраил Гакаев, Путъ к Чече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http://www. sakharov - center. ru
〔36〕Петр Акопов, Я знаю, что я жертва//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5 июля 1998.
〔37〕Борис Ямшанов,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за баксы, http://www. fsb. ru/

第六章

车臣危机：阶段、特点

车臣危机经历了逐渐演变、发展的过程。从1990年车臣发布主权宣言到1994年，是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1991年8月19日事件之后，车臣发生“革命”，危机加剧，苏联和俄罗斯失去对车臣的控制。随即开始了政治谈判、小规模的武装对抗，逐渐发展为危机的最高形式——战争。从1994年到1996年，第一次车臣战争以俄罗斯撤军告终。此后，车臣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1999年，车臣分裂派武装入侵达吉斯坦，俄罗斯军队随即开入车臣，开始了第二次车臣战争。

“车臣革命”

1. 杜达耶夫其人

乔哈尔·穆萨耶维奇·杜达耶夫，车臣族人，1944年出生于中亚。像大多数那个年代出生的车臣人一样，杜达耶夫在中亚流放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直到1957年赫鲁晓夫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平反后，从中亚回到车臣。杜达耶夫的家庭是一个普通的车臣人家庭。起初他在物

理数学学校学习，后来到唐波夫高等空军学校学习，1968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7 年在加加林高等空军学院毕业。妻子阿拉·杜达耶娃是一位画家，俄罗斯族人，有三个子女：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据杜达耶夫的一位熟人回忆，杜达耶夫刚从唐波夫空军学校毕业时，其身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空想家或民族主义者的东西。当杜达耶夫驻在爱沙尼亚城市塔尔图的时候，此人曾经去过杜达耶夫的家里。当时杜达耶夫的住所非常普通，家里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或奢侈品，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妻子创作的画；而这些画中最珍贵的，当数杜达耶夫妻子在丈夫授衔时为丈夫做的穿将军制服的大幅画像[1]。总之，从各个方面看起来，杜达耶夫只是一位普通的苏军军官。据杜达耶夫妻子杜达耶娃回忆，杜达耶夫在苏军服役期间，表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深受官兵的爱戴。而杜达耶夫为普通人所知，是在 1990 年。杜达耶夫作为远程战略军的领导人驻扎在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当时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爆发了游行和集会，要求独立；杜达耶夫接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命令，要求镇压集会人群，包围电视台和议会大楼；但是杜达耶夫拒绝执行命令，这一行动使杜达耶夫获得很高威望，在爱沙尼亚人的心目中，这位“反叛将军”成为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但是，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在苏联军队中，车臣人、印古什人等民族出身的军人都很难得到上司的信任、赏识和擢升的机会。杜达耶夫善于隐忍自己的欲望和感情，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很冷酷[2]。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品质，使杜达耶夫能够成为一个苏军中被提拔得最快的车臣人，成为苏军中惟一一个车臣族将军。



杜达耶夫

1990 年 5 月，杜达耶夫提前退役，随即回到车臣，开始从政。有人认为，杜达耶夫提前退休似乎是得到什么人的授意，目的是让他回到北高加索发动民族主义运动，对苏联最高当局发起挑战。因为有人需要这样的形势[3]。

杜达耶夫回到车臣后，很快得到了几乎所有车臣人的支持。《自由报》主编写到：他并不是像我们大家一样的人。他没有钱，也没有强大的家族背景，最可怕的是，他非常正直。当时，车臣民众之所以对杜达耶夫普遍怀有好感，除了人们对当时腐败、保守的苏联官僚体制感到不满以外，原因还在于杜达耶夫本人来自军队。从 80 年代末直到车臣战争之前，军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比较廉洁清正，形象良好。对于车臣人来

说，杜达耶夫既是一个车臣人，也是一个外来人，与共和国的官僚体制和集团没有任何关联，身上没有污点。此外，一位带兵的将军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英武、正直、果断、严厉的印象。这既可满足消除共和国苏共腐败体制的社会要求，也符合多数车臣人的传统和民族心理。从历史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将军、战士在车臣人中拥有崇高地位，更容易得到车臣人的认同。

2. “车臣革命”

1990年2、3月间，车臣—印古什共和国首次举行选举，选举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多库·扎夫加耶夫当选为共和国主席，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出身车臣族的最高领导人。

11月23日到25日，在征得车臣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同意之后，召开了由共和国境内的民族组织、社会组织、生态组织、最高苏维埃代表以及境外车臣人代表组织的“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11月25日，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宣布了国家主权，并通过决议，请求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批准宣言。27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声称“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是按照车臣—印古什民族自决原则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4]，并打算在苏联和俄罗斯联邦范围内签署一个条约。而“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很快成为一个常设的政治组织，且逐渐脱离政府控制。

1991年6月，在“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杜达耶夫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该组织成为一个与共和国苏维埃政府平行并立的机构，形成了“双重政权”的局面。以多库·扎夫加耶夫为首的温和派主张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争取比较大的自主权，而以杜达耶夫为首的激进派则主张完全脱离俄罗斯而独立。多库·扎夫加耶夫对激进派不予认可，双方产生了冲突。此后，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内不断举行经过精心组织的、支持杜达耶夫的集会，而其参加者们则得到奖赏。同时，在“执行委员会”的授意和庇护下，开始建立非法武装，并于1991年6、7月间在格罗兹尼郊外的森林里经过专门训练，准备夺取政权。

俄罗斯和苏联领导人忙于国内政治斗争，对车臣的政策缺乏连贯性，时而协商，时而施压，没有起到实际效果。8月15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作出决议，决定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代表参加即将在8月20日举行的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但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不打算签字，其理由

是：在1944年流放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之后，划归北奥塞梯的印古什人的土地问题没有予以解决，乃是一个政治障碍。

1991年3月15日，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更改共和国名称，将“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字样去掉；并认可了主权国家联盟的方案，甚至批准了签署文件的代表的名单。

6月22日，“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各民族代表大会”发出致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呼吁书，强调指出：多民族的车臣—印古什将永远为各自由民族之间兄弟般的合作、和平与社会和谐、和我们统一祖国的繁荣作出有分量的贡献。1991年6月，杜达耶夫成为“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作为在1989年到1990年间形成的民族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和一些党派将杜达耶夫视为政治斗争中的盟友。杜达耶夫及其支持者开始在政权内部建立军队：“民族近卫军”。

1991年的“8·19”事件，标志着戈尔巴乔夫与反改革的传统派别的矛盾激化，反改革派希望挽回局势，于是制造了“8·19”事件。该事件对于整个苏联和车臣的命运都是一个转折点。“8·19”事件之后，“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将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力量和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内的反对派联合起来。当时，“车臣民族全民代表大会”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与政府积极合作，较为温和；另一派是杜达耶夫代表的民族激进派，要求推翻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共产主义制度，结果杜达耶夫一派占上风。8月19日下午，未经登记的“瓦依那赫民主党”的一部分成员试图在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大楼前举行集会，被强行驱散，该党领袖、文学家扬达尔比耶夫被拘押，但是，“执行委员会”对宣布采取非常措施表示强烈反对。当天深夜，“执行委员会”召开非常会议并通过决议，号召车臣和印古什民族支持俄罗斯联邦合法当选的领导人，不要服从新出现的机构，并在决议中称“8·19”事件为“国家政变”，而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则没有正式表态。在“8·19”事件中，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人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多库·扎夫加耶夫声明准备退休，但是在莫斯科的压力下没有离职。

这时，格罗兹尼已经是风声鹤唳，形势非常严峻，正在酝酿一场剧变。但是，8月21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称：鉴于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境内“社会政治形势稳定”，因此主席团决定不在共和国实行紧急状态。22日，杜达耶夫领导的“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和其他一些团体在格罗兹尼举行群众集会，要求共和国领导人对发生在莫斯科

的叛乱表示沉默作出解释，并对民主派在莫斯科获胜表示支持。一些团体成员潜入电视大楼，人群迫使工作人员中断广播，“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杜达耶夫得到发表言论的权力。杜达耶夫在第一次电视演说中，要求解散最高苏维埃，通过新宪法和车臣国籍法，并在车臣举行直接民主选举。

8月23日到25日，集会人群摧毁了共和国政府大楼前的列宁纪念碑，封锁了共和国内务部和克格勃所在的大楼，还占领了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所在的大楼。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机场都在这些人的控制之下，护法机关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以杜达耶夫为首的“车臣民族全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和以多库·扎夫加耶夫为首的最高苏维埃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协商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摆脱危机的出路。原本打算召开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在法律基础上解决所有问题，但是，集会人群要求最高苏维埃主席立即下台。29日，紧急召集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就扎夫加耶夫的信任问题提交讨论，不信任案没有通过，最高苏维埃重申：扎夫加耶夫拥有全权。

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8·19”事件使得用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保留苏联的希望成为泡影：“八月阴谋的策划者破坏了用把苏维埃联盟改造成为主权国家联盟的办法保存联盟的现实可能。”[5]但是，“8·19”事件却给了杜达耶夫机会。事件之后，莫斯科、俄罗斯以及苏联政府实际上已经对车臣丧失控制。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之后。当时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扎夫加耶夫，而莫斯科当局却将希望寄托在杜达耶夫身上。以杜达耶夫为首的激进派战胜了以多库·扎夫加耶夫为首的温和派（“车臣的列宁、罗伯斯庇尔战胜了车臣的米拉波、米留科夫”[6]）。车臣政局发生的一系列突变被称为“车臣革命”。

1991年9月初，武装分子占领了许多政府机关。9月1日，“车臣民族全民代表大会”执委会决定，解散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委托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筹建临时政府。9月3日，杜达耶夫与索斯兰别科夫一起宣布：废除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废除一切现有的国家机构，并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杜达耶夫还指责俄罗斯对车臣推行殖民政策。同时，杜达耶夫的追随者们开始加紧行动，占领了电视台、电台等重要设施，宣布原最高苏维埃通过的一切法律法规丧失效力，等等。9月6日，杜达耶夫的“民族近卫军”强占了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的大楼，包括多库·扎夫加耶夫在内的40多名最高苏维

埃成员遭到毒打，其中格罗兹尼市苏维埃主席维塔里·库琴科被从窗户掷下，不治身亡。

事态已经发展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9月14日，俄罗斯联邦代表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飞赴格罗兹尼，在他主持下，代表们作出决议：扎夫加耶夫辞去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职，最高苏维埃自动解散，新的议会选举确定在11月17日举行。9月15日，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和“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代表共同组成一个“临时最高苏维埃”，拥有过渡时期的权力，总共32人，其中一些人并非出于自愿，当时哈斯布拉托夫也在场。但是，几小时之后，当哈斯布拉托夫匆匆飞回莫斯科后，杜达耶夫和扬达尔比耶夫立即坚持将临时最高苏维埃成员数目缩减为13人，而实际上，剩下这13人同样不发挥作用，真正发挥作用的只有一个人，即临时最高苏维埃主席艾哈迈多夫。这些情况表明，车臣的苏维埃党政机构已经不复存在。

这个非法机构被民族激进派利用，目的是使车臣进一步脱离俄罗斯。整整三个星期的时间，艾哈迈多夫取代了“临时最高苏维埃”。三周之后，“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因“从事爆炸和挑衅活动”，宣布解散“临时最高苏维埃”，“执委会”拥有全权，巴赫马多夫取代艾哈迈多夫担任主席一职。10月6日，以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为首的代表团抵达格罗兹尼，会见了包括“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在内的许多社会政治团体。10月7日，“临时最高苏维埃”成员的数目再次恢复到原先的32人。

10月8日，俄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主持召开会议，鲁茨科伊做了主题报告，对车臣—印古什的局势评估非常严重，其他人的发言基本上是对他发言的补充和支持。10月10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形势》的决议，责成俄联邦副总统和部长会议保障恢复共和国法制的必要条件；俄罗斯政府惟一认可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是“临时最高苏维埃”；同时要求解除非法武装。多库·扎夫加耶夫在后来回忆说，正是这份文件对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非常消极的作用，它使本已异常紧张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并使问题的解决走向死胡同。扎夫加耶夫认为，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客观上使强制驱逐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这一行为合法化，并使以主席为首的苏维埃失去宪法赋予的权力，也使他们失去开展活动的可能性[7]。同时，这种做法本身还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宪法。

该文件列举了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内一些违反宪法的现象，但是，其中竟然只字不提强行驱逐最高苏维埃这一严重事件；该文件宣布共和国“临时最高苏维埃”为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境内惟一合法的国家权力机构，从而就默认了1991年9月6日车臣境内发生的政变，也助长了发动暴动的“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气焰，鼓励他们放手行事。但是，“临时最高苏维埃”自身难保，将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命运托付给他们，预示着前景极为凶险。

杜达耶夫准备选举，试图使自己的政权合法化。杜达耶夫的政治目标是：从1991年10月27日起，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国家主权获得承认；与苏联政府以及俄罗斯联邦政府谈判，商讨有关未来双方关系事宜。10月24日，“临时最高苏维埃”声明：“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定于10月27日举行的车臣—印古什总统和议会选举是非法和违宪的。同时发布决议，称任何选举结果都不具有法律效力。同一天，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艾哈迈德·阿尔萨诺夫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统驻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代表。10月26日，格罗兹尼媒体发布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决议，“临时苏维埃”宣布在11月17日举行全民公决，公决的参加者将回答两个问题：设立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总统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将共和国一分为二，即分为车臣和印古什。“临时最高苏维埃”还确定在这一天举行共和国议会选举。但是，杜达耶夫走在了前面。10月27日，车臣共和国举行总统选举，选举活动整整持续了两个星期，杜达耶夫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车臣方面的统计表明：1270429人（1991年1月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人口统计数字）中，参加选举者49万人，其中，支持杜达耶夫的占85%以上[8]。俄罗斯政府方面认为，无论从现行法律的角度，还是一般民主程序来看，都是绝对非法的：参加选举的人数占全部选民的10%到12%；许多投票点的投票人数超过了登记在册的选民；在共和国的14个区中只有6个区参加选举。

11月2日，杜达耶夫签署第一道总统令，宣布自11月1日起，车臣已经是主权国家。至此，车臣走向独立的所有形式上的步骤都已经完成。但是，“临时最高苏维埃”还在继续存在和活动，车臣与俄罗斯中央政府的对抗还在继续。“临时最高苏维埃”确认选举为非法，反对派提出了自己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杜达耶夫及“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称反对派和“临时苏维埃”无权组织新选举。11月2日，俄罗斯联邦第五次非常代表大会选举哈斯布拉托夫为主席，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认为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于“1991年10月27日举行的国家最高权力机

构最高苏维埃选举是非法的，其通过的决定不得执行”。11 月 4 日，“临时最高苏维埃”决定，原定于 11 月 17 日举行的选举改为 12 月 8 日举行。11 月 5 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谢·费拉托夫和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奥·罗波夫发来电报，称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选举是非法的，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政府谴责“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的行动，并警告其领导人：将采取法律规定的一切措施来消除对抗行动，并将追究罪犯的责任。11 月 7 日，叶利钦发布总统令，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境内实施紧急状态。但是，苏联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以及俄罗斯联邦克格勃主席等人实际上并没有履行俄罗斯总统的命令。俄罗斯特种部队受命恢复车臣境内秩序，他们原计划使用当地的武器装备，因此他们从莫斯科来的时候没有带武器。但是，他们被杜达耶夫武装困在格罗兹尼的汉卡拉机场，甚至都无法下飞机。杜达耶夫要求立即将特种部队撤出车臣境外。经过谈判，该部队在 11 月 9 日无功而返。11 月 9 日，杜达耶夫宣布在共和国全境废除紧急状态，并进入战备状态，同时恢复总动员；俄罗斯总统任命的共和国行政首脑及其副手被勒令交出权力；同时，旨在实现高加索统一，并将许多高加索地区的民族运动和政治组织联合起来的“高加索山地民族邦联”，也声明：如果俄罗斯侵略车臣，“邦联”将对车臣提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政府被迫让步。11 月 11 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没有批准在车臣—印古什实施紧急状态的总统令，并将其废止。

此前，反杜达耶夫派别的力量也很强大，甚至拥有军队。但是，叶利钦下令在车臣实施紧急状态之后，形势发生逆转，在“抵抗俄罗斯侵略”的口号下，反对派纷纷解散，并且表示支持新政府。

由于杜达耶夫并非以决定性优势而夺取了政权，就造成共和国的内部分裂，首先是激起了俄语人口，特别是哥萨克的不满。10 月 19 日，捷列克河地区的哥萨克发表声明：鉴于哥萨克可能会置身于祖国——俄罗斯境外，因此，纳乌地区的哥萨克打算举行全民公决，加入邻近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为此已经建立起了地区、军屯和居民点的委员会，但是没有确定公决的日期。哥萨克要求立即解除共和国境内的非法武装，声称要保卫纳乌地区的列宁纪念碑。

12 月 5 日，居住在捷列克河沿岸的居民公开反对新建立的政权机构，捷列克河右岸 20 个村庄的代表举行了集会并通过声明，认可车臣共和国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是既成事实，并且指出：“选举没有考虑居民的意见，而且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参加”。声明中称，必须在共和国全

境就国家制度、领土完整以及与俄罗斯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同时还制定了具体的行动纲领，每个村庄都成立了民兵组织。

3. 杜达耶夫体制及其特点



杜达耶夫及其战友玛利亚姆·瓦希多娃。后者曾拍摄有关杜达耶夫的宣传片，使其成为车臣人心目中传奇般的英雄。

杜达耶夫的战友玛利亚姆·瓦希多娃回忆说，在杜达耶夫的政府中，多数是“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的一些素质不高、接受教育很少的成员，而真正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的车臣人，没有一个参加到杜达耶夫的政府。杜达耶夫周围的人不善于工作，每日以挑唆、犯罪为能事。杜达耶夫反对派领袖、“古拉木”运动领导人穆斯塔法·埃吉尔比耶夫回忆说，当时许多车臣居民对杜达耶夫政权怨声载道，各地都建立起按照泰普和教派为基础的武装力量，抵制杜达耶夫的命令，杜达耶夫政权已经濒临垮台。在“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中，杜达耶夫的反对派力量还很强大，包括以下一些组织：“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民主改革运动”于1991年7月17日成立，正式注册则是在1991年12月24日。该组织罗致了数个组织和团体，如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知识分子协会、谢赫·曼素尔协会、恢复印古什国家组织委员会、车臣—印古什社会学家学会、格罗兹尼社会民主俱乐部等等[9]。“民主改革运动”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组织，由许多社会名流组成，社会基础很好，在车臣知识界、格罗兹尼的俄语居民中，以及车臣的一些乡村影响很大。“民主改革运动”赞成进行民主改革、实现社会保障、民族关系的和谐正常、支持追求主权独立，但是反对自我孤立和封闭。在1991年8月至9月间，运动积极支持了反对苏共领导的大规模行动，并在12月27日车臣进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中，进行积极抵制，宣布总统选举是违反宪法的，在广场上举行大规模集会，还建立

了自己的军队“国民义勇军”[10]。直到战争爆发前，杜达耶夫的支持者都并不占优势，但是，俄罗斯的举措却使局势迅速发生逆转。

1991年11月7日，叶利钦总统发布关于在车臣实施紧急状态的命令，杜达耶夫及其亲信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将其渲染为来自俄罗斯的侵略，并煽动1944年流放事件的历史记忆，使车臣人相信：俄罗斯准备对车臣民族再次实施流放。车臣居民更多地认同了杜达耶夫政权，原先的反对派害怕被指责为民族叛徒，也纷纷站在杜达耶夫一边，杜达耶夫的政治地位逐步巩固。

杜达耶夫领导下的车臣分裂派的目标及意识形态是“车臣革命”：先在车臣争取独立，然后将整个北高加索地区都归并进来，建立一个包括印古什、达吉斯坦在内的“北高加索山民共和国”，而车臣是实现这一构想的核心。在外交方面，杜达耶夫宣扬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乃是威胁北高加索各族人民利益的两个帝国，使车臣与俄罗斯的矛盾表现为“文明的冲突”，借此得到伊斯兰教国家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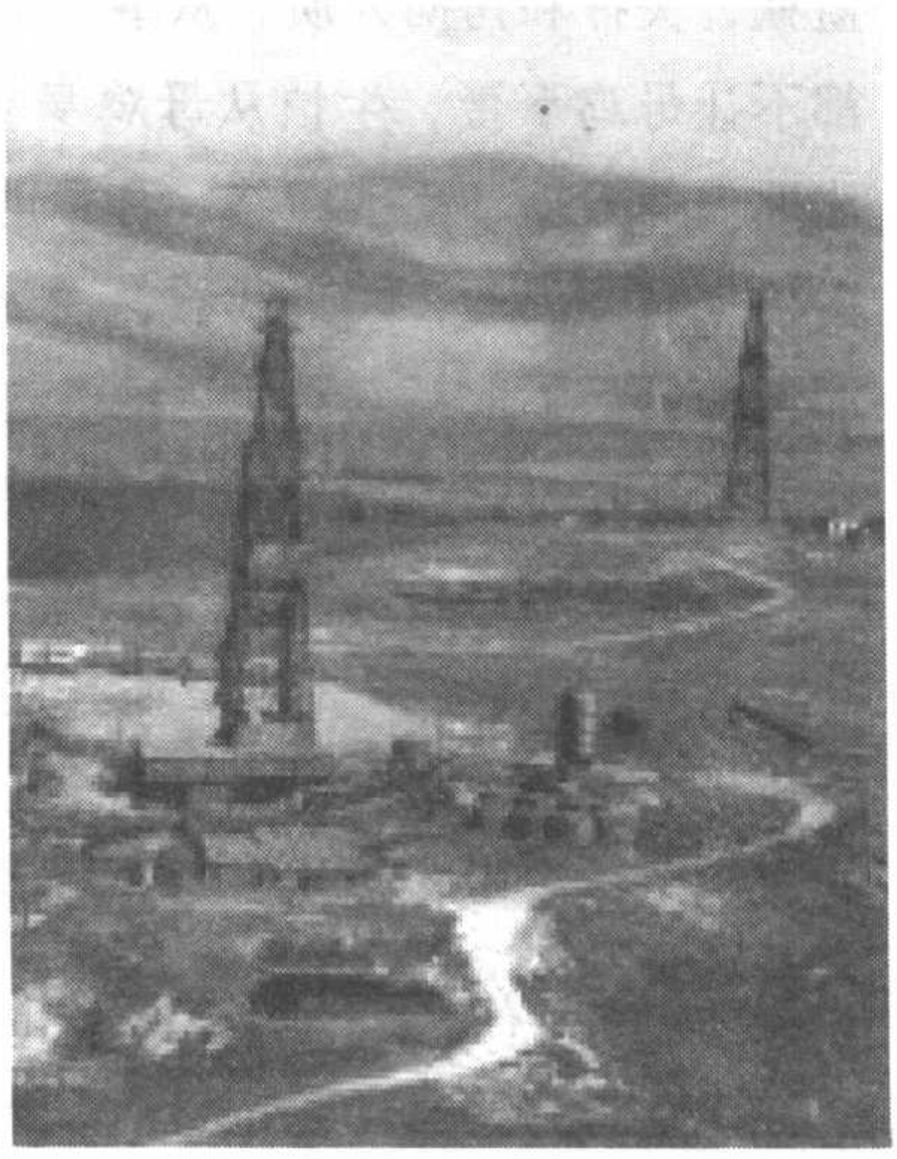
杜达耶夫一伙是一个以他本人为中心的、专门在经济上从事大肆掠夺和搜刮的集团。杜达耶夫的同族兄弟在车臣居民中的名声极为恶劣。曾经与杜达耶夫一起共事的人说，杜达耶夫的堂哥列奇·杜达耶夫是一个贪婪、凶狠之徒。在乔哈尔·杜达耶夫夺取政权后，由他担任格罗兹尼市长，而列奇·杜达耶夫的亲弟弟图罕·杜达耶夫（野战指挥官，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在防卫格罗兹尼的时候战死）则在自己的家里设立监狱，关押和拷问人质，从事“人口贸易”[11]。以至于当地人说，他们都不让母鸡下蛋，生怕从母鸡身上撸走一根毛[12]。杜达耶夫、扬达尔比耶夫等人煽动反俄情绪，称：与俄罗斯的冲突在所难免，号召车臣人卖掉牛马、家产，购买武器，而当大家听信宣传购买了武器之后，杜达耶夫却发起了取缔武器的运动。这就等于是对贫穷的车臣人的经济掠夺。在俄罗斯政府已经对车臣实行经济和交通封锁后，杜达耶夫却依旧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到俄罗斯的任何地方去，在自己家里用车臣的酒菜招待叶利钦身边的人[13]。巴萨耶夫则是一个具有宗教狂热，具有冒险家气质，甚至可以说是心智不够健全的政治人物。他在车臣各地种植罂粟和大麻，进行人口和毒品贸易，赚取巨额钱财[14]。他们都代表一些具体的利益集团。

杜达耶夫集团是一个具有明显经济特征的利益集团，而杜达耶夫的反对派则是另一些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基础或核心，则是车臣的一些特定家族或者泰普。他们把自己伪装为车臣民族利益的代表，实际

上只是一些具体家族利益的代表。这些有实力的集团将车臣的自然财富“私有化”，或者通过武装走私、贩卖人口、绑架人质等手段大发横财，成为所谓的“新车臣人”；而那些原本就贫困的人们更加贫困和无助。在分裂进程中，车臣社会发生了深刻分化：大约有1%的居民属于富有阶层；30%的人属于勉强过得去的；而其余的人则处于赤贫状态。一些人得到一切，另一些人则一无所有。

到90年代初，车臣的“影子资本”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等大城市很快合法化并站稳脚跟，并开始排挤投机金融贸易方面的竞争者；反过来，竞争者们则从合法的商业领域排挤车臣投机者。据估计，车臣方面从石油获得的利润，达数百万或千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都落入中介公司和为这些石油美元洗钱的银行。车臣境内敷设许多通向黑海沿岸港口的重要油气管道。1991年前，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每年开采石油4200万吨，加工量是1800万吨。1992年，虽然车臣已经宣布独立，但还是有大量俄罗斯油田的原油运到车臣境内等待加工，杜达耶夫并不打算归还这些原油，而是将其销到波罗的海国家和土耳其等国，赚取差价。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俄罗斯各地往车臣的石油管道运送的原油量已经大大减少，但还是持续到1994年车臣战争前夕。实际上，这些重要的自然财富在当时是无主的，因而就引起俄罗斯和车臣的实权人物的争夺。当时的俄罗斯副总理沙赫赖称杜达耶夫体制为犯罪体制，而车臣则是一个犯罪的自由经济区[15]。为了争夺石油所带来的巨额利益，俄罗斯中央与车臣寡头集团和政治精英发生冲突。

杜达耶夫本人行伍出身，而其追求分裂的步骤及其体制的特点也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考虑到车臣追求独立不可避免地会与俄罗斯发生冲突，杜达耶夫政府决定武装自己。在这期间，苏联驻北高加索军区的负责人曾经上交一份报告，建议立即将武器撤离车臣—印古什境外，以防落入车臣人手里。因为此前，在选举结束后杜达耶夫曾表示，要将所有的苏联财产国有化，包括苏联国防部的财产[16]。1991年11月，杜达耶夫已经开始行动。11月



车臣石油是政治斗争的战利品

8日，杜达耶夫武装占领强力部门，车臣内务部被缴械，大部分人员转向了杜达耶夫方面；同时，铁路、航空运输线路以及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军营都被封锁。

1991年11月5日，车臣武装分子潜入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克格勃大楼，偷去枪械2000件，子弹2000万发；到11月底，杜达耶夫武装的枪支数目达到3000件。1991年11月12日，车臣人占据了苏军382航空兵团的基地和汉卡拉机场，夺取了停放在那里的260架飞机。11月26日，杜达耶夫宣布：在原苏军基地的基础上，建立两个车臣自己的军事基地。

1992年初，杜达耶夫提出俄罗斯军队将所有军事装备留下，而将俄军全部撤走，遭到拒绝。于是，杜达耶夫开始行动。1992年2月初，杜达耶夫武装开始袭击俄罗斯军队的军营，同时抢夺武器弹药和一些装备。他们让妇女和儿童打掩护，潜入军营，偷走大批武器，只有大约20%的武器被空运出车臣。军队曾得到命令：不许抵抗，否则要被军法惩处。一部分武器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下令交给车臣方面的，还有一部分则是车臣方面花钱购买的。这样，车臣分裂派逐渐武装起来，用这些武器可以建立起一支常备军。1992年7月7日，俄罗斯军队从车臣撤出，车臣是前苏联地区。这是俄军最早撤走的地区。

在车臣武装的成型和强大方面，俄罗斯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93年，阿布哈兹想要脱离格鲁吉亚而独立，格鲁吉亚动用军队前往镇压，俄罗斯特工部门秘密帮助阿布哈兹，在人力上则借助于车臣人。许多车臣人从俄罗斯获得武器，并在俄罗斯接受军事培训。车臣的许多所谓“野战指挥官”，如沙米尔·巴萨耶夫等人就是在阿布哈兹的战斗中获得了军事技能和实战经验。

4. “车臣革命”的后果

杜达耶夫主导的“车臣革命”使车臣获得事实上的独立，标志着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高涨的车臣民族主义已经达到顶峰。车臣更改了名称，称为“车臣伊奇凯里共和国”。伊奇凯里为车臣东南部山区，传说是车臣民族的发祥地；还设计了国家的象征物：国徽、国旗、国歌，这些象征物照例表达了车臣人一贯的民族理想。国旗图案为绿、白、红三色，分别象征生命、自由和斗争。国歌的第一句是关于车臣人起源的传说：“我们出生在母狼产崽的那个夜晚”，而歌词内容特别表示了车臣人捍卫自由的决心：“自由或死亡，我们从中择其一。”国徽则是一只狼的

形象，是车臣等许多北高加索民族都崇拜的动物。车臣等民族崇拜狼图腾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信念：狮子和鹰象征着力量。但是，它们往往只进攻弱者，而狼是惟一敢于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动物的野兽。狼依靠自己的机敏、灵活、勇敢以弥补自己力量的不足。如果狼被打败了，就会静静地死去，没有恐惧、没有痛苦，并且在即将死去的时候，将脸转过来，对着自己的敌人。在阿瓦尔人中间，“短耳狼”是对勇士的最高称赞[17]。

“车臣革命”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追求分裂的车臣民族主义运动是苏联解体的一个环节，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其后果。作为一个独立于西方以外的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苏联社会主义体系，西方的说法是“苏联帝国”，共包括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同时也是苏联体系的核心环节，就是包括若干个省和自治单位，如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等在内的俄罗斯联邦；其外层则是各个加盟共和国；而其最后一环，则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西方称之为苏联的卫星国。这些环节互为表里，共同构成苏联的庞大阵营和体系。1989 年前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率先爆发政治地震，纷纷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存在几十年的社会制度，剧变导致苏联对东欧失去控制，而这是整个苏联社会主义体系的崩溃的开始。受到剧变的鼓舞，靠近东欧的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率先迈出独立步伐。随即，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也纷纷发表主权宣言。在俄罗斯联邦走向独立以后，境内的 21 个自治共和国也纷纷对俄罗斯联邦发表主权宣言，所有的行政主体都开始了主权化进程。由此可见，苏联的庞大体系是从外围到核心逐步走向分离、逐渐崩溃的，苏联解体是一个渐进过程，这一过程最早应该从 1989 年算起，而于 1991 年 12 月 25 日终结。但是，震荡余波还在。车臣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自治共和国，一个行政主体走向独立，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

俄罗斯哲学家费多托夫曾经说过：“共产主义专政崩溃之时，释放出俄罗斯的民族势力，同时也是巨大危险之时。崩溃无疑会释放出俄罗斯某些民族眼下被压制的分裂主义趋势。他们试图利用革命，借助外部敌人的帮助，脱离俄罗斯。能否顺利摆脱危机要看新政权的力量，政治上是否成熟以及他摆脱外来压力的自由。”他还认为，“革命巩固了所有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18]。”而苏联解体，就其对社会的强大的震撼、其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的影响和后果来看，不啻于一场深刻的革命，足可以将其同 1917 年十月革命相比较。而且，1917 年所存在的或者未解决的那些问题，在苏联解体的 1991 年以后仍然显现出来。有人认为，苏联

解体所掀起的民族分离狂潮，乃是完成了“1918 年到 1921 年的未竟事业”[19]。

按照国际法，苏联解体是由于分裂导致的，苏联的分裂也就导致苏联的国际人格主体消灭，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新主权国家，继承了原来（苏联）国家的人格主体，也就意味着它继承了母国的所有权利与义务[20]。各加盟共和国纷纷提出主权宣言，宣布了主权，而俄罗斯联邦的各自治单位也对等地对俄罗斯宣布了主权。俄罗斯联邦的另一个行政主体鞑靼斯坦也宣布了自己是拥有主权的国家。经过谈判与协商，双方签订条约，俄罗斯认可鞑靼斯坦具有下列一些重要权力：鞑靼共和国法院可以赦免犯人、参加外贸活动、参加政治组织的活动、与外国建立关系以及签署协议，等等；另一方面，也规定了鞑靼斯坦必须履行俄罗斯联邦的国际义务，类似于当初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在苏联的地位。鞑靼斯坦的危机通过立法得以解决，但是，车臣危机却没能以同样方式解决[21]。

在苏联这样的国家里，各地的政治精英往往具有特殊能量，他们利用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作为牟取私利的政治资源。杜达耶夫等人发起的分裂运动，实际上将车臣人民引上一条通往灾难的道路。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政治利益，杜达耶夫集团在政治上铤而走险，采取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步骤，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即最终走向完全独立，而这样做必然会导致与俄罗斯的对抗。

从积极的意义上，但只在很小的程度上理解“车臣革命”，那么，从俄罗斯分离，预示了车臣民族走上另一条发展道路。苏联崩溃，表明了从前发展道路的失败。而车臣摆脱苏联崩溃这种恶劣形势的出路，要么是与俄罗斯实现一体化，要么是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杜达耶夫等车臣民族精英主导下的“车臣革命”和义无反顾地走上追求主权独立的道路，也具有避免苏联解体消极后果的色彩。当然，作为一个后进民族，其政治创造性有限，而其领导人的政治理念是乌托邦式的。在 1994 年之后，俄罗斯境内几乎所有行政主体都有类似车臣的意愿，都曾向中央要求主权，但是，车臣却是惟一一个采取激进步骤的共和国。

从后来的发展进程来看，车臣追求分裂所导致的后果是悲剧性的。车臣民族并没有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相反，却变成少数政治精英和利益集团手中的政治筹码，并在冲突中蒙受巨大损失，元气大伤。车臣民众的民族意识虽受到俄罗斯帝国以及苏联时期车臣民族遭受的苦难的历史记忆的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政治领导人的误导和

煽动。历史记忆仍旧需要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来触动和引发。安德森曾经提出，民族是一个想像出来的社群：“这样的社群是想像出来的，这是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国家，绝大多数的成员也是彼此互不了解。他们也没有相遇的机会，甚至未曾听说过对方。但是，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却存在着彼此共处一个社群的想像。”[22]由于现代化以及大众媒体的推动，从而使得人群联系紧密，并在想像中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共同体。这一观点在解释车臣的民族主义时，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还有人说，民族主义产生于民族之前，即先有民族主义，后有民族。在车臣，民族主义是一种动员群众的意识形态，“民族是一个政治口号和动员的手段，而根本不是一个科学的范畴”[23]。政治精英的鼓动、媒体的灌输，对于车臣的民族主义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车臣分裂运动，只是杜达耶夫等车臣民族精英与俄罗斯政治家之间进行的政治豪赌，一场游戏，而人民则只是赌注和牺牲品。

杜达耶夫号召车臣人为了“摆脱奴役地位”和抽象的“自由”而战斗，称：“那些不想摆脱奴役地位的奴隶，理应受到双重奴役。”尽管为此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即使有70%的车臣人死去，而30%的车臣人将会得到自由。”[24]从各方面来看，车臣的武装志愿者们类似一些暴徒，恰恰是他们完成了车臣“革命”的“粗活”和脏活。车臣分裂运动具有激进、极端的性质，且伴随着暴力和强制，甚至建立起了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可观的武装。这样，追求民族“独立”就将导致不可预见的，甚至是不祥的后果。

另外，自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伊朗发生革命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将穆斯林民族在“伊斯兰复兴”的口号下联合起来。这个潮流是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两面旗帜之下展开的，同时伊斯兰教也越来越政治化、激进化或者极端化。从英国伦敦到中国新疆，甚至北美大陆，在美国的纽约等大城市，都有穆斯林社区。一些伊斯兰国家支持车臣的政治独立活动，目的在于将伊斯兰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建立起一个未来的穆斯林联盟的核心。车臣的“革命”正好迎合了这种潮流，或者说，“车臣革命”正好为沙特、土耳其、印度尼西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提供了一个契机，他们渴望在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外建立起一个伊斯兰共同体，车臣成为国际伊斯兰激进派别实践自己乌托邦的现成的“试验场”。有人说，即使没有车臣，也会制造出一个车臣来[25]。在巴勒斯坦、阿富汗，凡是有社会和政治冲突的伊斯兰地区，总是有国际上的伊斯兰势力卷入其间，站在同信仰者的一

边作战。在与俄罗斯持久冲突的条件下，车臣变成一个设在俄罗斯境内的“国际恐怖主义”基地[26]。

车臣危机乃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联邦境内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的一部分，是民族危机和民族纠纷发展的极端表现。俄罗斯仍旧如苏联一样，拖着巨大的民族问题的包袱。车臣危机以及后来的车臣战争也是俄罗斯民族苦难的缩影。历史上俄罗斯民族苦难深重：鞑靼蒙古人侵、农奴制、内战、斯大林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解体等等。从俄罗斯的政治、战略利益考虑，车臣危机还标志着俄罗斯在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民族政策的彻底失败。如果车臣走向分裂成为事实，将在高加索地区出现一个强大政权，甚至成为高加索地区的“盟主”。高加索地区本来就是俄罗斯控制最薄弱的部分，车臣的分裂行动正好符合外国反俄罗斯势力的利益，反俄势力有可能借机插手进来。

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曾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苏联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并顾及了他们不同的历史经验和民族意识，在带动落后民族共同走向经济社会进步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苏联实行民族自治政策，一个占多数的主体民族通常就可以成为一个行政主体，并用该民族的名称命名该行政主体，常常会进一步强化该民族的民族意识。如果对这些民族地区的行政主体走向分离缺乏法律约束和现实的威慑力量，那么，当一些民族精英为了私利而发起分裂运动时，中央政府就会无能为力，局面就会失控，就难免会出现诸如车臣那样的危机，甚至导致战争悲剧。因此，在俄罗斯有人认为：关心自己主权和国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应该不是以民族为基础建立行政主体，而要尽力消除类似行政主体的民族色彩。十二月党人的著名思想家彼斯特尔最早提出这种思想。现在，这种思想又在一些俄罗斯政治家和学者中引起回响。在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中，必须保持一个足够强大的中央政府，防止民族精英或地方的精英人物发难，使国家面临分裂和混乱局面；而且要建立起符合历史传统和政治现实的政治、法律制度，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使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融入共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

危机各阶段

1. 从对抗走向战争

在车臣事实上脱离了俄罗斯控制之后，俄罗斯政府内部一直有两种

意见：一派主张通过谈判，建立邦联体制；另一派则倾向于用武力解决。在俄罗斯军队开入车臣之前，杜达耶夫与俄罗斯政府代表从1992年直到1994年曾举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俄罗斯与车臣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晤，有几次甚至是政府级会晤。1992年底，双方拟定了一个条约文本，该文本得到俄罗斯联邦法律机构和行政机构的认可。当时，俄罗斯政府正将注意力集中在鞑靼与俄联邦关系的问题上。种种情况表明，当时要求用军事手段解决车臣危机的力量，所谓主战派似乎占了上风。1992年，印古什和北奥塞梯发生流血冲突，俄罗斯政府介入调解，军队受命开抵车臣边境。随后，在国家杜马的一次会议上，总理盖达尔说，联邦军队已经做好开进车臣的准备。只是由于他个人的坚持，才将业已作出的决定废止了[27]。俄罗斯政府对车臣实施经济、财政、政治、信息等方面的封锁，并沿车臣周边的俄罗斯行政主体印古什、北奥塞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达吉斯坦等地布置军队，作为对车臣的威慑，而在未划界的车臣—印古什边界则集中大批军队，并一度向车臣方向推进。

1993年7月底，俄罗斯政府提出：如果车臣作为俄联邦成员留在俄罗斯范围内，联邦中央将给予车臣以特殊地位（比鞑靼获得的自主权还要多），但是，车臣议会却加以拒绝。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举行新议会选举，车臣没有参加。

另一方面，杜达耶夫方面曾提出，要求叶利钦亲自与杜达耶夫会晤谈判，俄罗斯政府则予以拒绝（实际上，军方势力对这种会晤加以阻



1992年，杜达耶夫的支持者在总统大楼前的广场上举行集会游行。

挠），并且表示：车臣当局必须首先承认自己是俄联邦行政主体，服从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28]；俄罗斯政府派副总理沙赫赖与车臣当局谈判，车臣方面表示不愿将他作为谈判对手。俄罗斯政府从这一态度中看出，杜达耶夫不愿意用协商对话的途径解决问题。同时，杜达耶夫还下令驱逐车臣的所有俄罗斯记者和和平组织的代表，表现得鲁莽，缺乏政治才干和技巧。

在这期间，俄罗斯政府一边向杜达耶夫施压，促使其坐下来谈判；一边开始采取其他策略，试图假手反对派，从内部推翻杜达耶夫体制。1993 年 6 月 5 日，车臣就共和国法律地位问题举行全民公决，杜达耶夫的反对派在格罗兹尼中央广场举行集会，抗议杜达耶夫政权，结果被忠于杜达耶夫的武装驱散。同时，杜达耶夫武装还攻占了不支持杜达耶夫政策的市议会和警察局，为此发生了流血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

在车臣政治反对派遭到失败之后，又有军事反对派向杜达耶夫发难。1993 年 12 月 16 日到 17 日，车臣志愿军的指挥官们包围了杜达耶夫的府邸，要求在 1994 年 3 月底举行议会选举；但是，反对派没有采取果断行动，实际上等于是自我推翻了抗议行动。1994 年 6 月 4 日，在那德捷列克河区召开了车臣民族代表大会，有 2056 名代表参加，大会认可反对派的政治组织“临时委员会”为车臣最高国家政权机关，并要求杜达耶夫辞职；宣布至迟不晚于 1994 年 8 月举行车臣共和国国家政权机关选举。

1994 年夏天，车臣发生了第三次恐怖事件之后，俄罗斯政府主要寄希望于扶植反杜达耶夫的武装派别。6 月 2 日，鲁斯兰·拉巴扎诺夫攻击格罗兹尼广播大楼；6 月 12 日，反对派举行集会，向杜达耶夫提出政治要求。13 日，杜达耶夫武装攻占了鲁斯兰·拉巴扎诺夫的基地，数十人伤亡。8 月 11 日，车臣进入战备状态，并进行动员。在 1 个月之内，杜达耶夫的支持者和反对派之间互有胜负。8 月 17 日到 20 日，反对派领袖阿弗图尔汉诺夫领导下的“临时委员会”武装试图控制格罗兹尼，遭到失败。9 月 5 日，鲁斯兰·拉巴扎诺夫的部队被杜达耶夫武装消灭。同一天，北高加索军区通过内务部向反对派提供了 10 辆装甲车和 6 架军用直升机。20 日，阿弗图尔汉诺夫称：要用武力推翻杜达耶夫体制。9 月 27 日，杜达耶夫军队进攻反对派失利，反对派袭击了格罗兹尼近郊，杜达耶夫武装退却。10 月，反对派武装在俄军中接受训练。11 月 1 日，北高加索军区向反对派提供 40 辆坦克。11 月 17 日，“临时委员会”准备最后一次进攻。大批俄军军官从莫斯科飞往莫兹多克，伏尔加格勒第八军区副指挥员茹科夫直接指挥行动。1994 年 11 月 26 日，“临时委员

会”的武装1200多人，50多辆坦克、80辆装甲车、6架苏-27战斗机，从四面包围了格罗兹尼，但是遭到伏击，死伤惨重。500多人被打死，20多辆坦克被击毁，杜达耶夫方面甚至俘获了反对派的大批武装人员，主要是俄罗斯军人，并于11月28日在格罗兹尼游街，作为“战胜反对派力量的纪念”。车臣领导人称：被俘的14人都是俄罗斯军人，并提出了名单；在电视转播时，这些俘虏承认：他们多数来自驻扎在莫斯科近郊的部队。俄罗斯国防部则答复说，上述人员早已不在俄军服役，或者就说这些人是逃兵、志愿者。杜达耶夫方面借此大做文章，俄罗斯政府越辩越丑，陷入被动。杜达耶夫充分利用了俄罗斯俘虏问题，作为逼迫俄罗斯与其谈判并承认其合法地位的筹码，而被俘的俄罗斯军人的命运就取决于俄罗斯政府对车臣走向分裂的立场。该事件扭转了对杜达耶夫的不利局面，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事后获知：最初，许多车臣居民看到“反对派”有如此实力，能够组织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在静候事态发展，甚至在准备面对政权更换的事实；但是，当他们发现，从坦克里钻出来的是俄罗斯军人时，就认识到这是俄罗斯的“侵略”，开始转而同情和支持杜达耶夫[29]。俄罗斯政府假反对派之手，从内部推翻杜达耶夫体制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一时间，对杜达耶夫无计可施。

与此同时，俄罗斯领导人还获知，杜达耶夫正在主持制定一个可怕的计划：“套索”行动，即对俄罗斯腹地实施破坏，包括空中轰炸等。这些情况让俄罗斯领导人判定：杜达耶夫有巨大的战争潜力，若不动用武力，恢复车臣秩序是不可能的。

关于车臣战争的内幕，至今仍有许多不解之谜。当年的政治明星，一个政治怪物列别德曾经说了许多怪话，也许可以对我们今天认识这一问题提供某些启示。

按照列别德的说法，叶利钦作出入侵车臣的决定，原因还在于：掩盖已经腐蚀到军队上层的贪污腐败。1991年到1994年间，俄罗斯西部集团军在黑市上变卖军事物资，主要卖到正在爆发内战的塞尔维亚和霍尔瓦蒂。这些甚至连格拉乔夫在内的高级将领都卷了进去的丑闻影响了俄军的声誉。因此，俄军西部集团军迫切需要在某处发动一场大战，消耗大批军火，将这些军火空缺算作战争损耗，掩盖丑闻[30]。

而另一方面，当车臣被俄罗斯军队从四面包围的时候，杜达耶夫曾几次要求会见叶利钦，但不知为何却没能实现。杜达耶夫当时曾说过：看来，有人需要一场战争[31]。实际上，这时的俄罗斯政府对于战争已经下了决心，形势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从1994年11月到12月14日，俄罗斯政府和车臣当局就使局势正常化问题在弗拉季高加索举行谈判。俄罗斯方面提出两个条件：解除车臣民众的武装，解散非法武装，并建立一种解除武装的机制；同时，俄罗斯方面也将武装力量撤出车臣。杜达耶夫方面提出的先决条件是：俄罗斯政府必须首先承认车臣是一个独立国家。这样，双方无法达成妥协。11月29日，即俄罗斯支持的“反对派”军事行动遭到失败后第2天，俄罗斯安全会议通过决议，对车臣发动军事行动。11月30日，叶利钦签署命令：解散车臣武装或予以消灭，俄罗斯武装力量已经在准备军事行动。1994年12月1日，俄罗斯空军开始轰炸格罗兹尼。12月5日，俄罗斯军队已经在莫兹多克、基兹里亚尔、弗拉基高加索方向集结完毕。12月6日，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与杜达耶夫举行谈判。在俄罗斯政府已经做好发动军事行动的准备的情况下，与杜达耶夫的谈判就只具有象征意义。格拉乔夫称：车臣问题最终解决，要等到12月8日召开的安全会议作出决定。实际上，格拉乔夫、叶林等国防部高官飞抵莫兹多克，只是为了就近准备和指挥即将发动的军事行动。两个苏联将军的谈判，完全是按照军人的方式进行的。在谈判破裂之后，格拉乔夫说：我们打仗吧！而杜达耶夫也表示：那就打吧！随即，同时喝掉一杯香槟，将酒瓶摔在地上，双方不欢而散[32]。

这时，在争取释放被俘俄罗斯军人的问题上，俄罗斯国防部部长巴维尔·格拉乔夫与以亚夫林斯基为首的国家杜马议员代表团正展开竞争，都表明自己关心俘虏的生命安全。当议员代表团与杜达耶夫就人质问题基本上达成协议的时候，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代表给杜达耶夫打电话，要求后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俘虏交给民主派，因为他们只想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到12月14日，双方终止了谈判。

2. 第一次车臣战争

在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之前，车臣方面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从杜达耶夫夺取政权之后，分裂派就开始建立军事化体制。1991年11月8日，杜达耶夫发布命令，设立军部，所有武装部队隶属军部。车臣《总统活动法》规定：车臣的一切武装力量都服从总统。车臣军队的指挥人员主要是原苏军军官，如马斯哈多夫等人，许多人还有在阿富汗等地的实战经验。

1991年12月24日，车臣《国防法》规定：车臣的所有男性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并征召19岁到26岁的男性青年服兵役。1992年2月

17 日，杜达耶夫发布命令，原驻车臣境内苏军中的车臣籍逃兵，如愿意参加车臣军队，可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还征召预备役军官。1991 年到 1994 年期间，共征兵动员 6 次。车臣政府计划在各地建 4 个军团，人数为六千人。同时开设了一个军校，培训军官，有 700 多人受过培训。除了民族近卫军以外，还有总统卫队、内务部队、民兵、自卫队等。杜达耶夫还从各国招募雇佣军，选拔有山地战和城市作战经验的人员。到俄罗斯—车臣武装冲突前，车臣军队已达到 15000 人，总统近卫军 2000 人，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门人员 3500 人；民兵达 40000 人，已经是一支战斗力强大、致命的武装力量；而且，车臣军队组织良好，有很强的战斗力。这是杜达耶夫与俄罗斯政府对抗的物质基础。

车臣分裂派拥有许多轻重武器。从 1991 年到 1994 年期间，车臣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大批武器：从独联体、国外购买；从俄罗斯国防部获得；自己制造。1992 年 5 月 28 日，按照巴维尔·格拉乔夫的命令，车臣境内武器装备的 50% 转交给杜达耶夫。但实际上，80% 的军事装备和 75% 的枪械转交车臣武装或被车臣武装夺取。车臣甚至还有一批捷克生产的教练机，但是，在战争初期就被俄空军击毁在机场。

在战争初期，俄军参战兵力为 23800 人，到 1994 年 12 月底增加到 38000 人，拥有大批重型武器，空中力量具有绝对优势。

1994 年 12 月 11 日 7 时，联邦军队进入车臣，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

第一次车臣战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4 年 12 月到 1995 年 5 月，联邦军队攻占格罗兹尼、阿尔贡、沙里、古杰尔梅斯、阿奇霍依—马尔坦等重要城市和居民点。

12 月 31 日，俄军开始进攻格罗兹尼。车臣武装早已做好准备，守卫格罗兹尼的车臣战士达 10000 人。每个防守地段都建立了武器、粮食和医疗用品库。这些车臣战士士气很高，誓死保卫格罗兹尼和杜达耶夫。此前，俄军以为车臣军队只有 5000 人。俄军中下层军官甚至连格罗兹尼地图都没有；或者用的是 1980 年的旧地图。车臣军队等俄军的装甲车进入，随即开始集中火力进攻。当天，俄军 131 大队在麻痹大意的情况下遭到 1000 多名车臣武装的伏击，损失惨重。包括 131 大队指挥员萨文在内的多名俄军指挥官阵亡或受重伤，100 多名军人被俘。俄军攻城受阻。1 月 7 日，俄军改组为两个集群：“西部”集群和“北部”集群，并再次从西部和北部发起进攻。18 日，俄军两个集群在市中心会合。18 日夜里到 19 日，俄军攻陷车臣总统府。从 20 日开始，双方以松日河为界对峙。1 月 26 日，双方在哈萨维尤特首次交换战俘。

2月13日，俄军指挥官与马斯哈多夫约定休战，在格罗兹尼交换战俘名单，寻找和转运阵亡者的尸体，一直持续到19日。2月底到3月初，部分俄军开始对车臣西部开始进攻。3月6日，俄军占领了黑河区——车臣军队据守的格罗兹尼最后一个区。尽管遭到抵抗，但俄军仍然按照预定计划推进。在进攻格罗兹尼的战斗中，俄军蒙受了巨大损失：阵亡军人达1500多人，受伤军人达5000多人，是一次空前重大的失利[33]。攻占格罗兹尼并不意味着主要战斗已经结束，而是意味着战斗形势变得复杂化、长期化。俄军必须面对车臣山民向来擅长的山地游击战。对于征服车臣来说，攻占格罗兹尼的军事价值和战略意义是微乎其微的。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对于车臣人来说，车臣首都格罗兹尼并非他们心理上的最后防线，在他们心目中，车臣的象征不是城市，而是群山[34]。

从1995年初到6月，俄军占领了车臣境内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与此同时，俄军也付出沉重代价。3月10日，俄军开始进攻巴穆特村，3月23日攻占阿尔贡市。3月28日，马斯哈多夫试图同俄军指挥官库利科夫和谈，但是遭到拒绝。30日、31日，俄军攻占古杰尔梅斯和沙里。4月7日、8日，俄军攻占了萨马什卡、达维登科、新沙罗依等地。叶利钦宣布在4月28日到5月18日期间休战，庆祝卫国战争胜利；但是，实际上从没停止交火。5月10日，杜达耶夫表示准备研究俄罗斯政府关于停止冲突的提议。就在休战期间，俄军伤亡达数百人。到此为止，第一阶段战事结束。

第二阶段：1995年5月—1996年8月。在该阶段，双方之间的阵地战已不多见，车臣武装化整为零，与民兵和自卫队一起在车臣境内外发动游击战。车臣武装装备了大量轻武器和反坦克武器，纪律严明，熟悉地形地貌，机动性强，对每次军事行动都精心策划，每个战士的职责都很明确。对抗双方对重要村镇和城市展开争夺，许多情况下都是几次易手。同时，在正面作战失利的情况下，车臣武装开始采用劫持人质等恐怖手段。

5月18日，休战期结束，俄军加紧进攻。车臣武装采用新战术，出现了一些专门执行恐怖行动的小分队。

俄军向车臣山区挺进。6月3日，俄军攻占车臣军事要地维杰诺；6月13日占领沙托依和诺扎依—禹尔惕。6月14日，巴萨耶夫等人在布琼诺夫斯克劫持1500名人质，要求俄军停火并开始和谈。17日，俄罗斯安全部门发动强攻，但是没有成功。同时，车臣武装开始进攻格罗兹

尼。6 月 18 日，俄罗斯政府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与巴萨耶夫谈判，巴萨耶夫释放大部分人质，双方并达成协议：在车臣停火并谈判。6 月 19 日，巴萨耶夫乘坐俄罗斯政府提供的汽车，利用部分人质做挡箭牌回到车臣。

1995 年 6 月 19 日到 22 日，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调停下，双方开始了第一轮谈判，达成协议，延长休战期限。27 日到 30 日，又开始了第二轮谈判，并达成原则性协议：交换战俘；解散车臣武装；俄军撤出车臣；车臣举行自由选举。

7 月 1 日，格罗兹尼谈判确定：1995 年 11 月 5 日举行车臣选举。7 月 24 日，在欧安组织的主持下，开始了第三轮谈判。29 日夜到 30 日，双方就军事问题达成协议，规定：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建立专门的观察委员会，罗曼诺夫和马斯哈多夫共同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交换战俘和其他被强行扣押的人员；解散非法武装和俄军分阶段撤出车臣；停止恐怖行动和破坏行为。

但是，双方都没有完全执行协议。8 月 18 日到 19 日，俄军围困阿奇霍依—马尔坦村，经谈判后得到调解。21 日，一支车臣武装进入阿尔贡，占领了区警察局，随即被俄军逐出。9 月 20 日，俄罗斯总统驻车臣代表奥列格·罗波夫在从格罗兹尼前往“北方”机场的途中被刺杀。9 月底，俄军包围了阿奇霍依—马尔坦村和谢尔诺夫斯克，原因是这些村里有车臣战士；车臣方面坚称其中是“自卫队”。10 月 6 日，在“米努特卡”广场，俄集群司令员罗曼诺夫将军被袭身亡，谈判从此终止[35]。10 月 9 日，俄罗斯方面不再参加谈判，军队受命恢复军事行动，继续解散非法武装的行动；从 10 月 11 日开始，车臣方面也停止履行协议。

俄军更多地动用空军对一些重要村镇进行轰炸。12 月 14 日，车臣武装甚至占领了许多村镇和居民点：沙托依、古杰尔梅斯、乌鲁斯—马尔坦。俄军的军事行动一时受挫，10 月 27 日俄军 506 摩托化团撤离维杰诺地区。12 月 15 日，萨尔曼·拉杜耶夫率部占领了古杰尔梅斯。经过激战，俄军于 12 月 25 日夺回了古杰尔梅斯。

1996 年 1 月 9 日，拉杜耶夫率 400 多人袭击了基兹里亚尔的军用机场，劫持了 1500 多名人质，盘踞在市医院。恐怖分子携 100 多名人质试图回到车臣，遭到打击后撤回到了五一村，俄军将该村包围起来，但恐怖分子最终脱逃。

2 月 22 日到 23 日，俄军对印古什境内用兵。在经阿西诺夫峡谷前往巴穆特村时，遭到当地车臣人袭击，被迫停止前进；印古什总统阿乌舍夫发出强烈抗议。26 日，俄军撤离阿西诺夫峡谷。此后，一直对巴穆

特村进行空中打击，但是没能控制该村。俄军在维杰诺、达尔哥等地进展顺利，同时在车臣西部的老阿奇霍依、奥列霍沃、巴穆特展开了阵地战。4 月 16 日，俄军 245 摩托化团在山路上遭到哈塔布率领的车臣武装伏击，伤亡 100 多人。4 月 17 日，马斯哈多夫和莫弗沙耶夫率领 350 多人进入沙里，并宣布沙里为车臣新都。19 日，俄军将沙里包围；5 月 6 日，联邦军队未发一弹进入沙里[36]。俄军一直寻机消灭杜达耶夫。1996 年 4 月 22 日，俄军根据其所使用的卫星电话确定其所在位置，用导弹将杜达耶夫击中，杜达耶夫不久死去。但是，杜达耶夫身亡对于俄罗斯控制车臣局势来说毫无实质性意义，并没有打乱车臣武装的有组织对抗，局势并没有因此而向有利于俄军的方向发展。按照车臣宪法，杜达耶夫死后，立即由其副手泽里木汗·扬达尔比耶夫接替。



杜达耶夫遗相

5 月 7 日，俄军占领格依村，随即控制了乌鲁斯—马尔坦。5 月 19 日，俄军开始进攻巴穆特村，并于 24 日将其攻占。5 月 27 日，扬达尔比耶夫率代表团抵莫斯科，与叶利钦谈判，同意从 6 月 1 日开始停火并交换俘虏。29 日，马斯哈多夫下令：近期不得采取军事行动。6 月 4 日到 6 日，在莫斯科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在纳兹兰继续谈判，规定：解除对居民点和道路的封锁，交换俘虏及被强行扣押的人员；关闭检查站；解散车臣武装；之后才可举行大选。6 月 9 日到 11 日，开始落实纳兹兰协议：从 6 月 11 日到 7 月 7 日，俄军必须把道路上的所有工事拆除；从 7 月 7 日到 8 月 7 日应该解散车臣武装；俄军预计在 8 月 30 日之前完全撤离。但是，6 月 19 日，双方在阿尔汉—禹尔惕发生冲突。20 日，马斯

哈多夫发布命令：在俄罗斯总统第二轮选举结束前，不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6月25日，叶利钦发布命令：在9月1日前分阶段从车臣部分撤军。6月28日，245摩托化团首批撤离。7月1日，车臣指挥部门称：打算在7月7日之后采取防卫性措施，因为俄军没有拆除一个工事。7月3日，双方最后一次会晤，商讨解决军事问题；但是毫无结果。

第三阶段：车臣武装恢复了在山区的行动，并出其不意地占领了格罗兹尼，俄罗斯政府与车臣方面签署和约，战争结束。

8月6日5点50分，车臣武装突然进入格罗兹尼；此前驻守的1500多名俄军以及内务部军队在另一些村镇行动，得知消息后迅速向格罗兹尼推进，但为时已晚。猝不及防的市内俄军、警察部队被围困在市中心的行政大楼里，双方开始了街巷战和阵地战。格罗兹尼市中心的战斗最为惨烈。警察部队从城中撤离，退往俄军基地。来自郊外汉卡拉机场的俄军赶来驰援，试图突入城中解救被困俄军，但是伤亡巨大。到8月10日，车臣武装已经控制了市中心的主要街区和要道。在格罗兹尼防卫战中，俄军伤亡数千人。8月14日，俄军司令普利科夫斯基与马斯哈多夫会晤，协议从14日起在车臣全境停火；但是，一些指挥官拒绝执行命令。

8月15日，列别德抵车臣，与马斯哈多夫和扬达尔比耶夫谈判。8月17日，普利科夫斯基将军发布命令，在车臣全境停火，并要求车臣武装离开格罗兹尼，随即俄军对格罗兹尼恢复炮击。8月22日，列别德和马斯哈多夫签署文件，规定冲突双方脱离接触，共同控制格罗兹尼的某些区。8月28日，古杰尔梅斯、阿尔贡、沙里被车臣武装控制。8月30日，列别德和马斯哈多夫在哈萨维尤特签署联合声明，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

从1994年12月到1996年8月，俄罗斯与车臣的武装冲突持续了将近两年时间。俄罗斯军队在车臣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即第一次车臣战争几乎是以俄罗斯政府无条件撤军而告终。俄军付出了巨大代价，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为了大选需要，叶利钦责成列别德将军尽最大可能与车臣达成和约。在列别德与马斯哈多夫签署的《哈萨维尤特协议》中规定，俄罗斯军队完全撤出车臣，仅仅留下两个师作为常驻军队；相反，解散车臣武装的问题却没有提及。也许，与此相关的规定仅仅是："在与犯罪现象、恐怖主义、民族和宗教敌对行动的斗争中，采取协同措施。"[37]惟一的政治成果就是：搁置有关车臣政治地位的问题，于5年以后的2001年12月31日举行全民公决。

协议对于俄罗斯政府无疑是极为不利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表声明，称列别德超越了权限，“给俄罗斯带来了沉重的损失”；此后列别德就从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俄罗斯政府从政治和道义上都遭到了全面、重大的失败。正如一位作者所说，俄罗斯总统、政府和俄罗斯军队遭到惨重失败，但是并非败在车臣战士的手里，而是败在自己的议会、媒体、人权派及他们所制造的社会舆论——不单是本国舆论，还包括国际舆论[38]。社会舆论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俄罗斯的政治决策与行动，表明当代俄罗斯政治生活的某些特点。的确，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即使付出巨大代价，俄罗斯终究能够取得战役上的胜利；然而，即使取得了军事胜利，俄罗斯在政治上仍然遭到失败。

3. 俄罗斯为何遭到挫败？

俄罗斯政府之所以遭到重大失败，首先在于：俄罗斯政府对于在车臣的军事行动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俄罗斯政府没有切实地认识到，车臣危机是一个政治问题，归根结底要政治解决，而军事途径只是其辅助手段。政治谈判没有达成妥协，草率地作出出兵决定，无疑是一个重大错误；更为糟糕的是，军事行动的结局出乎意料——俄罗斯军队损失惨重，且迟迟不能控制局面。而军事行动的挫折，直接决定了俄罗斯政府在政治、战略上的失败，政治解决车臣危机的机会丧失。

军事上不能速决，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总体上说，车臣武装占尽天时、地利，甚至还有人和；而相应地，俄罗斯政府方面则几乎正好与此相反。

几年之后，当叶利钦从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谈到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时候，承认对这一问题的出现有些措手不及，而且俄罗斯政府的决策者们曾犯了错误。当时，许多政界人士关于车臣的情报不足、或视而不见，认为杜达耶夫依靠一些车臣氏族的力量，而这些氏族内部也在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俄罗斯可以借助反杜达耶夫的力量，并在必要时利用特工，但似乎车臣内部的反对派用“合法”手段就能将杜达耶夫推翻[39]。俄罗斯政府利用一些所谓的“志愿人员”，发起了反杜达耶夫的行动，但却遭到挫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使许多车臣人更加认为车臣当局的行动是合法的，那些反对杜达耶夫政策的人们在民族同仇敌忾情绪的驱使下，转而支持分裂行动。

俄罗斯军方同样犯了严重错误。车臣武器装备精良，人数众多，训练有素，士气高昂，而且早有准备。而按照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当时俄

罗斯军队，包括那些位高权重的将军们将在车臣的军事行动视为儿戏，认为只要军队“进入格罗兹尼，对天放上两枪，一切就结束了”[40]，没有人对军事行动会迅速成功表示怀疑，甚至在最初，许多人并没有做好作战的心理准备。当时，人们在心理上觉得，不论是俄罗斯人还是车臣人，我们都是苏联人，而多半只是将军队开进车臣视为展示实力[41]。俄罗斯军方对杜达耶夫武装的实力和抵抗决心没有足够重视，对车臣状况严重缺乏了解和资讯不足，甚至连杜达耶夫武装力量的人数都没有弄明白，其决策过程之草率令人难以置信。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后来回忆说，当时所谓的民族事务专家介绍情况时说，有70%的车臣居民期待俄罗斯军队介入，其余30%的居民则持中立态度；但是，实际情况则是：俄罗斯军队开进车臣，勾起了车臣人关于沙皇俄国征服、1944年流放等历史记忆，许多车臣人，甚至连最远离政治的人们都拿起武器，反抗俄军[42]。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俄罗斯政府方面来说，与车臣武装的战争就成为“出乎意料的战争”。俄罗斯政治家和将军们对于军队开进车臣以后出现的复杂形势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可以说是措手不及。对于苏联解体以后新组建的俄罗斯军队来说，车臣武装的作战特点是难以适应的，是一次全新的经验。

双方对于武装冲突的态度完全不同。对于车臣人来说，俄罗斯军队开进车臣就是为了征服车臣民族，剥夺他们所珍爱的自由，破坏和干预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掠夺他们的自然财富。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几乎所有原来杜达耶夫的反对者都在转眼间转向了杜达耶夫方面；支持杜达耶夫政权的，甚至还有俄罗斯族居民。在俄罗斯军队进入车臣之前，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所有车臣人拿起了武器，学习射击。对于俄罗斯军队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车臣武装的作战目的很明确：与俄罗斯军队作战乃是为了反抗异族入侵，是捍卫自己的土地和亲族的神圣权利，其抵抗决心是坚决的。同时，俄罗斯军队对车臣居民点的轰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也引起了车臣人的愤怒。由于车臣社会保留血亲复仇的传统，因此，许多普通民众拿起武器，成为可怕的复仇者。俄罗斯军队开进车臣是为了“恢复宪法秩序”，执行所谓的警察行动，遭遇的却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时期推行的所谓“改革”和“新思维”也深刻地影响了军队，苏联军队也开始了从思想、意识上的涣散，甚至瓦解的过程。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军队作为苏联的遗产，在各个前加盟共和国之间加以瓜分，而这就等于是将一支强大的军队摧毁了。独立以后，俄罗斯组建新的军队，这些军队继承了苏联军队的所有

缺点，又受到解体后俄罗斯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消极影响，从士气、斗志等各个方面来看，都已不堪一击。他们缺乏明确的概念和目标：不知在为了什么而作战，而且，在新组建的俄罗斯军队中，许多将官的专业训练和专业技能都很差，从而导致在对车臣的军事行动中，俄军在指挥和决策上都有许多失误。

实际上，对车臣武装的军事行动，注定就不可能速决。由于不能迅速取得军事成果，舆论对俄罗斯政府就愈加不利。如果俄罗斯不能迅速阻止车臣的分裂进程，那么，就越加表明：似乎车臣武装真正是在为追求正当的民族权利而战。由于军事行动旷日持久，且难免伤及无辜，舆论压力日益增大，俄罗斯政府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没有得到国内的应有支持，处境非常被动。国内的许多政治派别借机发难，社会发生了分裂，再加上西方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舆论压力，致使俄罗斯政府无法将战争进行下去。许多失踪的俄罗斯士兵的母亲自行前往车臣和高加索，寻找自己的儿子；俄罗斯人权组织则成立了“士兵母亲委员会”，对失踪士兵的家属提供救助；这些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俄罗斯社会对车臣战争的反感和厌恶。按照俄罗斯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的观点，俄罗斯社会存在着 3 种有可能导致国家毁灭的综合症，其中之一是“阿富汗综合症”，这种综合症的“症状”在于：由于社会对持续多年的阿富汗战争的谴责，产生了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使用武力、反军队的“变态心理”，军队和强力机关成为最受人鄙视的机构[43]，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与此相反，车臣的舆论宣传却取得了很大成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车臣战争还是当代“信息战”，即“宣传战”的经典范例。车臣非法武装通过报刊、出版物、电视、电台以及因特网进行积极宣传，赢得了俄罗斯国内、国际的同情和支持。据说，被称为“车臣的戈培尔”的车臣著名意识形态专家莫伏拉迪·乌杜戈夫的出色宣传，使俄罗斯政府的宣传家们惊慌失措。车臣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中赢得的胜利，几乎就是俄罗斯走向失败的起点[44]。与此同时，车臣战争使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个人威信受到极大损害。考虑到大选在即，叶利钦对自己能否连任没有把握，希望尽快结束在车臣的不得人心的军事行动，以换取国内支持。对于俄罗斯来说，与车臣方面停战、签署协议，尽管难以接受，但在国内国际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仍然是惟一妥当的办法。由于第一次车臣战争是如此寡助，俄罗斯政府必须收拾人心。在军事、政治上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签署协议，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差使交给了列别德将军。叶利钦此时需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为让列别德

顺利完成使命，叶利钦授予他完成停战所需要的全权。

在协议签署之后，俄罗斯国内舆论哗然，军方对此尤其感到不满，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军人都对列别德丧失好感[45]。有舆论甚至认为：这是俄罗斯签署的一份对车臣的“无条件投降书”，因为其中的内容包括撤军和“车臣的重建计划”，而俄罗斯政府为车臣拨款，就类似于战败之后的“赔款”。受命签署协议的列别德将军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从此在仕途上陷入低谷。1996 年冬天，俄罗斯军队开始从车臣撤离——这是第二次撤军。有人描绘了当时俄军将士的心理状态：天下着雪，没有热的食物，没有取暖的东西，军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和耻辱；其对俄罗斯军队的打击和损害，比战场上的失败还严重。第二次车臣战争中的著名将领特罗舍夫后来写到：“现在，不仅是我，还有绝大多数军官都为这位将军——我们的前战友——感到羞辱。没有人比列别德对我们的武装力量造成的危害更大的了。”[46]。

但是，签署和约并不表明危机结束，而是使危机暂时缓和，将问题搁置起来。俄罗斯政府和车臣当局双方对待协议的看法不同：俄罗斯政府将签署协议视为不得已的妥协，一种权宜之计。列别德也真诚地相信：协议给俄罗斯以喘息之机，挽救了国家，类似列宁与德国签署的《布列斯特和约》。协议中惟一为俄罗斯政府留有余地的条款，是将有关车臣地位的问题搁置起来，留待 5 年后决定。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卢金当时曾说过：“5 年以后俄罗斯会更加强大，那时我们等着瞧。”[47]车臣方面却因此受到极大鼓舞，将协议视为车臣对俄罗斯的历史性胜利，普天欢庆，普通车臣居民则欢庆战争结束。

俄罗斯军队在车臣的军事行动，表明现代战争发生的一些深刻变化。要赢得一场战争，需要一个国家在各方面的协调组织能力。此外，俄罗斯军队必须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应付类似车臣危机这样的事件。有人说，车臣战争对于俄罗斯惟一的积极影响，就在于促使俄罗斯军队的职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4. 在两次战争之间

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之后，俄罗斯政府已经无力影响车臣局势，车臣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1997 年 1 月 27 日，车臣举行了大选，阿斯兰·马斯哈多夫获得 70% 以上选民的支持，当选为车臣总统。

马斯哈多夫，1951 年出生在哈萨克斯坦流放地。1957 年，马斯哈多夫全家从中亚返回，住在车臣的一个村镇。1972 年，马斯哈多夫从第比

利斯高等炮兵学校毕业，在远东担任排级指挥官，从此开始了长期的军旅生涯。1981 年，马斯哈多夫从列宁格勒加里宁高等炮兵学院毕业，随即到匈牙利服役并担任师长，后又担任团长。其战友证实，马斯哈多夫所在的团多次获得流动红旗，该团在全军比赛中名列前茅。经他倡议，在军内开展各种演习和射击比赛。由于表现出色，这些活动就被称为“阿斯兰秀”[48]。稍后，马斯哈多夫在波罗的海军区指挥一个团，不久被任命为该军区导弹部队和炮兵师领导人，驻扎在维尔纽斯。1990 年，波罗的海三国爆发游行，马斯哈多夫属下的炮兵部队掩护特警部队攻占维尔纽斯电视中心。有评论指出：这表明马斯哈多夫“在冲突形势下的严厉和果断”[49]。



马斯哈多夫

从 1991 年起，马斯哈多夫开始担任车臣共和国国内防卫部长和车臣共和国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1992 年从俄军退役。1995 年 2 月，一些报道开始称他为“杜达耶夫政府的国防部长”。1995 年 3 月，俄罗斯检察院对马斯哈多夫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他触犯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第 170 条：滥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以及第 64 条和第 77 条，罪名分别为叛国罪、组织匪帮等。不久，马斯哈多夫被作为国事犯在俄罗斯全境通缉。

马斯哈多夫立场较为温和，认为苏联解体导致很糟糕、消极的后果。同时，他也不完全赞同杜达耶夫的分裂主义立场，不主张与俄罗斯作战到“只剩下最后一个车臣人”。

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之后，马斯哈多夫在设在诺扎依—禹尔惕的参谋部指挥军事行动，与俄军作战。俄罗斯政府多次指责马斯哈多夫参与策划了在布琼诺夫斯克和基兹里亚尔等地的恐怖活动。但是，马斯哈多夫表示自己与恐怖活动没有任何关系，称“这不是我的方法，不是我的作风”。从各方面看来，马斯哈多夫自身未必参与这些恐怖行动，也无力策划这些行动；俄罗斯政府也并没有得到确切无疑的证据。但是，这

些事件一再发生，表明马斯哈多夫对“野战指挥官”们没有影响力，而向来对马斯哈多夫温和立场不满的“野战指挥官”们却愿意让外界，首先是俄罗斯政府看起来似乎这些行动也得到“我们总统”（“野战指挥官”们对外这样称呼马斯哈多夫）的许可和授意，从而将其与自己绑在一起。同时，马斯哈多夫主观上也希望利用恐怖事件，引起俄罗斯政府对自己的重视，在谈判中增加筹码。

1997 年到 1999 年期间，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车臣内部发生了分裂。由于国际社会不承认车臣是主权国家，“野战指挥官”地位上升。车臣受到强大的外国势力的影响，瓦哈比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大量来自伊斯兰国家的金钱和志愿人员流入车臣境内，车臣的外国雇佣军有 3000 人到 4000 人之多，车臣俨然成为各种伊斯兰主义者实践宗教和政治理想的“圣地”。

到 1999 年底，“车臣伊奇凯里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仅在与俄军作战时才是一支统一的力量，但是从来没有统一的指挥。除了官方的强力机构外，车臣境内还有许多“野战指挥官”控制的军队，其多数成员都曾受到良好训练。车臣变成了“百衲衣”，每个小分队、每一支独立队伍都控制着自己的地盘，只是偶尔与格罗兹尼的政府发生接触。这些队伍可以分为三部分：队伍的主要核心一般占成员总数的 30% 到 40%。这种战士永远待在队伍中，并随时准备执行任何任务；后备队伍负责侦察和联络；其他成员生活在各自的居民点，从事日常活动，需要时就听命于队伍的指挥，完成任务后各自回家；还有一些人通常不参加战斗行动，但可提供住所、交通、物质保障等等，多数都在行政机关中担任职务。

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无力控制局势。这些激进组织具有强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多半经过职业化训练，具有很强的组织和策划军事行动的能力。他们不服从中央政权，并在政治上向马斯哈多夫发难。1998 年 12 月，“野战指挥官”沙米尔·巴萨耶夫、萨尔曼·拉杜耶夫、洪卡尔·伊斯拉皮罗夫等人指责马斯哈多夫坚持亲俄立场，对其权力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他们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车臣指挥官会议”，向最高教法法院要求将马斯哈多夫撤职；但是，教法法院没有找到将马斯哈多夫撤职的足够理由，只认定他的过错在于遴选一些与“占领体制”合作的人担任领导职务。同时，提议马斯哈多夫单方面与俄罗斯断绝关系[50]。

车臣境内军阀林立、马斯哈多夫政权无力控制局势这一事实表明，车臣民众缺乏自我约束、自我组织的能力；而低下的组织程度和水平，预示着共和国动荡不安的前景。脱离了俄罗斯政府的控制，本身考验着

车臣的自我生存能力。

从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到1999年间，俄罗斯与车臣双方并非彻底切断一切联系，而是继续寻求政治解决的出路。1996年11月23日，马斯哈多夫与以切尔诺梅尔金为首的俄罗斯政府代表团签署了有关俄罗斯联邦中央与车臣共和国相互关系的原则协议。1997年5月12日，叶利钦与马斯哈多夫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和平以及俄罗斯联邦与车臣共和国相互关系的条约，此外还签署了两个协议：关于经济合作、货币流通等。这些协议实质上宣示了车臣仍旧留在俄罗斯联邦的经济空间内，车臣政治、法律地位也没有改变，未被认可为国际法主体。马斯哈多夫当选为车臣总统，也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认可；同时，俄罗斯与车臣继续进行谈判，只是双方立场相去甚远。车臣照旧宣称自己是独立国家，是以国际法准则为基础与俄罗斯建立关系的。俄罗斯提出了各种建议，如“俄罗斯境内的自治共和国”等，但是，所有这些方案都被车臣方面拒绝了。车臣领导人一再要求与俄罗斯建立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再签署类似国家间条约以及共同的经济和国防空间的协议。俄罗斯政府在1997年提出了一个划分双方权限的条约草案，准备给予车臣极大的自主权，甚至比鞑靼共和国拥有的权限还要广泛：车臣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宪法、法律以及全部国家行政权力；政权机关的建立、行政疆域制度都由车臣政府掌管；不经车臣同意，不得改变其领土、地位；车臣可以拥有土地、自然资源等[51]。作为答复，车臣方面提出了一个自己的《睦邻合作条约》草案文本，俄罗斯政府则未予理睬。这些情况表明：车臣领导人的立场已经僵化。在1997年到1999年间，双方的政治谈判毫无结果，和平解决车臣问题的机会被再次错过。

瓦哈比派主要意识形态专家是副总统泽利木汗·扬达尔比耶夫和情报部长莫弗拉迪·乌杜戈夫，以及达吉斯坦的“伊奇凯里和达吉斯坦各民族代表大会”的领袖。后者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激进力量关系密切，特别是与“基地”组织和本·拉登有联系。负责军事培训的核心人物，是约旦人艾哈迈德·哈塔布，他曾是阿富汗战争的老兵，参加过塔吉克斯坦内战和第一次车臣战争，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从1997年开始，车臣培训的武装成为印古什、北奥塞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达吉斯坦等地的不稳定因素。达吉斯坦的形势变化对联邦中央最为不利，联邦中央对该共和国的控制已经让位于伊斯兰激进派别。

对于激进派别来说，向北高加索其他共和国扩张，乃是在车臣得手之后的自然延伸，其政治意图是：在车臣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之后，再

将整个北高加索地区都同俄罗斯分离；同时，封锁里海石油运输线路，从而有利于中近东地区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家。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向俄罗斯的伏尔加河地区、乌拉尔地区进一步扩张。这些伊斯兰主义者还有更宏大的目标，那就是使俄罗斯的所有穆斯林地区都脱离俄罗斯而独立。莫弗拉迪·乌杜戈夫提出一种构想，即：将车臣和达吉斯坦合为一体，建立一个伊斯兰国——“车臣—达吉斯坦邦联”。车臣武装入侵达吉斯坦的目的，是占领马哈奇卡拉，将车臣与达吉斯坦联合起来，获得通向里海的出海口，从而就获得了油气资源蕴藏丰富的占俄罗斯在里海石油大陆架2/3的里海大陆架。这样，它就成为一个里海地区的产油大国，并拥有从巴库到新西伯利亚2/3的石油管道。

车臣激进派与达吉斯坦激进派走到一起，联合为“伊奇凯里与达吉斯坦各民族代表大会”，其领袖之间就未来的发展战略发生分歧，其共同特点是侵略性更趋加强。1999年春末，车臣伊斯兰武装在车臣与达吉斯坦边界地区发起一系列挑衅活动，加剧了达吉斯坦共和国局势的不稳定。车臣武装在达吉斯坦北部的卡尔加林地区到南部的楚马金地区展开了一系列行动，进行战斗侦察，以转移俄罗斯政府业已拟订的主攻方向[52]。与此相呼应，达吉斯坦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也蠢蠢欲动，以从1998年即已宣布不受共和国当局管辖的卡达尔地区为依托，加强了分裂颠覆活动。到8月初，达吉斯坦的局势已经非常严峻：不断发生针对军人和护法机关人员的恐怖事件，西南山区甚至一直有游击战争。这些情况加剧了俄罗斯政府的担忧，同时，也为俄罗斯政府再次动用武力解决危机提供了机会。

5. 第二次车臣战争

第二次车臣战争是第一次车臣战争的继续，因为此时第一次战争所要解决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甚至还在向更坏的方向继续发展；但是，两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和特点又有不同。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后，俄罗斯被迫与车臣作为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坐下来进行谈判，签署了《哈萨维尤特协议》。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俄罗斯政府被迫作出很大让步，事实上是接受了战前车臣当局所提出的条件。俄罗斯政府倾向于在条件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达到其在第一次战争中没能达到的军事、政治目标；而军方人士则渴望借机恢复军队的声誉。与此同时，车臣境内的恐怖爆炸和绑架事件频繁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在1996年到1999年之间，总共有1000多人被绑架。俄罗斯缺乏社会安全感，

人民感到极度恐慌，开始对政府不满，社会舆论谴责车臣恐怖分子野蛮残忍的行径。这一形势对于俄罗斯执政的政党和领导人都较为有利。

1999 年 3 月 5 日，俄罗斯内务部驻车臣代表根那迪·施比贡将军在格罗兹尼被绑架，俄罗斯政府对此反应异常强烈。第二天，内务部长谢尔盖·斯捷帕申对车臣方面几乎下了最后通牒："这将不是坦克，也不是一些 18 岁的男孩……这将是相应的措施。……我们有责任——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有责任向所有人，首先是我们自己表明：俄罗斯是有政权的，也有对政权和法律的尊重。"[53] 俄罗斯政府随即开始向北奥塞梯运输导弹发射装置，并在达吉斯坦组建海军陆战队。这些情况表明，从这时候起，俄罗斯政府方面已经开始备战。

车臣方面也针锋相对地发表了许多措辞强硬的声明。如前所述，早在 1998 年 7 月 15 日在古杰尔梅斯发生瓦哈比派与马斯哈多夫的支持者之间的流血冲突之后，为了避免内战，避免在政治上或肉体上被消灭，以巴萨耶夫为首的瓦哈比派就决定将能量释放到车臣之外去。1999 年 1 月，在达吉斯坦的哈萨维尤特发现了瓦哈比派的传单，对当地俄罗斯军警发出威胁，要求其离开达吉斯坦。4 月中旬，巴萨耶夫称，要在车臣和达吉斯坦范围内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必须开始达吉斯坦的非殖民化进程。不久之后，巴萨耶夫承认："车臣面临内战的威胁，而我们避免了内战，发动了与俄罗斯的战争。"[54]

按照叶利钦回忆录中的说法，在第二次车臣战争前，对车臣武装的担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车臣武装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地方发动的恐怖袭击和掠夺人质的活动，危害了社会安定，社会失去安全感；其次是车臣武装危害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作为总统，我所担心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匪徒们分裂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想。这种思想的重新形成有可能使俄罗斯再次面临被从内部瓦解的危险"[55]。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政府可以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这与第一次军事行动的情况不同，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一致支持采取军事行动，捍卫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俄罗斯政府可以放开手脚。俄罗斯政府和媒体倾向于将车臣视为一个叛乱地区。早在 1998 年，俄罗斯内务部长安那托利·库利科夫就公开支持这种提法[56]。民意测验表明，比起第一次车臣战争来，俄罗斯军队在车臣的第二次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民众的支持和认可；而且，联邦军队准备充分，士气高昂。

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俄罗斯政府宣布：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上来看，《哈萨维尤特协议》都已经失去意义。

1999 年 8 月，以沙米尔·巴萨耶夫为首的武装分子侵入了与车臣相邻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占领了几个村庄，并立即宣布建立“达吉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临时政府。这一行动表明，车臣分裂活动走得更远了，超越了车臣的范围。而且，也超越了杜达耶夫时期的车臣民族主义，形成了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意识形态。8 月 7 日夜里到 8 月 8 日，在巴萨耶夫的指挥下，2000 多名“伊奇凯里与达吉斯坦各民族代表大会”的武装分子发动了名为“伊玛目哈吉—马赫麦德”行动，从车臣的雪山山口进入达吉斯坦。这些入侵者中，20% 以上的成员是来自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志愿者，是“基地组织”出钱雇佣的。经过整整两个星期的激战，俄罗斯军队损失很大。最后，动用空军和大炮才于 8 月 21 日夜到 22 日将车臣武装击退。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多数达吉斯坦人对车臣分裂派表示同情和支持。但是，这次他们将巴萨耶夫分子的入侵视为是来自车臣人的入侵，予以坚决反对。在达吉斯坦人的支持下，俄罗斯军队予以坚决回击，巴萨耶夫分子遭到重大失败。由于车臣武装出人意料的袭击，达吉斯坦居民感到心理恐慌，开始自救，加上俄罗斯政府采取积极措施，车臣武装向里海沿岸地区的扩张计划成为泡影。从 8 月 29 日到 9 月 12 日期间，经过激烈战斗，瓦哈比派向马哈奇卡拉进一步扩张的据点、达吉斯坦中部的卡达尔地区被清除，扎鲁拉·哈吉马哈迈多夫指挥下的武装分子拼死战斗，但是最终被俄罗斯军队彻底消灭。

北高加索地区局势尖锐，也与中亚地区的局势有关系，两者正好互相呼应。八月中旬，由朱马巴依·霍吉耶夫（或朱马·那曼汗尼）率领曾在阿富汗训练营接受训练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战士，从塔吉克斯坦境内潜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巴特肯地区，其目的是进入费尔干那盆地，并在那里挑起叛乱。由于吉尔吉斯国防能力低下，该国成为这些武装分子的过境通道。在几次战斗之后，武装分子甚至将吉尔吉斯军队指挥官和 4 名日本地质学家扣为人质。由于乌兹别克斯坦军队将武装分子围困并击退，那曼汗尼的行动对北高加索地区的局势才没有发生影响。

必须说明的是，这些入侵达吉斯坦的分裂武装基本上是马斯哈多夫的反对派，并不能代表马斯哈多夫政府；但是，马斯哈多夫对这些行动没有公开表示谴责。俄罗斯政府曾提议马斯哈多夫共同与恐怖主义作斗争，但是，没有得到后者的积极回应。接着在 9 月份，在莫斯科、伏尔格顿斯克、布依那克斯克等地发生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恐怖爆炸事件，受害者近 500 人。车臣—达吉斯坦危机的规模扩大，车臣危机进入新阶

段。车臣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和俄罗斯境内犯罪组织的飞地[57]，聚集了大批外国雇佣军，车臣武装集团得到一些伊斯兰国家和组织的物质和金钱的支持，乌萨马·本·拉登也曾经派人前往车臣，提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军队在车臣的第二次军事行动凸显了反恐色彩。

1999 年 10 月 1 日，俄罗斯军队重新进入车臣境内，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了。俄罗斯军队用导弹发动攻击，摧毁了车臣境内的基地、训练营、大本营等，轰炸了格罗兹尼郊外的石油工厂。同时采取措施，断绝恐怖分子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资金的来源，防止外国雇佣军渗透。俄罗斯政府开展外交活动，使车臣武装受到孤立，出于各种考虑，一些原来支持车臣当局的国家停止类似支持。1999 年 11 月 5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通过政府决议，临时中止同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沙特阿拉伯、约旦、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叙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等国经由马哈奇卡拉、弗拉季高加索、纳尔奇克、埃里斯塔等机场的航空联系[58]。

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车臣武装采取了新战术，包括：伏击；向俄军后方渗透；消灭俄军有生力量、作战设备、军事目标等等；发动恐怖袭击。

为消灭俄罗斯军人，通常在山路、峡谷由 7—10 人组成的小分队设伏。这种地形接近通道且不易阻击，可最大限度地利用交叉火力，对俄军有生力量和辎重造成重大损失。类似行动被称为“跳蚤咬狗”战术，发动袭击之后，立即转移。通常对第 1 辆车和紧挨着的车辆进行袭击，然后直接射击队伍[59]。

抓俘虏和人质：通常针对那些运送食品、水等后勤车辆。这样的车中通常只有 2—3 人，对突然袭击无法抵抗。车臣小分队的人数通常只有 3—5 人，化装成车臣平民或难民。此外，专门针对那些擅自离队的单个军人。俘虏的命运取决于“野战指挥官”。俄军截获的车臣非法武装的战术指南中，提到对俘虏的处置办法：妇女、儿童、老人去做奴隶；男人可以杀死、交换、做奴隶或被宽恕。信仰伊斯兰教的俘虏适用以下原则：如果是在被俘之后接受伊斯兰教的，那么可适用以上任何一种办法；若是在被俘之前接受伊斯兰教的，那么《古兰经》禁止将其杀死，而适用别的办法。

夺取战利品：通常由 20 人到 25 人组成的小分队，选择开阔地设伏，当车队出现时，设伏的武装人员用火箭筒对为首的和末尾的汽车开火，压制敌方的保护队伍，以便俄军后退并留下辎重、武器等。

到10月12日，俄罗斯军队将1/3的车臣领土解放，并采取措施，实现生活正常化。1999年11月，古杰尔梅斯升起了俄罗斯联邦国旗，行政机构转到俄罗斯军队手中。

1999年12月，车臣平原地区已经全部解放。马斯哈多夫意识到大势已去，命令指挥官们尽力坚持到1月27日欧洲议会开会的日期，寄希望于西方对俄罗斯施加压力，迫使俄罗斯停止军事行动。但是，近2万名俄军从四面将格罗兹尼包围起来，并动用了空军和炮兵。1月17日，俄军开进城里，迅速控制了重要通道和建筑。到1月31日，车臣武装的主力已被消灭。2月6日，格罗兹尼解放，保证了整个行动的顺利进行。与第一次车臣战争相比，俄罗斯军队师出有名，且在短期内将非法武装的主要力量消灭，解决战斗；否则，拖延时日，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就会增大。

到2001年初，车臣的俄军人数已经达到8万人，包括国防部、内务部等机构的人员。第二次车臣战争以来，俄军的人员伤亡也在不断增加。按照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资料，从1999年10月1日到2001年2月1日，俄军阵亡2728人，受伤7971人。俄军消灭了近2万名非法武装的战士。

俄罗斯将在车臣的第二次军事行动赋予反恐怖作战的意义，就表明与武装分子的斗争将具有长期性。外国势力支持车臣武装，致使俄罗斯军事行动在短期内难以奏效；另一方面，却也给俄罗斯政府以更多的理由发动军事行动。俄军第二次军事行动旷日持久，降低了行动效果。同第一次车臣战争一样，其原因在于，俄军新式武器的装备程度很低，只达到25%。俄军需要改革，以便提高战斗力，应对新出现的恐怖武装。

注　释：

〔1〕Алихан Ахильгов, Простой советский офицер, http://www.faces.ng.ru/

〔2〕Джохар Мусаевич Дудаев, http://www.dudajev.narod.ru/

〔3〕同注释〔2〕。

〔4〕И. Н. Еременко, Россия и чечня: Документы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1990—1997, М, 1997, С.7.

〔5〕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397页。

〔6〕Джабраил Гакаев, Путь к Чече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http://www.sakharov-center.ru

〔7〕Б. Н. Зенькович , Тайны уходящего века, М, 2000, С.391.

〔8〕Доклад 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бстоновке чеченско－ингуш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http://www.inforcentre.ru/win/user/

〔9〕Оппозиция Дуда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http://www.panoloma.ru: 8100. 1992. 5

〔10〕Эмиль Абрамович Паин, Чечня и другие конфликты России, http://www.nns.ru/press/dagestan/pain.html

〔11〕А. К. Волин, Чечня. Белая книга, М, 2000, С.94.

〔12〕Мустафа Эдильбиев, "Бунт героев "по чеченски, http://www.inforsetre.ru/win/user/

〔13〕同注释〔12〕。

〔14〕Генадий Трошев, Моя война. дневник окопного генерала, http://www.vagrius.ru/

〔15〕О становлении режима Дудаева, http://www.nasledie.ru/persstr/persona/shahrai

〔16〕Доклад 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бстоновке чеченско－ингуш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http://www.inforcentre.ru/win/user/

〔17〕Г. З. Анчабадзе, Вайнахи（чеченцы и ингуши）, Тбилиси, 2002. С.77.

〔18〕Г. Федотов, Будет ли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Россия? http://www.vehi.net/fedotov/

〔19〕艾里克·霍克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 李金梅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199 页。

〔20〕《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 1 分册, 王铁崖、陈体强译, 商务印书馆 1989 年出版, 129 页。

〔21〕关于该问题, 参见拙文《"鞑靼模式"与车臣道路的比较》,《世界民族》2004 年 6 期。

〔22〕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 冯建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154 页。

〔23〕Валерий Тишков, О нации и нацоанализме//Либеральная идея, 1996, №3, С.35.

〔24〕Лев Анинский, Русские плюс..., М, 2003, С.419

〔25〕А. Гушер, Чечня: узел трудных проблем вопросов//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0, №11, С.4.

〔26〕Исламски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и его сущность, http://www.home.ural.ru/chechnya/index.htm

〔27〕Орлов, Черкасов, Россия—Чечня: цепь ошибок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М, 1998, С.111.

〔28〕Орлов, Черкасов, Россия—Чечня: цепь ошибок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М, 1998, С.125.

〔29〕Александр Черкасов, Как начиналась"первая чеченская", http://www.kavkaz.memo.ru/

〔30〕П. Хлебников, Крестный отец Кремля Борис Березовский или История разграбления России, М, 2001, С. 44.

〔31〕Алихан Ахильгов, простой советский офицер, http://faces. ng. ru/necropolic

〔32〕Оксана Попова, Война с бесконечностью. . . , http://www. idelo. ru/354/14. html

〔33〕А. К. Волин, Чечня. Белая книга, М, 2000, С. 81.

〔34〕А. Искандарян, Чече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провал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кавказе, М, 1995, С. 10.

〔35〕Война в Чечне, http://www. sergeant. genstab. ru/

〔36〕同注释〔35〕。

〔37〕О принципах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основ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Чече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http://www. nns. ru/press - file/dagesitan/hasa. html

〔38〕Лев Остерман,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власть в России. 1985—1996, М, 2000, С. 358.

〔39〕鲍里斯·叶利钦:《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曹缦西、张俊翔译,译林出版社 2001 年出版,66 页。

〔40〕Генадий Трошев, Моя война. дневник окопного генерала, http://www. inforcentre. ru/win/user

〔41〕Оксана Попова, Война с бесконечностью. . . , http://www. idelo. ru/354/14. html

〔42〕Г. З. Анчабадзе, Вайнахи (чеченцы и ингуши), Тбилиси, 2002, С. 79.

〔43〕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出版,242 页。

〔44〕Элиезер Воронель - Дацевич, Хрен с горы, http://udod. traditio. ru/hsg. html

〔45〕Константин Крылов, Путь Генерала Лебедя, http://www. specnaz. ru/archive

〔46〕Генадий Трошев, Моя война. дневник окопного генерала, http://www. inforcentre. ru/win/user

〔47〕Кавказ, http://www. home. ural. ru/chechnya/index. htm

〔48〕http://www. ng. ru/

〔49〕同注释〔48〕。

〔50〕同注释〔48〕。

〔51〕http://www. kavkaz. memo. ru/

〔52〕Джангир Арас, Терроризм: вчера, сегодня и навеки, http://www. world-warfour. org/blok4_1. shtml

〔53〕Александр Черкасов, Как начиналась "вторая чеченская", http://www.kavkaz.memo.ru/

〔54〕同注释〔53〕。

〔55〕鲍里斯·叶利钦:《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曹缦西、张俊翔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390页。

〔56〕Эмиль Абрамович Паин, Чечня и другие кофликты России, http://www.nns.ru/dagestan/press-file/pain.html

〔57〕A. Гушер, Чечня: узел трудных проблем вопросов//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0, №11, С.3.

〔58〕Посто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номер 1223, http://www.nns.ru/press/dagestan/no-terror.html

〔59〕Джангир Арас, Терроризм: вчера, сегодня и навеки, http://www.world-warfour.org/blok4_1.shtml

第七章

车臣危机中的伊斯兰因素

在车臣危机的发展过程中，伊斯兰教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其意义不容低估。伊斯兰因素成为与俄罗斯联邦中央对抗的思想资源，车臣社会被充分动员起来；而且，正是在宗教旗帜下，来自境外的激进思想开始对车臣社会发生影响，车臣社会走向激进化，并在所谓“圣战”的口号下，与俄罗斯政府进行长期武装对抗。

俄罗斯：伊斯兰复兴

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境内的伊斯兰复兴进程进入新的阶段。

北高加索地区乃是俄罗斯境内传统的穆斯林聚居区。伊斯兰教在俄罗斯境内，乃至整个独联体国家境内复兴，有着非常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在苏联，虽然各个时期有一些细微差别，但是，基本上可以说，苏联政府对各种宗教信仰采取了不宽容的政策。1917 年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对于东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实施了严酷政策，对宗教怀有敌意。在革命的条件下，宗教被视为封建、反动的东西，布尔什

维克领袖试图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来取代人民的宗教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东正教作为俄罗斯民族的基本信仰，从苏联的社会生活中消失了；伊斯兰教也元气大伤。按照统计资料，1917 年以前俄罗斯境内的清真寺有 24000 座，但是，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苏联的清真寺仅存 300 个，注册的神职人员只有不到 1000 人。当然，这些数字只是表明，官方许可的清真寺数目是大大减少了，而地下状态的清真寺和宗教活动却并没有从此根绝。实际上，尽管经过政权的压制，伊斯兰教从来不曾被消灭，而是极为顽强地生存着，并在一定程度上仍旧在继续发展。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表层之下，仍然是人民传统的精神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社会的政治空气相对宽松，苏联各民族都开始了回归传统的运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苏联政府想利用宗教为现实政治服务，对宗教的高压态势减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宗教复兴。俄罗斯民族开始了复兴东正教的进程，而穆斯林民族也开始了复兴伊斯兰教的进程。到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穆斯林民族人口将近 5000 万人，占苏联人口的 1/6，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只占 1/8。伊斯兰教还是穆斯林民族保存民族特性的重要手段：对于身处俄罗斯民族中间的少数民族来说，伊斯兰复兴还有另一项特殊的使命和功能，那就是抗拒俄罗斯化。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中，有很多组织就是这种复兴传统文化，同时也是复兴民族意识的倡导者。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苏联伊斯兰复兴的具体表现包括：各民族历史记忆的复苏，如 19 世纪北高加索各民族领袖沙米尔受到关注，并被车臣和达吉斯坦的人民视为英雄；此外，其他的一些反抗沙皇俄国征服的著名人物也受到北高加索各族人民的尊崇[1]；许多伊斯兰教历史上和传说中的圣地，以及陵墓、文献、一些所谓有灵性的神山之类都受到尊崇。



17 世纪的车臣堡寨

如果我们将眼光投向一个更大的范围，那么，可以说，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日益积极化，该进程可以称做世界范围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以 1979 年伊朗发生的革命为标志，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执政以后，推行了具有外向性的“输出革命”政策，得到伊斯兰世界的响应。1979 年到 1989 年的阿富汗战争对苏联伊斯兰复兴有很大影响，从那时起，苏联穆斯林民族以伊斯兰为背景的民族主义上升，苏联的伊斯兰复兴进程有意无意地成为

世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部分。

从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开始，苏联的伊斯兰复兴进程明显加快。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政府放松了对人民的意识形态控制，苏联人民长期被压抑的宗教感情开始复苏。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经济形势恶化，导致苏联政府在人民的心目中丧失威信；但是，戈尔巴乔夫改革使宗教政治化成为可能，宗教势力开始增长，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89年，苏联政府正式注册了一个合法的宗教组织："全苏伊斯兰复兴党"。随后，该党在苏联所有的穆斯林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其领导人之一是阿赫塔耶夫（1998年去世），这是苏联穆斯林宗教组织首次合法化的具体表现。

苏联解体以后，整个俄罗斯乃至独联体境内，伊斯兰教复兴进程进一步加快，这是二战以来苏联伊斯兰复兴过程的继续。伴随着苏联政治体制的瓦解、民族国家的分裂，意识形态也随之崩溃，出现了所谓的思想和信仰的"真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借回复传统来寻求思想和精神资源；而对于穆斯林民族来说，当然就需要复归伊斯兰传统。

伊斯兰复兴，不仅限于俄罗斯联邦，还有俄罗斯的达吉斯坦、车臣，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伊斯兰教地区，他们建立了不受当地政府控制的飞地，甚至是准国家组织，如波斯尼亚、科索沃、克什米尔，等等。

俄罗斯境内的伊斯兰复兴具备哪些条件呢？一般来说，苏联时期对宗教的镇压，针对的主要是国内的主要宗教，即东正教，而伊斯兰教由于自身的一些特点，如内部统一，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一致，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因而，尽管面对强大的无神论宣传和当局的打压，仍旧能够保留良好的社会文化基础。研究表明，甚至在20世纪60、70年代里，苏联的穆斯林地区如高加索、中亚、鞑靼斯坦、奥伦堡等地，在宗教传播方面已经非常活跃。当然，这些复兴现象多半表现为地下秘密状态。1970年初，苏联部长会议下设的宗教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尔门科夫指出，实际上，登记在册的314个穆斯林宗教团体（清真寺）的数字远远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些团体（清真寺）的数量，相当于革命前穆斯林团体的1%多，不能满足穆斯林信徒的宗教活动需要，更大量的，是地下状态的清真寺和礼拜场所。

大约在卫国战争之后，苏联穆斯林人口开始迅速增长，其出生率高于其他民族。提高出生率，客观上也成为防止被同化，即被俄罗斯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在改革前夕，伊斯兰教就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条件，

而东正教则在受到打击和镇压之后却一蹶不振，要想复兴，还需从零开始。

伊斯兰教是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宗教，所以，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往往就是这些少数民族实现自我认同的途径，以及作为处在多数民族，即主体民族包围中的少数民族自我保护的手段。在许多穆斯林领袖看来，俄罗斯在东正教的口号下实现复兴，不啻是对伊斯兰教的公然蔑视[2]。因此，他们认为，俄罗斯穆斯林地区的行政主体不应加入俄罗斯联邦。俄罗斯的许多穆斯林民族几乎可以说全民都是教徒。社会学家对鞑靼人进行的调查表明：有86%的农村人和66.6%的城市人称自己是信徒；对北高加索地区并没有进行类似的统计。但是，许多学者认为，在这些地区，信仰伊斯兰教、并在各方面信从伊斯兰教教义的人口可能接近100%[3]。

作为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俄罗斯的伊斯兰复兴还受到外部世界的支持：包括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这些外部支持，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约旦、埃及等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支持俄罗斯乃至独联体的伊斯兰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自己在穆斯林世界的威望，争取在穆斯林世界中独一无二的领袖地位。在整个苏联时期，甚至包括从这些地区归并俄罗斯帝国以后的漫长时期里，高加索地区与传统的伊斯兰国家联系很少，甚至没有联系，具有很强的封闭性，那里的伊斯兰教信仰具有很多前伊斯兰教时期的信仰特点。北高加索地区伊斯兰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1944年被流放后，受到中亚伊斯兰教的影响。在与外部的伊斯兰世界骤然密切接触之后，这些地区的宗教特点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复兴首先表现在：穆斯林地区大规模建设宗教教育体系——学校、清真寺等。90年代初，俄罗斯最大的伊斯兰高校，是设立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国立伊斯兰学院，该校实行免费教育，共有学生420人。这是惟一一所在学校的两个系都培养伊斯兰教教法专家的学校。在学校工作的教师，分别来自约旦、叙利亚、沙特阿拉伯、苏丹等国家。1992年，达吉斯坦首府马哈奇卡拉开办了伊斯兰医学学校，该学校只接收女孩。据该校校长哈吉·加萨诺夫说，该校的毕业生将成为“伊斯兰传教士，同时也将是高水平的医疗人员”[4]。此外，伊斯兰复兴的另一重要表现还在于：苏联时期几乎被忘却的伊斯兰宗教传统在当代复活，穆斯林的日常生活要依据伊斯兰教规、教法，如：严格禁止饮酒，等等。在这方面，北高加索地区，尤其是车臣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斋月时期，格罗兹尼街头几乎看不到吸

烟者；而且，除了那些不受约束的士兵之外，几乎没有酗酒者，按照伊斯兰教教法，酗酒者要被处以死刑。对于当地居民来说，伊斯兰教乃是对抗俄罗斯意识形态的思想资源和武器。伴随着苏共对社会控制的衰退而来的，是宗教组织在社会中日渐取代苏共党组织原来的功能和地位。1991 年 9 月 6 日，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苏维埃党政机构停止运行，政权易手；在这种情况下，加入新政府的是一些工厂经理、集体农庄领导人以及许多宗教界人士，即穆福提、清真寺的伊玛目及宗教积极分子，等等；共和国的会议都有各级宗教人士参加，因而，“似乎是宗教大众组织取代了原来的苏联共产党组织”[5]。

按照《古兰经》的训诫，真主号召那些有财力的信徒，在一生中至少要到麦加或者麦地那朝圣一次。在苏联时代，朝觐活动对于苏联穆斯林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苏联政府严密控制信息传播，担心苏联公民与西方国家，哪怕是与同信仰的国家接触获得更多信息，威胁政权。1989 年，苏联官方的统计资料表明，到麦加朝圣的苏联穆斯林只有 31 人；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去麦加朝圣已是一种风潮。在朝圣的信徒中，有 2/3 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特别是达吉斯坦。普通公民自不用说，连穆斯林地区的领导人也纷纷前往麦加朝圣，这些人包括：俄罗斯议会的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前联邦委员会副主席、副总理拉马尚·阿布杜拉吉波夫、车臣领导人阿斯兰·马斯哈多夫、印古什共和国总统鲁斯兰·阿乌舍夫、鞑靼斯坦领导人明铁木耳·沙伊米耶夫、巴什基尔领导人，等等。这些领导人前往麦加朝觐，是为了在政治活动中拥有更多资源和号召力，适应了政治需求；反过来，政治家的朝觐活动又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当然，前往朝觐的普通公民中，除了宗教感情驱动以外，还有一部分人则包含着经济动机：将前往沙特阿拉伯作为一次商业旅行。

与此同时，北高加索地区开始修建和修缮了许多清真寺，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据统计，1997 年，达吉斯坦有 1200 所清真寺，印古什有 400 所，卡巴尔达—巴尔卡尔有 96 所，卡拉恰依—切尔克斯有 91 所。车臣的统计资料虽然还没有，但是，有人估计，大约有 1000 所清真寺开放。俄罗斯境内规模最大的清真寺在达吉斯坦首都马哈奇卡拉，可同时容纳 8000 名信徒。此外，由于许多主客观原因，这些数字恐怕未必确切，比如，据达吉斯坦穆福提的估计，达吉斯坦清真寺数目为 3500 所；但是，据高加索问题专家的估计，早在 1994 年，达吉斯坦境内清真寺的数目已经超过 5000 所[6]。

在整个北高加索地区，一些古老的宗教习俗和礼仪实现了复兴，这



车臣人的宗教舞蹈“寄可尔”。

方面较为典型的，是车臣苏非教派的一种宗教礼仪舞蹈：“寄可尔”（зикр）。这是一种激烈的身体运动，要在按照一定规则、合着一定韵律进行身体运动的同时，念诵咒语，呼唤安拉的名字。据说，这种舞蹈会导致舞蹈者陷于迷狂，其功能在于唤起人们内心的某种战斗精神和攻击性[7]。到1996年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之后，车臣还确立起了伊斯兰教教法——不，毋宁说是恢复了沙米尔时代的伊斯兰教教法。车臣人将沙特阿拉伯的教法翻译过来，将其作为车臣的法律基础。当然，由于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习惯和需求，人们还是继续遵循习惯法和普通法。

瓦哈比派与车臣的伊斯兰激进化

车臣各教派在沙米尔时代就已经存在，并且得到很大发展。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这些地区纷纷走向“再传统化”。车臣的伊斯兰教派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它的宗教礼仪反映了车臣社会在伊斯兰教传播之前的风俗习惯；另一方面，20世纪40、50年代，车臣人在中亚流放地又受到中亚伊斯兰教的影响。而从上世纪80年代苏联改革、直到苏联解体后，车臣的伊斯兰教信仰一直受到来自外部的、伊斯兰国家的影响。

车臣的伊斯兰信仰与整个地区有某种共性。北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教各派别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逊尼派；一种是塔里克派（Тарикат）；还有一种则是所谓的瓦哈比派（Вахабизм），或称塞来菲耶派（Салафизм）。北高加索地区传统的伊斯兰教与其他穆斯林地区有所不

同，至今仍残留了神灵崇拜时代的痕迹，并与北高加索地区各民族的传统习俗结合在一起，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教有很大区别。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伊斯兰走向复兴，外来的伊斯兰思潮对北高加索地区发生很大影响，这些派别包括：瓦哈比派伊斯兰教、阿拉伯伊斯兰教、阿富汗伊斯兰教，等等。在北高加索的东部地区，主要是车臣，历来盛行所谓苏非教团，或者被称为苏非兄弟会，而苏非派又可以分为两个派别：分别是那克什班迪和卡迪里派，以及从中派生出来的一些变种，通常也被称做塔里克派。塔里克源于阿拉伯语，译为“道路”或“认识真理的神秘主义方法”[8]。这两个苏非教派有长期的发展历史，在车臣社会中根底深厚。那克什班迪派主要在包括格罗兹尼的平原地区传播；卡迪里派则主要在山区传播。这两个教派将许多车臣的泰普结合起来，或者说，所有泰普要么属于那克什班迪教派，要么属于卡迪里派。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革新派，或通常所谓的瓦哈比派。

瓦哈比派最初是18世纪中期沙特阿拉伯著名宗教领袖穆罕默德·伊本·阿里·瓦哈布（1703年—1792年）创立的宗教派别，是逊尼派的一个分支。瓦哈布领导了一场伊斯兰革新运动，号召阿拉伯半岛上的伊斯兰信徒放弃从前的半神灵崇拜的伊斯兰信仰，反对一切形式的圣物崇拜，回复到真正的伊斯兰，严格遵守伊斯兰教规，净化伊斯兰教，等等；而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主张所有穆斯林和谐、团结、统一，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道德训诫，反对铺张奢华、贪财好利等；但是，瓦哈比派最重要的思想，是所谓对异族人和背离早期伊斯兰教原则的穆斯林发动“圣战”。今天，这也是最容易被伊斯兰激进主义者滥用的口号，真正的穆斯林信徒往往因之而蒙受恶名。在思想信仰和与对手斗争的方式方面，瓦哈比派表现出了狂热和激进的特点。从那时起，瓦哈比思想就成为阿拉伯半岛走向统一的思想武器，后来，在沙特阿拉伯获得类似国教的地位。今天的沙特阿拉伯人称自己为塞莱菲耶派，但实质上已经对瓦哈比思想有很大发展和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塞莱菲耶派渗透到车臣境内，并开始被称为瓦哈比派。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思潮，当代瓦哈比派主张严格遵从伊斯兰教规、圣训和伊斯兰礼仪，其口号是“纯洁伊斯兰”，具有激进主义色彩，属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一种，有人将瓦哈比派比做“伊斯兰教中的托洛茨基派”。瓦哈比派代表多是一些来自国外的信徒，以及一些在国外接受过宗教教育和训练的信徒。对于瓦哈比派的产生以及术语“瓦哈比派”的确切含义，学术界至今莫衷一是。有人认为，独联体境内的瓦哈比派是20世纪70年代后苏联克格勃对在中

亚活动的一些宗教集团的称呼；也有人认为，瓦哈比派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产生于塔吉克斯坦的宗教组织[9]；还有人认为，瓦哈比派直接产生于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支持[10]。

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媒体中，独联体境内的伊斯兰激进派别因“瓦哈比派”而著称，有学者将其称为“北高加索瓦哈比派”[11]，既有一般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共同特点，又有其自身特色。实际上是境外伊斯兰激进主义与北高加索社会结合之后产生的一个变种。

瓦哈比派在车臣等地迅速发展，有多方面原因：首先，苏联时期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导致车臣传统的伊斯兰教派受到很大压制和削弱；苏联解体之后，作为政权组成部分的宗教管理机构——北高加索宗教管理局对宗教的统一管理解体。在这一过程中，车臣当局的政治控制日益衰弱，特别是在扎夫加耶夫时期，客观上为外来宗教产生巨大影响提供了可能性。而90年代初上台的激进分裂派领导人，不但不阻碍、反而千方百计地促进伊斯兰教激进派的巩固和扩大影响。格罗兹尼甚至成立了一个瓦哈比派中心，传播宗教文献，组织集体祈祷，通过传媒兜售自己的思想。杜达耶夫声称：我们是在建设一个伊斯兰国家，所以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杜达耶夫的意识形态专家如乌杜戈夫、扬达尔比耶夫等人，希望瓦哈比派发挥凝聚国民、统一思想的功能。同时，车臣分裂派领导人也怀有其他意图：希望得到富有的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的物质、资金支持；希望那些受过良好军事训练的人支持车臣的分裂运动；同时，还希望借传播严格的、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来消除共和国内部，以及北高加索各民族之间的宗教分歧。国际伊斯兰激进组织设法对在车臣境外学习的宗教青年“洗脑”，通过他们对车臣的伊斯兰信仰间接地施加影响。

同时，必须承认，瓦哈比思想自身的一些特点，使其在车臣社会得到回应，迅速传播开来。瓦哈比学说的优势，在于其实用性很强，容易接受，有明确的、无可辩驳的内在逻辑，尽管对于许多穆斯林神职人员来说，这些问题都并非没有争议。瓦哈比派宣称“完全、不折不扣地”遵从古兰经经文，实际上却是有选择地解释古兰经条文，特别是在社会政治方面几乎是重构了“纯洁伊斯兰教”的模式，从而使伊斯兰教适应了当代北高加索社会的宗教、政治需求，使伊斯兰教实现了“现代化”，克服了逊尼派传统上的精英主义、封闭等缺点，清除其迷信、神秘主义、宗法制传统等前伊斯兰时代的残余。

瓦哈比思想在北高加索的年轻人中间很有影响，青年成为瓦哈比派

的社会基础。青年信徒需要从宗教中寻求关于重大生存问题的解答，同时也希望立即变革社会。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包括北高加索在内的俄罗斯社会严重分化，道德价值观念转换，都极为病态地影响到了青年人。他们反感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而苏非教团与传统社会结构结合紧密，不可能表达类似不满，并承担类似的社会角色。瓦哈比思想要求只严格服从真主安拉，使个人从泰普关系中解放出来，自主地追求独立。尽管说瓦哈比团体的纪律照旧会对其做出种种约束，其程度并不比在泰普中更低，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区别。对于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从此获得了实现个人选择的机会。此外，与苏非教团不同的是，瓦哈比派常常是有组织的，有武装力量的，能够在动乱形势下保护其成员。瓦哈比派宣扬所有信徒在真主面前一律平等，自然地与号召实现社会平等和正义结合起来。从而，瓦哈比学说就成为动员成员与社会不公现象和法制混乱状况斗争的有力工具。

年轻人往往是政治上最为活跃的部分，因而可以说，“瓦哈比”是一场年轻人的宗教政治运动。在年轻人看来，以前的伊斯兰教学说是幼稚可笑的，信徒对长老们的无条件信从也是不可接受的，对长老们在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地位表示蔑视和怀疑。这样，就造成了两代人之间的隔阂，“父与子”的矛盾。瓦哈比激进思想控制了车臣青年，为其参与政治斗争做好准备，储备了人力。

俄罗斯对车臣的政治军事压力，是瓦哈比派在车臣加速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第一次车臣战争前夕，杜达耶夫称，正是由于俄罗斯的政策导致境外伊斯兰势力加紧对车臣渗透。1994 年 12 月 6 日，杜达耶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一些遥远的伊斯兰国家也可能打“车臣牌”，而这将导致事态的发展失控。第三种力量——伊斯兰主义者逐渐占据主动。这些伊斯兰主义者向杜达耶夫表示：我们已经不是你的战士，总统，我们是真主的战士。杜达耶夫表示：“车臣局势已经开始失控，而这使我感到不安。”[12]

像一切伊斯兰国家一样，伊斯兰组织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由于种种原因，车臣宗教界政治化进程加快。1991 年，车臣的宗教管理组织，包括穆福提和“伊斯兰中心”在车臣建立起了长老会，其基本功能是解决族际和泰普之间的争端。苏联解体以后，在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宗教领袖并没有像传统的伊斯兰教权国家那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取得显赫地位。一般来说，基层宗教组织倾向于将伊斯兰教变为国教，以便提升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许多宗教界下层人士都支持杜达耶

夫，将他视为“车臣伊玛目”。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宗教集团更倾向于借助世俗政府的力量，与政界合作；同时，它也往往被用作对政敌提出谴责和施加压力的工具。但是，长老会的活动也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有时候它支持杜达耶夫，有时候也敢于批评总统。在俄罗斯军队于1994年12月底进入车臣之前，车臣伊斯兰组织呼吁车臣各泰普和集团超越狭隘的利益，团结起来。按照当时的一位政界人士的说法，几乎所有的宗教人士都卷入了尖锐的国内政治斗争[13]。

车臣“瓦哈比化”进程有其自身特点。达吉斯坦是北高加索的伊斯兰学术和传播中心，北高加索地区受到达吉斯坦伊斯兰教派的影响，而达吉斯坦的教派比较集中地体现出了中东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派的发展状况。在达吉斯坦，瓦哈比派领袖首先是宗教领袖，其次才是政治人物或公众人物；而车臣等共和国正好相反。车臣宗教领袖首先是世俗的政治家，他们诉诸宗教只是为了追求国家独立。车臣那些所谓的瓦哈比派精英，包括乌杜戈夫、扬达尔比耶夫、巴萨耶夫、哈里莫夫、侯赛因诺夫等等，都是一些世俗的政客。杜达耶夫本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都非常有限。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事例：一次，杜达耶夫去维杰诺参观车臣圣地，有人自发地聚集在一起。杜达耶夫说：“干吗聚集在一起？走开，每天祷告3次！”随从中有人提醒他：“乔哈尔，应该每天祷告5次才对！”。“那更好嘛，虽说你会很忙。”[14]这件事情表明，杜达耶夫本人对伊斯兰教起码的教规都不甚了了。

在杜达耶夫最初的声明和访谈中，并没有将伊斯兰教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而且，他设想的车臣国家是立宪的民主国家。1992年，杜达耶夫在回答《文学报》记者提问时，明确否定了在车臣建立宗教国家的可能性，提出在即将建立的国家中，实行政教分离：“车臣共和国是一个立宪的世俗国家。宗教作为精神领域应该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道德和人性的发展方面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宗教对世俗的宪政制度占了上风，就会出现西班牙式的宗教法庭和表达明确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15]杜达耶夫坦陈，车臣伊斯兰化是不得已的选择。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杜达耶夫直言不讳地说：“是俄罗斯迫使我们走上伊斯兰教的道路，尽管我们并没有对接受伊斯兰教价值观做好准备。”杜达耶夫不止一次声称，自己赞同民主和市场经济：“我从来不按这个原则（指是否信仰伊斯兰——作者注）划分国家。支持我们的有不少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杜达耶夫还将那些在车臣有声望的宗教人物和组织排除在他的政治安排之外，杜达耶夫的政敌比斯兰·甘塔米罗夫成

立的“伊斯兰道路”党就遭到如此命运（后来出任格罗兹尼市长）。

至于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此人从来就不是伊斯兰激进教派的赞同者，他不同意在车臣实施教法。他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得势，是依靠雄厚的泰普组织的支持。1997 年他发表了关于在车臣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声明，是迫不得已的[16]。对于马斯哈多夫来说，宣布实施伊斯兰教法，是为了使政敌少一个指责的借口；但是，在许多人看起来，却似乎是马斯哈多夫在压力下向政敌屈服或投降。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家，不论是杜达耶夫，还是马斯哈多夫，都不拒绝借伊斯兰教意识形态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其他车臣领袖诉诸伊斯兰教，只是表达自己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形式，以及与政敌争权夺利的手段，甚至仅仅是为了得到国外的物质、资金援助。这种认同具有功利性，是一种政治实用主义的态度。车臣分裂派的意识形态，就是发动一场针对俄罗斯的“圣战”、“吉哈德”或“哈扎瓦特”。同时，车臣追求分裂的各党派也并不寄希望于“伊斯兰团结”的思想。

如果将车臣的宗教运动与阿富汗的激进的“塔利班”做一个比较；那么，可以说，“塔利班”的伊斯兰激进主义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其领袖都是狂热的伊斯兰教信徒，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权国家；而在车臣，伊斯兰教只是一种政治斗争工具，其领袖对其抱实用主义的态度。车臣领导人只是一些“伪塞来菲耶派”或者“伪瓦哈比派”，俄罗斯媒体中的“瓦哈比派”，实际上是一个被扭曲了的术语。著名的车臣分裂武装头目哈塔布与记者曾有一段对话：

记者：“在车臣有人说，你们在帮助瓦哈比派，是这样的吗?”

哈塔布：“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人。《古兰经》中关于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写到；这就是说，这些人是不存在的。”[17]

车臣的伊斯兰激进化的另一个特点，是随着车臣危机的发展而变化：俄罗斯—车臣对抗越是激烈残酷，车臣社会就会加速激进化进程。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之前和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以及两次战争之间，车臣伊斯兰化的特点是不同的。

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后，大敌当前，车臣各教派联合起来；但是，当俄罗斯军队撤离之后，在争夺权益的问题上，这些派别开始了新一轮的分化组合。鉴于瓦哈比派的名声以及在一定范围内的消极影响，车臣领导人在公开场合都尽力与瓦哈比派划清界限，避免给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的媒体以口实；但是，另一方面，车臣与瓦哈比派确实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也是事实。1997 年 12 月，萨尔曼·拉杜耶夫就与达吉斯坦

“伊斯兰团体武装力量”签署合作协议。达吉斯坦瓦哈比分子的活动中，也往往有车臣背景。

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后，围绕着未来车臣应该是立宪的世俗国家，还是伊斯兰教法国家的争论上，车臣各宗教派别再次发生深刻的分裂和对立。瓦哈比派对北高加索地区的政治安排有着极为明确的目标，将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建成一个伊斯兰宗教国家，而这一战略目标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推进：一是地方层次，如在达吉斯坦的卡达尔等地区；二是民族或共和国层次，如车臣，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达吉斯坦；三是跨地区，即车臣—达吉斯坦—印古什；四是北高加索地区。车臣属于这一目标的第二个层次[18]。对于每一个层次的目标，瓦哈比派都有具体实践。

车臣“瓦哈比化”，受到国外“圣战者”的协助。1995 年春天成立了“伊斯兰协会”，领导人是约旦籍车臣裔哈塔布。1996 年，在约旦车臣人团体的协助下，车臣境内建立了一个教学中心，高加索伊斯兰号召学院，成为国际激进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并得到沙特阿拉伯“国际伊斯兰援助组织”的资助。该学院是培训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的专业化营地。到 1997 年，有年龄在 17 岁以上的 155 名未来的“圣战者”在学院学习。在两个月时间内，他们学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接受军事训练。哈塔布在学院中教授在车臣发动游击战的战术，其学员是“达吉斯坦伊斯兰军”的核心，准备推翻达吉斯坦的制度。哈塔布灌输民族沙文主义，号召仇恨俄罗斯人，并建议指责一切爱国的俄罗斯人为“法西斯主义”。另一个著名组织，是乌马尔·本·伊斯玛因（达乌特·乌马罗夫）领导的瓦哈比组织“乌鲁斯·马尔坦团体”，该组织完全由俄罗斯境外组织资助。此外，车臣境内还有各种训练营。来自车臣、北高加索其他共和国、格鲁吉亚、中亚地区以及中国新疆的学员，在“高加索”、“扎法尔”、“雅库布”、穆塔法吉拉特等训练中心接受培训，学习破坏、爆炸、侦察、信息战等技术。

为了不被政敌攻击，车臣领导人最终决定建立伊斯兰国家。1998 年 4 月，马斯哈多夫总统发表电视讲话，称车臣将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在车臣国家里，将只有伊斯兰教和教法规则发挥效力，《古兰经》将是车臣的根本法。但他立即遭到瓦哈比派的围攻。第一次车臣战争中，这些来自境外的激进组织站在车臣方面勇敢作战，赢得了车臣人的尊敬；但是，他们与马斯哈多夫等温和分裂派发生矛盾。瓦哈比派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激进主义以及在政治斗争中采用的极端手段，使他们与传统教派疏远开来，其惯用手法是：指责立场温和的传统派别与俄罗

斯政府合作，是“民族背叛”，双方的矛盾一度白热化。1998 年 7 月 14 日，瓦哈比派与传统派在古杰尔梅斯发生了流血冲突，冲突双方死去 50 多人，主要是一些年轻人，瓦哈比派损失惨重，而在政治上受到的损失更大。随即，马斯哈多夫宣布：瓦哈比派不受法律保护；但是，马斯哈多夫政府的副总统瓦哈·阿尔萨诺夫和巴萨耶夫等人支持瓦哈比派，并说服马斯哈多夫不要加深内讧。瓦哈比派元气大伤，但幸免于难，很快又壮大了实力。

1999 年 4 月 17 日，格罗兹尼召开例行会议，主题是巩固马斯哈多夫总统在车臣的地位。为了避免内讧和纷争，瓦哈比派决定将能量释放到与车臣相邻的达吉斯坦。在扬达尔比耶夫的报纸《高加索邦联报》上，瓦哈比派领导人号召高加索青年加入他们组建的“高加索伊斯兰军”，参加圣战；并对高加索青年灌输一种思想：我们，穆斯林们，必须为宝贵的宗教而战，并发动圣战；为此须到高加索伊斯兰军的集结地，并随身带上野战条件下必需的一切。由此可见，8 月 2 日入侵达吉斯坦的事件，实际上策划已久。

车臣伊斯兰激进化：实质与后果

对于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来说，伊斯兰教与民族认同联系在一起。伊斯兰复兴具有自我保护的功能和意识，同时也有很强的排外性。对于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不只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更重要的是：它是民族意识的基础”[19]。伊斯兰信仰是车臣人认同的基础，并与车臣人的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是车臣人用以号召和实现民族动员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在车臣民族历史上的历次转折关头，伊斯兰教都发挥了这种动员功能：1785 年到 1791 年的曼素尔起义；1834 年到 1859 年的沙米尔伊玛玛特时期；1917 年到 1920 年的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1944 年到 1957 年的流放时期；以及第一次车臣战争和第二次车臣战争时期。

在车臣危机爆发前，如同俄罗斯乃至独联体的其他地区一样，车臣的宗教复兴运动只是一种正常的宗教感情的复苏；但是，随着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以及来自俄罗斯的外部压力，宗教复兴就具有了凝聚民族感情、动员社会的功能。有学者认为，车臣的伊斯兰复兴，是 19 世纪的谢赫·曼素尔在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开始的伊斯兰化过程的继续，甚至也可能是这一过程的终结。这本来是一个自

然进程。在正常、和平的条件下，这一进程也许会持续很久，但是，俄罗斯与车臣的冲突加速了这一进程。

北高加索地区，特别是车臣和达吉斯坦的内部政治斗争尖锐，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一些政治派别借助伊斯兰教作为制胜手段，导致伊斯兰激进化，甚至极端化，比如：它使车臣由世俗社会急速转向教法社会，并在特定情况下，使车臣乃至北高加索地区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车臣恐怖主义组织正是在宗教的外衣下活动的，典型的就是宣布所谓“圣战”。研究表明，在所有导致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条件中，宗教因素起独立作用的占37%，宗教因素与民族主义因素共同起作用的占62%，其他则只占1%[20]。

俄罗斯对车臣的政治、军事压力是一个催化剂，促成车臣的伊斯兰激进化。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形成的真空里，车臣很难提出别的更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而只能步沙米尔的后尘，继续以伊斯兰教为号召，对俄罗斯异教徒发动“圣战”。车臣走向伊斯兰激进化，也是残酷的武装对抗导致的后果。正是战争使部分车臣人在思想和信仰方面走向激进。车臣战争导致大量平民死去。一些失去亲人的车臣人听从瓦哈比派的说教，服膺其学说。这些人所占比例并非很高，估计在5%到10%之间[21]，但却拥有很大的能量。

此外，由于社会经济形势恶化，人们对政府感到愤懑，却又看不到摆脱危机和困境的出路。在这种条件下，几乎人人都会成为瓦哈比思想的支持者。1997年以后，车臣向教法国家转变，得到许多车臣居民的支持，甚至还曾得到俄语居民的支持；但是，普通民众赞成实施教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车臣社会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失业人数增加，犯罪率攀升，社会缺乏安全感，而实施伊斯兰教法，正是回应了“治乱世必用重典”这一古训。这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调节了社会关系，遏制了犯罪升级的势头，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通过宣布“圣战”，建立伊斯兰教法，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车臣就最终实现了伊斯兰化。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在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从来就不具备实施伊斯兰教法的条件，在北高加索地区缺乏这样的历史基础；甚至在所有的伊斯兰教国家中，也只有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实施了真正意义上的教法统治。即使在沙米尔时代，伊斯兰教法的影响也很有限，山民社会中更多遵从的是习惯法；何况在今天，车臣社会的许多成员已经接受了现代观念。

另一方面，瓦哈比派还曾得到俄罗斯政府的某种支持，虽然听起来

难以置信，却也是一个事实。如前所述，在1998年7月古杰尔梅斯发生的瓦哈比派与传统派的流血事件中，俄罗斯政府从中看到了机会，试图将瓦哈比派作为抗衡车臣分裂派的一支力量。1998年7月22日，俄罗斯总统下属的“与政治激进主义作斗争”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有司法部长克拉谢尼科夫、安全局长科瓦廖夫、内务部长斯捷帕申等人）得出结论：瓦哈比派并非激进派别[22]。俄罗斯政府的这种做法无疑是极为短视的。

北高加索地区存在着因宗教而引发的矛盾，但是，这些宗教矛盾却并非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矛盾，而是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尽管伊斯兰教与当地实力微弱的基督教之间也存在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并不占主导地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人为的意味；更本质的矛盾，是当地传统伊斯兰教派内部的矛盾。那克什班迪派与卡迪里派之间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存在竞争。在曼素尔和沙米尔时期，得势当政的乃是那克什班迪派，随后在20世纪初期，那克什班迪派的群体中，产生了车臣社会的第一个商人阶层[23]；但是此后，卡迪里派也得到长足发展，车臣领导人杜达耶夫主要依靠的就是卡迪里派。

传统教派与外来、新潮的伊斯兰教派之间，即当地传统派与瓦哈比派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矛盾：传统教派视瓦哈比派的传播是对自己的威胁，这种矛盾首先表现在两个教派之间的哲学、宗教学争论，以及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宗教学争论是其表，而政治斗争是其里。“宗教辩论演变为政治对抗，是穆斯林世界发展史上特有的特征”[24]。矛盾和对抗双方都号召穆斯林团结起来；同时，又相互指责对方叛教，意在借机将对手排挤出去。在两派严重对抗的条件下，许多政界、商界的精英人物都被迫作出选择，而且，很多时候必须作出郑重表态：应该站在哪一边。鉴于瓦哈比派的激进主张及其在世俗社会中的形象，谁都不敢冒险坦承自己热衷瓦哈比思想。由于看到了车臣和达吉斯坦的前车之鉴，北高加索其他共和国居民认识到：如果在境内实现伊斯兰激进化，会导致国内局势不稳定，因此都急于与瓦哈比派划清界限。一般说来，在这些共和国里，没有一个领导人致力于伊斯兰激进化；但是，在政治斗争加剧的情况下，这些共和国的领导人走向激进化的可能性就增大。

同时，北高加索伊斯兰教的内部矛盾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北高加索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甚至还超越了地区范围。在穆斯林占少数的俄罗斯联邦各地，如伏尔加河地区及莫斯科等，瓦哈比派往往得到同情和支持。车臣的激进分裂派提出“圣战”口号，就在俄罗斯社会以及俄罗斯境内

的穆斯林社区内部引起分裂。一些俄罗斯穆斯林支持车臣的“圣战”；但是，并不是所有穆斯林对车臣发生的所有事件都站在车臣分裂派一边；支持车臣分裂派的，主要是那些在政治上激进的穆斯林青年，他们主张穆斯林世界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异教徒，鞑靼斯坦和巴什基尔的一些穆斯林青年作为志愿者就参加了车臣战争；另一方面，伊斯兰极端化发展趋势也被一些穆斯林共和国的政治精英有意夸大，借以向俄罗斯中央政府表明一种危险性，使后者认识到：只有他们才是能够遏制这些极端派别的政治力量，以便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实际上，与俄罗斯对抗和作战的，并非真正的瓦哈比派，而是那些利用瓦哈比派的集团和势力。伊斯兰激进派的活动成为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也是独联体加强一体化的障碍。

车臣的伊斯兰复兴与国际范围内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有意无意地结合起来。由于瓦哈比派倾向于对伊斯兰世界输出意识形态，阿富汗是伊斯兰复兴事业的另一个实验场。因而，瓦哈比派甚至与“塔利班”运动结成了同盟，而这也影响了车臣的政治进程。在与俄罗斯的对抗中，车臣可望得到同情“塔利班”事业的力量的支持，乌萨马·本·拉登就曾经对车臣武装提供大量援助。车臣实现伊斯兰化，不仅表明自己独立于俄罗斯，还明确宣布自己属于另一个文明体系。从而，车臣与俄罗斯的冲突就具有了“文明冲突”，即东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的意味，而俄罗斯在处理车臣危机的时候，还要面对整个穆斯林世界，其解决车臣问题的能力将受到严重考验。车臣的伊斯兰激进化，还导致国际犯罪势力借机渗透到车臣，乃至北高加索地区。在俄罗斯法制混乱、经济动荡、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的背景下，国际犯罪集团在车臣，乃至整个俄罗斯找到了更加广阔的舞台：走私、贩毒、制造假钞、洗钱、绑架，等等。车臣一度成为俄罗斯的“国中之国”和国际恐怖主义、黑手党肆虐的飞地。

伊斯兰教不仅使车臣民族在“伊斯兰”口号下统一起来，同时，在俄罗斯与车臣的冲突中，伊斯兰世界本身也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穆斯林民族与其他民族发生争端，都会有同信仰的志愿人员前往助战，如：巴勒斯坦、南斯拉夫、阿富汗，等等。屈辱感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数个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遭受很多挫折和失败，蒙受屈辱，对于那些狂热的伊斯兰主义者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伊斯兰复兴，乃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和使命。在“圣战”的号召下，许多伊斯兰世界的人员、物质和金钱方面的援助也流入车臣，车

臣成为穆斯林世界的理想主义者们实践其宗教、政治理想的新场所。俄罗斯是一个地跨欧亚、疆域辽阔的大国，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样的疆域特点会感到易受攻击与中近东毗邻的南部边疆地区是最为脆弱的“软腹部”。伊斯兰是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而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复兴，削弱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车臣危机中的伊斯兰因素，也是外部势力反对俄罗斯、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根源。

瓦哈比思想在车臣以及北高加索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是对地区稳定的一个极大威胁；但是，任何宗教信仰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而意识永远只是这种生存状况的反映。伊斯兰激进思想的传播和发展，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车臣恶劣的社会经济状况（人民贫穷、社会动荡不安、大规模失业），才是瓦哈比思想存在的土壤，恐怖主义是这种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后果，而不是其原因。无论是俄罗斯军队、还是车臣政权，都不可能干预车臣民众的意识，更不可能因为某人信仰所谓瓦哈比派思想而将其治罪，而只能以车臣和俄罗斯联邦法律、法规作为治理社会的依据。各国历史上类似实践都生动直观地表明：对于一种信仰越是压制，反倒只会使其变本加厉地发展。粗暴、武断地对待宗教信仰，只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即：许多人会反过来增加对瓦哈比派（或塞来菲耶派）的兴趣。这些极端派别已经在北高加索地区建立起了组织机构并站稳脚跟，因此，面对任何外来压力都会导致其内部团结一致，激烈反抗；因此，用政治或军事手段压制并不可取。其次，伊斯兰激进主义还是一个国际问题，而北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教发展状况与整个国际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些伊斯兰组织和国家还将继续对北高加索的激进派别提供帮助，这就会导致北高加索内部的分裂：伊斯兰传统派别与瓦哈比派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北高加索的社会政治形势复杂化，成为该地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在车臣之后，瓦哈比思想在达吉斯坦、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卡拉恰依—切尔克斯等北高加索共和国也得到迅速发展，其手法完全类似车臣，形势已经不容乐观。

俄罗斯政府必须解决北高加索存在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消除激进思想传播和发展的社会土壤，实现该地区的社会稳定；同时，通过政治、外交的手段，杜绝境外伊斯兰国家和一些伊斯兰激进组织对北高加索地区的渗透。此外，还须制定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传播新的立国理念，对抗类似激进伊斯兰思想以及一切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思想的传播；而这种新的意识形态须像当年的共产主义理想那样，能够团结俄罗斯各民族人民（不论是信仰佛教，还是东正教或伊斯兰教）为之奋斗，甚至献

身。在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口号下，苏联时期曾经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只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才能占领俄罗斯思想的制高点；如果俄罗斯民族再次体现出这种思想创造力，标志着俄罗斯走向真正崛起将为时不远。

注　释：

〔1〕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刘振前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36 页。

〔2〕Г. В. Миронова, Ислам и политика, М, 2001, С. 292.

〔3〕А. Малашенко, Исламск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1998, С. 74.

〔4〕А. Малашенко, Исламск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1998, С. 80.

〔5〕Кавказ, http://home. ural. ru/chechnya/index. htm

〔6〕同注释〔4〕。

〔7〕А. Аймермахера,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их, М, 1999, С. 263.

〔8〕А. Малашенко, Северный Кавказ:исламский фактор//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1, №9, С. 6.

〔9〕Санобар Шерматова,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й Вахабизм, http://www. sakharov - center. ru

〔10〕Г. В. Миронова, Ислам и политика, М, 2001, С. 88.

〔11〕В. В. Черноус,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Чечни: социаль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Ростов - на Дону, 2001, С. 24.

〔12〕Александр Литвиненко, Юрий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ФСБ взрывает Россию, http://www. chechenpress. com/

〔13〕А. Малашенко, Исламск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1998, С. 168.

〔14〕Марина Перевозкина, Боевая подруга Дудаева, http://www. mk. ru

〔15〕А. Малашенко, Исламск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1998, С. 172.

〔16〕А. Малашенко, Северный Кавказ: исламский фактор//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1, №9 , С. 11.

〔17〕Санобар Шерматова,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й Вахабизм, http://www. sakharov - center. ru

〔18〕А. Малашенко, Северный Кавказ: исламский фактор//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1, №11, С. 18.

〔19〕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刘振前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32页。

〔20〕Е. И. Степанов,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терроризм: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а, М, 2000, С.134.

〔21〕Эмиль Сулейманов, Беслан как результа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Кавказе? http://www.watchdog.cz/

〔22〕Г. З. Анчабадзе , Вайнахи (чеченцы и ингуши), Тбилиси, 2002. 80.

〔23〕Г. В. Миронова, Ислам и политика, М, 2001, С.94.

〔24〕А. Малашенко, Северный Кавказ: исламский фактор//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1, №9, С.7.

第八章

俄罗斯人眼中的车臣人：文化差异与政治学

在车臣危机的爆发和发展过程中，文化差异无疑是影响该进程的另一重要因素。忽视问题的这一方面，就很难全面认识车臣危机的实质和特点，对于解决车臣问题也是有害无益的。文化差异并不总是导致政治危机，但是，文化差异却有重要的政治学意义。

有人说，车臣的文化是那种很难被现代化的文化，其内在要求是竭力保持传统。在车臣以及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其文化的特点在于：信仰伊斯兰教，男权优先，注重亲缘联系，村社生活，崇拜长老，等等；而且，许多个世纪过去了，而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社会发展仍相当缓慢。当车臣危机使车臣民族从幕后走向前台、从边缘走向焦点和核心的时候，车臣人乃至北高加索人依旧保留了许多个世纪以来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看过那些对车臣民族、车臣社会的研究著作或采访报道，让人觉得，车臣人似乎仍旧停留在19世纪的沙米尔时代。在俄罗斯作家、旅行者的笔下，异文化的文化审视就使得车臣文化具有了另一种意义。当实现现代化成为落后民族国家的咒语和走向进步的指针时，一切弱小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价值都被边缘化了。但

是，文化多元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却认同文化的差异性。那些以西方现代文明为衡量标准，看来似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依旧具有无可替代的、与其他文明平等的价值。

俄罗斯与车臣人早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一则来自战争和征服；二则来自人民之间共同的经济文化生活。毕竟，俄罗斯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而车臣是一个少数民族，俄语的信息量又远远大于车臣语。在这样一种不对等的交流中，车臣人一定程度上借助俄罗斯人的观念和印象，被外界所认知。在俄罗斯帝国以及苏联的民族丛林中，车臣人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长期以来，有关车臣的历史文化都只是作为俄罗斯帝国以及苏联的一部分被提及。

在俄罗斯境内的众多民族中，俄罗斯民族历来是领导民族，在各民族中占据主导地位。置身于众多少数民族中间，俄罗斯人对自己国内的许多民族几乎像外国人那样，缺乏了解；反过来，少数民族对俄罗斯人的了解却多于俄罗斯人对少数民族的了解。正如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那些俄罗斯人从来没有与高加索民族一起生活过，而只是在市场上或交通工具上注意过这些民族的个别代表，不仅没有像样的理由不喜欢作为整体的这些人，而且也不能判断他们谁是谁。""对于他们来说，所有人几乎都是一张脸孔；相反，高加索人对于判断一个人的民族属性却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能力"[1]，对于他们遇见的任何一个毗邻他们的边疆地区的人，甚至还不止是与他们相近、毗邻的人，他们都能够判断出那些波兰移民后代身上的"不太俄罗斯"的东西。他们可以"凭借许多不易觉察的特征，饶有兴致地猜出其民族属性，并且几乎从来没有差错"[2]。这种不对等的交流和反应，是以经济、文化的差异，甚至差距为前提的。长期以来，作为俄罗斯帝国（苏联）境内的众多少数民族之一，车臣人向来都处于边缘位置；正是车臣危机和俄罗斯—车臣武装冲突，使车臣人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从边缘走向中心。

在俄罗斯作者的笔下，车臣人的形象都是怎样被描述的呢？1823 年出版的一本《高加索人》的书中写道：按照礼节（我们可以理解为文明程度），车臣人可以分为三类："和平的车臣人"、"独立的车臣人"、和"山地的车臣人"。"和平的车臣人"，就是被武力征服的、松日河右岸 24 个村庄的居民；"独立的车臣人"，就是不友好的车臣人，有属于自己的适于种植和放牧的肥沃土地、水和森林，住在黑山山脚以南、阿克塞河和松日河沿岸地区；而"独立的车臣人"中，有一部分人是高加索有名的强盗，他们被称做"山地车臣人"。在该书作者的笔下，车臣人往

往由5到20人组成一些小的团伙，渡过捷列克河，潜伏着，把那些不加小心的旅行者或在农田干活、缺乏防范的农民当作袭击对象。如果抓到的是军官或商人，那么就将脸、手、脚都贴在墙上，监禁起来，给很少的食物，几天之后拿来纸、笔、墨，指定赎金，并通过第三者将信送到俄罗斯。要是掠夺的是普通人，就将他在市场上卖掉[3]。此外，山民还是一些不讲信义的人。19世纪20年代前后到过高加索的普希金曾经写到：切尔克斯人仇视我们。他们常常潜入山中，从那里对我们发起袭击。和平的切尔克斯人的友谊也是靠不住的：他们永远准备帮助自己同族的抢劫者[4]。



车臣人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一些俄罗斯思想家认为，俄罗斯征服高加索的战争，可以归结为："使山地民族变得文明，终止他们的强盗式袭击。这种袭击对于高加索的俄罗斯居民点是经常的和重大的威胁。"[5]

19世纪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尼·雅·丹尼列夫斯基曾经对长达60年之久的高加索战争作过评价和论述，他基本上是为俄罗斯帝国的扩张行动辩白的。他说，俄罗斯征服南方（高加索）并非因为想让俄罗斯民族居住在那里；对于北方民族来说，在南方居住简直是自杀，西伯利亚对于俄罗斯比高加索更有吸引力。作者对高加索山民充满偏见："就其狂热的宗教、生活方式、习惯以及他们所居住的国度的特性来说，高加索山民是一些天生的盗贼和抢劫者，永远不让，也不会让自己的邻居安宁……"[6]在尼·雅·丹尼列夫斯基看来，俄罗斯的征服几乎是一种高尚行动，甚至是牺牲自己的利益惠及他人："俄罗斯知道，它给自己加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尽管它也许还没有预计到，这个包袱是如此沉重，需要为此进行60年连续不断的战争。无论如何，不管是实质还是形式，这都不是征服，而是对疲惫不堪者和濒临死亡者提供帮助。"[7]

甚至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家彼斯特尔对车臣人也充满歧视和偏见。1824年，他在自己编订的宪法章节中，讲到对高加索山民的对策。他认

为，包括高加索在内的许多土地都应该归并俄罗斯："因为，为将山地民族变成和平和安宁的邻居的所有尝试，明显地、无可争辩地证明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这些民族不会放过任何微不足道的机会给俄罗斯造成尽可能的危害。只有一种手段可以将他们驯服，那就是将他们完全征服。"[8]接着，彼斯特尔写道："他们信仰不同的宗教，操不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管理方式极不相同，惟一相同的是，都热衷于相互之间胡作非为和拦路抢劫。"[9]彼斯特尔主张严厉，甚至是残酷地对待这些山民。他主张将高加索民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和平的；另一部分是狂暴的。将前者作为俄罗斯臣民对待，而将后者强制迁居到俄罗斯内地，将他们分散成数目小的若干部分，散居在俄罗斯各州；同时，在高加索建立俄罗斯居民点，将不驯顺的山民的土地分给这些俄罗斯居民。从后来的历史发展可知，这些观点与俄罗斯帝国后来的做法甚至不谋而合。许多俄罗斯政论家乃至普通民众都认为，俄罗斯对高加索的征服并非殖民行为。就连以研究高加索问题而知名的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也认为：征服高加索山民并非出于殖民目的。高加索战争直接源于远征波斯，而其战略意义甚于殖民意义，因为自由的山民部落永远威胁着俄罗斯军队；高加索战争还是一次将信仰基督教的兄弟民族，例如格鲁吉亚从其野蛮卑污的山民邻居的包围中解救出来的正当行动，几乎是在俄罗斯南部边疆发动的一次十字军征服。在俄罗斯民族历来的弥赛亚思想的支配下，波克罗夫斯基认为：俄罗斯征服这些落后的民族或者部落，是为了解放他们，为他们带来更高的文明；而征服所带来的经济、战略上的好处，俄罗斯本来就有权利追求；但是，高加索山民对俄罗斯的顽强抵抗、俄罗斯为战争付出的巨大代价，使俄罗斯人感到愤懑。



彼斯特尔

如果说，来自敌人和充满成见或者敌意方面的观点，是不可靠的，

那么，身为北高加索各民族和部落的领袖，领导他们反抗俄罗斯帝国征服的沙米尔对车臣山民也素无好感。在沙米尔看来，山民们天生酗酒、打劫杀人和淫乱，品行败坏。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沙米尔对山民采取了极为严酷的镇压措施。

然而，在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文学作品中，车臣人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山民的形象却与俄罗斯思想家的描述有所不同。一方面，俄罗斯作家仍旧描写了山民的落后、愚昧、残忍；另一方面，也对山民热情歌颂。在普希金的长诗《高加索囚徒》中，讲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位切尔克斯少女爱上了一名被俘的俄罗斯军官，这位少女不顾家族部落的规矩，将俄罗斯军官放走，然后自己投河自尽。实际上，这样的文学作品重复了男权中心时代的主题：一个女性为了所爱的人而委曲求全，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尤其所爱者还是自己的家族、部落或者民族的仇敌和侵略者。在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中，对切尔克斯人—山民大加赞美。在他们的笔下，山民或者切尔克斯人是一些骄傲、勇敢的人，但是他们按照原始的、自然的方式生活。在俄罗斯作家中，普希金、莱蒙托夫、格里鲍耶多夫、波列扎耶夫、拉多日尼茨基、费特等曾经写作大量诗文，热情洋溢地歌颂高加索以及山民。在这些山民身上，俄罗斯作家寄托了自己的某种人性与社会的理想，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在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也曾经写到了高加索山民，他们多半愚昧落后，不守法律，缺乏道德操守，但作者对他们的



莱蒙托夫的画作：《高加索的回忆》

态度却并非完全鄙视。小说在写到主人公在从高加索返回的路上，雇佣的几个山民（奥塞梯人）扛物品，山民们假意吆喝公牛前进，但实际上却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有意敲竹杠讨要小费。车主是深谙此道的当地人，他说："糟糕透了的下流胚，这些亚洲佬！您当他们吆三喝四，是在帮忙吗？鬼才晓得他们是在吆喝些什么？公牛可明白他们，就算套上20头吧，只要他们用自个的话吆喝，公牛也会寸步不移……"[10]在小说的另一处，又写到："我们那边的卡巴尔达人或者车臣人，虽然他们全是强盗胚，穷光蛋，但却是能豁出性命的硬汉子。"[11]托尔斯泰在小说《哈吉穆拉特》中写到：原沙米尔将领、闻名全车臣的哈吉穆拉特，因不堪忍受沙米尔的严峻统治以及出于对沙米尔的个人恩怨，叛逃到俄罗斯；但后来又逃回车臣，结果被追击的俄罗斯军队打死。作者写到："就是这个死，使我想起那棵在犁过的田地里被车压倒的牛蒡花。"[12]而作为呼应，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就赞美了牛蒡花，牛蒡花成为车臣民族的某种象征；"然而生命的毅力和力量是多么的惊人，它是如何顽强地防卫着，并且高价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啊"[13]。小说和其他艺术作品对于民族形象的刻画，往往流传范围更广，影响也更大。在俄罗斯优秀作家的笔下，车臣人的形象就被定格了。

十月革命以后，1917年到1920年间，车臣人与高加索其他民族一起，迸发出高度热情；开始了建立民族国家的运动，与布尔什维克一起，消灭了白色势力，建立了苏维埃国家。但是，苏维埃时期采取的激进政治措施破坏了车臣原来的社会组织和结构，激起车臣人的激烈反抗。由于反抗持续不断，车臣人被视为不安分、难以统治的民族。1921年到1925年，车臣曾经发生了大规模武装起义；苏联政府动用了大批正规军，运用轰炸、炮击的手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14]。在集体化时期，由于斯大林苏联政府强制推行集体化，破坏了车臣人的内部生活，1929年，车臣不断发生暴乱，遭到严厉镇压。在30年代的"大清洗"时期，许多车臣人遭到镇压。在整个苏联时期，车臣人遭受了许多苦难，同时也反抗不断。在一个时期里，车臣人与北高加索其他民族因为竞争而一直存在矛盾。而苏联政府也公然将车臣人视为苏联"各民族间友谊的障碍"，是一个最"困难"的民族。到卫国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车臣人遭到史无前例的流放，而在随后公布的声明中称：这是对车臣人投敌附逆的行为的惩罚。这样，车臣人就又成为一个全体成员都是叛徒的民族。他们背负着精神重负，在流放地饱经歧视和苦难。在苏联时代，通常是以一个抽象的政治标准而将人划分为敌我两派，很少有人能超越这一

法则。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曾经在小说《古拉格群岛》中，写到了身处流放地的车臣人。在作者笔下，他们是一群文化落后、缺乏创造力的人——即使在流放地，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也极其明显：德意志人“最整洁、热爱美”，希腊人有良好的道德规范，车臣人则与外界封闭起来，住在名为“萨克利亚”（сакля）的又矮小又破的小房屋里。在这一时期，车臣人的形象，就是一个全体成员在政治上有过错的民族，车臣人为此而受尽歧视。在流放地，许多民族冲突都因对车臣人的歧视而引发。在这一时期，车臣人在苏联各民族心目中消极、反面的形象，是由于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所导致的。可以说，是苏联政府将这样的形象加到这个民族的头上，而与车臣人共同居住的其他民族的代表，往往是苏联政策的盲目、盲从的支持者。

俄罗斯人对车臣人的这种消极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来自车臣人自身。对于现代文明来说，车臣民族确实是一个后来者；同时，俄罗斯帝国时期对于车臣人的长期征服、殖民统治，以及苏联民族政策所带来的民族敌意，仍然起了很大作用。在俄罗斯帝国对外扩张的情况下，俄罗斯民族对于被征服民族具有某种大俄罗斯主义色彩的优越感。丹尼列夫斯基对欧洲指责俄罗斯征服高加索感到愤愤不平。对于丹尼列夫斯基来说，俄罗斯征服高加索地区，就像是几百年前俄罗斯抵抗了鞑靼—蒙古，而在19世纪上半期打败拿破仑法国挽救了欧洲一样，理应得到欧洲的感激才是。

外部世界对于车臣人的成见还来自车臣或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独特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就如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一样，特别是中亚、中东民族：如阿富汗人、吉尔吉斯人等一样，车臣民族由若干个泰普组成。泰普是车臣社会重要的社会细胞和社会组织机制。而在泰普之下，有所谓的克郎（клан），相当于氏族；在泰普之上，通常还有图克胡姆（тукхум），所谓的图克胡姆，大致来源于沙米尔时代的、存在于车臣以及整个北高加索社会的“自由社会”，是若干个泰普的联合体。

车臣有着深刻的氏族部落痕迹，亲缘关系在车臣人社会中非常被看重。当一个车臣人在莫斯科或者俄罗斯其他城市做生意站稳脚跟，就会将一个大家族都带到这里，于是就形成一个庞大的车臣人社区。如果用一个图表的形式，就可以直观地将这种社会机制反映出来[15]。

图克胡姆

↓

泰普（тейп）长老会

↓

克郎（клан）长老会

↓

大家庭

↓

（若干）小家庭

在克郎—泰普的社会结构中由大约5名到20名成员组成一个小家庭；再由若干个小家庭组成一个大家庭，长老具有决断权，其意见是决定性的，对所有家庭成员都具有法律般的效力，并凌驾于世俗法律之上。这种社会结构的特点是：严密、封闭。在这种社会中，做出决断以及执行该决断都是高效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中写到，在中亚流放地，一个车臣人阿布杜尔·胡达耶夫杀死一位车臣老人，逃到监狱里，但是他的亲人受到死者家族血亲复仇的威胁；几位车臣老人决断，必须将杀人者当场宣判并处死，否则就处死阿布杜尔·胡达耶夫的弟弟。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往阿拉木图发电报，将车臣民族最受尊敬的长老请来。长老们召开会议，对胡达耶夫进行诅咒，宣布不论在地球的任何地方，“只要他遇见车臣人的刀子，那把刀就应该把他处死”。这样，胡达耶夫家族的人就可以自由行动，不会被威胁了[16]。

在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泰普的社会结构对该地区社会的日常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轨道，原来的自然进程被打破，这些特征并没有消失。但是，如果说当代车臣社会保留了氏族时代的特征，就等同于氏族部落的落后状况，恐怕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实际上，在宗族社会的外表之下，已经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而且，与以往相比，当代宗族势力及其组织形式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无论如何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氏族部落的生活方式；否则，也否定了车臣民族在漫长的时期内，尤其是在归并俄罗斯帝国以后，所取得的历史进步。宗族势力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表明它仍旧在某些方面适应了车臣社会生活的某些要求，具有内在的合理性。许多前代的事物在后代改头换面地回复了，而这却受到人民的认同。

一般来说，车臣社会分为9个图克胡姆。关于图克胡姆的数目，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是7个，还有人认为是13个。一些车臣人认为：印古什人属于13个瓦伊那赫人图克胡姆之一。每个图克胡姆包括若干泰普，但是，还有一些小的泰普长期游离于这些图克胡姆之外。通常来说，每个车臣人都属于某个特定泰普；反过来，每个泰普都包括一些特定的人口；可是，有一些分支很难归入某一具体的泰普，他们与其他泰普或图克胡姆的亲缘和社会差别是相对的。列举如下：

1 阿基伊（Аккий，Аьккхий），7个泰普；

2 米亚尔西伊（Мялхий Маьлхий），16个泰普；

3 诺赫奇马赫卡霍伊（Нохчмаххахой 或 Нохчмаххахой），27个泰普；

4 泰尔罗伊（Терлой 或 Терлой），10个泰普；

5 昌基伊（Чантий 或 Чаьнтий），7个 泰普；

6 切巴尔罗伊（Чебарлой 或 Чебарлой），20个泰普；

7 沙罗伊（Шарой），10个泰普；

8 绍托伊（Шотой Шуотой），11个泰普；

9 艾尔施特霍伊（Эрштхой 或 Орстхой），17个泰普[17]。

此外，尚有许多处于图克胡姆体制之外的泰普，如古霍伊（Гухой）等，大约有10多个；此外，还有一些民族起源不属于车臣民族、具有外来民族色彩的泰普，也与车臣族的泰普一起组成了完整的车臣民族。这些泰普多数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内融入车臣民族的邻近民族，数量不小：如族源为格鲁吉亚人的泰普大约有6个；族源为达吉斯坦人的泰普共31个；还有几十个族源为俄罗斯人、犹太人、阿巴金人、卡巴尔达人、诺盖人、突厥、切尔克斯人、鞑靼人等民族的泰普。现在，车臣所有已知的泰普约160个。这些由包括外族人在内的众多泰普组成的车臣民族，表明车臣民族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外族人泰普加入车臣民族较晚。

车臣民族像任何一个民族一样，绝非那么“纯粹”，其成分比较复杂、多元；同时还表明，车臣民族直到近代以来还是“开放”的，还在继续接纳外来民族成为本民族的成员，而泰普就是车臣人接纳外族成员加入本民族的重要渠道——成为车臣人的途径。但是，这些特点导致的后果是：由于车臣民族是由众多起源复杂、形态各异的部族组成，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通常就是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的，甚至还有不睦和

内讧。

泰普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许多泰普在形成之初，并不一定是由血亲关系来维系的，而多半是某种“同乡会”之类的团体，随着泰普的逐渐发展，往往将土地占有原则与血缘关系结合起来。泰普的规模大小不等，人数最多的泰普有10万人之多。每个泰普拥有一定的领土，有“氏族城堡”，以显示兴盛。规模较大的泰普，往往还有作为泰普象征的泰普山。这种社会组织可以迅速地将泰普成员组织、动员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泰普生活乃是车臣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泰普可以适应当代需要，能够完成国家体制的功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危机的条件下，泰普是凝聚成员的核心，可以保护自己成员的尊严和权益不受外来侵犯。由这样众多泰普组成的车臣民族，在和平时期泛滥着的，也许仅仅是部族主义；而在面对外敌侵犯的时候，泰普就成为组织和动员成员的重要机制。一位访学英国的车臣族学者安娜·泽尔金娜曾向西方介绍了泰普制度，一位西方人发出赞叹：泰普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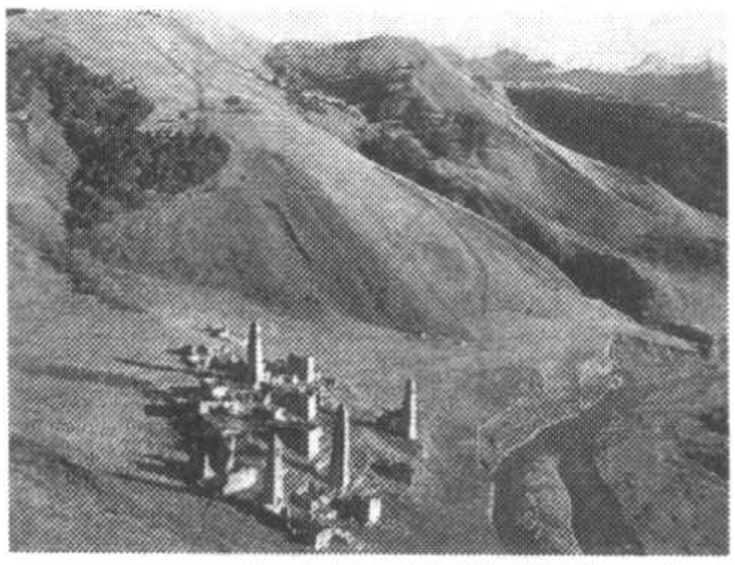
在苏联时期，泰普还是独立于苏联党政机关之外的另一套社会政治体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泰普具有了政治功能。泰普往往支持一定的政治领导人或政治派别；反过来，一个政治领导人也多半以某些泰普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础。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高加索山地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由于山地物产贫瘠，因此山民必然常常下山袭扰邻近民族。在冲突的情况下，山地民族更倾向于用武力的手段解决冲突，认为这样的解决方式更可靠、有效[19]。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20世纪90年代里，几乎所有的北高加索共和国都建立起军事组织或准军事组织，许多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近卫军。社会生活的军事化或准军事化，也是北高加索山地民族的一种特色，而车臣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移居他乡的车臣人，由于他们的亚洲高加索人体貌，在当地形成一定规模和势力，并且与外界隔绝，很少往来，因而就被看作一个神秘的外来世界。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们就被视为残酷的竞争者，对当地人造成经济威胁。有人指出：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少数民族的代表就会变得显眼。当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的情况下，也许没有人会留意到这些；但是，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社会心理就会变得不宽容，少数民族，尤其是在经济上取得某种成功的少数民族往往成为来自人口占多数

的主体民族歧视的牺牲品。在一定时期内，高加索人在俄罗斯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往往较为成功，但其地位却往往类似于犹太人，即经济地位高于政治地位，容易遭到嫉恨。在当代俄罗斯，甚至还有这样一种微妙的心理定势：当一个人被出身俄罗斯族的匪徒勒索，往往就会视为正常；而如果是被少数民族的匪徒勒索，其反应就会很负面。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车臣人乃至北高加索人的形象恶化，甚至丑化方面，部分俄罗斯媒体起了很大作用。一些不负责任的报纸，惯于采用新闻手法，或者夸大其词，或者耸人听闻，或者资讯不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但是，这样的新闻报道却往往是最受欢迎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影响最大的。许多大大小小的犯罪案件，作者往往要特意强调一下犯罪嫌疑人的高加索出身。1999 年 10 月，俄罗斯军队对车臣发动军事行动以后，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都是关于车臣人如何洗劫俄罗斯居民、绑架和杀害人质和平民，几乎是一种反车臣的歇斯底里。在一些俄罗斯人看来，车臣人是一个“犯罪的民族”，俄罗斯人对车臣人以及车臣人对俄罗斯人越来越怀有敌意和仇视。



车臣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不同的文明，却有相同的价值。对于不同的文明，我们承认差别，但是我们不能说：一种文明是有价值的；而另一种文明则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说，一种文明的价值高于另一种文明。

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对车臣人的反映，表现出历史形成的对车臣民族的偏见和成见。任何民族都有这样那样的特点，表现出某种民族性的东西。在今天，车臣分裂派从事劫持人质、恐怖爆炸、贩卖人口等活动，而且得到许多车臣人的庇护。然而，不应该只将问题的某一方面无限夸大，由于偏执而失去公正和客观。对于车臣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些特点，也要表示同情和理解。阿克顿勋爵曾经说过：历史是形成民族性格的最强有力的因素之一，车臣人的民族性格与其历史也是分不开的。在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如法兰克人、贝都因人等，都以偷盗、掠夺为荣，不事生产。车臣社会，甚至那些最远离现代文明的原始部落也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善恶标准，用我们社会的道德规范去衡量是没有意义的。遗传学成就并不曾，也不能为一个民族的道德状况提供学理上的支持。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说：“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任何关于先天的文化差异都是站不住脚的。”[20] 至于说车臣人在

二战期间的投敌附逆行为，只是表明特定环境下车臣人的政治态度，并不能表示车臣人天性不讲信义，容易变节。一个民族的个别代表的行为，不足以让这个民族全体都必须为其背负恶名。针对沙皇政府的史学家所谓的高加索山民热衷于“抢劫”和“袭击”的说法，著名高加索问题专家波克罗夫斯基指出：应该记住，高加索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游击战争，真正发生的这样的袭击也是游击行动。在当代，当全世界都从新闻媒体得知车臣人从事绑架人质、勒索财物的活动时，实际上，俄罗斯军队的这种行为也不少见。俄罗斯《新报》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雅就曾经报道了俄罗斯士兵在车臣设置“过滤营”，拷索人质等行径。双方的这些行为，只是表明车臣与俄罗斯对抗的残酷和民族矛盾乃至民族仇恨的深刻程度。

车臣民族并没有表现出比其他民族更少的才华和创造力。许多车臣族大学者、商人、艺术家、军事指挥官等，他们都是车臣民族的优秀代表。曾经亲自参加过高加索战争的俄罗斯作家、思想家托尔斯泰，在《哈吉穆拉特》中就表明了这样一个主题。小说中，俄罗斯士兵被迫打死车臣人，同时还侮辱了他们的圣地；而反过来，车臣人也蔑视和仇恨俄罗斯人。最后，俄罗斯士兵在说到那些被他打死的车臣人的时候，说：他们都是些多么好的孩子！完全像俄罗斯人一样！许多车臣人参加了卫国战争，勇敢作战，建立功勋；然而可悲的是，苏联政府却有意将其抹杀。车臣族的苏联英雄巴依布拉托夫被登记为库梅克人，马哈麦德—米尔佐耶夫被登记为塔吉克人，传奇的车臣族勇士汗帕沙·努拉基罗夫竟然同时被登记为库梅克人和鞑靼人[21]。

然而，对车臣民族，乔哈尔·杜达耶夫的遗孀俄罗斯族的阿拉·杜达耶娃却有许多溢美之辞。她认为，车臣境内发生的杀害三名英国人的事件绝非车臣人所为，而是俄罗斯特工的阴谋，是为了吓唬外国投资者，并向外界表明：车臣人是怎样的野蛮和残忍，是匪徒和恐怖分子。她还说，车臣人是一个极为知恩图报的民族，很容易忘记受过的伤害和屈辱。他们只是在复仇的时候才记得敌人，而且也不会在背后放冷枪。至于发生在莫斯科的爆炸事件，杜达耶娃也认为不可能是车臣人干的，因为这是车臣民族传统和复仇戒律所不允许的[22]。

但是，在与俄罗斯政府的对抗中，车臣激进分裂派进行诸如绑架、爆炸、劫持人质、掠卖人口、毒品贸易等活动，就使得车臣民族蒙受了恐怖分子的恶名。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事件，使美国改变了对俄罗斯在车臣军事行动的态度，开始承认这是世界反恐怖战争的

一部分，从而就更加凸显了车臣武装军事活动的非法性。当俄罗斯境内某处发生了恐怖爆炸事件，立即就会联想到车臣人，车臣人几乎成为“恐怖分子”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军队对于车臣的报复也就越加残酷。车臣人爱好自由、剽悍善战、不惯于屈从。车臣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车臣人蒙受苦难的原因之一。应该指出的是：车臣民族的许多成员选择和支持了分裂派领袖，如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等人；也有许多人支持、包庇车臣的恐怖集团或黑帮，这也是事实。车臣人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等人盗用车臣民族的名义，号召车臣人为了民族自由、独立去对俄罗斯发动“圣战”。车臣民族的名声受到极大损害，失去了文明社会的尊重。正是这些车臣领导人成为车臣民族的罪人。有人指出，他们为车臣人带来的危害，超过了斯大林和贝利亚。


每一个车臣人都是将军？

应该承认，民族之间实现沟通和理解极为不易。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在交流、交往的时候，必然存在某种文化、心理上的差异。但是，如果在一个国家中还有一个地区与该国家的政治社会体制、经济生活都存在很大差别，在一个社会中还有另一个社会时，这种文化差别就具有了政治学意义。一般来说，文化发展与政治社会的发展进程存在某种脱节时，这个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往往就想要保持文化特性和独立性，趋于保守；而对于统一国家来说，则倾向于使社会中的各个族群的特色泯灭、趋同，使社会成为一个同质的社会。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存在严重的文化差异、隔阂，再加上经济、政治利益的差别，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会有更多的可能走向冲突[23]。

当前，对于消灭与俄罗斯正面对抗的车臣分裂武装来说，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但是，当车臣危机的军事阶段结束之后，军事手段已不重要。为促进相互沟通、理解，逐步消除上述这种社会与文化差异，俄罗斯政府应着手给予车臣以更多的扶持：帮助其发展经济，提高文化，使其融入现代生活；实现现代化、车臣与俄罗斯社会的一体化；彻底消除产生恐怖主义根源，这才是根本出路。否则，在未来，车臣危机不难再起，而所谓“俄罗斯与车臣：永恒的矛盾”的命题，也许不只是一个神话。

注　释：

〔1〕M. Глобачев, Заложник свободы, http://web. vrn. ru/piligrim/

〔2〕M. Глобачев, Заложник свободы, http://web. vrn. ru/piligrim/

〔3〕同注释〔1〕。

〔4〕Яков Гордин, Кавказ:земля и кровь,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0, C. 27.

〔5〕Н. И. Покровский, Кавказские войны и имамат Шамиля, М, 2000, C. 29.

〔6〕Н. Данилев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5, C. 31.

〔7〕同 2, C. 36.

〔8〕Яков Гордин, Кавказ:земля и кровь,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0, C. 8.

〔9〕刘军宁主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 1998 年出版，212 页，C. 8.

〔10〕《莱蒙托夫诗文选》，殷涵译注，商务印书馆 1983 年出版，第 375 页。

〔11〕同注释〔10〕，第 381 页。

〔12〕托尔斯泰：《哈吉穆拉特》，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出版，184 页。

〔13〕同注释〔10〕，第 2 页。

〔14〕《关于 1925 年车臣事件的档案》，郑异凡译，《世界历史》2000 年 3 期，111 页。

〔15〕П. В. Чернов, Этно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аз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 1999, C. 125.

〔16〕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册，田大畏译，群众出版社 1996 年出版，475 页。

〔17〕http://voskres. orthodoxy. ru/

〔18〕Д. Е. Фурман, Чечня и Россия: обществ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http://www. sakharov－center. ru

〔19〕Л. М. Дробижева, Конфликтные этносы и этносн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М, 1994, C. 136.

〔20〕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第 9 页。

〔21〕Светлана Алиева, Так это было: Репрессия народов в СССР 1919—1952гг, Том 2, М, 1993, C. 172.

〔22〕Аллах Дудаева пишет книгу о своем муже, http://www. netcity. ru/2001. 8. 21

〔23〕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出版，245 页。

第九章

车臣危机与外部因素

近年来新披露的一些资料表明，车臣危机自始至终都有外来因素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同苏联解体一样，除了苏联内部的原因以外，还有导致其解体的许多外部因素；车臣危机也是如此。车臣分裂主义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外部势力企图利用这种分裂势力，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论是在车臣危机爆发之前，还是在车臣与俄罗斯武装冲突，以及至今为止持续不断的车臣非法武装对俄罗斯的恐怖袭击，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有一些影影绰绰的外部势力站在其后。客观地说，仅仅是一些车臣的分裂派武装，其能量是有限的，而且经过两次车臣战争之后，分裂派的能量即将释放完毕；在这个时期里，外部因素就将在车臣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车臣危机是西方的阴谋

车臣危机折射出来的，是苏联以及俄罗斯继承苏联的国际法主体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方面，不能孤立地去看待。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一轰动世界、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历史事件，其背后都影影绰绰地潜藏着

某些西方势力。这些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有着切肤之痛的俄罗斯普通公民和学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问题的这一方面。而车臣危机的爆发，也不完全是内部因素导致的。车臣民族分裂运动的发动，还有某些反苏联、反俄罗斯势力的背景，这一点在以前很少被人提及。苏联解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至今各国学者还在争论不休。毋庸置疑，苏联自身存在着许多问题，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撇开苏联内在的种种问题不谈，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西方势力在其中做出很大“贡献”，却也是事实。一些苏联领导人的理论和实践有意无意地符合了西方的“西化战略”，成为西方势力的代理人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第五纵队”。

车臣人是北高加索人口最多的民族。在历史上，在北高加索各民族中，车臣人向来发挥着特殊作用。不论是在沙米尔时代，还是在十月革命前后，或是在1944年流放年代，北高加索各民族都将车臣人作为自己的领头羊而亦步亦趋。按照俄罗斯学者近年来的观点，还在苏联解体前夕，西方就图谋将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地区同俄罗斯分离出来。西方势力的阴谋假借车臣领导人之手得逞，具体来说，就是1991年“8·19”事件之前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领导人多库·扎夫加耶夫所犯的政治错误，而在杜达耶夫时期则畅行无阻。西方情报部门的意图是：引爆“车臣革命”这一民族炸弹，从而在整个北高加索引起雪崩般的连锁反应。1990年前后，应许多境外车臣人的请求，乔哈尔·杜达耶夫将军提前退役，回到车臣，开始发动民族主义运动，有传言，杜达耶夫与叶利钦之间存在某种协议。这时，有人提供资金，成立一个“兄弟会”组织，对于组织的前景，有人表示怀疑。而当时就有人指点迷津，用1944年的流放事件这样的历史问题做文章[1]。车臣是北高加索人数最多的民族，是最强大的。此外，车臣人还是苏联时期受苦难最深重的民族之一。因此，选择发动和引爆车臣这颗“民族炸弹”，是精心算计过的。

策动车臣危机，目的在于将北高加索地区从俄罗斯分离出去，实现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的再解体。到车臣危机的持续阶段，外部势力的目的是：借助车臣分裂派别的力量牵制俄罗斯，使其焦头烂额，并进一步衰落。在苏联解体后的初期，俄罗斯所推行的外交政策为外国势力干预和插手车臣问题提供了可能性。苏联解体之后的最初几年内，俄罗斯外交学说没有成型和成熟，执行了明显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以外交部长科济列夫任期内最为典型，不仅政治制度完全向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转变，经济上，在美国经济学家的主持下，实行“休克疗法”，建立起

所谓的市场经济关系。同时，俄罗斯将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视为包袱，几乎在为其脱离俄罗斯的卵翼而感到庆幸；这就意味着：不论在政治、还是军事方面，俄罗斯都已经完全放弃了高加索，俄罗斯主动做出战略退缩。到1992年，由于俄罗斯漠视高加索和中亚，就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力量真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甚至早于安德烈·科济列夫访问了高加索和中亚国家，同时，土耳其和伊朗等国的官员也争先恐后地访问了这些国家。由于俄罗斯势力从外高加索地区退出，北高加索就成为俄罗斯与外部势力直接对抗的前沿地带。车臣危机，只是冰山一角，是一个被挤破了的脓包。外部势力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最终操纵了车臣分裂派的对抗活动，使其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利益。但是，外部势力利用车臣分裂势力，只是为了让其完成牵制和削弱俄罗斯国家的功能，而且，完成的是外部势力分裂和削弱俄罗斯战略中的“粗活”和“脏活”，而并非真正支持其所谓“民族自决”和允许其建立独立国家。南斯拉夫、阿富汗等地的经验已经证明，一旦车臣分裂派的历史使命完成，那么，其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也将类似于塔利班或“基地”组织。

随着科济列夫外交政策的失败，以及俄罗斯国内政治力量的重组，俄罗斯政府被迫调整外交政策，重新重视高加索地区。1993年10月，叶利钦用流血方式将议会击败并解散，在此次政治斗争中，他得到军方明确无疑的支持，开始对军方的行动表示赞赏。1993年11月，叶利钦批准了此前半年内拒绝批准的军事学说，同时指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与以前加入苏联的领土相一致。1994年12月初，叶利钦参加了布达佩斯峰会，别有所指地提到了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冷和”；而车臣战争的爆发时间也正好与此巧合，随后不久，俄罗斯就发动了对车臣的军事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发动车臣战争还是一次主动出击，表示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和转变。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外交特色，通常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但是，这次，俄罗斯实际上是向西方传达了一个严重不满的信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明确地说车臣危机是西方阴谋的，竟然是如今已被美国军队推翻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2003年2月19日，当伊拉克面临美国入侵的威胁，萨达姆政权岌岌可危的时候，萨达姆与到访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曾经有一番谈话：“再谈谈车臣问题。我们知道这是俄罗斯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我国的库尔德问题相提并论。车臣问题是美国挑起的。美国需要俄罗斯总是危机的

策源地，以便向俄罗斯施压。阿拉伯人和俄罗斯人的关系历来友好。至少在阿富汗战争之前是这样。作为朋友，当时我们并没有指责你们，只是指出这是错误的。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关于车臣的可靠信息，但是从种种情况判断，美国人在车臣问题上插了手。"[2]萨达姆这番话当然有其自身的打算，但是，说车臣危机有西方国家的背景，看起来并非玩笑。

现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强调西方间谍活动在车臣危机中所起的作用，这种活动是西方对俄罗斯既定战略的一部分。还在19世纪的高加索战争中，西方就设法毒化俄罗斯与伊斯兰力量之间的关系。西方至今还在坚持这一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的间谍挑唆叶利钦体制和车臣的领导人，促使车臣危机激化"[3]。在从车臣问题危机走向俄罗斯—车臣武装冲突的过程中，俄罗斯政府的政策前后矛盾、反复无常，本身反映了俄罗斯政府内部斗争的激烈，而这些情况同样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并且有意无意地迎合了西方国家的需要。德米特里·罗戈金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在挨着俄罗斯边界的地方制造麻烦。制造这些麻烦，意在使俄罗斯被迫长年累月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而遏制俄罗斯国家的复兴。"如果没有人妨害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独立地解决高加索问题和德涅斯特河地区问题，解开其他由于苏联解体而出现的死结；但是，有这样的印象，有人在妨害我们。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一个强大、独立、民主的俄罗斯，乃是他们的眼中钉"[4]。

西方国家对高加索的关注程度非常之高，这些国家多数是传统上参与高加索竞争的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情报部门对于车臣分裂派领袖网开一面，如，英国接受车臣分裂派头目别列佐夫斯基和扎卡耶夫等人为政治难民，并在俄罗斯政府与其多次交涉之后，都拒绝引渡，试图加以利用。英国境内还有250个登记注册的伊斯兰组织的总部，其中17个组织是被伊斯兰国家查禁的，但是在英国却得到合法注册，并且招募和培训在北高加索活动的恐怖分子。

高加索地区对车臣问题的态度

车臣与俄罗斯的对抗，使整个高加索地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了进来。由于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北高加索各民族日常生活和社会政治进程方面的联系都很紧密，也有某种心灵上的默契。在整个地区，各民族交错杂居，任何一个行政主体内都有其他行政主体的主体民族的亲族。因此，一个行政主体内发生民族冲突，往往会牵动整个地区。俄罗斯的

北高加索各共和国与南高加索独立国家之间的联系，要多于北高加索各共和国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联系；因此，车臣危机实际上是整个北高加索，甚至整个高加索政治进程的一部分。

对于车臣与俄罗斯中央政府的对抗，这些行政主体多半持观望态度或等待时机。如果车臣独立成为现实，那么形势会很明朗，高加索各民族如印古什人、切尔克斯人、卡巴尔达人、奥塞梯人等很可能将以车臣为榜样，步其后尘，走向独立。但是，在车臣的分裂行动受挫后，北高加索其他民族出于自身利益，同时慑于俄罗斯的强大，没有参加到车臣武装的分裂活动中去。在车臣走向独立的时刻，连车臣人的“兄弟民族”印古什人也在犹豫不决；正由于此，1991 年 9 月，车臣和印古什已经实际上走向分离。1992 年 6 月 4 日，俄罗斯政府将印古什与车臣分离：印古什留在俄罗斯联邦内，建立单独的自治共和国；这也是俄罗斯政府防止印古什与车臣结盟的一个步骤。但是，除车臣以外，其他北高加索共和国同样处于事实上的不受控制的状态，个别共和国还有自己的军队，如印古什、奥塞梯、达吉斯坦，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其领导人的言论俨然如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可以说，从政治地位上说，这些共和国处于“独立”和“不独立”的边缘。俄罗斯与这些共和国的边界也几乎只具有象征意义。

1994 年 11 月 28 日，车臣战争爆发在即，在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倡议下，征集一封致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呼吁书，请求俄罗斯总统采取一切措施，恢复宪法秩序。在他的压力下，车臣周边的俄罗斯行政主体领导人纷纷签名，其中包括：亚迪格、北奥塞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斯塔夫罗波尔、卡拉恰依—切尔克斯、罗斯托夫州；但是，印古什共和国总统阿乌舍夫和达吉斯坦总统马格迈多夫·马格迈德·阿里拒绝在其上签字。原因很简单，印古什人与车臣人是同源民族，印古什共和国境内本身也有车臣族居民；达吉斯坦境内同样有大量车臣族居民。车臣也希望北高加索各共和国与自己互相呼应，共同行动，提供支持。1994 年 12 月 11 日，当俄罗斯军队经由达吉斯坦和印古什进入车臣境内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戏剧性情景：在达吉斯坦的哈萨维尤特附近，俄军被当地阿金人（车臣人的一支）阻拦；一些俄罗斯军人甚至被俘虏，转送到格罗兹尼。俄罗斯军队途经印古什的时候被阻拦，甚至还遭到射击，一些武器装备被损坏[5]。这就直观地表明了这些地区对俄罗斯政府发动的军事行动的态度。

到 1999 年 10 月，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前后，只有印古什总统鲁斯

兰·阿乌舍夫对军事行动提出疑议。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为此抱怨：他们表现得似乎战争不是在他们身边进行，而是在月球上一样[6]。但是，车臣分裂武装仍然得到这些共和国别的方式的支持。首先，车臣武装在这些地区有很好的民意基础，特别是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之前。较之于俄罗斯联邦军队，许多当地居民更同情、欢迎和支持车臣非法武装，一些车臣武装分子在这些地方得到庇护；其次，车臣战争之后，印古什、达吉斯坦等接纳了许多车臣族难民，其中一些人与车臣境内的恐怖分子有某种联系；车臣武装甚至还得到来自这一地区人员的补充，这就使得这些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形势复杂化。车臣与周边共和国（州、国家）山水相连，许多行政主体之间至今都没有明确划界。因而，恐怖分子往往能在遭到打击之后迅速撤离，并在群山中找到藏身地。由于这些地区属于俄罗斯南疆，客观上俄罗斯对其政治、军事控制较弱，外部势力极容易从这里渗透，特别是达吉斯坦等共和国容易成为外部势力与车臣境内非法武装联系的通道。由于这些因素，俄罗斯政府对车臣用兵就涉及整个地区。俄罗斯军队的清剿行动很难奏效，原因往往就在于此。没有这些支持，车臣分裂武装要在该地区立足和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2004 年 10 月 13 日，联邦安全部门人员称，马斯哈多夫和巴萨耶夫等人领导的非法武装利用印古什的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在印古什发现并摧毁了 10 个基地，还发现了大批弹药[7]。

南高加索三国的情况则又有不同。苏联解体之后，三国已经成为独立国家，它们都必须做出自己新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选择，而车臣危机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整个地区，影响到三国与中近东、外部世界的联系。

在俄罗斯反车臣的行动中，格鲁吉亚是支持车臣分裂武装的重要国家。还在杜达耶夫时期，外国组织就在车臣和格鲁吉亚境内建立了许多训练营，培训小分队，担任教官的是来自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家的人员。许多车臣武装分子在格鲁吉亚境内藏匿，并得到格鲁吉亚的庇护和帮助；为此，俄罗斯多次向格鲁吉亚发出警告。该国持这一立场，既有其历史传统——历史上车臣人和格鲁吉亚人就互相支持，也有其现实的利益关系——格鲁吉亚境内有大量车臣族居民，还有外部因素在发生作用——格鲁吉亚已经转向了美国和北约，北约可以在其境内部署预警侦察机。马斯哈多夫等人曾答应：支持格鲁吉亚在阿布哈兹问题上的立场，以换取格鲁吉亚对车臣的支持，共同反对俄罗斯。谢瓦尔德纳泽曾经声明，原则上不反对车臣难民进入格鲁吉亚山区避难，前

提是：他们要获得联合国资金的资助。1999 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后，格鲁吉亚总统还下令：必须给车臣以全面的支持。法国情报机关曾分析，格鲁吉亚有 15 到 20 个车臣训练营。法国的情报还表明，格鲁吉亚设法让车臣人占领某些军事目标，甚至想主动挑起俄罗斯对其发动打击；这样，格鲁吉亚就会找到一个口实，说俄罗斯在打击平民，使自己的反俄行动得到国际舆论的同情[8]。2004 年 9 月 14 日，在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俄罗斯威胁要对恐怖分子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驻格鲁吉亚大使理查德·麦尔斯承认：在靠近潘基希峡谷的地方，还有一些国际恐怖分子和一定数量的车臣战士。美国大使说，在格鲁吉亚恢复对该地区的控制之前，那里有国际恐怖分子，而在格政府采取行动之后，已经减少了 2/3[9]。

此外，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车臣问题的解决中占据重要地位，俄罗斯必须借重这些国家才能更有效地巩固在车臣所取得的军事、政治成果。鉴于阿塞拜疆的宗教和民族心理以及其外交政策，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冲突中，俄罗斯采取了支持亚美尼亚的态度，并长期在亚美尼亚保留军队作为对阿塞拜疆的威慑。相应地，阿塞拜疆也是外部资金、人员、武器等流向车臣非法武装的一个过境通道。阿塞拜疆境内也有车臣族居民和难民，一些报道说，这些车臣人曾经资助过车臣非法武装。俄罗斯学者认为，在美国策动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已经加入反俄阵营，而格鲁吉亚境内的车臣武装分子“不是一帮散兵游勇，而是一支利用格鲁吉亚领土、拥有特定战略目标的特种部队”。车臣山区有 1500 名武装分子在活动。如果没有外界支持，这些人看上去一定是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但是，从装备、战术以及政治角度看来，他们更像是一支特种部队[10]。

反俄宣传：台前与幕后

众所周知，媒体在现代国际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有助于控制大众意识和社会舆论，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媒体服务于特定的政治集团，其信息来源、传播的各个环节，都可以被人为地控制。冲突和斗争各方都要运用这一武器，竭力丑化对方，使其处于被谴责的地位。媒体报道是有倾向性的。媒体报道的倾向性，表明的往往是操纵媒体的集团或势力的政治态度和政治需求，任何国家的媒体都不是完全客观、中立的。通过控制媒体来控制舆论，对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具

有重大意义。控制舆论的能力，也是体现一个政府对国家的控制能力的重要指标。在这方面，俄罗斯有前车之鉴，特别是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当车臣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和欧洲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几乎全是消极、否定的，完全不利于俄罗斯政府。诚然，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军队在车臣确实有侵犯人权的情形，一些军人对车臣平民甚至有犯罪行为。俄罗斯媒体自身也有这方面的报道，而且至今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人都有人因滥施暴力而被提起诉讼。俄罗斯军队在车臣侵犯人权的报道充斥着西方以及西方以外一些国家的媒体，其实质，首先是车臣非法武装在对俄罗斯的“宣传战”或“信息战”方面占了上风。现代社会信息流布渠道众多，传播速度加快，无论是传统的媒体如报纸、杂志和电台电视，还是因特网等，都在信息传播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敌对各方都利用宣传机器为自己服务，这是冲突或对抗的另一条重要战线。

从车臣战争爆发之初，车臣非法武装就与俄罗斯方面展开宣传战，其主体有三个：俄罗斯媒体、西方媒体、车臣媒体（主要是“高加索中心”通讯社）。对于对抗双方中的弱者一方来说，信息战最为有利，是最为有效，甚至也是惟一有效的斗争手段。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分裂派在军事上逊于俄罗斯，但在宣传战方面，车臣方面却赢得了主动，当然，其中也有俄罗斯国内人权组织、反对党炮制的舆论的“功劳”。俄罗斯被迫停战，并与车臣方面签订和约，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舆论对自己十分不利，即在宣传战方面失败了。车臣分裂分子认识到自己与俄罗斯的军事政治实力不可比拟，因此竭力在宣传和外交方面胜过俄罗斯，试图借助国际社会和俄罗斯国内的舆论来对俄罗斯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俄罗斯终止在车臣的军事行动。他们向国外媒体提供只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让西方国家相信：高加索正在发生人道灾难，俄罗斯正在消灭车臣民族，实施“种族灭绝”。网络媒体是信息战资源的主要载体。车臣分裂派擅长此道，能够十分有效地运用网络资源。他们开设了自己的网站并通过电视等发布信息，宣传车臣的历史、文化，按照自己的需要解释现状。域名为 www. kavkascenter. ru 的网站是关于高加索的资讯方面较为著名的网站，其网页是被登录和浏览次数最多的[11]。该网站最初设在立陶宛境内，后在俄罗斯政府的压力之下被迫关闭；但是，有报道说，该网站的 IP 地址的服务器已于 2004 年 10 月转移到芬兰境内[12]。

以网站 www. kavkaz. org（其思想领袖乃是车臣分裂派的著名意识形态专家莫伏拉迪·乌杜戈夫）为例，该网站成为车臣对俄罗斯信息战中的“佼佼者”。表面上看，该网站的信息是客观、多元的，但是，这些

信息都经过了严格筛选。如果将这些信息加以分类，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 评论车臣乃至整个高加索的军事政治局势，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车臣非法武装得到世界上大量支持。这些内容主要包括：如《致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的呼吁书》等；2. 指责俄罗斯政府和达吉斯坦政府使达吉斯坦局势恶化，将共和国境内任何的局势恶化都视为俄罗斯当局的错误；3. 唤起网页浏览者的宗教感情，例如在“伊斯兰教”网页栏目中，往往有这样的口号：“我们的力量在于统一！我们的主要武器就是信仰和知识！让真主保佑我们！”等；4. 谴责俄罗斯人对高加索人的种族主义。一个主题是：俄罗斯联邦无视境内少数民族的利益，借以煽动民族间冲突。例如，会有这样的内容：“俄罗斯人蔑视所有的高加索人”；“这里正在产生带有俄罗斯面貌、俄罗斯狂热、成见的法西斯主义，它在我们的生活条件中生根”；等等[13]。将网站内容做技术统计之后，得出数据如下：近60%的信息都是反俄宣传；25%的信息是宣传伊斯兰价值观的；近10%的信息则是报道和评论国际时事的[14]。从对网页内容的回馈可知，这些信息对俄罗斯受众的影响很小；但是，却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媒体。西方媒体，如CNN和BBC网站上的大量评论，其观点与分裂派网站的文章观点极其相似。此外，还有多个相关网站，一看可知其车臣背景。对这些网站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多数来自外国和一些伊斯兰激进组织。2004年10月7日，车臣新任总统阿卢·阿尔汉诺夫在斯特拉斯堡的会议上发言称，车臣武装“不仅在财政方面得到境外的支持”，呼吁欧洲国家协助俄罗斯关闭分裂分子设在境外的信息中心。不仅要剥夺其支持和资金，而且还应禁止其得到信息保障[15]。

俄罗斯国内人权组织的舆论宣传，是反政府宣传的另一个主体。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助，通过操纵这些非政府组织，间接兜售有利于西方国家的观念，从而影响俄罗斯社会。这些做法对俄罗斯社会的影响更大，对俄罗斯国家的“杀伤力”更大。实际上，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本身就是流品不一、鱼龙混杂的。许多类似基金会有外国情报机构的背景，并为后者提供服务。同时，西方国家的基金会或慈善机构也只对那些言论和活动符合西方利益和需要的组织提供赞助。西方赞助者的原则是：谁付钱，谁就可以点音乐[16]。在俄罗斯维权组织中，最著名的当数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和纪念碑（Мемориал）协会，而国际赫尔辛基委员会领导人就是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她本人于1984年移居美国，她撰写的《苏联持不同政见史》还是研究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重要著作。1999年，当北约轰炸塞尔维

亚的时候，阿列克谢耶娃曾致当地维权组织一封公开信，“建议”他们不要对北约的轰炸提出抗议。

以下是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的资助者：

自由之路，政府性质，瑞士驻俄罗斯使馆；
国际发展部，政府性质，英国；
欧洲委员会，政府性质，欧洲；
美国福特基金会，私人性质；
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私人性质；
马特拉（MATRA），政府性质，荷兰驻俄罗斯使馆；
开放社会研究所，隶属于美国索罗斯基金会；
英国外交部；
国际开发署（USAID），美国，政府性质。[17]

这些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属于美国或北约国家政府部门，在苏联—美国对抗年代曾服务于“冷战”目标，包括：资助俄罗斯反社会主义、反爱国主义的派别、组织、政党等；通过建立和资助教育系统、自由媒体和电视台传播西方的自由思想，逐渐从国家那里争夺文化、教育、社会、慈善等功能。这样，政府就失去了对这些领域的控制，从而为将该国“和平演变”创造了条件。在这些基金会和慈善机构中，有许多与中央情报局有合作关系。所有这些组织中，有 7 个是官方性质的，而且除瑞士以外，全都是北约成员国。除了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之外，其他维权组织的赞助者也主要来自境外。由于俄罗斯维权组织在财政上对西方，主要是美国基金会和“慈善机构”的依赖性，在车臣等问题上，他们都站在西方立场上。2001 年，福特基金会资助 21 个俄罗斯维权组织，总金额大约为 500 万美金，接受赞助最多的是莫斯科“纪念碑协会”，共约 350 万美金；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得到大约 7 万美金；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得到大约 10 万美金；其他组织也分别得到数目不等的资助。同时，这些“慈善基金会”也会帮助俄罗斯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以便提升自己的公众形象，掩盖其他目的，如：2000 年为印古什的车臣难民以及从其他前苏联国家前往俄罗斯中部的俄罗斯族移民提供援助，等等；但是，数额只有 65000 美金，比起那些明显反俄、亲美的报纸来，资助力度要小得多[18]。

西方媒体的反俄立场极为明显，其惯常做法是：攻击俄罗斯军队在

车臣践踏人权。客观地说，这些情形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这些报道充满偏见，倾向性明显，有许多夸大和不实之处，如美国的主流媒体在报道俄军强攻格罗兹尼时，将其与二战时期希特勒军队进攻斯大林格勒相提并论，而车臣非法武装则成为英勇抵抗侵略的“苏联红军”，导致俄罗斯国家形象受到极大损害。俄罗斯捍卫主权的正当行动，被说成是对车臣人的“种族灭绝”。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西方媒体渲染俄罗斯军队的类似行为，并非真正关注车臣的人权，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写到：对于那些试图找到自我认同、并重新开辟民族归属感的民族来说，敌人是极其重要的，最危险的冲突，往往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按照亨廷顿的理论，美国为了保持自身认同，必须找到敌人。一位法国学者对美国主流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关于车臣报道性文章的语义学分析表明，这些文章表面上关心车臣平民，实际上却反映了美国民族认同的重建过程，并对这一进程做出贡献，其目的在于：确立并巩固了美国人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感[19]。类似文章的初衷，是出于美国社会实现认同的需要，但是，极有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而这似乎正好符合亨廷顿的理论，即：正是通过与敌人的对抗，实现民族定位。美国的日报在制订美国人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认同，美国人的自我意识和认同反映在这些报纸上；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对对方的观念反映在媒体中[20]。西方媒体与俄罗斯国内的人权组织以及车臣分裂势力的宣传互相呼应，对俄罗斯政府构成巨大压力。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反对车臣战争的舆论在俄罗斯社会占了上风，俄罗斯政府方面在政治、道义方面遭到重大失败。

2001 年“9·11”事件之后，美国赢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声援，得到道义、政治的支持，俄罗斯也对美国提供了许多可贵的支持，希望用这些让步来换取美国在车臣问题上改变立场和态度。在短期内，美国主流媒体对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的谴责减少。但是，通过一段时期的实践看来，美国并不认同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是反恐行动，美国仍然在反恐问题上坚持双重标准，俄罗斯为此不断发出抱怨，美国继续批评俄罗斯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到 2001 年 12 月，美国和欧洲就恢复了对俄罗斯在车臣行动的照例的批评。这些情况反映了：美国与俄罗斯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美国在高加索有着长期利益，美国与俄罗斯的利益是根本冲突的；美国国内，特别是政府内外反俄势力强大。在没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下，美国不可能与俄罗斯持共同立场。

车臣分裂派的资金来源

车臣分裂派有许多获取资金的渠道，这是其与俄罗斯长期对抗的物质前提之一。分裂派通过各种手段从俄罗斯银行获得大量资金。在与俄罗斯武装对抗的同时，车臣分裂派也在金融方面发动了进攻，即通过假发货单，利用假造的企业和商业银行的名义骗取资金。在车臣宣布独立的两年时间里，车臣从俄罗斯银行中掠走大约4000亿卢布，而且全是现金，按照当时的汇率，值3亿多美金。俄联邦内务部的部分调查资料表明，从1992年到1994年，调查的11起类似刑事案件涉案金额达1130亿卢布，400多个发货人基本上全是虚假的企业和商业银行。417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99人是俄罗斯族，151人是车臣族，26人是印古什族。据估计，被通缉的罪犯多数藏身在车臣和印古什。而北高加索的这些犯罪实践及其经验，也被在俄罗斯腹地运用。这些犯罪活动取得成功，就有可能形成稳定的犯罪集团[21]，和资助犯罪集团的活动。车臣能够成为国际黑手党的演练场，原因就在于车臣的特殊地位：事实上不受控制和法律上的不独立。车臣战争爆发后，从事银行贸易的车臣犯罪团伙遭到打击；而印古什族从一开始就没有恶化与莫斯科关系，其犯罪团伙就从中受益，一下子变得极为富有。

绑架人质是获取收入的重要来源。据统计，仅仅1991年到1992年间，车臣境内就发生了1200起谋杀案件，起因是为争夺财产和资金而引起的纠纷；随后，这种办法成为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之一。从1995年到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之前，北高加索地区超过1700人，而据非官方的统计数字，有2000多人被绑架。用这种方式获得的资金大约在2亿到3亿美金之间。杜达耶夫时期，就有恐怖分子通过袭击火车而获得大笔资金；而从1993年到1994年，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资金大约为400万美金。

车臣非法武装的另一个资金来源，是来自制造和贩卖毒品的收入。在格罗兹尼四十中发现了一个属于沙米尔·巴萨耶夫的实验室，是用于生产毒品和武器的。为了顺利发展毒品贸易，沙米尔·巴萨耶夫甚至买下了几架单马达轻型飞机，经车臣—俄罗斯边界运送毒品。除巴萨耶夫以外，几乎所有的“野战指挥官”，如哈塔布等人都有自己的毒品加工厂。车臣一度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毒品供应者，其数量达数百吨。据说，从毒品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已经接近车臣从石油出口及掠夺人质所获的

收入。

来自石油销售的收入。从 1991 年到 1994 年，车臣变卖了大约 4000 万吨的石油产品。国际伊斯兰激进势力和一些与俄罗斯有竞争关系的跨国公司，将车臣视为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盟友。从 1994 年到 1995 年间，因为车臣非法武装堵塞石油管道这一行动，车臣从国外非政府组织获得资金估计在 15 亿到 20 亿美金之间。1996 年俄罗斯与车臣签署了《哈萨维尤特协议》之后，马斯哈多夫政府立即从两个方面获得大笔资金：来自“世界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专家，用于在北高加索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国家；一些跨国公司，用于控制里海的石油管道。这样，车臣当局从各个方面获得几百亿美金，而如果实现这些计划，就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几千亿美金。按照车臣分裂武装的计划，用这些资金，就有可能使整个北高加索完全脱离俄罗斯，在伏尔加河地区建立类似的伊斯兰教国家，并将钻石和黄金的开采及不少于 50% 的俄罗斯银行系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比较奇怪的是：俄罗斯自身为车臣提供了许多资金和武器来与自己对抗。由于俄罗斯政府和联邦军队内部对资金管理不善，腐败无能，许多人进行贪污或武装走私，趁机发“国难财”，尤其是在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许多用于车臣重建的资金都被车臣武装用来武装自己或中饱私囊。俄罗斯在车臣重建政权以来，俄罗斯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住房补偿、补贴等名目的资金，最后往往被用于恐怖分子从事恐怖活动的经费。恐怖集团头目沙米尔·巴萨耶夫曾经说过：我作战依靠的是俄罗斯联邦预算中的扣除款[22]。

境外势力对车臣的资金赞助额度极其巨大。俄罗斯安全部门曾经公布车臣非法武装的境外资助者名单，涉及几十个国家的大量私人或官方组织：

1. **阿尔巴尼亚**：“马克—阿尔巴尼亚”；伊斯兰宗教基金；麦加、麦地那两禁地组织；
2. **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武装伊斯兰小组”；
3. **阿富汗**：“塔利班”运动、“阿富汗伊斯兰党”、“基地”组织；
4. **保加利亚**：“争取人权与自由运动”、穆斯林最高委员会；
5. **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穆斯林青年组织、奥伊尔—特拉夫尼克与“满月—号角”联合企业、“Б 与 Г”情报文献社；
6. **英国**：“瓦依那赫人”伦敦处、国际阿列尔特、“侨民运动”、软件信息 2000 有限责任公司、伊斯兰复兴中心；

7. **德国**：德意志—高加索协会、赫尔伯公司；
8. **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圣战组织；
9. **约旦**：伊斯兰拯救阵线、车臣与高加索—切尔克斯社团、“波斯湾银行”分行、伊斯兰解放党、切尔克斯慈善协会；
10. **伊朗**：“那克什班迪”苏菲教团、“卡德里”苏菲教团、“逊尼派组织”；
11. **也门**：改革党、“拯救小组”集团；
12. **卡塔尔**：卡塔尔慈善协会；
13. **科威特**：“社会改革协会”、科威特复兴伊斯兰遗产慈善组织、宣传与指导组织、“伊斯兰立宪运动”组织、“亚洲”穆斯林委员会组织、“泰巴”慈善基金会；
14. **利比亚**：伊斯兰神学者组织；
15. **摩洛哥**：伊斯兰会议组织；
1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斯兰召唤组织地区局；
17. **巴基斯坦**：伊斯兰协会、国际伊斯兰神学者组织、巴基斯坦神学者协会、巴基斯坦伊斯兰协会、巴基斯坦—车臣友好协会、“世界圣战基金会”、“忠诚”组织、“感谢安拉”组织、圣战者运动、“胜利力量”集团、青年阵营组织；
18. **巴勒斯坦**：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不妥协者”集团、伊斯兰统一组织、援助者阿斯巴特组织、圣训组织、圣战组织；
19. **波兰**：车臣信息中心、波兰—车臣委员会；
20. **沙特阿拉伯**：世界伊斯兰联盟、达吉斯坦宣教组织、“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代表大会”、协助达吉斯坦穆斯林取胜委员会、伊斯兰宣教组织、“两禁地”基金会、国际伊斯兰拯救组织、世界伊斯兰青年大会；
21. **美国**：高加索—美国工商院、车臣伊斯兰银行家小组、美国伊斯兰最高委员会；
22. **土耳其**：沙米尔基金会、达吉斯坦阿特拉克组织、“正确道路党”、“伊斯兰秩序策源地”、中东突厥人同盟、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友好基金会[23]。

除了输入资金以外，还输入了人员和武器。在俄罗斯军队俘获的武装分子中，除了来自个别国家的车臣族以外，还有许多其他民族的雇佣军和志愿者。这些伊斯兰志愿者和外国雇佣军的来源非常广泛：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约旦、阿联酋、科威特、也门、

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业国家、中国新疆（“东突”分裂分子）及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特别是车臣恐怖集团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也有关联。2004 年，俄罗斯安全部门称：著名的“野战指挥官”哈塔布本身就是“基地”组织成员，该人已于 2002 年被俄罗斯安全部门用投毒的方法清除。至今为止，北高加索地区有“基地”组织的 10 个代表在活动，其中引起俄罗斯安全部门特别关注的是阿布·哈夫斯。他是“基地”组织在车臣的负责人，负责国外对车臣武装提供的资金分配、制定行动计划等；俄罗斯情报部门甚至确信：正是他资助了 9 月 1 日的别斯兰人质事件[24]。2004 年 10 月，新任车臣总统阿卢·阿尔汉诺夫在斯特拉斯堡发言，再次表示，有许多事实表明，车臣恐怖分子中有许多是来自欧洲等国的公民[25]。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车臣只是一个切入点，美国和北约已经渗透到了整个高加索和中亚地区。通过扶植与美国和北约合作的当地政权，美国和北约的势力已经在外高加索站稳脚跟，并且与个别国家还建立了军事合作。

由于中、近东伊斯兰国家在意识形态、文化、资金、政治等各方面的影响，导致车臣到高加索以至俄罗斯全境伊斯兰教的激进化。在苏联时期，一道“铁幕”将苏联与西方世界隔绝，西方思想难以渗透到苏联内部；苏联解体后，不仅有来自西方、而且还有来自东方的思想渗透到俄罗斯。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反恐行动收到成效，俄罗斯国内的社会政治状况好转，那么，影响车臣问题的内部因素日渐淡化，真正在操纵车臣分裂活动的是外部势力，而且，外部因素将成为最终解决车臣问题的关键性因素。

西方、俄罗斯、伊斯兰世界：文明的冲突

影响车臣问题的外部因素主要是两种势力：西方势力和伊斯兰教激进势力。在西方、伊斯兰世界、俄罗斯三者之间，存在着地缘政治和地缘文明方面的斗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文明的三角。

俄罗斯与西方

俄罗斯—西方，特别是美国，不仅仅是国际关系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哲学、文化学命题。俄罗斯的人文地理状况，决定了它的历史发展进程游离于东方和西方、欧洲和亚洲之间。因而在外部世界看来，也就是既非东方、亦非西方；既非欧洲、亦非亚洲。大致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

俄罗斯开始面向西方，从此患上了严重的“欧洲情结”，加入欧洲并成为西方文明家庭中的一员是其夙愿。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将亚洲视为落后的代名词；但是，在西方看来，俄罗斯却是个异类。加上俄罗斯自身的主客观条件，西方世界不会将俄罗斯接纳为与自己权利平等的伙伴和成员。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迅速转向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仍然没有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并不放松对俄罗斯的排挤和敌视。在所有脱离俄罗斯卵翼的前苏联地区，如波罗的海国家、外高加索三国、中亚国家等，西方都极力排挤俄罗斯，甚至北约东扩的进程加快，其触角已经延伸到了俄罗斯的边界。这些都深深地伤害了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巨大民族苦难、有过切肤之痛的俄罗斯人开始从迷梦中醒来。当代俄罗斯思想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有一个极为著名的公式：瞄准的是共产主义，击中的却是俄罗斯，即：无论俄罗斯具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建立起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西方都是要加以遏制甚至消灭的；所谓意识形态对立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招牌之下，西方已经将苏联摧毁，包括苏联人自身也亲手摧毁了这个国家和制度；但是，冷战结束之后的政治现实却表明：西方世界仍然要像摧毁苏联一样摧毁俄罗斯。冷战之后，西方又发动了“温和战”（亚·季诺维耶夫用的术语，介于“冷战”和“热战”之间，或者像叶利钦等人所说的“冷和”），甚至是“热战”，1999 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发动的战争，以及车臣、利比亚、伊拉克就是这样的热战[26]。按照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的观点，西方世界已经日益联合起来，并且其社会结构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之上，逐渐形成了一个超级社会（组成超级社会的，乃是西方世界的上层），超级社会主宰着整个世界。超级社会的使命，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这个过程与全球化进程是同步的。在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看来，全球化是世界大战的同义语。超级社会主宰下的西方世界，想要在全球范围内消灭异己，以便他们在其间生活得更为舒适。

1999 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目的是消灭对西方世界的不驯顺者，肢解斯拉夫世界，打击俄罗斯的斯拉夫兄弟民族和俄罗斯在东欧传统的基地和盟友，控制波斯尼亚这一出海口，将西方的力量与小亚细亚的土耳其联结起来，对俄罗斯形成合围之势。为此不惜扶植具有伊斯兰激进主义性质的波斯尼亚，使俄罗斯与东欧隔绝开来[27]。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了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美国的“温和

战”阶段结束，进入了“热战”阶段；同时，对于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来说，该事件也是一个转折点。9月11日事件之后，美国立即宣称：是乌萨马·本·拉登及其领导的“基地”组织所为，并迅速形成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总统布什明确要求世界各国做出选择，提出：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正是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号召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都发动了战争，加紧在高加索、中亚地区的活动，并在多个国家都建立了军事基地。在“9·11”事件之后，为了解决内政和外交问题，俄罗斯政府迅速地与美国站到一起，认为俄罗斯与美国有着共同敌人，实际上就是伊斯兰激进主义，因而有共同利益。俄罗斯政府做出种种姿态，向美国频频示好：关闭与西方争吵多年的设在越南金兰湾和古巴的卢尔德军事基地，并且说服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驻军，而这些军事基地原本是用来驻扎俄罗斯军队的。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期间，俄罗斯向美国提供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普京总统并且表示：对北约东扩不再感到过分忧虑，他认为北约更多地是一个政治组织，而不是一个军事组织。俄罗斯社会弥漫着亲美、亲西方的情绪，民意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俄罗斯国民对美国表示同情和支持。在普京访问美国期间，作为俄罗斯参加以美国为主导的反恐联合阵营的回报，美国总统布什在车臣问题上做出让步：部分地认可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是反恐行动，车臣恐怖分子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有一定联系，对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的谴责调门降低。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要求俄罗斯政府与恐怖分子谈判；并且很快就又恢复了对俄罗斯的批评和攻击。而且，尽管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已经基本取胜，但是，美国并没有明确的撤离时间表，美国谋求在中亚驻军长期化。美国的这些行动不仅让俄罗斯感到不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问题并不在于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有人甚至认为“9·11”事件本身是一个阴谋），而是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反对恐怖主义作为幌子，目的却是要打压伊斯兰世界，如阿富汗、伊拉克等。在这种宣传下，伊斯兰世界被“妖魔化”。亚·季诺维耶夫认为，在镇压伊斯兰世界之后，美国的下一个目标是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如朝鲜。到一定的时候，用反对恐怖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其资源终究会枯竭，且对中国等国家师出无名，那该怎么办呢？但是，西方可以着手对付反全球化主义者，而为了对付共产主义中国，也可以重新复活

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看看那里，中国担当“世界之恶”的角色已经成熟[28]。甚至有人认为，为什么至今没有抓到乌萨马·本·拉登？如果本·拉登被抓到，那么，所谓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神话将不再生效。

俄罗斯国内有许多亲西方政治组织，其中，一部分政治派别是苏联时代培育起来的，他们曾经作为“第五纵队”，在摧毁苏联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还有一部分则是解体后逐渐形成的，他们得到西方的支持，或者说，本身就是西方通过各种手段着意培植的，成为西方利益在俄罗斯的代言人。通常来说，这些亲西方派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极为活跃，得到外国支持，社会能量巨大。在他们的操纵下，一些媒体、社会组织等向俄罗斯社会灌输反华、反伊斯兰的观念，渲染“中国威胁论”或伊斯兰威胁——所谓“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左右俄罗斯政府的决策，并且在政府内部长期缺乏制衡的力量。

俄罗斯向西方靠拢以换取西方友谊、加入西方共同体的努力，最终往往得不到善意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将逐步变得强硬，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日渐上升。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看来，美国已经是俄罗斯最危险的敌人。亚历山大·杜金认为，在美国主导的世界里，俄罗斯将没有在地缘方面独立存在的任何机会。而凡是俄罗斯的爱国主义者，相应地，必定也是一个坚定的反美主义者[29]。

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势力，乃是卷入车臣危机中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伊斯兰文明乃是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动力，也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力量，而且，从各方面来判断，伊斯兰文明在国际政治中所占的分量还在继续增大：伊斯兰世界人口众多且增长率高，拥有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世界上大部分石油和天然气几乎都埋藏在伊斯兰国家的地下、占据着许多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的地区。迄今为止，属于伊斯兰世界的有44个国家，而几乎所有伊斯兰地区都是地缘政治价值极高的地区[30]。伊斯兰世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上升势头，其中心地带的精神和智力潜力大大增长，其人口和资金急剧增长（特别是近东的石油巨头）[31]。同时，伊斯兰世界在国际政治领域也日渐活跃、积极，许多伊斯兰国家卷入了世界各地的民族和宗教冲突中。

从20世纪初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与包括中东、非洲等地区的整个穆斯林世界都有很好的关系，苏联曾向第三世界的许多穆斯林国家提供援助、支持或声援他们争取民

族独立的斗争，对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等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但是，1979 的阿富汗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苏联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恶化，也损害了苏联国内穆斯林的族群认同。现在，许多研究者认为，阿富汗战争是由西方世界人为挑动的，目的在于将苏联拖入与伊斯兰世界的持久冲突。而在许多伊斯兰激进分子看来，1989 年苏军撤离阿富汗，是伊斯兰运动战胜了苏联这个超级大国。1991 年海湾战争前后，苏联政府持亲西方立场，也使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威信大大降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国力下降，开始战略退却，与伊斯兰世界的传统联系中断，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不够积极。1994 年俄罗斯对车臣采取了军事行动，不论是否西方势力挑动了这场战争，也确实有些势力希望借车臣问题使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关系进一步恶化，但其后果正与阿富汗战争相同。在车臣的反恐行动中，俄罗斯政府还强调借鉴以色列的经验，并且有证据表明：车臣恐怖分子与巴勒斯坦的激进反抗组织有某种联系[32]：2004 年 11 月 6 日，俄罗斯电视台播放一则新闻，在以色列的一次搜捕行动中，查获大批“哈马斯”的宣传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巴萨耶夫、哈塔布等人被称做“圣战英雄”。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犹太人因素也不容低估。俄罗斯政界和商界要人有许多犹太族，一些以色列人与俄罗斯境内犹太人都有亲缘关系。历史上，俄罗斯帝国曾是反闪主义的策源地之一，但是今非昔比。鉴于以色列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高度发达的科技，俄罗斯政府和学术界希望以俄罗斯犹太人为重要资源，吸引来自以色列的投资；而以色列因巴勒斯坦问题而在国际社会中受到孤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这方面对俄罗斯也有需求，两国逐渐接近，签订了战略协议，互相合作、分享情报等，有分析称两国已经建立起了“反恐同盟”。鉴于以色列与整个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深刻矛盾，俄罗斯—以色列接近也会使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受到消极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政府忽视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俄罗斯积极在巴—以冲突的问题上发挥作用，以便在伊斯兰世界赢得，或者说恢复信任和尊敬。

对于俄罗斯来说，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挑战也是具体、真实的。苏联解体以及随后十多年来俄罗斯国力的持续削弱，该进程正好与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进程相吻合，而一些伊斯兰势力借机向俄罗斯所有传统的势力范围，如东欧、中亚、乌克兰和高加索等地区进行扩张。伊斯兰主义者试图将车臣变成在俄罗斯境内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平台，但是，其范围不限于车臣。卡拉恰依—切尔克斯也有一个瓦哈比集团，准备武装夺取

政权。负责此事的，是一个名为“伊斯兰三号协会”的组织，是按照著名的阿拉伯激进运动“真主党”的模式组建的。在几年间，该组织变成一个秘密协会，目的是在卡拉恰依—切尔克斯武装夺取政权，最终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范围不但包括卡拉恰依—切尔克斯，而且还包括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该共和国的伊玛目黑泽尔·萨尔帕哈罗夫等人领导意识形态，而沙米尔·巴萨耶夫、艾米尔·哈塔布、阿切梅兹·戈奇亚耶夫等人则筹备破坏活动并提供资金。

土耳其的政治精英热衷于所谓泛突厥主义，对中亚、高加索的渗透极为重视，甚至还试图对俄罗斯境内的突厥语族施加影响。1992 年，建立起了以土耳其为主导的“黑海联盟”，土耳其代表甚至还去访问了俄罗斯所有的穆斯林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与他们签订协议，为其提供贷款，使其绕开俄罗斯。而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拉伯，除了想要争夺在穆斯林世界的领袖地位之外，还要与重要的石油输出国俄罗斯争夺石油出口市场；而且，沙特阿拉伯本身与美国的关系非同寻常。有穆斯林学者指出：沙特阿拉伯统治上层表面上信从伊斯兰教，但实际上，同时却在“执行着大规模的反伊斯兰的颠覆活动”，是“世界政府”在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合作伙伴[33]。利用车臣武装封锁经过车臣、格鲁吉亚的输油管道，不让俄罗斯石油以及里海沿岸国家的石油输出到国际市场，符合沙特阿拉伯石油大亨们的利益。

但是，当代伊斯兰世界走向意识形态和政治激进化，并非由于来自俄罗斯的政治、军事压力，而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压力，这些情形使穆斯林世界感到屈辱；同样，俄罗斯也不断感受到西方世界的挑战和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世界与俄罗斯有共同利益。一方面，俄罗斯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联合；另一方面，俄罗斯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不总是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一致，因此，俄罗斯和美国都想在对抗中借重伊斯兰力量。

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出发，与伊斯兰世界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还在帝俄晚期，针对当时穆斯林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沙皇重臣维特伯爵就曾提出很有见地的看法，他指出了穆斯林问题对俄罗斯国家的重要性：“在穆斯林问题上的国内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不是一个单一信仰的国家，而是一个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有人认为是 1500 万，也有人认为是 2000 万，有人甚至认为是 3000 万或更多，这是一个基本国情，而俄罗斯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却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现在，俄罗斯政府高度重视与穆斯林世界

发展友好关系。2003 年，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曾经访问俄罗斯，与俄罗斯各方人士交流、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发表讲话，表明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以及穆斯林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他指出：与西欧国家的穆斯林不同，俄罗斯的穆斯林都认为俄罗斯是自己的祖国；这使我们有权认为：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34]。2003 年 8 月，普京访问了马来西亚，首次表示希望加入世界伊斯兰会议组织，最初阶段先做观察员。10 月，普京参加了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世界伊斯兰会议组织首脑会议。普京发表讲话称：俄罗斯也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同时，普京还同到会的穆斯林国家领导人交换意见，甚至申请加入该组织；但是，普京的提议遭到多数成员国的反对。反对最力的，是穆斯林大国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担心，与自己关系敌对的印度也可以同样理由提出加入该组织。

俄罗斯学者和政治家逐渐认识到，在许多国际重大问题上与伊斯兰世界合作，对于捍卫俄罗斯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意义。2004 年，俄罗斯国家杜马成立了一个党团组织，名为“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战略对话”。按照当事人之一、国家杜马议员沙米尔·苏丹诺夫的介绍，这是一个“所有视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为战略盟友的俄罗斯政治家的联合体”，其主要目标是加强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政治联系，发展科学、文化交流，等等。而促成团体成立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扭转从前俄罗斯政界一边倒的亲西方态势，平衡国内政治势力，因为在俄罗斯国内，一直存在着一个反伊斯兰的“院外集团”，散布反伊斯兰、仇伊斯兰言论；加强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同时，也是由于伊斯兰国家的推动。由于美国对伊斯兰国家的直接干预，包括军事干预，导致伊斯兰国家对与俄罗斯发展友好关系发生兴趣[35]。

俄罗斯国内的一些政治组织、派别也主张利用伊斯兰这一重要政治力量。2001 年的“9·11”事件，被认定是本·拉登领导下的“基地”组织所为，一时间，似乎存在着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俄罗斯迅速站到了美国一边，与美国持相同立场，在地缘政治方面对美国做出许多让步，如允许美国在中亚驻军，建立军事基地，目的在于防止来自阿富汗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侵入俄罗斯，想要让西方明白：俄罗斯和美国同样面临伊斯兰激进、极端势力的威胁和挑战，减轻西方对俄罗斯的压力。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派别、共产党等组织却希望与穆斯林联合起来，反对美国霸权，特别是在美国渗透到中亚并摆出长期驻扎的姿态，以及 2002 年初在格鲁吉亚的潘基希峡谷发现了

“基地”组织成员之后。反美主义将这些政治力量联合起来。2001 年 10 月，在距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地方，俄罗斯“欧亚主义党”、俄罗斯共产党试图与穆斯林组织一起举行示威活动，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以及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但是，穆斯林害怕与俄罗斯政府的关系激化，没有参加这次行动[36]。2001 年 11 月到 12 月间，俄罗斯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派别的出版物上开始刊载大量材料，将“塔利班”对美国人的反抗与卫国战争中苏联红军的英勇行为相提并论，并且还引用了伊朗前领导人霍梅尼的话，称美国是“大撒旦”，甚至还将巴勒斯坦人在拉马拉对以色列军队的反抗比作斯大林格勒战役。2002 年 1 月，在激进反对派的报纸《明日报》上，刊载了致俄罗斯公民的新年贺词，本·拉登肖像与俄罗斯民族主义领袖的头像被一起放在封面上[37]。

在与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明对抗中，如果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其智力潜力巨大，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国家复兴只是个时间问题，那对于伊斯兰世界是有利的，对于世界力量平衡也非常重要[38]。但是，许多俄罗斯学者认为：伊斯兰文明以及其他一些周边的文明都想利用俄罗斯的暂时衰弱。历史上俄罗斯曾经与土耳其发生过几十次战争，与伊朗也发生过好多次战争，而这些战争的背后都有西方国家的挑动。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实现联合，是西方不愿意看到的。他们甚至在尽力挑起双方的冲突和矛盾。同时，伊斯兰世界与俄罗斯自身也缺乏走向联合的一些条件，如相互信任等。在俄罗斯看来，穆斯林世界常常被西方势力利用，成为反对俄罗斯的工具。车臣乃至整个高加索的动乱局势，背后就有外国势力的背景。俄罗斯南部边疆局势持续动荡、恐怖事件愈演愈烈，首先对西方势力有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个别阿拉伯国家，而车臣恐怖分子和分裂集团完成了外国势力战略步骤中所有的“粗活”和“脏活”。2004 年 9 月 4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就该事件发表了电视讲话，其中也强调了卷入车臣问题中的外部因素：“有些人希望从我们这里抢走一块肥肉，还有一些人则充当了帮凶。”其中含义不言自明，它表明了俄罗斯政府对人质事件以及车臣问题乃至整个高加索问题的基本判断。

如果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能够积极合作，那么，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又会拥有新的政治杠杆，甚至，面对西方的压力，俄罗斯与穆斯林世界都会占据非常有利的地位，赢得主动。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

在与以色列发展关系的过程中，美国积累了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的经

验。美国与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建立盟友关系，借以控制石油天然气的走向，并操纵中东等地区的政治进程，保持对世界各地的控制。在“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都对穆斯林国家展开争夺，借以牵制对手。美国在“反共”方面的重要伊斯兰盟国包括：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基斯坦等；而苏联则对许多穆斯林国家提供了援助，并保持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冷战”双方展开宣传攻势，离间敌手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这些宣传未必符合实际，但是却很有效。鉴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敌人——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到冷战结束前夕，看起来当时苏联的宣传占了上风。

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曾经与沙特阿拉伯合作，降低石油价格，使苏联的石油出口收入迅速减少。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陷入了持久战争的泥潭，在军事、政治、道义上都受到很大损害，与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恶化，成为国力下降，甚至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反，美国则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阿富汗战争。在阿富汗战争爆发后，美国从军事、政治和道义上给予阿富汗全方位的支援，最终严重地削弱了对手苏联，并在伊斯兰世界赢得声望和威信，这曾经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极大成功。据认为，“塔利班”运动最初也是美国着意扶植的，目的是为了将俄罗斯从中亚地区排挤出去[39]。近来，媒体更加明确地认为：“塔利班”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以及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组织扶植起来的[40]。但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之上，难于长久维持。在冷战时代，伊拉克曾经得到美国的大力援助，而乌萨马·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也曾与美国合作，但是，最终，这些伊斯兰国家及组织都与美国成为仇敌。美国对伊拉克发动了两次战争，并最终于2003年将萨达姆政权推翻；而在2001年美国纽约遭受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认定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是恐怖事件的罪魁祸首。

近年来，美国国内的泛伊斯兰组织开始变得活跃，如美国穆斯林委员会、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等。美国穆斯林族群总共大约600万人，大多数不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而是祖籍非洲的美国黑人。通常说来，美国穆斯林的伊斯兰认同多半只用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对美国以外的伊斯兰国际政治问题很少关心[41]。但是，一些穆斯林组织和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对穆斯林国家的政策。

谢赫·希沙姆·穆罕默德—卡班尼在美国创立了三个大的伊斯兰组织：美国伊斯兰最高委员会、哈卡尼基金会、美国穆斯林援助组织。这

些组织在独联体伊斯兰复兴过程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支持苏非派那克什班迪教团——车臣人的伊斯兰教派之一，也是从美国向车臣输送资金的主要渠道。1998 年，美国穆斯林最高委员会曾邀请马斯哈多夫到美国，2000 年还曾接待了车臣共和国的外交部长。2000 年初，应马斯哈多夫之邀，“美国穆斯林援助组织”代表还曾经访问车臣。2001 年二三月间，“美国穆斯林援助组织”的代表清查了在俄罗斯境内注册对印古什的车臣难民提供援助的社会救助协会的资金。在美国，至少有 24 个组织，主要是伊斯兰组织在资助车臣武装，其中一些组织甚至与中央情报局有紧密联系（包括“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该组织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各大城市有 12 个分部）。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挑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穆斯林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最高。1945 年，世界上的穆斯林人口有 3 亿，而到 20 世纪末已经达到 12 亿；据估计，到 2050 年将达到 30 亿。其次，随着穆斯林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些国家军事开支日益增加，其中，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发展最快，而且军事实力强大，人口潜力巨大。由于种种原因，尽管土耳其积极加入了西方的政治军事集团，但是西方的民主价值仍然难以完全被土耳其接受，而西方对土耳其也有歧视，不愿意接受土耳其为权利平等的伙伴。在西方决策中心的战略计划中，土耳其被分派的角色是充当工具，西方对土耳其加以鼓励，并提供援助，目的是让土耳其为西方世界捍卫在欧亚大陆的利益。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某些势力征服全球的战略中，伊斯兰世界和俄罗斯都是要铲除的对手。而伊斯兰世界与俄罗斯之间爆发矛盾和冲突，显然符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西方可以从中渔利。对于世界上的民族分裂运动或恐怖主义活动，西方世界往往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或通常所谓的执行双重标准。对于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的正义运动，美国长期以来坚持了偏袒以色列的立场；而对于车臣的分裂主义活动（以及中国新疆、西藏等分裂活动），西方则将其视为追求“民族自决”的正当行动而予以支持，完全无视俄罗斯是一个主权国家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实际上首先打压的是伊斯兰世界的地缘政治空间。1990 年的海湾战争，2001 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都是冷战结束后美国针对伊斯兰世界所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之后，美国立即断定：本·拉登领导下的“基地”组织乃是恐怖主义的策源地，美国既没有进行仔细调查并拿出可靠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也从来没有为恐怖主义下一个

明确的定义，就在短时间内发动了两场针对伊斯兰国家的战争。类似恐怖事件可以被用来达到好几个目标，如：迫使许多国家在反恐方面作出惟一选择，并裹挟其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反恐同盟”，如2002年印尼巴厘岛发生的恐怖事件，迫使澳大利亚加入美国的反恐阵营；西班牙发生的恐怖事件等。所谓“国际恐怖主义”，被美国用作凝聚国民、控制社会，并成为其在全球扩张的工具。实质是在对非西方文明——首先是伊斯兰文明宣战，并借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之机，保证了美国发动类似战争的永久性[42]。

虽然美国政府曾一再说明：反恐战争不是针对穆斯林世界的战争，但其行动却越来越等同于对穆斯林世界的战争，引起了穆斯林国家的愤懑。2001年9月11日事件之后，许多穆斯林国家都爆发了反美游行。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传统盟友中，除了土耳其以外，都变成了美国不可靠的伙伴[43]。许多反美的恐怖组织和激进组织，得到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国家的资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穆斯林世界对美国如此仇恨？在穆斯林国家所做的大量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反美情绪与贫穷、嫉妒或文明冲突没有关系，而是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美国人对穆斯林世界特别是巴勒斯坦遭受的苦难的漠视和伊拉克的战争引起了穆斯林世界的极度不满。2004年7月5日，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在瑞典访问期间指出，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即将出现一道“铁幕”，而在铁幕最终降落在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前，必须采取行动。穆沙拉夫说，由于政治不公、贫困等原因，导致伊斯兰世界的很多人感到被剥夺、无助和无权，因而很容易受到被歪曲的伊斯兰理念的灌输。他认为：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同时，世界还应该关注伊斯兰世界存在的那些不公正现象，如巴勒斯坦问题等。这是穆斯林心灵中的伤口[44]。美国的扩张行动从军事、政治上打击了伊斯兰世界中的不驯顺者，同时也使伊斯兰世界各国继续走向分裂。这些被镇压的伊斯兰国家中，往往酝酿着对西方世界的仇恨。在这种情况下兴起的伊斯兰主义者的激进反抗，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往往被不加区别地视为恐怖主义。而这些反抗活动的根源，正在于西方的扩张。通过伊斯兰世界来削弱俄罗斯，同时也削弱了伊斯兰世界自身，而且西方还无须付出太大代价。对于西方来说，这种战略和策略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另一方面，在美国、俄罗斯、伊斯兰世界的三角中，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加深，客观上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正是由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导致伊斯兰世界与俄罗斯接近，伊斯兰力量减轻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压

力；同时，俄罗斯会从中看到更多与穆斯林世界实现某种联合的希望和机会。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民族也会成为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接近的动力和促因，共同对抗来自美国和西方的压力。

如何克服车臣问题中的外部因素？这是俄罗斯在解决车臣问题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俄罗斯政治家的智慧是一个重大考验。当俄罗斯自身衰弱不堪、或存在各种问题和危机的时候，就为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干预提供了可能性，因此，车臣问题的内在因素乃是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克服外部因素对车臣和高加索地区的消极影响，同样需要从根源去寻找应对手段。它需要这样一些条件：一、俄罗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国家复兴。社会经济发展加快，原来的许多社会政治问题会迎刃而解，社会形势趋于稳定。俄罗斯已经从苏联解体以来的阶段性衰落过程走出，其主客观条件决定了复兴将是一个现实，只是需要尽量缩短周期；二、俄罗斯对车臣乃至整个高加索地区需要有整体、长远的政策，以避免该地区被外部势力挑唆和利用。反之，地区各国和俄罗斯各行政主体对俄罗斯的离心倾向将会加剧，甚至不排除他们主动引入外来因素，从而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三、在车臣问题上，外部干预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因素在发挥重大作用。因此，俄罗斯应该重视对外宣传，揭示车臣分裂派的恐怖主义实质，在国际社会争取舆论支持，消除反面舆论带来的消极影响。2004 年 9 月 23 日，在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大发表讲话，向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要求引渡那些滥用政治难民身份、在俄罗斯境外资助或组织恐怖活动的人；同时，建议联合国制订一份参加恐怖活动的个人、组织和实体的名单，冻结其资金，实行武器禁运等制裁，尽快引渡有关人员。拉夫洛夫呼吁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彻底抛弃双重标准；四、外部势力对车臣分裂派别的支持，其背后是俄罗斯与某些外国和外来势力在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方面的冲突：有的属于根本性冲突；有的则是非根本性冲突。俄罗斯一方面要意志坚定地坚决捍卫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国家战略与策略。

注　释：

〔1〕Николай Зенькович, Тайны уходящего века, М, 2003, С. 387.

〔2〕http://www. redstar. ru/archiv. html

〔3〕Джемаль Гейдар, Ислам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русский патриотизм, http://www. ansar. ru/index. html

〔4〕http://www. utro. ru/

〔5〕http://sergeant. genstab. ru/chech_01. htm

〔6〕Коммерсантъ – Daily, 8 Ноября 1999.

〔7〕http://kavkaz.memo.ru/

〔8〕Война на Кавказе, http://home.ural.ru/chechnya/index.htm

〔9〕http://kavkaz.memo.ru/

〔10〕http://www.utro.ru/articles/2004/

〔11〕В. В. Черноус,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Чечни: социаль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Ростов – на – Дону, 2001, С. 162.

〔12〕http://www.utro.ru/

〔13〕同注释〔11〕, С. 126。

〔14〕同注释〔11〕, С. 126。

〔15〕http://www.utro.ru/articles/2004/10/07/358694.shtml

〔16〕http://www.hro.org/ngo/research/

〔17〕Олег Попов,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ые фонды 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правозащит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http://www.hro.org/ngo/research/

〔18〕http://www.patriotica.ru/enemy/popov_fonds.html

〔19〕Э. Ле,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дискурса язык статей о чеченской войне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есс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2001, №2, С. 106.

〔20〕同 2, С. 107.

〔21〕Чеченский преступный бизнес, http://www.fsb.ru/history/book/terr/terr2 – 1.html

〔22〕Последняя тайна Беслана, http://www.sobkor.ru/

〔23〕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спонсоры чеченских террористов, http://www.fsb.ru/history/book/terr/terr2 – 1.html

〔24〕http://newsru.com/russia/

〔25〕http://www.utro.ru/articles/2004/10/07/358694.shtml

〔26〕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 侯艾君等译, 新华出版社 2004 年 1 月出版, 51 页。

〔27〕Н. А. Нарочинская, Россия и запад в новы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альностях, http://www.pravoslavie.ru/

〔28〕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Чечня", http://whiteworld.ruweb.info/rubriki/

〔29〕США поставили себя вне закона, http://www.terrorism.ru/

〔30〕С. А. Модестов,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Ислама, М, 2003г, Р44.

〔31〕Наталия Нарочницкая, Исламский Мир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http://www.pravoslavie.ru/analit/islam-mir.htm

〔32〕http://kavkaz.memo.ru/

〔33〕Джемаль Гейдар, Ислам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русский патриотизм, http://www.ansar.ru/index.html

〔34〕В. Попов, Ислам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4, №. С.13.

〔35〕Россия и ислам, http://www.ansar.ru/arhives

〔36〕Алексей Малашенко, Ислам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http://news.ru/ru_lib/islam_fact.htm

〔37〕同注释〔35〕。

〔38〕С. Г. Киселев, Основной инстинкт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ызовы России, М, 2002, С.223.

〔39〕С. А. Модестов,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Ислама, М, 2003, С.129.

〔40〕Ю. Н. Глущенко, А. Д. Собянин, Исламский фактор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США, http://ryadovoy.vif2.ru/

〔41〕http://www.kisi.kz/Parts/Monitoring/

〔42〕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терроризм инструмент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43〕Николай Добронравин, Ислам и Америка //Искренний враг, ненадежный союзник, http://www.idelo.ru/339/

〔44〕来源：新华网。

第十章

车臣危机的后果

车臣从1990年开始追求独立，并且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俄罗斯没有现实的政治法律手段可以控制，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车臣危机。长期政治谈判，最终无果而终。车臣分裂主义者走上了与俄罗斯政府武装对抗的道路，双方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于是，当代俄罗斯政治生活中最具有悲剧后果的一幕发生了。

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除北高加索军区以及邻近军区的军队以外，俄罗斯政府还从远东、乌拉尔、西伯利亚各军区，以及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调集了军队；而且，除战略火箭军外，几乎所有军兵种都参加了军事行动。据估计，双方参战的人数大约在10万到12万人之间。从1994年直到现在，俄罗斯政府先后两次对车臣用兵，至今，军事行动也没有在完全的意义上结束。前后历时数年，劳民伤财，战争规模巨大，人员伤亡惨重，对于北高加索地区、俄罗斯国家以及整个中近东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这是苏联解体以来，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甚至包括整个战乱和冲突频繁的独联体范围内爆发的规模最大的战争，同时也最具有毁灭性。在二战以来的苏联历史上，也许只有1979年到1989年的阿

富汗战争可以与车臣战争相比。但是，就最粗略的估计，俄罗斯在车臣战争中的损失，已经远远大于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损失，而其影响也远大于阿富汗战争。

车臣：俄罗斯滑向谷底

车臣危机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社会动荡不安的表现。不论是俄罗斯联邦体制的各个环节，还是以杜达耶夫为首的车臣当局，都没有对政治危机采取现实的对策。结果，由于双方的错误，政治解决车臣危机的所有机会都没有很好地把握和利用。车臣问题旷日持久，是苏联解体以后的过渡时期里，俄罗斯国力衰落导致的结果，反映了俄罗斯政治控制能力相对或绝对下降的现实。

也许，现在谈论车臣危机的历史意义乃至其后果还为时尚早。俄罗斯—车臣武装冲突的后果，仍旧需要时间的积淀才能看得清楚。今天，俄罗斯军队在车臣虽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正在为重建车臣做出种种努力。但是，这绝不是说，俄罗斯政府已经彻底解决了车臣问题。车臣局势类似19世纪的高加索战争结束以后的局势，分裂武装的反抗活动远没有停止，并且将持续很长时间。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是俄罗斯国家的内部事务，这是基于：车臣并没有在法律上或者在政治现实中建立起独立国家，也没有得到国际承认，俄罗斯对于车臣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中国的兵家说过：兵者，国之凶也——对待它要慎而又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西方兵家的名言；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战争也是政治的失败。因此，在处理政治危机的所有手段中，战争无疑是下下策。政治的目标是在危机和冲突尚未发展、成熟的时候就将其化解。俄罗斯—车臣的武装冲突，表明俄罗斯在政治上的失败。有人认为，俄罗斯派军队到车臣是为了压制不驯服的车臣人的独立意志，以便在车臣人的白骨堆上建立俄罗斯业已失去的强国地位，并借以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但是，选择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危机，反映了俄罗斯国家的虚弱甚至脆弱。车臣危机是由于苏联以及俄罗斯的衰落，而战争的进程乃至后果，都表明了俄罗斯的衰落。当有人，尤其苏联的冷战对手，在为苏联解体而感到庆幸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联解体将许多潜伏的问题暴露了出来，释放出了危险的，甚至是毁灭性的能量，而车臣战争本身也使得俄罗斯进一步衰弱。俄罗斯在车臣花费了太多的人力和物力。如果从沙皇俄国征

服车臣和整个高加索算起，则到今天为止，实际上，俄罗斯对于车臣和高加索的控制越来越力不从心。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向所谓的新联邦制转变，一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理想的实践；二来也是对现实的迎合和适应。对车臣、鞑靼等危机的解决，就是这种具体实践的一部分。联系起前苏联政治空间内发生的民族冲突和解体后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现实，以及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对武力的重视和运用，可以说，俄罗斯走向真正民主制度的道路仍很漫长。俄罗斯的传统中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基础。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俄罗斯是一个庞大的国家：疆域辽阔，民族成分复杂多样，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动荡和曲折。俄罗斯长期面临内乱以及外来入侵的威胁，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当然也包括用武力等极端手段来解决棘手的社会政治问题。

采取军事手段，是俄罗斯政府处于弱势后迫不得已的选择，而旷日持久的冲突又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这种弱势的状况。如果俄罗斯继续衰弱，中央的政治控制能力将继续下降，联邦制度还将受到考验。有人认为，由于经济潜力丧失，俄罗斯不仅会失去联邦制发展的民族政治基础，甚至还将失去整个国家发展的民族政治基础。这样一来，俄罗斯的联邦制就会变成邦联制[1]。而是否会开始这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实力是否继续下降以及政治改革成功与否。

车臣危机还表明：车臣并没有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真正地与俄罗斯融为一体，车臣依旧是俄罗斯社会中的另一个社会。危机升级为战争，表明苏联以及俄罗斯在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民族政策的失败。对于车臣来说，俄罗斯已经失去经济、政治方面的魅力，而俄罗斯政府除了武力以外，再没有什么可以展示。车臣与俄罗斯的冲突，是地区与中央、社会与国家以及社会体制之间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文明的冲突。

俄罗斯再不可能像苏联时期那样，实现对人民的完全控制，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在过渡期内，俄罗斯境内的民族主义运动绝不会平息。在今后一个特定时期里，民族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社会问题都会长期困扰俄罗斯，并阻碍其社会发展。车臣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较为极端，但远非惟一的，或者最后的一次民族危机。在车臣危机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俄罗斯政府犯下严重错误，导致车臣危机愈演愈烈，一直发展到非用武力不能解决的地步；而以杜达耶夫为首的车臣民族精英，在把车臣民族推向民族苦难方面，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俄罗斯政坛风云变幻，导致车臣问题复杂诡谲。在俄罗斯领导人和车臣分裂派

领导人共同操纵的这场政治游戏中，不论赢家是谁，普通俄罗斯人与车臣人都是这场赌博的受害者。

战争给车臣和俄罗斯造成的经济、人员方面的损失是巨大的。由于人为的原因以及各种技术性问题，车臣战争造成的人员伤亡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统计。按照一些统计结果：1994 年到 1996 年的战争中，俄罗斯军人有 4379 人阵亡，703 人失踪，自愿留下者 705 人[2]。此外，按照列别德的说法，受伤者 17892 人，还有一种说法是 19794 人。1996 年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后，总共有 1200 多名俄罗斯士兵下落不明，还有 500 多名俄罗斯战士的尸体存放在罗斯托夫的冷藏间中等待认领[3]。另一种数字是：1994 年到 1996 年的车臣战争中，俄军官兵阵亡 5551 人，受伤 513878 人，被俘或失踪 509 人[4]。

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罗斯军人的伤亡情况也非常严重。官方资料表明，从 1999 年 10 月到 2000 年底，俄罗斯军人牺牲 2676 人，受伤 7838 人[5]。俄罗斯军人的伤亡数字还在继续增加，因为反恐行动还在继续，并且至今尚无结束该行动的时间表。

俄罗斯政府为战争支出了巨额费用。单单从 1999 年 8 月 1 日算起的一年多时间里，俄罗斯就为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支出了大约 3250 亿卢布，而为车臣重建的花费：2000 年的 750 亿卢布，2001 年的 300 亿到 450 亿的巨额费用还没有包括在内。但是，由于俄罗斯政府某些机构和官员贪污腐化，这些费用多半并没有用于重建家园，而是被贪污截留、中饱私囊，或在流入车臣之后，被武装分子用于购买军火[6]。

武装冲突导致社会结构被破坏，社会资源，包括有形和无形的资源无谓丧失。冲突使俄罗斯社会与车臣社会都蒙受巨大损失，给两个民族都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战争使车臣的经济彻底被摧毁，平民伤亡也非常巨大。2004 年 11 月 19 日，车臣国务委员会主席塔乌斯·加布拉依罗夫称：从 1994 年到 2004 年的 10 年间，车臣境内共有 20 万人死去，2 万名儿童成为残疾人，还有好几万人成为孤儿[7]。俄罗斯人权组织估计，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大约 5 万平民死去，其中仅仅在 1994 年底到 1995 年初强攻格罗兹尼期间，就有 2.5 万到 2.9 万名平民死去。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以来，平民伤亡也较为严重，大约两万平民死去。从 1999 年秋天到 2000 年春天战斗最为激烈的时期，大约有 6500 名到 10500 名平民死去；2000 年到 2004 年，大约 5300 名到 10700 名平民死去[8]；但是，俄罗斯总检察院公布的相关数字与此出入很大：如，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大约 1000 名平民死去。一般来说，人权组织的数字明显夸大；而俄罗斯

司法部门的数字又似乎有缩小的嫌疑。车臣战争爆发已近10年，至今没有专门委员会做过相关调查，这是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而人员伤亡的数字，往往被用于政治宣传。最近，一位俄罗斯人口学家运用人口统计学方法，进行估算，其结果是：不超过35680人[9]；而导致人员损失的原因中，除轰炸外，还包括因战争导致的生活条件恶化，如饥饿、疾病等。

当车臣危机的军事阶段结束后，车臣分裂派大规模运用恐怖手段，使车臣社会和俄罗斯社会成为分裂派与俄罗斯政府对抗的人质。

除经济、政治上的损失之外，俄罗斯在道义上也蒙受极大损害，军事上旷日持久、战果乏善可陈，使俄罗斯军队的威望受到打击，从而也连带地对俄罗斯政府的形象产生消极影响，俄罗斯政府在国内以及国际上的威信大大降低，遭到多方诟病。资料表明：第二次车臣战争有很强的“商业”色彩，战争符合某些人的利益，因为战争是能够产生暴利的“商业活动”。俄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一些军人为牟取私利，给车臣武装贩运石油提供便利，而这些石油被偷运到莫斯科市场上，换成美元，流入车臣，成为分裂武装购买武器装备的经费；而这些武器却是用来杀伤与车臣分裂派作战的俄罗斯士兵的![10]。

由车臣战争导致的“车臣综合症”也不容忽视。战争对俄罗斯国民造成的心理伤害之大，可与阿富汗战争相比拟；但是车臣战争的惨烈，人员损失之大，俄罗斯国民对车臣危机的关注和反战情绪的强烈，媒体和社会舆论对车臣战争的谴责，都远远超过阿富汗战争。那些参加过战争的年轻人和在战争中致残的人被称做“失去的一代”。在莫斯科地铁里，曾经参加过反恐行动的老兵为自己牺牲了的战友家庭募集钱物，一边弹着吉他唱：“我们对于所有人都是个外人！……车臣综合症！”[11]。在俄罗斯国内，青年对战争极端厌恶、对军人毫无好感，作为一种职业，军人受到的诟病最多，社会认同程度最低。战争对于人们心理的创伤，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平复。

车臣危机的爆发和持续，使得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状况变得极为不利。第一次车臣战争开始之后，俄罗斯通往里海的石油管道就被迫关闭，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受到很大影响。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车臣境内的石油。秋明油田的石油因为石蜡和硫的含量太高，必须用格罗兹尼或巴库的石油来稀释，形成所谓的“俄罗斯混合体”；否则就没有出口价值。这样，首先就对那些俄罗斯在石油出口方面的竞争者——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大王们——有利。在争夺里海油气资

源的竞争中，俄罗斯处于不利地位。跨国公司利用石油开采和运输的项目，可以将外高加索各国在反俄的立场上团结起来；而这样发展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使得俄罗斯在高加索的战略地位受到极大损害。有人认为，这在许多方面影响了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利益，并且有可能在几十年到几百年之间，将俄罗斯从外高加索地区排挤出去[12]。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军队在车臣的军事行动表现出极大兴趣。俄罗斯在特定条件下展开的军事行动的得失，给俄罗斯的传统敌人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同时也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判断俄军的战斗力提供了参照。实际上，俄罗斯军队在车臣令人失望的表现，令美国等西方国家颇感意外，正如1991年苏联解体事件出乎人们的意料一样[13]。这些军事挫败，表明了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军事能力的显著下降，俄罗斯的军事政治影响也因而受到损害。

经过了从1999年到2002年的军事行动之后，车臣问题尽管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可以认为：车臣的政治、法律地位的问题，实际上已经不再有争议。车臣没有像分裂派原先期望的那样得到真正的独立，也没有获得任何国家的承认。苏联解体使以前潜伏的问题暴露出来，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让问题暴露有时强于潜伏和积压，因为它给问题在未来的妥当甚至彻底解决提供了可能性，是解决危机的一个开端。

车臣的人权状况

战争造成了严重的难民问题，至少有20多万难民无家可归，这些难民依靠俄罗斯政府或国际组织、慈善机构的资助维持生活。其中，大批车臣族难民涌入邻近的印古什共和国，使这个共和国成为世界上难民与平民比值最高的地区，也使这个狭小的共和国因难民而感到巨大压力。这些难民贫困不堪，衣食无着，处境悲惨。有的寄住在亲戚朋友家里；有的则出高价租住民房；情况更坏的，住在政府提供的帐篷里；条件最差的，只好住在野外。寒冷和饥饿在威胁着他们。在这些地方，由于人群密集，缺乏基本的医疗条件，成为疫病的潜伏区[14]。由于战争引起的恐慌以及担心恐怖分子的胁迫，许多人前往俄罗斯其他地区或选择出国，但是，许多地方都对他们抬高了门槛。按照俄罗斯宪法，公民有权自由选择居住地，但是，莫斯科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制定了自己的地方法规，为车臣难民设置许多障碍，其他地方也纷纷仿效，作出种种限制，而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方面，巴尔达一巴尔卡尔的情形尤

其突出，该共和国使公民居住登记手续复杂化，除了俄罗斯联邦法律规定的条件以外，公民还须提供两张照片、房产的技术证书；超过3个月者还须提供雇佣合同、雇主无欠税证明等等[15]。这些都是在社会经济方面对车臣难民的公然歧视。此外，在车臣战争之后，迁徙到俄罗斯各地的车臣难民往往被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每次恐怖事件发生之后，俄罗斯国内的种族歧视就会加剧：来自高加索、亚洲的人口往往受到排斥，甚至经常发生针对高加索人和亚洲人的暴力事件。除了俄罗斯国内以外，还有许多难民流向了外高加索国家，如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及土耳其、约旦、德国、捷克等国家。

在车臣政权重建的进程中，车臣政府派代表号召车臣境外的难民返回车臣，但是，返回进程并非完全自愿。由于安全等方面的问题难以解决，许多难民不愿意回去，如到2003年8月，仅仅印古什就还有1万多车臣难民；车臣政府代表使用了威胁的手段，如撤除难民营、停水、断电、停止食品救助，或将其从难民名单上划掉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难民被迫同意返回[16]。

车臣共和国境内的俄语居民即所谓东斯拉夫人，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的境况也非常悲惨。许多人流离失所，被迫迁往俄罗斯内地，成为难民。在8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车臣的俄罗斯人有大约50万人；而到1994年，车臣出版的《士兵之声报》写到车臣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俄罗斯南部边疆的小国，还居住着大约10万俄罗斯人。"这就是说，至少有40万人被迫离开了车臣；而在车臣战争之后，更多的俄罗斯人选择离开车臣，前往俄罗斯内地生活。到2002年为止，车臣共和国境内的全部人口约为35万人，俄罗斯居民大约只有5万人左右。

车臣分裂派与俄罗斯的武装对抗，对车臣造成了巨大破坏，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在战后，车臣经济已经被彻底摧毁，格罗兹尼几乎变成废墟，社会动荡，失业率继续增高达到90%以上，犯罪现象猖獗，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有人描述了第一次车臣战争之后车臣的悲惨状况："车臣上空笼罩着生态和疫病的灾难。城市和居民点实际上并没有恢复，人们住在被摧毁的街区，那里早已没有排水设施，没有水，而且常常连电也没有。医疗设施实质上也没有。人们因大规模疾病和饥饿而死去，儿童死亡率特别高，实际上所有的居民都需要心理治疗。除了几所私立院校以外，学校实际上已经关闭了。车臣鲜明地表明了社会内部的经济、文化联系解体的特征。"[17]有作者恰当地指出，在车臣战后，

车臣居民并非是生活，而是在为了生存而斗争。工厂和住宅遭到破坏，经济凋敝，许多人衣食无着。据车臣统计部门的数字，战前车臣的国营机关和企业中有10万人在工作，而在战后，多数人都失业在家。许多厂矿发不出工资，因而就以生产的产品作为工资。据说，在这方面最为“走运”的是砖厂工人。许多人的住所遭到炮火毁坏，为了建造住处或者修缮房屋，分配砖瓦成为最为实用的物品[18]。

在现代高科技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已经很难像传统社会那样，对人民封锁信息。电视、电台、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非常迅速、快捷。当车臣境内爆发战争之后，俄罗斯国内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对车臣的人权状况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人权是一个哲学、法学的概念，最初只是一种道德权利，但在今天已经变成了一项重要的法律权利。国际社会为此成立了各种组织，通过了大量立法。俄罗斯人权组织与西方社会的舆论遥相呼应，对俄罗斯政府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与此同时，车臣分裂派也运用自己的资源和手段，与俄罗斯政府进行“宣传战”，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使俄罗斯政府在道义上陷于被动地位。

从许多材料可以看出，俄罗斯军人在车臣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存在的，许多正面、反面的材料都可以表明这一点。从战争一开始，俄罗斯军方就以种种理由对到车臣战地采访的各国记者作出前所未有的限制和阻拦。按照一些说法，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中，对许多民用建筑进行轰炸，后果严重：车臣的421个居民点中，有300个遭到轰炸，包括大城市格罗兹尼、古杰尔梅斯、沙里、阿尔贡，等等。10万多平民死去，其中8000名是儿童[19]。

俄罗斯《新报》的著名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是一位出色的职业女记者，深受《新报》的器重和读者的欢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身为女性记者所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以及难能可贵的勇气，曾经多次只身前往车臣进行战地采访，发回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报道。她曾经写了一部名为《肮脏的战争：一位俄罗斯记者在车臣》的著作，揭示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军中黑暗、腐败的内幕。因为她对车臣发生的事件所做的出色报道，因而被大赦国际授予在人权领域报道工作的世界性大奖。她的获奖作品是报道性文章《俄罗斯的英雄如何变成车臣的拷打者》，刊载于2001年2月26日《新报》。这些报道多数是安娜的亲身见闻。她曾经到俄军在车臣的驻地，并在那里看到一些被称做“过滤营”的场所。这是一种很深的大坑，一些俄罗斯军人专门用来关押车臣人质、勒索赎金。

在另一则报道中讲到，一个由俄罗斯总统任命的调查委员会到车臣前线，调查俄军的所作所为。该委员会已经收集大量资料，完成调查任务，准备返回莫斯科；而在此之前，当地军方已经得知，该委员会的观点将对其不利。该调查团乘坐的军用直升机刚刚起飞升空，就被一枚导弹击落，军方称是由车臣游击队干的；而女记者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之后，确认是俄罗斯军方的人所为。这些报道发表之后，安娜受到了生命威胁，报社也受到某种警告和威胁。迫于压力，同时也为了安娜的安全，报社决定将她派到奥地利去躲避。这些情况表明，俄罗斯军人在车臣确曾有过侵犯人权的行为，而这不但违反日内瓦人权公约，也违反了俄罗斯法律；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军方强力人物的包庇和袒护，甚至俄罗斯政府对这些行为的态度一度也很暧昧。

俄罗斯军人在车臣侵犯人权的行为，涉及车臣族、俄罗斯族等车臣各族居民。当然，不能说这些违反人权的现象是政府行为，多数情况下，是个别战斗单位单独的犯罪行为的数字叠加。这些违法行为，更多地反映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队腐败、混乱、无组织无纪律，以及作为一个大国的军队所存在的问题和重重危机。2003 年 8 月 30 日，面对记者提问，普京承认车臣确实存在军人侵犯人权的现象，同时，他也反对将个别军人的犯罪行为与俄罗斯政府的政策联系在一起："这些行为并未得到上边的批准。"[20]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欧盟委员会、人权观察组织，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就车臣的人权状况发表的报告中，既批评其人权状况，同时也肯定其所取得的进步。而俄罗斯政府和军方也在采取措施，整肃军纪，军事法庭开始对那些被指控有违反军纪、侵害平民、践踏人权行为的官兵进行惩处。

车臣决定俄罗斯的命运?

苏联解体、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化"浪潮，影响了俄罗斯社会心理，即：将俄罗斯国内的分离趋势视为寻常。当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持久不决的时候，俄罗斯国内有许多组织和派别，主要是一些穆斯林社群、人权组织、在野的俄罗斯反对派，纷纷对俄罗斯政府提出指责，甚至主张俄罗斯应该放弃车臣，任其独立。他们认为俄罗斯在车臣的战争是犯罪的，牺牲了无数生命，违反了日内瓦人权公约，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对车臣进行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车臣分裂派领导人坚持车臣有权建立独立国家，实现民族自决，认为这一行动有法律依据，一些俄

罗斯学者和政治家也附和这一观点[21]。苏联解体后回到俄罗斯定居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也曾提出：应该让车臣独立；否则，车臣会让所有的周边民族不得安宁。而俄罗斯与车臣应该划定一个真正的疆界。俄罗斯学者阿林在最新出版的著作中提出：车臣使俄罗斯花费巨额资金，但是俄罗斯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阿林认为，应该允许车臣人举行全民公决，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愿意留在俄罗斯，如果车臣人希望独立，那就应该与车臣人划定一个明确的边界，同时也应该与所有高加索国家划定这样的国界。阿林还举例说：戴高乐放弃了阿尔及利亚，却拯救了法国；英帝国放弃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英国却更加强大了。阿林认为，俄罗斯如果不采取类似步骤，就会导致俄罗斯经常面临来自高加索的威胁，并且还会导致俄罗斯四分五裂[22]。上述观点在俄罗斯社会各界并非主流，但是持类似观点的人绝非少数。俄罗斯是否会放弃车臣，将取决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俄罗斯领导人或说领导集团的意志和决心、俄罗斯国内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当然也包括车臣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民心归向，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等等，而最根本的，则是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俄罗斯都绝不可能放弃车臣。

如果单看目前，则俄罗斯在车臣不仅没有得到明显的经济、政治利益，车臣甚至已经成为俄罗斯的巨大的经济、政治负担。俄罗斯在车臣维持局面，以及重建车臣所需要付出的花费，可能已经远远超过车臣所能够为俄罗斯带来的具体经济利益，俄罗斯在车臣的经营似乎得不偿失。

车臣事关俄罗斯长远的战略利益。车臣以及整个高加索地区具有极高的经济、政治和战略价值，俄罗斯帝国进行了几百年的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将高加索归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在苏联时期，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经济比重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6%。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实力较之苏联已经下降许多。在这种情况下，车臣在俄罗斯联邦的经济比重就上升为占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的10%到12%——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23]。车臣石油产品对于俄罗斯石油出口到世界石油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石油含硫量高，需要用车臣的石油中和，才能出口，车臣境内有许多石油管道，通往黑海沿岸各大港口及哈萨克斯坦境内最大的田吉兹油田。

北高加索地区是俄罗斯联邦最靠近南部的边疆地区。通过北高加索地区可以与外高加索地区取得经济、商贸等各个方面的联系，而通过黑海和里海（那里有许多不冻港）又可以与许多其他国家取得联系。从政

治、战略角度来看，拥有北高加索地区就使俄罗斯处于极其有利的战略地位。这一地区近则涵盖整个高加索地区，远则辐射中近东、中亚地区这样一个广大的范围。如果俄罗斯任由车臣独立，那么就会开了一个先例，而这对于俄罗斯是致命的。它会具有雪崩般的政治效应，整个高加索地区会步其后尘：印古什、奥塞梯等等也会随之独立。此外，还有许多民族地区就会加入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行列，俄罗斯就会进一步分裂。如果俄罗斯从高加索地区退出，其他国家就会挤进来，填补地缘政治真空。由于地缘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在所有想要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高加索的国家中，土耳其有很大优势；而土耳其本身就是北约成员国。这样，车臣问题作为俄罗斯的内政，就与向来非常敏感的北约东扩联系在一起。经过苏联解体以来长期的动荡和内部冲突，俄罗斯国力比起苏联时期已经衰弱许多，同时，俄罗斯民族的心灵已经非常脆弱，在车臣问题上几乎不可能做出任何让步。

2000 年，俄罗斯政府发表了《车臣白皮书》，在结论部分明确表达了类似观点：西班牙可以离开拉丁美洲，但却不能容许巴斯克人独立；法国离开了阿尔及利亚，但却不能离开科西嘉；英国离开了印度，但却不能因同样的原因而在贝尔法斯特问题上让步；同理，俄罗斯可以离开阿富汗，可以和平地与其他加盟共和国分离，但却不能离开车臣。俄罗斯在车臣经营了几百年，已经不只是一个殖民者，而且也是这里的主人，在这里有巨大的利益："俄罗斯在高加索所做的事情不少于车臣人"，而且，俄罗斯不能出卖在这里生活的几十万俄罗斯人，以及包括愿意与俄罗斯结盟的车臣人在内的高加索各民族[24]。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被国内复杂的民族问题深深困扰。实际上，在转型时期，社会冲突几乎表现在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俄罗斯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感到如此屈辱以及对未来的恐惧。俄罗斯人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甚至人数极少的民族都可能作为俄罗斯民族的敌人而站在面前。俄罗斯著名报纸《论据与事实》曾经刊载一篇文章，其中用大号字体写道："车臣是我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但对西方这么说，我们也对自己反复地这样说"[25]；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的心态。作为一个有过辉煌历史的民族，俄罗斯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怀有深深的自豪感；而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已经是一落千丈，美国以及北约却又步步紧逼，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俄罗斯的民族感情。普通民众在苏联解体以后，经历了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主义所带来的失落和屈辱之后，开始怀念

苏联时代，认识到国家强大要胜过个人自由；而发生在车臣的持久危机和冲突，又成为这种民族感情的试金石。在车臣问题上的坚定态度，是俄罗斯民族感情和民族敌忾情绪的集体体验。车臣成为当代俄罗斯实力衰落和军事失败的象征，因此，相当部分俄罗斯人将车臣作为国家政治退却的底线。因此，要求俄罗斯放弃车臣，任其独立言论，纯粹是腐儒之论，误国清谈，或者就是别有用心。有些组织鼓噪并宣传类似言论，其背景往往都是一些反俄的国家和组织。

对于俄罗斯政治家来说，不论是叶利钦还是普京，还是将来的俄罗斯政治家们，都不会听任车臣实现独立。这不仅是由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任何一个俄罗斯领导人如果宣布放弃车臣，都会成为俄罗斯的民族罪人，并立即会被迫下台；也是由俄罗斯现实的政治状况和政治游戏规则决定的。在叶利钦时期，车臣乃是他政治角逐的重要筹码；对于普京来说，车臣也是他在政治舞台上地位上升和巩固的阶梯，而且普京的政治生命本身就崛起于车臣危机，并在车臣问题上赢得了政治资本。叶利钦适时“禅让”，是普京的总统权力合法性的源泉，但是，巩固这一地位，却是由车臣为他提供了绝好的舞台。当然，在“禅让”之前，叶利钦已经提拔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理，并因在车臣问题上的表现而得分，为其进一步上升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有人说，即使没有车臣战争，也要造出一场战争来。在第二次车臣战争前后，俄罗斯许多大城市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恐怖爆炸事件，有人认为是俄罗斯特工所为；虽然传闻未必可靠，但在当时，这些事件客观上为俄罗斯的新近政治家准备了舆论，可以充分利用。而且，有了车臣战争，有了恐怖爆炸事件，俄罗斯政府就可以更轻松地控制舆论。普京驾驶战斗机视察车臣前线，以及他针对车臣恐怖分子发表的强硬言论“将匪徒溺死在马桶里!”，为民意测验中对普京的支持率增加了百分点，普京几乎成为俄罗斯的民族英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车臣战争造就了普京。至今为止，普京一直被视为成功结束车臣战争，恢复车臣和俄罗斯安宁的政治家。因此，从其执政背景来看，很难想像他会从现在的立场退步。随着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上的不断进取，车臣地区经济、社会的日益恢复和发展，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后退的可能性只会更小或者没有。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车臣仍旧可以是俄罗斯政治家手中的一张好牌。

军事手段的相对性

如果将冲突分为根本性的和偶然性的两种，那么，俄罗斯与车臣的

冲突属于根本性冲突。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与车臣的矛盾与冲突具有内在的性质，是与双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别、文化的差异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冲突是根本性的，也就是说它来源于争夺的一方或双方某些永恒的基本结构，这种冲突就可能反复出现”[26]。俄罗斯对车臣的军事行动使得车臣人的民族感情再次受到伤害。对于多数车臣人来说，战争使俄罗斯政府与车臣领导人的矛盾变成俄罗斯民族与车臣民族之间的矛盾，战争带来的创伤更难愈合。有人说，对车臣的任何胜利都只是暂时的。确实，无论根据历史经验还是现实情况来看，俄罗斯在车臣都不能说已经达到政治目标。许多因素决定了，在未来很长的时期里，车臣的反抗活动都将持续。即使在中央政权极为强大的俄罗斯帝国时期或是苏维埃时期，车臣人的反抗都从来没有中断过：19 世纪的高加索战争结束以后，车臣人的零星的反抗持续了几十年之久；十月革命之后，车臣人不断发动叛乱；1944 年流放车臣人之后，一些车臣人坚持游击达 30 年之久……俄罗斯不能通过发动一次战役或军事进攻就将车臣问题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一位学者写到：“……正如在斯大林时期一样，消灭车臣人或者甚至将他们赶出车臣境外，让车臣住满俄罗斯人，我们是作不到的。我们应更软弱一些，或许甚至再更善良一些，而且，联合国、欧洲安全组织、北约，西方各国政府及其社会舆论都是不会允许的。”[27]对于致力于建立新联邦制的俄罗斯来说，采用武力手段被视为对民主原则的倒退，受到俄罗斯国内外的谴责和反对：“军事手段解决危机是做不到的，而且不论在军事、政治还是在道德方面，都不可能得到认可。”[28]

俄罗斯面临的选择：要么与车臣分裂武装长期消耗、对抗；要么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一劳永逸地结束车臣问题。如果与车臣武装持久作战，对于俄罗斯实现在高加索的战略计划会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俄罗斯无力与他国争夺高加索。如果发动大规模战争，必将在政治和道义上付出巨大代价，南高加索各国以及北高加索各行政主体受到威慑后，或许将选择投靠北约等外部势力寻求保护。在 19 世纪下半期的高加索战争后期，沙皇曾被迫与山民实现了某种和解，保留他们的内部生活方式，最终使高加索地区实现了安宁。今天的俄罗斯政府最终也必须与车臣人实现和解，化解俄罗斯民族与车臣民族的世代仇恨；但是，按照这些山民的精神气质和信仰，任何人间的法律和和约对于他们都没有约束力。有人认为：俄罗斯与这些山民的和约，应该以神的名义和以安拉的名义——类似与上帝的约定。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联邦总统不是作为一

个国家元首，而是作为俄罗斯各民族共同体的领袖，作为一个被车臣人信任的人，与车臣民族签订和约[29]。

在车臣，种种现实条件决定了恐怖活动将会持续，而对付现代恐怖活动，俄罗斯是一个新手，需要逐渐适应和学习。俄罗斯在车臣的反恐怖行动缺乏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俄罗斯政府没有赢得车臣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而许多武装分子却得到当地居民的掩护。印古什共和国总统阿乌舍夫曾经说过：俄罗斯军队要想取得对恐怖分子的胜利，必须将车臣民众作为自己的盟友。但是，看起来，俄罗斯军队曾犯过严重错误。许多车臣人承认：最初，他们都以为俄罗斯军人会将自己从罪犯和瓦哈比派那里解放出来；但是，随后发现，俄罗斯军队几乎将所有车臣人都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施武力，导致许多无辜者受害[30]。在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一些俄罗斯将军甚至威胁说，要逮捕所有从10岁到65岁之间的车臣男子——所有车臣男子都被归入可能的恐怖分子之列。2000年，卡德罗夫在自己的政治计划中曾经提到，要改善军队对居民的态度，呼吁居民在武装分子面前关起家门；这表明，车臣领导人公开承认，俄罗斯军队曾经对车臣平民有过激行为，导致居民与俄罗斯军队的关系恶化并趋于紧张。而没有民众对俄罗斯军队的支持，清剿恐怖武装的行动很难奏效。

车臣并非俄罗斯机体上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俄罗斯恢复对车臣的控制之后，军队仍被赋予重要意义，远比车臣政府机关更重要。俄罗斯必须长期在车臣驻扎军队，控制车臣局势，而这样做将会付出巨大代价，靠时刻保持军事戒备的手段，来维持对一个地区的控制，花费巨大，而从政治上来说是不可能的，俄罗斯终究须在车臣实现非军事化。车臣成为俄罗斯国家机体上的一块流血的伤口。就对抗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这一意义上说，俄罗斯与车臣的冲突，将类似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车臣与恐怖主义

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车臣武装就开始以劫夺人质来勒索赎金。一些车臣分裂组织认为，俄罗斯是战败国，应该为此向车臣支付2000亿美元的赔款。俄罗斯当然不能将车臣作为一个对等的国家来对待，向其支付赔款，而且也无能力支付；那么，车臣恐怖组织就通过掠卖人口这种当代的“奴隶贸易”，向俄罗斯索取赎金，作为赔款的一部分。否则，就会撕票。据估计，俄罗斯已经向这些绑架掠卖人口的集团支付了将近

10 亿美元的赎金[31]。

由于社会形势恶化，武器扩散严重，从而导致车臣社会犯罪率升高。官方统计，车臣地区平均每周的犯罪案件有 60 到 70 件，其中包括 18 宗谋杀案。1998 年上半年，登记在册的案件就有 130 宗谋杀案，66 起绑架案，137 起抢劫案[32]。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前后，车臣的恐怖主义形势日趋严重：绑架人质、抢劫、爆炸，等等，引起俄罗斯社会的不安和世界各国的关注。恐怖袭击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且范围不限于车臣，已经蔓延到整个俄罗斯南部边疆，以下是南部边疆地区历年发生的恐怖事件的统计数字：

1997 年，带有恐怖性质的案件 1535 起；

1998 年上升为 2095 起；

1999 年为 3558 起；

2000 年为 4167 起[33]。

据俄罗斯安全部门官员安得烈·帕特鲁舍夫通报说，2004 年，俄罗斯安全部门侦破的未遂恐怖袭击案件就将近 500 起，其中 200 起是会造成巨大破坏、引起极大社会震动的案件[34]。由于俄罗斯国内恐怖事件接连不断，车臣一度几乎成为恐怖主义的代名词。恐怖主义袭击使俄罗斯蒙受巨大损失，也损害了俄罗斯国家的形象和俄罗斯政府的威望。现在，俄罗斯的许多媒体和出版物越来越将俄罗斯与以色列相提并论：俄罗斯日益“以色列化”，而车臣则日益“巴勒斯坦化”。俄罗斯研究者开始研究以色列的技术和策略，借鉴反恐斗争的经验；俄罗斯学者乐于称道以色列“定点清除”战术的有效性。

“恐怖主义是对个人或集团使用暴力行动或威胁，以改变某些政治进程结局的策略”[35]。恐怖主义的实质，是恐怖集团借助恐怖手段，引起社会震动，唤起社会舆论的关注。恐怖主义有以下基本特征：1. 使用暴力，制造恐怖，引起社会震动；2. 使恐怖袭击的受害一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3. 恐怖并非目标，而是手段。不在肉体上消灭人，也能使对手屈服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那也未必就不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强迫屈服”[36]。恐怖主义的产生，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哲学：即对于解决争执和矛盾来说，实力是最有效的手段。在有强权存在的社会中，实力是解决争执和矛盾，并使解决结果有利于自己的一个重要前提。有人遭到失败或挫折，只是由于实力不够强大；而弱者往往认同强者的哲学，在内心压迫和精神煎熬下，弱者的人格就被扭曲和异化，因为无力与强者正面对抗，就只有采取极端措施。恐怖袭击一方与遭受恐

怖侵害的一方，其实力是不对称的：俄国革命家与沙皇政府；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国；北爱尔兰共和军与英国政府；车臣恐怖分子与俄罗斯联邦政府，等等。

恐怖主义源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状况。政治就是这样一种技巧和艺术，通过非暴力的说服以及协调来达成妥协，使社会得以有序、正常地运行；而恐怖主义的产生，恰恰是因为俄罗斯政府不能有效控制车臣局势，从而导致社会政治进程畸形发展，它表明了政治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车臣恐怖主义也是俄罗斯政府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的结果，武装冲突导致车臣正常的社会政治进程被打断，无法建立有效、统一的政治权力，局面出现失控。在第一次车臣战争初期，车臣的恐怖活动并不占主流。当然，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前后，杜达耶夫就意识到军事力量相差悬殊，曾表示：如果战争爆发，将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战争”，车臣方面会将战争引入到俄罗斯境内的其他地区，引人到战争的策源地。主要是第一次车臣战争后期以及第二次车臣战争以后，开始大规模采用恐怖手段。这也是车臣分裂派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后，迫不得已的选择。它表明了俄罗斯—车臣冲突的残酷性。

车臣恐怖主义的根源，还在于车臣及其周边令人悲观的社会经济状况。如果说，今日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形势已经很恶劣，那么，包括车臣在内的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主要社会经济指标，比俄罗斯的平均水平还要低许多。1998 年底，每个俄罗斯国民的月平均收人是 900 卢布，而北高加索地区同一指标仅在印古什的 300 卢布和罗斯托夫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 600 卢布之间。该地区的贫困化程度很高，以 1998 年的月均货币收人低于最低生活费者，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为：亚迪格共和国 45.7%；达吉斯坦 57.5%；印古什 76%；卡巴尔达—巴尔卡尔 44.5%；卡拉恰依—切尔克斯 52%；北奥塞梯 33.8%；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32%；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40%；罗斯托夫州 33%；俄罗斯联邦 21%[37]。这就是车臣周边的社会状况。车臣共和国的相关统计资料虽然缺乏，但是，可以想见，经过多年武装冲突之后，类似社会指标决不会比邻近共和国和州的水平更高。此外，车臣居民大部分受教育程度很低；在车臣乃至整个高加索地区，武器流失情况极为严重；国际激进组织和恐怖组织向车臣乃至高加索地区渗透，等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车臣的恐怖主义形势趋于严峻。

车臣的恐怖主义，可以说有三个传统：俄国革命党人的传统，如民意党等组织；中近东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如巴勒斯坦的一些激进反抗组织，

如“哈马斯”等；如果说还有一个传统的话，那就是车臣民族自身的历史传统。在中世纪和近代历史上，包括车臣在内的整个北高加索社会，都存在抢掠和绑架其他部落人口的风气。

不论从法理还是从伦理方面看，恐怖主义无疑都应该受到谴责。作为一种极端、绝对的政治斗争手段，它使社会政治进程脱离常轨，使社会机体受到毒害，不仅侵害特定对象——敌人、对手，且可能使大量无辜平民成为受害者。恐怖行动不仅挑战国家的社会组织、制度，而且还严重地伤害社会中人们的心灵。

车臣分裂派武装的恐怖主义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劫持人质：目的是对国家部门和社会舆论施加压力，满足自己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吸引舆论的关注。这种手段并不新鲜，实际上，不单是车臣非法武装，整个北高加索地区，不论是政府还是政治组织（如格鲁吉亚），都曾用劫持人质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但是，车臣武装将这种恐怖行为的规模扩大，对人质生命的蔑视程度也在增加。据扬达尔比耶夫回忆说，在1994年之前，车臣分裂派常常用这种手段为自己筹措资金。巴萨耶夫、拉杜耶夫、巴拉耶夫武装能够在布琼诺夫斯克、基兹里亚尔等北高加索地区3次就劫持超过5000人作为人质，并且在劫持之后能够全部撤离。在这种情况下，人质的死亡率很高，据估计达到10%到15%；而在2004年9月1日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中，人质死亡率之高尤为罕见。这就使俄罗斯政府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必须严厉镇压恐怖主义；另一方面还要竭力拯救人质的生命。俄罗斯政府已经多次因之而陷于被动，而这也就是恐怖事件策划者们的最终目的。2004年10月30日，俄罗斯总检察长声明，应该运用“反劫持”手段来对付恐怖劫持：即把那些恐怖分子的亲属扣为人质，作为谈判的条件；车臣新任总统阿卢·阿尔汉诺夫对此提议表示赞同和支持，并希望俄罗斯政府能够通过类似立法，以便有法可依。这种“以恶制恶”的手段当然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俄罗斯政府通过立法并将其付诸实施，必将在政治和道义方面付出巨大代价。

劫持交通工具：包括劫持陆上的汽车、火车；水上的客轮；空中的飞机等交通工具。2001年9月11日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是劫持飞机用做攻击特定建筑物的武器，目的是为了摧毁象征美国的代表性建筑；但是，2004年发生在俄罗斯的飞机“同步”坠毁事件，多半却是以从肉体上消灭人员、造成重大伤亡为主要目的。

爆炸：意在通过爆炸事件，使社会心理产生恐慌。恐怖爆炸通常会

造成巨大伤亡。爆炸地点通常选择在咖啡馆、地铁、餐厅、居民楼等人群相对密集的公众场所。车臣恐怖武装在选择爆炸对象时，对民族属性有选择，即专门针对俄罗斯族。1999 年 9 月发生在莫斯科、伏尔加河—顿河斯克、布依那克斯克的恐怖爆炸事件导致 300 多人死亡。

谋杀：从时间上看，这是最为古老的一种恐怖行动；从地域上说，它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曾发生过。车臣以及整个俄罗斯境内发生的刺杀事件不计其数，既有普通刑事性质的，也有政治性质的。2004 年 5 月 9 日，车臣总统卡迪罗夫被炸身亡。按照分析，恐怖袭击的意图是要炸死参加庆典的所有高官，或许还包括俄罗斯领导人，乃是最为严重的刺杀事件。车臣分裂派别曾经扬言：暗杀卡迪罗夫总统的继任者，甚至还打算暗杀俄罗斯总统普京。

今天的恐怖主义，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概念上的恐怖主义，与近现代历史上的恐怖行动不可同日而语。也许，我们必须承认：恐怖主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社会政治进程。在当代，恐怖主义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非同寻常的发展，具体说来，理由如下：一、今天的世界上，存在着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存在着利于恐怖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霸权主义、社会不公正、贫富分化、民族矛盾，等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推行的全球化进程，导致第三世界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许多弱势群体受到侵害，反全球化主义逐渐盛行。在弱者对强者的对抗游戏中，恐怖主义是弱者的宗教和鸦片。反全球化主义运动与反美、反西方的恐怖主义有共同敌人，而反全球化运动很有前途，在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回应和支持；二、恐怖主义行动赢得了一些大众和舆论的支持，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占优势的支持。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世贸中心遭到恐怖袭击，世界各国人民一方面对死难者表示同情，另一方面，有许多人在明里暗里同情袭击者，对美国政府幸灾乐祸，甚至连美国向来的盟国都有人对美国政府冷嘲热讽，视美国和以色列为民族敌人的巴勒斯坦更是将这一天变成自己的狂欢节；三、以往我们熟知的孤立、单纯的个人恐怖行为不等于恐怖主义。在今天，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拥有动员社会的巨大能量，成为一些恐怖组织的思想源泉。一些伊斯兰激进组织给恐怖行动披上了宗教学说的合法性外衣，典型的如“圣战”口号。尽管《古兰经》对“圣战”的规定有明确的范围，而伊斯兰各教派对其理解也有不同。但是，许多恐怖分子正是在“圣战”的名义下发动恐怖袭击的。最近，车臣非法武装头领、著名“野战指挥官”沙米尔·巴萨耶夫写了一本《圣战者手册》，其中讲到如何做一名

“圣战者”“穆扎希德”。在《古兰经》中，“穆扎希德”是指那些为了真主而与自己的弱点斗争的人，即为使真主的教诲在心灵和意识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奋斗的人。除了对“圣战者”进行心理和意志训练以外，还有明确的战略战术。这就表明，在与俄罗斯的长期对抗中，车臣非法武装不仅积累了相当的军事经验，而且还对恐怖主义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理论总结。同时，可以想见，这些经验还将与巴勒斯坦等地的伊斯兰反抗活动的经验结合起来；四、现代科技有可能让恐怖分子和集团获得前所未有的制胜手段，从而在非对称战争中占据优势。有人将反恐战争称为第四次世界大战；五、当恐怖主义成为日常的政治斗争手段被反复地、大规模地使用时，其带来的象征意义或实质性的后果都是不容忽视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人质和牺牲品。当其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政治进程就会发生深刻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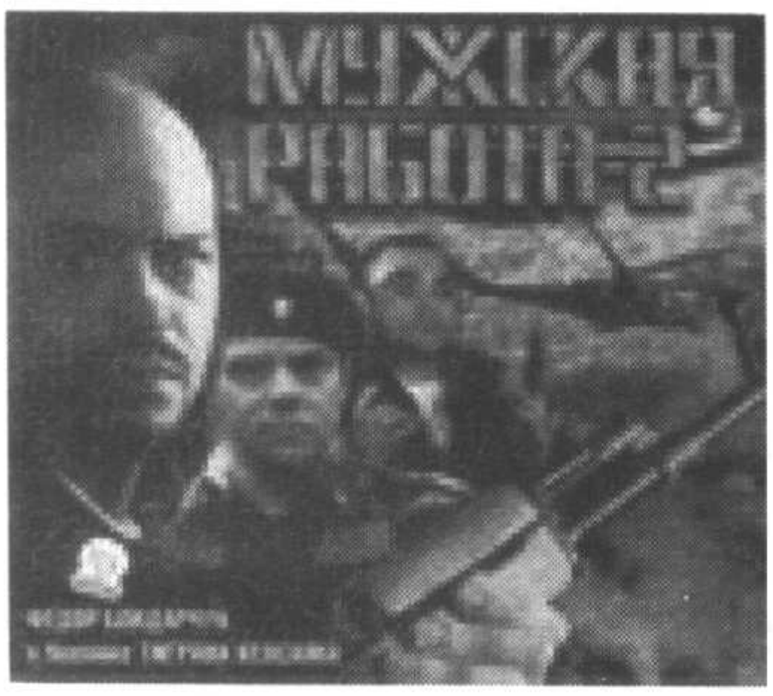
与此相对的，则是遭受恐怖主义侵害方面的苍白乏力。原因何在？当今世界上所谓的“反恐联盟”更大程度上是一个虚拟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有明确理论基础、有共同利益维系、巩固的联合体。现在的反恐联盟多是在美国的旗帜下走到一起的，而其主导国家的真实意图并非要反恐，而是借反恐实现自己的政治和战略目标。美国遭受的恐怖主义侵害和别的国家如俄罗斯、中国等所遭受的恐怖主义侵害是不同的，产生恐怖主义的社会政治根源也是不同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对于恐怖主义的界定也相差悬殊。例如，在很长的时期内，西方国家一直支持车臣非法武装，其组织及分支机构在这些国家得到庇护。反恐阵营中的国家情况各不相同，许多并非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连想像中的恐怖主义侵害都谈不到，各国之间并没有共同的利益维系。其次，要消灭恐怖主义，首先要消灭产生恐怖主义的社会政治根源和意识形态根源，用大规模军事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应该将现实中的恐怖主义和意识形态宣传中的恐怖主义区分开来。反对恐怖主义有可能成为一些国家侵犯别国的借口，成为一种用来欺骗舆论的新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乌萨马·本·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的行动正好符合某些西方势力的利益。一些国家打着所谓“反恐”的招牌，实质却是在玩弄地缘政治游戏，消灭异己，掠夺油气资源，扩大势力范围。如果真正的恐怖主义行动被视为正当合法的“民族自决”行动，而真正在进行反恐活动的国家却受到诋毁和攻击，那么，以军事手段去消灭“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不会减少、而只会增多；而且，这种“反恐”行动本身也会成为恐怖主义的不竭根源。这从伊拉克战争所导致的后果就可知晓。

在这种情况下，反对这种虚伪的新意识形态的国家将会增多。

当代俄罗斯的车臣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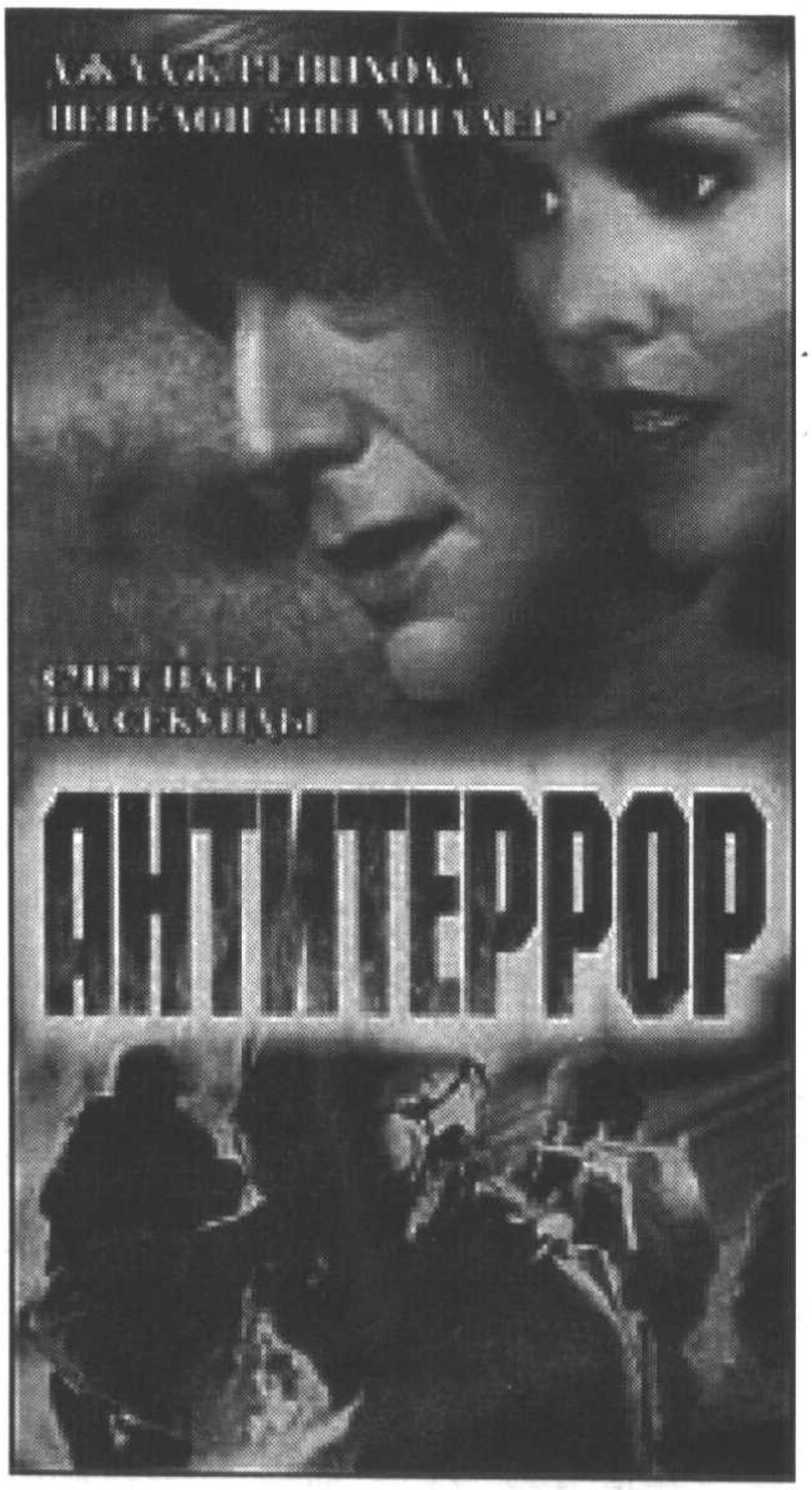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代俄罗斯，以车臣为题材的创作活动无疑已经成为苏联卫国战争以来又一种新的“战争文学”。俄罗斯通俗作家、俄罗斯电影和电视剧对车臣题材的关注超乎寻常。在俄罗斯出版物中，有关当代车臣的回忆录、旅行记、反恐小说、影视作品如雨后春笋；比起19世纪下半期高加索战争之前的情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车臣问题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受到俄罗斯和整个世界的关注。这些大众文化，从不同角度反映、解读着车臣战争，反过来也影响着大众意识。阿富汗战争对于苏联，犹如越南战争之于美国，其损失是惨重的，留在人们心中的创痛是深刻的；但是，由于阿富汗战争的非道义性，随着时间的流逝，苏联解体之后，已经被逐渐淡忘。散布在众多俄语国家中的阿富汗战争的老兵们，多半在贫困线上挣扎，成为社会中被遗忘的一群。有些俄罗斯人愿意把车臣与阿富汗相提并论，将车臣危机视为“阿富汗第二”，但是，车臣战争的性质与社会后果却不同于阿富汗。车臣危机是苏联解体的组成部分，也是苏联解体进程的继续，而苏联解体乃是俄罗斯民族或国家的重大历史挫折。





战争首先伤害，甚至扭曲了战争的参加者。美国著名报纸《华盛顿邮报》曾经写到，在经历过车臣战争之后，俄罗斯的雇佣警察所发生的种种心理扭曲：从车臣回来之后，他们只是酗酒，然后忘却。他们不情愿地参加这场战争，他们很容易被激怒，因为他们体会过为金钱而带来的痛苦；而且，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得到多少钱。而在当代俄罗斯社会里，几乎很少有人称赞他们。俄罗斯雇佣警察完全不同于10年前担任警察职务的那些人。他们在车臣发生了变化。由于高度紧张和压力，当他们从车臣返回之后，就像是暴徒。结果，他们将这种经历也带回了家。他们性格暴戾，容易愤怒和冲动，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将对俄罗斯社会长期

构成严重威胁，这是车臣战争所导致的、将长期发生作用的消极后果，是俄罗斯社会的疾病。



在当代俄罗斯，随着大规模军事行动真正结束，文学和影视作品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纪念车臣战争，并且成为俄罗斯通俗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闪光点，在社会流行方面异常活跃。在第一次车臣战争前后，有关车臣战争的电影或通俗小说其主题通常都是反战的。这些影片对于战争的表现基调是灰暗、甚至悲惨的。俄罗斯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一个记录片，在片中，一些首次前往车臣战场的士兵将打仗视为一次小旅行，并打算在3月8日前回家，但是不久就在前线阵亡了。片中插放一首俄罗斯士兵自己写的歌曲，一句反复出现的歌词是：谁将战争作为工作，战争就会给谁带来灾难。

一些影视作品反映了车臣战争对人的心理扭曲、民族之间的深刻敌视。电影《战争》（《Война》）中，一个车臣人同被俘的俄罗斯人有这样一段对话："我是一个穆里德的后代。150年前他是收拾过你们的人。这是我的土地，我要将异教徒狗从土地上清除出去，直到伏尔加格勒的俄罗斯人一个不剩。"电影《信号所》（《Блок－пост》）中，一个令观众印象非常深刻的情节是：在北高加索某村庄，一个不更事的小孩，面对俄罗斯士兵，用斧头敲打烈性炸药，与俄罗斯士兵同归于尽；而影片的结尾，终于清楚，那个神秘的狙击手原来就是经常到信号所来的高加索少女。她假装和一个士兵谈恋爱，并几次给信号所的士兵带去一个姑娘，做肉体生意。

车臣，还有塞尔维亚、伊拉克、阿富汗等，是当代伊斯兰宗教狂热者、理想主义者实践宗教乌托邦的试验场，也是俄罗斯人捍卫民族尊严的最后底线，成为俄罗斯走向历史衰亡或复兴的象征。而车臣题材的文

学作品、影视作品，是俄罗斯人对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感的集体体验的介质。电影《炼狱》（《Чистилище》）中，俄罗斯军队在车臣遭到伏击，伤亡惨重，表现了车臣战争，特别是在车臣战争初期的残酷。按照导演亚历山大·涅夫佐罗夫的说法，是为了尽量真实地展现车臣战争的画面："我没有人为的英雄，所有的名字都是真实的。我不能容许自己造假。我追求、并且创造了一个战争本身应有的世界。"类似影视剧的情节多半是：恐怖分子野蛮残忍，绑架人质，索取赎金，于是俄罗斯军队运用谋略，或动用勇敢无畏的特种部队，展开搜索和围剿，最终将恐怖分子消灭，表明俄罗斯反恐战士的英雄主义和无畏气概。这些作品对参加军队、参加战争、保卫国家在价值上作出肯定。如《士兵叙事歌》（《Баллада о солдате》）中，生病的父亲对主人公一位年轻的战士说：参加过战争，这很好。它能够将一个小伙子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从车臣前线归来，乃是一个人获得男子汉气概和成为非凡战士的骄人资历，正如美国电影中男主人公拥有在越南战场的经历一般。可以说，《男人的行当》（《Мужская работа》）、《特种部队》（《Спецназ》）、《祖国在等待》（《Родина ждет》）等影视剧是俄罗斯的《第一滴血》，其中，浓墨重彩刻画的主人公也是一个个俄罗斯的"兰博"们。

还有一些作品则是为了配合俄罗斯的反恐行动，具有政治宣传的功能，其情节多为：恐怖组织打算攻击俄罗斯的水库、大坝、核电站、核设施等，如德米特里·切尔卡索夫的小说《科索沃原野》，就是描写恐怖分子打算在圣彼得堡实施核爆炸的情节。

车臣分裂派得到外部支持的事实，已经得到披露。第二次车臣战争以来，许多通俗小说中刻画一些车臣分裂派的"帮凶"的形象：俄罗斯国内，是国家杜马的政客、记者、维权人士、叛卖的军官等；在国外，则是伊斯兰激进分子、格鲁吉亚人、西方情报部门的特工等。



飘扬在墓地上的旌幡：车臣境内遍地招魂

任何冲突或危机并不总是坏事，社会冲突本身还有许多积极的功能，它可以使民众极大地团结起来，动员

各种社会资源，实现民族认同，凝聚国民，等等。俄罗斯军队已经在车臣控制局面，大规模战斗已经从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画面隐退，渐去渐远，成为背景。这些以车臣战争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消解 1994 年以来车臣战争中血与火的残酷真相，消弭因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而付出惨重的社会代价和人员伤亡的阴影，安抚那些因战争而受难的心灵，鼓励士气，振作民族精神。这种记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忘却什么。俄罗斯军人在车臣战争中付出伤亡数万人的代价，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受到反战团体的抨击和诋毁，社会形象消极恶劣，需要正名和重新审视。有关车臣战争的文学和影视作品的流传和繁荣，植根于俄罗斯社会的巨大需求，正面地宣扬了车臣战争中俄罗斯军人的形象。

没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俄罗斯是不可想象的，而长期没有重大的外来威胁，对于一支军队来说，也许是灾难性的。车臣战争的积极后果，就是迫使俄罗斯日益重视军队建设。搬上银幕，讲述故事，也是让现实成为被思索对象的一种手段。车臣危机的爆发、进程及其后果都表明俄罗斯的衰落，车臣战争不是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生死考验，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俄罗斯国家的前途。许多俄罗斯人逐渐认同这样的信条：不养活自己的军队，那就要养活别人的军队。俄罗斯已经从第一次车臣战争所遭受的挫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而且将继续走向强大。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等民族分裂主义领袖们已使车臣民族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却为俄罗斯从衰落的谷底走向上升做出了贡献。在一张影碟的封皮上，写着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那些不能消灭我们的事物，只会使我们变得更强大。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衰落到了极点，往往也就是复兴的起点；也许，俄罗斯民族的复兴，就始于对惨痛的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精神的复兴。

注　释：

〔1〕П. В. Чернов, Этно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аз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 1999, С. 173.

〔2〕А. Ю. Даниэль, 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олдаты кавказской войны, М, 1997, С. 57.

〔3〕http://www.polk.ru/chechi1.html

〔4〕Ант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 в Чечне//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0, №11, С. 7.

〔5〕Ант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 в Чечне//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0, №11, С. 7.

〔6〕А. Гушер, Чечня: узел трудных проблем вопросов//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0, №11, С. 7.

〔7〕http://kavkaz. memo. ru/regions/

〔8〕Точное число мирных жителей, погибших во время войны в Чечне, неизвестно, http://www. kavkaz. memo. ru/newstext/

〔9〕Сергей Максудов, Потери Чечни по данным переписей 1989—2002 годов, http://kavkaz. memo. ru/analyticstext/

〔10〕Война: герои и негодяи, http://kavkaz. memo. ru/analyticstext/home. ural. ru/chechnya/index. htm

〔11〕Алла Языкова, Чеченская война: неизвлеченный урок//Открытая полилика, 2001, №3、4, С. 68.

〔12〕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出版,358 页。

〔13〕П. В. Чернов, Этно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аз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 1999, С. 130.

〔14〕http://www. sakharov – center. ru

〔15〕С. А. Ганнушкина, О положении жителей Чечн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 2004, С. 38.

〔16〕同注释〔15〕, С. 29。

〔17〕Е. И. Степанов,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терроризм положе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а, М, 2000, С. 120.

〔18〕Зура Альтамирова, Жизнь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Чечне, http://www. sakharov – center. ru

〔19〕И. Н. Еременко, Россия и Чечня: Документы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1990—1997, М, 1997, С. 228.

〔20〕http://kavkaz. memo. ru/

〔21〕И. Н. Еременко, Россия и Чечня: Документы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1990—1997, М, 1997, С. 213.

〔22〕О. А. Арин, Мир без России, М, 2002, С. 451.

〔23〕А. Бли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Чечня: война 200 лет,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2000, С. 181.

〔24〕А. К. Волин, Чечня. Белая книга, М, 2000, С. 137.

〔25〕В Чечне решается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http://home. ural. ru/chechnya/index. htm

〔26〕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出版,174 页。

〔27〕Дмитрий Фурман, Россия и Чечня: заложники друг у друга , http://www. sakharov – center. ru

〔28〕http://www. stlana, ru/stories

〔29〕Хожа - Ахмет Нухаев, Ведено или Вашингтон, http://ryadovoy. vif 2. ru/geopolitika/geopol&war_oglav. htm

〔30〕В. В. Черноус,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Кавказа, Ростов - на - Дону, 2001, С. 118.

〔31〕В чеченском плену, http://home. ural. ru/chechnya/index. htm

〔32〕Чечня, http://www. yandex. ru

〔33〕А. Г. Володин, В. Н. Коновалов.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проблемы терроризма, Ростов н/Д, 2002, С. 124.

〔34〕http://newsru. com/

〔35〕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出版,244 页。

〔36〕Е. И. Степанов,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терроризм: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а, М, 2000, С. 7.

〔37〕И. Г. Косиков, Л. С. Косикова, Северокавказ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егион: основны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показатели, http://kavkaz. memo. ru/

第十一章

车臣的现状与前景

1999年到2000年间，经过短期的激烈战斗之后，对车臣分裂派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但是，反恐行动并没有结束。此后，俄罗斯军队除了继续清剿零星的车臣武装和恐怖分子以外，开始着手恢复和重建。可以说，这一进程任重道远。

俄罗斯重新控制车臣

在短期之内，俄罗斯对车臣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宣告结束。2001年2日，俄罗斯政府通过决议，提出了有关在车臣地区恢复经济、重建家园的具体纲领，包括：恢复车臣共和国的水、电、气、保健、教育、文化、居住、交通等生活保障体系，恢复通信、媒体等，保障支付共和国居民养老金、工资等，恢复基本经济领域，返回难民的安置[1]。

2002年2月9日，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安那托利·克瓦什宁指出：俄罗斯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非法武装的罪行实际上属于普通刑事犯罪，已经不具有政治色彩[2]。同时，车臣重建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

行，经历战乱破坏的车臣正在建设之中。2002 年 4 月 18 日，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称：可以认为，冲突的军事阶段已经结束，俄罗斯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使车臣回到俄罗斯的政治和法律空间。在以后的不同时期，俄罗斯政府都表示了这样一种判断和信心。

俄罗斯必须对车臣注入和继续注入巨额资金，恢复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经济。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其原因首先在于当地严重恶化的经济形势，大批失业者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车臣人只是因为没有工作，为取得一些固定收入而做雇佣军，参加分裂派武装与俄罗斯对抗，实际上，那些所谓分裂派武装的犯罪，往往是个人犯罪的总和和叠加，因此，恢复经济、创造就业岗位，才是消除这些犯罪现象的根本出路。恢复车臣的医疗和教育体系，是消除犯罪和恐怖主义根源的另一重要方面，也是使车臣走向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俄罗斯政府重建车臣所面临的重大困难，是必须花费巨资安置大量难民，使他们树立信心，重新生活和工作。车臣的难民问题与整个俄罗斯境内的移民浪潮联系在一起，如果不能中止这一移民进程，俄罗斯的国家完整就会受到威胁。在这些难民中，除车臣人以外，还有大量俄罗斯族。在政权重建之后，如果非车臣人，主要是俄语民族在车臣居民中不能达到一个必要的比例，对于俄罗斯控制车臣将是极为不利的。俄罗斯必须将车臣建设成为一个与俄罗斯社会同质、有机的组成部分，而这样的一个部分当然不能是纯粹由车臣人组成的社会。有人认为，如果车臣或北高加索某一行政主体是单一民族，或某个民族占绝对多数，其发生冲突的机会并不比民族杂居的地区少一些[3]；但是，各民族间人口比例发生骤然改变，往往也是民族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的根源。1991 年，车臣人口是 127 万人；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后，大约只剩下 35 万人；而第二次车臣战争之后，大批难民返回。2002 年的人口统计表明：车臣共和国人口已经骤然增加到 110 万人，而俄罗斯族所占比例很小，只有不足 4 万人。

俄罗斯也有一些有利条件。首先就是，经过多年军事对抗之后，人民疲惫不堪，民意逐渐向着有利于俄罗斯政府的方面发展。据俄罗斯军方估计，车臣武装分子还有 1000—2000 人，随着俄罗斯军队在车臣控制局势，车臣武装越来越具有流寇、游击的性质，从而就越加凸显出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合法性。而饱尝战乱之苦的车臣民众以及该地区的达吉斯坦、格鲁吉亚等等，也希望借助俄罗斯军队的力量，在该地区恢复秩序，

因此，在未来的行动中，俄罗斯可望得到当地人民的配合和支持。另外，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恐怖爆炸事件，客观上为俄罗斯解决车臣危机带来了积极影响。遭受重创的美国一夜之间成为俄罗斯在反恐怖斗争战线上的盟友，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对手和传统敌人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旗帜下统一立场。对于俄罗斯来说，乌萨马·本·拉登送给俄罗斯一个绝好的礼物，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是反恐怖行动，来自西方国家的舆论和政治压力骤然减轻。

在大规模武装冲突结束后，俄罗斯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在车臣恢复政权和法律秩序。到2001年，车臣是这样一番情景：境内有7个联邦强力机构在运转，包括国防部、内务部、联邦安全局、司法部军队等，互不隶属，也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车臣各地到处是军事设施，到处是兵站，几乎是一个大兵营。民用交通工具与军车，还有战斗机混杂在一起。军人可以随时封锁道路，清除居民点[4]。

车臣社会的政治文化是二元的，即车臣北部和南部的政治态度完全不同。车臣北部大多是平原，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北部平原的车臣居民多半对俄罗斯政府持合作态度，愿意服从俄罗斯政府及其法制，开始和平生活；而南部山区的车臣居民则对俄罗斯政府持敌意和不合作态度，其反抗持续不断，是分裂武装的堡垒，俄罗斯要迅速征服这些山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像一位作者所说的那样，这种差别类似18世纪苏格兰的高地派和低地派之间的政治差别[5]。鉴于这种特点，俄罗斯政府内倾向于将车臣分为两部分：北部平原地区划归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而将南部山区与北部隔离，类似以色列在与巴勒斯坦边界处建立的隔离墙。这一方案是俄罗斯前副总理聂姆佐夫提出的，可以称为“聂姆佐夫方案”。也有比较乐观的看法，将车臣居民进一步分为如下几部分：第一种是住在捷列克河以北的俄罗斯族和车臣族，这部分人最亲俄，而且一直不服从杜达耶夫；第二种是住在捷列克河与车臣山地之间的平原车臣人，他们摇摆不定，他们厌倦了无政府状态，他们很文明，并且支持能够维持稳固的秩序的政治力量；第三种是格罗兹尼居民，在1991年之前，该市居民占共和国人口的40%。经过了杜达耶夫和马斯哈多夫的统治之后，大多数居民原来的政治幻想已经破灭，相信车臣独立就意味着他们将变得赤贫、生命经常受到威胁。大部分人愿意俄罗斯在车臣恢复政权，但是没有军事和政治资源来实现政治表达；小部分人则强烈反俄，并且垄断着经济、政治和军事资源。第四种是山区的车臣人，他们往往是主要的反俄军事力量，不支持任何国家政权，会与任何一个中央政权战斗几

十年。第五种则是原来住在车臣境内的俄罗斯族，他们多半已经成为难民。车臣的重建以及大选，都应该有他们参加[6]。

对于车臣政权的统治形式的问题，也存在着不同意见。2000 年，普京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如果局势需要，可能会实行总统直接统治，作为过渡；在过渡的 1—2 年之内，创造一些必要条件，培养一些可以任用的人员，等等[7]。但是，这种统治形式无疑会极大地约束车臣人的自主权。有人提出：应该废除总统制，实施集体领导体制。因为在车臣很难找到一个被各方面接受、享有广泛权威的统一领导人。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实施地方自治的统治形式，但是，鉴于车臣境内缺乏公民社会的传统和基础，实施这种制度会导致更多消极后果，俄罗斯无法根除恐怖和匪帮；因此，所谓地方自治也是不太现实的方案。

在关于任命俄罗斯联邦驻车臣全权代表的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该代表须享有真正的全权，有权过问一切有关共和国管理的问题，并协调强力部门与车臣政府之间的关系。

卡迪罗夫、马斯哈多夫及其他

车臣的现存行政体制是俄罗斯对车臣发动两次军事行动，特别是在第二次军事行动以后建立起来的。它体现了俄罗斯军事行动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对这一政治成果的巩固；同时，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又是一种破旧立新。重建车臣政权的进程，对于俄罗斯政府是一个重大考验。

车臣行政体系是由俄罗斯联邦宪法和一系列专门法律、法规、俄罗斯联邦总统和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命令确立起来的，包括《俄罗斯联邦关于同恐怖主义作斗争的法律》（1998 年 7 月 25 日）、《关于车臣共和国行政机关首脑》（2000 年 6 月 12 日）、《关于车臣共和国行政机关体系》（2001 年 1 月 19 日）、《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北高加索地区同恐怖主义作斗争的措施》（2001 年 1 月 22 日）等等。2000 年 6 月 8 日即通过了《关于组织车臣共和国临时行政权力机关体系》的俄罗斯联邦总统 1071 号令（2001 年 1 月 19 日又加以修订和补充，更名为《关于组织车臣共和国行政权力机关体系》，以总统令的形式发布）。俄罗斯在车臣恢复政权之后，开始了法制建设；这些举措本身是重建车臣政权的重要步骤，同时，也使新建的车臣政权进一步合法化。

在举行大选之前，车臣政权处于过渡阶段，车臣的社会政治形势决定了其过渡性质。同时，共和国各部的设置体现了特殊时期面临的问题

和任务，包括艾哈迈德·卡迪罗夫在内的车臣领导人都是由俄罗斯联邦总统任命产生的。俄罗斯政府急于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政治成果巩固下来，开始建设性的政治进程。2000 年，俄罗斯政府废除了之前实行的教法政权体系和司法体系，恢复了世俗秩序。从 2002 年下半年开始，俄罗斯政府就开始筹备车臣宪法以及车臣总统和议会的选举法。2003 年 3 月 23 日，车臣就新版宪法举行全民公决，并获得通过。卡迪罗夫称：现在，我可以有全部理由以人民的名义说话和行事了。所有的成年公民都参加了公决。居民支持我们的路线：恢复车臣和平和秩序、复兴经济和社会领域、承认车臣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京也对车臣公决的政治成果寄予厚望，他认为公决的意义在于，“解决了有关俄罗斯联邦完整的最后一个问题”[8]；但是，一些西方国家和组织对公决的态度较为消极。欧洲安全组织称：只有在俄罗斯与马斯哈多夫开始谈判之后，在俄罗斯政府和车臣人民共同决定政治进程的情况下，才能认为公决是成功、合法的。为完成车臣政权重建，俄罗斯政府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投入颇为巨大，对卡迪罗夫给予不遗余力的支持。2003 年 10 月，车臣举行总统选举，卡迪罗夫当选为车臣共和国总统。

艾哈迈德·卡迪罗夫 1951 年 8 月 23 日出生于哈萨克斯坦。70 年代，一直在国营农场工作。1980 年开始在布哈拉宗教学校学习，1982 年在塔什干伊斯兰学院学习，逐渐成为宗教人士。1986 年到 1988 年，卡迪罗夫在古杰尔梅斯清真寺担任伊玛目的副手。1990 年赴阿曼伊斯兰学院学习教法。1991 年，车臣发生的政治事件促使他中断学习返回车臣。1993 年担任穆福提的副手，1994 年担任穆福提，1995 年被正式推选为车臣共和国穆福提，直到 2000 年。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卡迪罗夫是站在车臣方面反对俄罗斯政府的积极分子；但是，卡迪罗夫激流勇退，看到车臣民族与俄罗斯对抗没有前途，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车臣民族付出巨大代价，需要安宁的生活，因而与马斯哈多夫等人发生分歧和矛盾。卡迪罗夫反对车臣独立，称历史上“车臣从来就没有独立过”[9]。

卡迪罗夫符合俄罗斯政府的心意，被俄罗斯政府认可，2000 年 6 月 12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任命卡迪罗夫为车臣共和国的行政长官。2001 年，普京发布总统令，授予卡迪罗夫“友谊”勋章。对于俄罗斯政府来说，除了反对分裂外，卡迪罗夫政治立场的可取之处还在于：作为车臣伊斯兰教传统派的代表人物，他视激进的瓦哈比派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与之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卡迪罗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欧盟的认同。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欧盟向来是指责俄罗斯最为卖力的国际组织；

而且，车臣分裂派别有代表在欧盟活动。2001 年 11 月间，卡迪罗夫出访欧盟，与欧盟秘书长会谈，其用意显而易见。卡迪罗夫说，自己的使命是客观地介绍车臣局势。卡迪罗夫还率领北高加索地区的宗教人士出访阿拉伯国家，如埃及、沙特阿拉伯等，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表示：车臣问题是俄罗斯的内部事务，车臣非法武装与伊斯兰世界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按照《车臣共和国行政机关体系的法律》的规定，车臣政府采取措施，保障共和国实现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在金融、科技、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生态保护等领域执行统一的国家政策。共和国政府是俄罗斯对车臣政府确定预算的主要执行者；执行共和国预算，将预算完成情况以及执行社会经济发展纲领的情况呈报俄罗斯联邦政府；建立其他行政机关；管理和支配共和国财产；按照联邦法律行使其他职权；等等[10]。

共和国政府执行俄罗斯总统和联邦政府的法律法规，并在俄联邦宪法、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发布命令和决议。这些文件不应与俄罗斯联邦宪法、法律相违背，不得与俄罗斯总统和联邦政府的命令、决议相违背。共和国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做出的决定和决议，在共和国内是必须执行的。

车臣政府的一个主要职能，是与恐怖主义和犯罪作斗争。1998 年 7 月 25 日，俄罗斯政府通过《关于同恐怖主义作斗争的法律》，规定了同恐怖主义作斗争的组织原则、法律基础等等；同时，依据该法律的精神，2001 年 1 月 22 日，专门通过了《关于在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同恐怖主义作斗争的措施》的俄联邦总统令，车臣共和国在该项斗争中承担着重要的任务。车臣共和国将长期担负着艰巨的反恐任务。车臣局势影响北高加索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对俄罗斯南部边疆的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车臣建立了共和国紧急状况内务部，负责共和国的安全和社会局势。车臣境内还驻扎着大量俄罗斯军队，但是，随着局势发展，军队在反恐斗争中将起次要作用，由车臣内务部工作人员担当反恐任务；而反恐斗争的主体，在反恐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将是普通车臣民众。卡迪罗夫表示："只有我们，车臣人，能够结束反恐怖行动。"[11]

车臣建立起了总统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卡迪罗夫代表车臣共和国，主管车臣政务。考虑到车臣民族的历史道路、民族性格，以及车臣局势，集权制度在过渡时期较为适宜。俄罗斯较为宽松地对待车臣和印古什提出合并的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这是车臣的内部事务，俄罗斯不

打算干预。这表明俄罗斯对车臣前景抱有信心。车臣政府成员多数是在某一领域较有声望的车臣族人士，俄罗斯政府努力推行治理车臣的“车臣人化”或“本地人化”。2002 年 12 月，俄罗斯总统签署命令，筹备就车臣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

在叶利钦和杜达耶夫以及后来的马斯哈多夫时期，俄罗斯政府和车臣当局都错过政治解决危机的最佳时机，一度使解决车臣危机的政治资源丧失殆尽。在杜达耶夫死后，马斯哈多夫、巴萨耶夫、卡迪罗夫等人都曾是车臣领导人的人选，在很大程度上，车臣局势将取决于他们。马斯哈多夫出身车臣最大、最著名的阿列罗伊泰普。这个泰普又是著名的诺赫一齐·马赫克霍伊泰普的重要组成部分，邻近达吉斯坦。在苏联时代，阿列罗伊泰普与埃格哈什巴托伊泰普一起，曾经被克格勃领导人克留奇科夫称为“分裂主义者的堡垒”，长期以来，一直具有独立倾向。一般说来，出身名门望族，正是车臣总统的最佳人选。1994 年到 1996 年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马斯哈多夫亲族居住的阿列罗伊村被首先划作“非军事区”，战斗没有在这里进行过。马斯哈多夫的亲族在这里建起小型石油加工厂，夜以继日地加工石油并进行走私，赚取大量钱财。据说每天可以达到 3000 万到 3500 万卢布（旧币）[12]。物质基础是拥有政治权力的前提条件，反过来，拥有政治权力是保障既得利益的可靠手段。阿列罗伊泰普甚至还建立了自己的政党“车臣伊斯兰国家”，作为马斯哈多夫的政治后盾，对其给予大力支持。1997 年 1 月马斯哈多夫当选总统后，泰普长老们笑逐颜开，弹冠相庆。1996 年到 1997 年，普通车臣民众支持马斯哈多夫并投票给他，是因为渴望得到巩固、持久的和平，将他看作是一个善于谈判、能够与俄罗斯政府达成协议的政治活动家。

但是，马斯哈多夫却并非俄罗斯政府中意的人选。就在马斯哈多夫当政期间，车臣发生了许多骇人听闻的绑架事件，如绑架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瓦林金·弗拉索夫、俄罗斯内务部驻车臣代表格那迪·施比贡、新闻记者，等等。据说，这些事件都有马斯哈多夫的亲信参与[13]。另一方面，马斯哈多夫被那些激进的瓦哈比派“野战指挥官”所左右，俄罗斯政府认为马斯哈多夫不能控制车臣局势，并不看重他，甚至也不愿意将他作为谈判对手。入侵达吉斯坦是由马斯哈多夫的政敌挑起的，但是，马斯哈多夫既不能明确站在俄罗斯方面反对瓦哈比派，又不愿意为此承担作为车臣总统所应该承担的责任，甚至也没有意识到：激进派别对达吉斯坦的入侵也是对自己政治上的威胁。而到俄罗斯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之后，马斯哈多夫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虽然从理论上说，

马斯哈多夫还被一些车臣人，以及一些外国视为合法的总统，但是，俄罗斯政府不可能既任用卡迪罗夫，又与马斯哈多夫谈判，原因在于：卡迪罗夫和马斯哈多夫之间的政治斗争将非常激烈，水火难容，这样做将是一个政治错误；其次，对于许多恐怖袭击事件来说，马斯哈多夫都难脱干系，他曾获知或以某种方式参与，并倾向于加以利用这些事件，从而浮出水面。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主张与他进行谈判的政治人物都将蒙受恶名，并冒政治生命终结的危险。2004 年 2 月 6 日，莫斯科地铁爆炸事件之后，普京总统很快就发表谈话，明确地将恐怖事件与马斯哈多夫联系在一起："在每次罪行之后，就有人号召与马斯哈多夫谈判，这一事实本身就间接地证实了马斯哈多夫与匪徒和恐怖分子有联系。我们不需要这些间接的证据，我们大都知道：马斯哈多夫和他的匪徒们与这些恐怖事件有联系。" 2005 年 3 月 8 日，俄军最终将马斯哈多夫击毙。

在战争或对抗的条件下，"野战指挥官" 在车臣有重大影响，而俄罗斯政府已经确认这些人为恐怖组织首领，明令通缉。2001 年 7 月，包括巴萨耶夫、哈塔布等人在内的近 20 人都被列入俄罗斯政府的 "黑名单"，并决心用武力将其消灭，他们隐身车臣的深山或国外；而其他政治人物又多半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在政治上没有太大价值。也许，原来有符合这些条件的政治人选，但在俄罗斯政府错误的政策下被延误，从车臣的政治生活中已消失。俄罗斯政府自己又难以提出一个有权威的、具良好民意基础的人选。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俄罗斯亟须在车臣恢复政权。在俄罗斯政府支持卡迪罗夫，而通缉马斯哈多夫的情况下，车臣民族发生了分裂。俄罗斯政府的政策迫使在野的、非法状态的车臣派别走向政治激进化。恐怖袭击事件客观上有利于马斯哈多夫派别，使其在逼迫俄罗斯政府与其谈判方面增加了筹码。每次发生恐怖事件之后，马斯哈多夫本人就会发出自己的 "声音"，号召俄罗斯政府开始谈判。一些人被迫跟从非法武装，与俄罗斯政府和车臣共和国政府为敌；另一些人则支持车臣政府，与当局合作，开始和平生活。但是，后者往往就被非法武装威胁，并被指斥为民族叛徒。在马斯哈多夫当政期间，一些号召放下武器、建设新生活的车臣宗教领袖，如毛拉、伊玛目等，被指责为 "克格勃间谍"，而遭到杀害。卡迪罗夫由宗教领袖而为政治领袖，其间并没有很深的鸿沟，在车臣历史上有这样的传统；但是，卡迪罗夫权力的合



艾哈迈德·卡迪罗夫

法性主要来自他身为车臣穆福提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以及俄罗斯政府的全面支持，而在车臣担任领袖，还必须得到强大泰普的支持。同马斯哈多夫相比，卡迪罗夫在这方面恰恰处于劣势。马斯哈多夫还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在西方看来，马斯哈多夫是民选、合法的车臣共和国领袖，这对于卡迪罗夫始终是一种极大的压力。卡迪罗夫无疑是当时较为合适的车臣领袖人选。实际上，俄罗斯政府的选择余地本来就很小，几乎只能倚重他；但是，对于担任车臣领导人来说，卡迪罗夫的主要问题在于：

1. 在俄罗斯政府方面看来，卡迪罗夫的立场较为稳健，可以通过卡迪罗夫实现“车臣人治理车臣”的目标，使车臣走向稳定；但是，对于非法武装，也包括一部分车臣普通民众来说，卡迪罗夫是亲俄的，甚至是车臣的“叛徒”、“民族败类”，而卡迪罗夫政权就成为俄罗斯操纵的“傀儡政权”，号召力受到局限。他多半是从危机走向稳定这一过渡期间的车臣领袖。

2001年6月25日，车臣的所谓“最高教法法院”对与“占领当局”合作的卡迪罗夫等车臣政府领导人、军警、政府部门、护法机关、媒体等工作人员发出死亡威胁，责令其悔改；否则将被判处死刑。卡迪罗夫本人被列举三大罪状：1. 协助并支持“异教徒”反对穆斯林；2. 对抗教法法院；3. 许可真主禁止做的那些事情[14]。当时，这些威胁的效力不容低估；

2. 无论是大选之前还是之后，卡迪罗夫都要倚赖俄罗斯政府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卡迪罗夫巩固政权的手法就是培植自己的势力：卡迪罗夫及其儿子拉马赞·卡迪罗夫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在其麾下收罗了一些反水的前分裂派武装；有自己的监狱、法庭，等等，致力于加强个人权力，甚至也形成了特定的利益集团；而其亲信则骄横专断，树敌结怨，在矛盾和纷争的情况下，卡迪罗夫总是得到俄政府无一例外的支持：在出现对卡迪罗夫不利的传言时，普京总是申明对卡迪罗夫的信任和支持。这都不利于卡迪罗夫政府凝聚车臣民众，影响了他的执政能力。车臣的政权体系基本上是以卡迪罗夫为轴心在运转，而当卡迪罗夫于2004年5月9日被炸身亡后，车臣政权便几乎陷于瘫痪，甚至普京的整个对车臣政策都面临崩溃；

3. 俄罗斯政府对于车臣问题的解决，对于车臣和俄罗斯国家的前途缺乏明确理念。杜金认为：俄罗斯政府应该借机以车臣为范例，表明俄罗斯国家的原则和价值；否则，与分裂派的斗争便什么都不能证明[15]；

4. 车臣政府和车臣各地方政府机关中，为重建车臣政权俄罗斯必须

倚赖的那些工作人员，不断被暗杀。2004 年 5 月 9 日之前，卡迪罗夫本人已经多次遭到刺杀。如果俄罗斯政府不能切实保护这些人的安全，那么，重建车臣政权将困难重重。

最糟糕的是，第二次车臣战争，甚至也包括第一次车臣战争以来俄罗斯政府艰难取得的政治成果，就因为一个领袖人物遭遇政治谋杀而在瞬间化为乌有，且难以物色到一个能够接替卡迪罗夫的人选。对于俄罗斯政府来说，卡迪罗夫身亡是一个极大的损失，爆炸事件击中了俄罗斯国家最脆弱的环节，也凸显了这种脆弱。普京表示："忠实的俄罗斯人艾哈迈德·哈吉·卡迪罗夫像一个英雄般地牺牲了，但是，谁也不能摧毁他的事业，也不能使一切发生逆转。"但是，形势远比想像中更让人担忧。在卡迪罗夫之后，俄罗斯可以选择这样几个方案：1. 由俄罗斯总统直接统治。但是，在所有方案中，这种方案恐怕最容易被否定，等于是宣布了非常状态；2. 让卡迪罗夫之子拉马赞·卡迪罗夫接替乃父。因卡迪罗夫遇害带来的哀荣，让小卡迪罗夫继承总统位置的呼声渐高。但是，鉴于年龄的缘故，就需要修改业已通过公决的车臣共和国新宪法，车臣国务会议也曾提议修改车臣宪法，解除年龄限制，而小卡迪罗夫本人表态，自己不适于担任总统一职；3. 让莫斯科的车臣族要人，如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著名车臣商人马利克·萨依杜拉耶夫、比斯兰·甘塔米罗夫、阿明·奥斯马耶夫、雅库布·杰尼耶夫、加布拉依罗夫兄弟、阿斯兰别克·阿斯兰汉诺夫等人担任车臣共和国领导人，他们富有、社会地位崇高，其中一些人也曾表示要参加车臣总统竞选。但是，可以说，这些人早已从车臣的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脱离了车臣的社会土壤，在车臣危机的整个阶段，他们都是一些局外人。这些人不了解车臣局势，甚至不了解车臣人；而许多车臣民众也会将他们视为亲俄罗斯派。小卡迪罗夫本人就对他们参选总统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没有担任车臣领袖的道义权利："当他们的人民在遭受苦难的时候，他们在哪里?"虽然他们有钱、有关系，但是，对于从政来说，"需要付出的是生命，而不是美金"[16]。另外，哈斯布拉托夫等人与卡迪罗夫家族有很深的矛盾[17]，选择他们将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经过权衡比较，俄罗斯政府最终选定了阿卢·阿尔汉诺夫作为车臣总统人选，小卡迪罗夫被任命为车臣政府第一副总理。

2004 年 9 月，阿卢·阿尔汉诺夫接替卡迪罗夫的职务，担任车臣总统。阿卢·阿尔汉诺夫 1957 年生于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1975 年到 1977 年在苏军服役。从 1979 年开始，基本上一直在护法机关中工作，

并逐步擢升。2003 年 4 月，被任命为车臣共和国内务部长，成为卡迪罗夫政府的成员。在内务部长任上，阿卢·阿尔汉诺夫表现出色，正是在他的主持下，使包括车臣内务部在内的车臣共和国护法机关体系得以重建，并有效运转。2004 年 6 月，阿卢·阿尔汉诺夫担任监督共和国经济和社会恢复的“社会委员会”主席，在 8 月底举行的车臣总统选举中，阿卢·阿尔汉诺夫获得 73% 以上的选票而当选。

阿卢·阿尔汉诺夫担任车臣领导人的政治资源和号召力，要逊于所有前任，包括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卡迪罗夫等人，而卡德罗夫政府存在的前述弱点，在一定程度上还将被阿卢·阿尔汉诺夫继承。阿卢·阿尔汉诺夫原本是安全部门官员，由这样出身的人选担任车臣总统类似于俄罗斯帝国时期的督军，即警察和行政职能集于一身，表明了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就组建和维持车臣政权来说，俄罗斯政府确实很难打出好牌。也许，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只不过是在“坏的”和“更坏的”之间做出选择。

恐怖升级：别斯兰人质事件

2004 年 5 月以来，俄罗斯遭到多次大规模恐怖袭击。5 月 9 日，格罗兹尼“地那摩”体育场发生特大爆炸事件，车臣总统卡迪罗夫、车臣国务委员会主席伊萨耶夫等高官被炸身亡，在国际社会引起震动。6 月 22 日是苏德战争爆发的纪念日，车臣恐怖分子对原本平静的印古什发起了进攻：巴萨耶夫率领 200 多名恐怖分子袭击了共和国内务部等强力部门，双方发生激烈战斗，许多平民伤亡；而恐怖分子甚至带走被当地军警击毙的“战士”尸体逃逸。2004 年 8 月 24 日晚，从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起飞的图 -134 飞机在莫斯科南部的图拉地区坠毁；大约在同时，另一架同样从多莫杰多沃机场飞往俄罗斯南部的图 -154 飞机在罗斯托夫州境内坠毁，总共有 90 余名乘客死去。从常识来推断，这多半应是一起恐怖事件，否则两架客机同时坠毁的事件便难以解释。有人写道：难道我们国家的飞机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水平：可以同步坠毁?! 俄罗斯安全部门调查表明：两架飞机在坠毁前即已经在空中发生爆炸，并且发现了爆炸物残迹。随着调查深入，逐渐查明：所谓车臣“黑寡妇”极有可能是爆炸事件的疑凶。不久之后，有车臣反抗组织声称：这些爆炸事件是他们所为。

2004 年 9 月 1 日，是北奥塞梯共和国学校开学日期。就在这一天，

发生了惊人的恐怖事件：别斯兰市第一中学的师生以及学生家长等大批人员，在开学典礼上被恐怖分子劫持，扣押在体育场内。随后，俄罗斯安全部门人员将大楼包围起来，并开始与恐怖分子谈判。同时，印古什共和国前总统阿乌舍夫担当中间人，与恐怖分子取得接触，设法解救人质。

以往发生在俄罗斯境内的几次劫持人质事件，尽管成功解救，而人质的伤亡也很大，为谨慎起见，俄罗斯特警并未打算实施强攻。但是，到9月3日中午，突然传来爆炸声，恐怖分子和安全人员双方本来就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爆炸使局面失去控制：俄罗斯特警随即发动强攻，而恐怖分子也开始还击并杀害人质。经过战斗，多数恐怖分子被击毙，但是人质的伤亡非常巨大。

有关事件的真实情形，一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和传言。主要涉及如下几个问题：1. 恐怖分子有没有提出条件？政府为什么没有与恐怖分子进行谈判？2. 人质的数目；3. 恐怖分子的数目。而这几个问题，都涉及俄罗斯以及北奥塞梯政府有没有尽最大努力去营救人质，或至少将伤亡降低到最低点；4.9月3日中午，是否俄罗斯特工率先发动了进攻？如果说，俄罗斯特种部队发动了进攻，那么就表明：俄罗斯政府方面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与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和考虑恐怖分子提出的条件。

有些报道说，恐怖分子曾提出三个要求，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释放袭击印古什共和国纳兹兰市时被俘虏的30名非法武装战士；从车臣撤军；承认车臣独立。9月17日，巴萨耶夫通过“高加索中心”网站刊载了一封信，称对别斯兰人质事件承担责任。同时，巴萨耶夫称，他曾通过阿乌舍夫带信给普京，提出如下条件：俄罗斯从车臣撤军，承认车臣独立，车臣武装保证决不与任何一方建立针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不在自己境内设立外国的军事基地，哪怕是临时的；不支持、资助与俄罗斯进行武装斗争的组织和集团；加入独联体；留在统一的卢布区；签署集体安全条约；在信仰自由的条件下，至少在10年到15年内，保证俄罗斯境内所有穆斯林放弃对俄罗斯的武装斗争[18]。

同一天（9月17日），普京总统的助手阿斯特拉汉诺夫承认，普京曾经答应前一个条件，即用被逮捕的车臣“战士”交换孩子们，而在此前，俄罗斯政府一直称：恐怖分子没有提出任何条件。

关于恐怖分子人数的问题，也曾引起争论。俄罗斯媒体一直称恐怖分子只有33人。但是，有一种说法认为：恐怖分子被打死49人，3人被逮捕，还有13人逃走。

关于人质的数目。从一开始，俄罗斯政府部门及媒体都一直宣布：人质有300多名，直到被迫强攻的时候，负责解决紧急情况的部门领导人仍然声称：人质数目不多于350人；而当地的别斯兰市民对人质的数目显然更清楚，他们不相信政府和媒体的说法。他们估计人质不少于1000人。当地人对于采信上面这种说法的记者们深恶痛绝，以至于引用这种说法、报道说人质只有300人的《共青团真理报》记者遭到痛殴，一些别斯兰市民甚至怀疑这些记者与恐怖分子有勾结[19]。在人质事件后，别斯兰一中的教师制作网页，详细列出死、伤、失踪人质的名单，以便为受害者提供帮助。9月29日，该网页称：在该事件中死伤和失踪的人数已经达到1338人：338人死亡，其中174名孩子，还有超过400人失踪[20]。而总检察院代表称：死伤以及失踪的人数达到1156人。

当正式的信息渠道不畅，或真实信息被刻意掩盖后，来自别的渠道的信息就开始大肆流传。也许，知情的当地网友2004年10月21日在北奥塞梯的一个网站的网友论坛上，发的帖子，可供我们参考。我们将这段话原封抄录如下："仅仅在悲剧发生之后的第一天，弗拉基高加索的停尸间就签发了648份死亡证明。9月6日，在强攻之后的第3天，开始埋葬死者：第1天埋葬240人；第2天180人；第3天120人，而且并未封锁信息。由于9月6日有许多政府人员参加葬礼，瞒报240人是不可能的；而且至今还在埋葬：每天10到15具。"[21]

北奥塞梯共和国总统加索霍夫没有及时与恐怖分子开始谈判，赢得时间，在这个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事件发生后，加索霍夫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在办公室来回踱步，不断地说：我是一具政治僵尸。我完了。并且出于怯懦，都不敢去与恐怖分子谈判。当记者问阿乌舍夫，为什么加吉科夫和加索霍夫不和恐怖分子谈判？阿乌舍夫回答说："这要问他们自己。我惟一知道的是，当他们在决定由谁去谈判的时候，我们已经错过了整整一天半的时间。作为一个军官，这就是我可以说的实话。"作为北奥塞梯共和国领导人，加索霍夫负有保护自己公民的职责，他应该去与恐怖分子谈判，争取营救人质。一名人质曾经证实："恐怖分子一直说，等加索霍夫来了之后，我们就把你们都放了。如果他需要你们，他就会来。所有的孩子们都盼着他来，把他们带走，但他没来。"[22]

关于解救人质现场的情形，也是众说纷纭。巴萨耶夫称：是俄罗斯特工先发动了强攻，选在13点钟"圣战者"们做礼拜的时间开始行动。安全部门的人员冲进去，对人质喊：快跑！随后就发生了爆炸，载着狙

击手的直升机就立即出现了。巴萨耶夫还讲到一些细节：恐怖分子共33人，其民族属性包括车臣人、印古什人、俄罗斯人、阿拉伯人、奥塞梯人、鞑靼人、卡巴尔达人等[23]。当然，巴萨耶夫是在借机为自己宣传，挑动俄罗斯国内的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实际上，爆炸声本身是整个事件最大的谜，因为爆炸的发生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在爆炸声之后，人质、安全人员、恐怖分子，以及身处外围的大批人质家属都陷入恐慌，导致局面失控。

在事件之后，可以对恐怖事件作出一些判断。恐怖分子选在9月1日发动袭击，颇为耐人寻味，而这多半是恐怖分子精心策划的。8月29日车臣举行总统大选，在这时发动恐怖袭击，无疑意在破坏选举进程，制造恐慌和混乱。巴萨耶夫称：这是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为阿卢·阿尔汉诺夫投出的一票”。在车臣大选前后，北高加索所有的警力都已投入到车臣，用于保障选举的安全。29日夜到30日开始计票，30日宣布大选结果，31日，那些来自周边共和国的观看大选的人们也已各自回家，9月1日，大多数人都在休息，恐怖事件就发生了。

而车臣恐怖分子选择了一直被视为平静的北奥塞梯共和国作为袭击目标，表明恐怖分子在寻找俄罗斯的薄弱环节下手，并向车臣以外的地方拓展，开辟新的“战场”；向外部世界宣示，他们有可在任何希望的时间、地点发动袭击的能力。

11月16日，俄罗斯议会成立的调查别斯兰事件的专门委员会发布调查结果：土耳其等国家的情报部门参与了人质事件，甚至还与英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有某种联系[24]。

别斯兰悲剧使俄罗斯政府和北奥塞梯政府受到责难，民众对俄罗斯政府和当地政府普遍感到不满，认为在人质大量死亡的问题上，政府负有很大责任。舆论要求俄罗斯政府对别斯兰事件进行公开调查，普京表示：同意进行内部调查，而反对进行公开调查，因为否则就会变成一场政治作秀[25]。9月9日，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成员、人民党主席古德科夫称：在解救人质的行动中，至少犯了两个错误：在执行行动的地带人太多了；此外，对恐怖分子可能开枪射击人质，俄罗斯特工没有做好准备。当然，这还仅仅限于解救人质的技术性错误。9月底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表明，41%的北高加索居民认为：别斯兰悲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俄罗斯在高加索的政策[26]。民众认为：在人质的数目、恐怖分子的人数等问题上，俄罗斯政府和当地政府都对人民撒了谎。一份数据还表明：41%的被调查的北高加索人对当地政府和联邦政府感到不满，甚至

认为别斯兰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联邦政府的对高加索政策。欧洲安全组织委员会批评俄罗斯政府隐瞒了人质的数目，以及在其中有多少成人、多少孩子的问题上说谎，指出这种做法导致了三重不信任：记者不信任政府；百姓不信任记者；政府不信任自己的人民[27]；而且，人民也不信任自己的政府。大多数北奥塞梯共和国居民都非常贫困，而政府官员和权力部门则贪污腐化，积压了许多社会问题，而人质事件使民众对政府越加反感。11 月 10 日，人质事件死难者家属 200 多人在弗拉基高加索举行集会，矛头指向北奥塞梯政府，特别是总统加索霍夫，其中有这样的标语："加索霍夫和你的'班子'，我们不再相信你们！"或："加索霍夫——莫斯科的木偶！"[28]集会结果，是确定在 11 月 18 日由政府官员和来自莫斯科的代表与群众见面。

俄罗斯政府成立了委员会，对别斯兰事件进行详细调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调查结果还不能公布。

别斯兰的教训是什么呢？作为紧邻车臣的一个北高加索共和国，北奥塞梯共和国的相关部门缺乏反恐意识，也没有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面对恐怖分子发动的袭击，表现得惊慌失措，无力应对。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如何能够轻松地进入别斯兰市中心，且如入无人之境？可以判断，像俄罗斯发生的每一次恐怖事件一样，其中不免有军警部门的腐败行为发挥了作用。袭击事件考验了当地政府及其安全机关的能力，本来是领导人表现自己的机会，但是，却在世人面前暴露了他们的冷漠、无能。当劫持事件发生后，共和国总统加索霍夫急忙寻找被俄罗斯政府通缉、流亡英国的车臣分裂派领导人扎卡耶夫的电话，以及马斯哈多夫的代表一个叫阿里的人，请求他们帮忙；并提醒马斯哈多夫，北奥塞梯为他的家人做了很多事情，寄希望于后者大发慈悲。这些事实还表明：加索霍夫政府与分裂派有不寻常的个人关系！同时，北奥塞梯政府还一直不断地与莫斯科通话，等待最高指示；这种机制往往会导致互相推诿责任、缺乏协作，最致命的是会延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正如一位俄罗斯官员所说：这是我们政府最脆弱的地方。大家都在等总统。没有他，谁也不能迈出一步。从体力上



反恐游行："纳兹兰—莫斯科—别斯兰：不要吓唬我们！"

说，就是总统也不能掌握一切[29]。

人质事件给别斯兰人和奥塞梯人带来了巨大悲痛，留下了深深的心灵伤痕。由于在恐怖分子中发现了几名印古什人，人质事件还使民族矛盾激化，导致本来就有仇怨的奥塞梯人和印古什人的矛盾加深，奥塞梯人仇印古什人情绪增加。1992 年流血冲突后，两个民族冲突被武力调停，而人质事件或许会揭开即将被淡忘的伤疤，一些奥塞梯人曾威胁要对印古什人进行报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心怀恶意的势力或组织很容易挑动类似的不理智的民族仇恨和矛盾。同时，每一次恐怖袭击之后，俄罗斯社会的反车臣情绪照例就会增长。一些人对高加索人都有成见或偏见，俄罗斯的民族关系将更加复杂。当一个政府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也不采取措施保护公民的安全，那么，奥塞梯人就可能回复到血亲复仇等民族传统，自己保护自己。

俄罗斯：别斯兰之后

在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普京发表声明，称这是对俄罗斯的宣战。西方国家对恐怖分子表示谴责，但同时又照例“建议”俄罗斯政府与分裂派进行谈判，其逻辑前提，认为俄罗斯政府对车臣政策是错误的。遭到普京拒绝，普京将这种谈判比作 1938 年的“慕尼黑阴谋”。人权观察组织认为：个别车臣分裂组织确实与国际恐怖主义有某种联系，但是，车臣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分裂主义情绪。分裂派的动机各不相同：一些人是为独立而战；一些人是为亲人复仇；还有人则只是将其当作一个挣钱机会；但是，大部分车臣“战士”与“基地”组织并无联系。同时，与以往不同的是，该组织除了照例谴责俄罗斯军人在车臣的暴力行为之外，也对车臣武装分子的恐怖攻击行动，特别是刺杀包括卡迪罗夫等车臣领导人的事件表示谴责。在别斯兰人质事件的问题上，美国也对俄罗斯表示声援，布什称：“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中，美国与俄罗斯站在一起了，我们将并肩战斗，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30]大多数国家都对俄罗斯表示同情和支持。

普京的电视讲话表明，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趋于强硬。但是，这些言论被一些西方分析人士解读为充满冷战色彩，标志着“俄罗斯与西方冷战的升级，有可能使俄罗斯在面临惨痛的国内悲剧的同时，在外交方面也向孤立主义转变”[31]。与此同时，普京开始实施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普京提出：改变国家杜马代表一半由政党提名、一半由

地方选区选举产生的做法，而完全由全国性政党按得票比例提名产生；此外，改变现行 89 个联邦主体领导人由地方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做法，改由联邦总统提名，再经地方议会通过选举产生。普京认为，国家行政权力的统一乃是巩固国家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这些举措在俄罗斯国内外都引起争议。有舆论认为：普京利用别斯兰人质事件，借机加强中央集权。

普京采取措施加强国家统一、动员社会力量与恐怖主义作斗争，照例会遇到来自俄罗斯国内外的阻力和反对；因为这不仅是政治斗争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对于某些国家和势力来说，因集权而走向强大的俄罗斯将始终是一个“威胁”，还会威胁西方国家在俄罗斯的经济利益。普京改革俄罗斯行政体制是为了解决哪些问题？一般来说，自由、开放的社会有更多的制度缺陷和漏洞，恐怖分子更容易渗透并发动攻击。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在政治制度方面迅速转型，摧毁了原有的制度之后，表现得缺乏创造性，仿效西方建立所谓民主制度，却只是得到西方成熟的民主制度的外貌，其筋骨却没有任何改变。对于国家机器来说，旧时代的遗产诸如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效率低下等等无处不在。同时，政府对国家的控制能力却真正地显著下降和衰退，还滋生了道德退化、缺乏民族凝聚力等消极因素。在反恐斗争中，职能部门的表现每每令人失望，俄罗斯政府自身无法信任这些机构。2004 年 11 月 3 日，有调查表明：参与劫持别斯兰人质的恐怖分子中，还有一名印古什内务部警察[32]。历次恐怖事件的调查都表明：恐怖分子很好地利用了俄罗斯社会的这些弱点，并将其作为突破口，从而这些恐怖袭击屡屡得手。卡迪罗夫被炸、民航飞机同时坠毁等事件，其中都有一些“奸细”或被收买了的工作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另一个相关问题：恐怖组织基本上是针对中下层工作人员，如果联邦政府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就会被迫屈从恐怖分子或与恐怖分子合作，寻求安全保障；俄罗斯反恐力量和资源也严重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实行政治改革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完全回归苏联道路也是不可能的。将任何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都说成是要回复苏联时代，是反俄宣传中最平庸的策略。为安抚和消弭反对和批评的言论，普京表示：改革不会背离民主原则，也不会违反宪法。

9 月 8 日，俄罗斯总参谋长尤里·巴卢耶夫斯基在同北约欧洲盟军总司令琼斯会谈后声明：俄罗斯准备对世界任何地区的恐怖分子基地实施除运用核武器外的先发制人的打击，随即，俄罗斯国防部长也发表类

似讲话，引起舆论大哗。在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鉴于恐怖手段之残忍、俄罗斯遭受侵害之严重，民意和舆论客观上有利于俄罗斯政府。俄罗斯这些态度强硬的声明，应该解读为对卷人车臣问题的外部势力的一种强硬姿态。也有人将其看作是俄罗斯想要鼓动美国和北约邀请自己参加维和行动。特别是，众所周知，格鲁吉亚境内存在着车臣武装的训练营和藏身地，而俄罗斯向来指责格鲁吉亚当局支持车臣分裂势力，格鲁吉亚背后又有美国背景。也预示着俄罗斯将继续仿效以色列的做法，像对“哈马斯”领导人那样，实行先发制人的清除。2004 年 2 月，车臣前副总统扬达尔比耶夫在卡塔尔被杀就是一个实例。作为一个长期遭受“哈马斯”等激进抵抗组织袭击的国家以色列和俄罗斯找到共同语言，在反恐方面加强合作。就在别斯兰事件之后不久，以色列总理沙龙就打电话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建议两国加强情报合作，共同反恐。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以别斯兰人质事件为契机，俄罗斯与欧洲大国德国以及同中国的关系逐渐紧密。9 月 9 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加强反恐合作，这对俄罗斯是一个有力的声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认为，俄罗斯和德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将有利于整个欧洲。特别是在争夺高加索的问题上，俄罗斯选择与欧洲联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因素。此前，俄罗斯与中国在如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能源、世贸谈判等一些具体问题上，都存在着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当中国总理访问俄罗斯前夕，俄罗斯的尤科斯公司宣布：大大减少对华石油出口，部分西方媒体和俄罗斯媒体认定是中俄关系恶化的征兆而幸灾乐祸。人质事件为清除这些障碍提供了新动力。人质事件后不久，中国向俄罗斯紧急提供了 15 吨价值 1000 万元人民币的医疗器械和设备、药品，中国红十字会还向俄方提供了 10 万美元现金；此外，中方还表示：愿意接收部分受伤儿童到北京接受康复治疗。中国方面的援助得到俄方高度评价；在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 14 国中，来自中国的援助显得格外不同。10 月 13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即将访问中国前夕，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表示：“我首先要感谢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在俄罗斯艰难的时刻，特别是在别斯兰人质事件期间同我们站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中国朋友同我们站在一起、分担我们的痛苦、给予我们支持，这一点尤为重要。我们知道，中国人民在做这一切时饱含着真情。这更加令人感到可贵。”[33]

在中、俄、美三角中，俄罗斯与美国关系恶化，或中国与美国关系恶化，往往就会作为一种外部因素推动俄罗斯与中国接近。当普京即将

访问中国的时候，西方媒体一改原先对普京的批评和攻击。有人认为：正是俄罗斯和中国关系的进展导致了这种结果，俄罗斯希望通过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抗衡美国，俄罗斯在对美国打“中国牌”。美国报纸上开始出现类似《为何与俄罗斯不和，使其投入中国怀抱?》以及《如何阻止俄罗斯—中国之间的军事合作》这样的文章，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俄罗斯—中国关系进展对两国产生的良好效果[34]，以及西方对中俄接近的某种担心。在普京访华期间，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之间签署了一批协议，成果可观。在政治上，两国向来坚持互相支持对方的立场：俄罗斯在中国的内政如“台湾”、西藏问题上支持中国；中国则在车臣问题以及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方面与俄罗斯有共同看法；两国还就朝鲜核问题等问题统一了立场。在俄罗斯对华出口石油、天然气问题上，尽管存在着许多未知因素，但是，两国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中、俄就俄罗斯扩大向中国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等问题已经达成协议。两国东段边界已最终划定，边界问题彻底解决：《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成为两国有关边界问题的最后一个文件。中国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国之间的谈判也已经结束。

车臣的前景

从第一次车臣战争到现在，可以说，俄罗斯遭受的恐怖袭击几乎没有间断，而对每一次恐怖袭击的调查都表明，恐怖事件的策划者是车臣分裂派武装，如俄罗斯报刊所说，都能发现其“车臣痕迹”。2004 年，车臣武装分子对俄罗斯的恐怖主义袭击，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密集的、浪潮般的恐怖事件，表明了在新阶段，车臣分裂派别与俄罗斯政府的对抗的基本特征。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俄罗斯面对的是强大的车臣武装力量，双方进行了大规模阵地战和巷战，具备战争的规模和形式；而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罗斯军队与车臣武装的类似战斗较少，随即车臣武装就开始调整战术，大量运用小分队设伏、狙击等战术，同时也辅之以恐怖袭击和劫持人质等手段，向俄罗斯政府施压。随着俄罗斯军队在车臣军事清剿的顺利进行，恐怖袭击已经成为车臣武装与俄罗斯政府长期对抗的主要手段。在 2003 年 10 月车臣大选、卡迪罗夫毫无悬念地当选车臣总统之后，恐怖袭击开始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性质尤为残酷。先是 2004 年 5 月 9 日卡迪罗夫被炸身亡，接着是两架民航飞机同时坠落，9 月 1 日的别斯兰人质事件，这些恐怖事件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震

动和人员伤亡。除了这些已经成功实施的袭击之外，还有更多起恐怖袭击被俄罗斯安全部门制止。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好几次这样的袭击事件都极为“完美”。这些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意在破坏和终止业已开始的车臣重建和和平进程。车臣分裂派用恐怖袭击表明自己的存在和继续发展壮大。如果不发动类似恐怖袭击，将意味着恐怖组织已经自动消失。车臣恐怖组织的破坏性能量不可小觑，但是，与恐怖袭击所造成的具体伤害后果相比，更可怕的是其对俄罗斯和车臣社会在政治、思想上的消极影响：即由于俄罗斯现有的恶劣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车臣恐怖组织借机蛊惑人心、制造恐慌，并与俄罗斯社会的其他破坏性力量结合起来。恐怖袭击表明车臣分裂武装仍然有强大的能量和很强的组织、策划恐怖事件的能力，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和保障；同时，也表明车臣恐怖主义实际上已经达到顶峰。

迄今为止，俄罗斯成为世界上受恐怖主义危害最为深重的国家之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也许只有伊拉克。可以想见，今后一个时期里，车臣武装仍然不会放弃恐怖手段，俄罗斯国家仍将是车臣恐怖组织袭击的受害者。我们始终认为，车臣非法武装用在俄罗斯各地制造大规模恐怖事件的手段并不能翻盘，即不可能根本扭转现在的局面，达到自身目的。俄罗斯国力强大，政治、军事资源丰富，俄罗斯民族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车臣非法武装无疑难以与之抗衡；更何况，这些恐怖事件本身在对俄罗斯社会造成危害、对俄罗斯政府的威信造成损害的同时，也会对恐怖袭击的发动者及其幕后支持者的声誉造成极大损害，民意无疑还会向俄罗斯政府倾斜，俄罗斯社会有可能在同恐怖主义作斗争的号召下团结起来。

从历史上考察，车臣局势的动荡是一个周期性现象。总体上来看动乱不断，但是，从动乱到稳定之间也有其自身的规律。现在的混乱阶段是由于上世纪90年代前后的社会政治局势引发的。从那时候到现在，车臣民族分裂主义的能量并没有释放完毕，而俄罗斯国家本身也仍然处于过渡阶段；但是，可以断定：现在已经不是民族分裂主义的破坏性能量最旺盛的时期，而是在逐渐消退，再衰三竭。

车臣重新走向安宁，还需要多少年？谁也不能准确预言；从常识来看，既不可能是几百年，但也不是几年。恐怖分子曾经说过：要与俄罗斯对抗20年；有俄罗斯学者断言：车臣与俄罗斯的对抗将会持续20年。在20年的时间里，需要形势发生哪些改变，车臣才会走向稳定？车臣非法武装失去车臣民意支持；车臣民众渴望和平生活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对与俄罗斯中央对抗感到疲惫和厌倦；由于车臣战争而导致的车臣民族对俄罗斯政府和对俄罗斯民族的仇恨淡化或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俄罗斯对车臣政策无重大失误并顺利完成重建工作；车臣社会经济恢复加快；国际反恐怖形势好转，等等。还有人则从车臣的外部因素的角度出发，认为车臣危机结束，须等到石油价格恢复到1998年的水平。

非法武装的袭击对象，除了军事目标和一些特定的民事目标以外，往往针对车臣领导人和俄罗斯领导人，特别是现任总统普京，有报道表明：非法武装将会选定普京总统作为今后的加害对象。无论是谁担任车臣共和国的领导人，都面临被刺杀的危险。分裂派想要锄掉所有与俄罗斯政府合作的现任车臣领导人，威慑后来者，目的在于使车臣处于动乱状态，迫使俄罗斯政府让步，甚至在舆论的压力下迫使俄罗斯放弃车臣，承认其独立。而如果车臣持续正常的社会经济重建过程，对于车臣分裂派来说，无疑就是“俄罗斯化”的继续，分裂派的社会基础将越来越薄弱。

俄罗斯反恐战略和技术需要改进。俄罗斯强力机关应该借鉴以色列和美国等国家的反恐经验。这两个国家有与恐怖主义作斗争的较为丰富的经验，当然也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在遭受恐怖袭击之后，普京总统通过一系列法律和命令，其实质是借鉴美国的经验，即加紧对公民的人身控制，为反恐创造条件。为了不因恐怖袭击而遭受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损失，那就需要全体公民付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

对于车臣危机这样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俄罗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政策也值得检讨。普京政府没有及时调整战略和策略，应对变化了的形势，其政策有所僵化。反恐旗帜并非永远是所向披靡的思想武器，其在解决车臣问题中的有效性是相对的。俄罗斯政府仍旧有必要设法将温和反对派吸纳、消融，从而使其在政治上非积极化，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使其成为车臣重建进程中的有益成分。将反对派吸收到现存的政治安排中，比起让这些势力在境外流亡，或隐身高加索群山，对俄罗斯造成的威胁和舆论压力将只会更小，而不会更大。车臣政权将具有更显然的合法性，也将具有更强的执政能力。

俄罗斯政府不应该只看重对车臣最高领导人的任命，以及成立代理人政府，而应该注重发挥车臣传统的社会组织，具体地说，就是车臣泰普的作用。这是车臣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也是俄罗斯政府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如果这些泰普长老支持俄罗斯政府，那么，通过他们就可以

将相应泰普的武装分子召回，开始和平进程。否则，如果类似卡迪罗夫那样的悲剧在车臣反复重演，那么，将再次表明车臣政权的脆弱，以至俄罗斯在车臣的彻底失败。

从车臣民族的角度来考虑，同样需要改变思路，获得智慧。与车臣的悲剧性结局比较反差最为强烈的，是鞑靼。鞑靼同样追求独立，但在政治谈判的过程中及时达成妥协，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划分了主权，没有流血和战争，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境内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发达的地区。当然，鞑靼是一个特例，其与车臣的主客观条件不同；但是，必须承认：车臣领导人一直坚持的强硬、僵化的立场，也是车臣危机发展为武装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俄罗斯民族需要走出车臣问题的死胡同，车臣民族同样需要从该困境中走出。在长期的残酷对抗中，俄罗斯民族付出了巨大代价，车臣民族同样付出了巨大代价。车臣民族需要生存、发展、建设，而不是像分裂派领袖所鼓吹的那样，与俄罗斯血战到底。恐怖袭击这种自杀式反抗，不仅为车臣民族招致恶名，而且真的会导致玉石俱焚。实现俄罗斯民族与车臣民族的历史性和解，才是各自得到更广阔天地的惟一出路。

注　释：

〔1〕Федеральная целев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феры Чече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2001 году, http://www.nns.ru/press-file/dagesitan/prvosst_2001.html

〔2〕Орлов, Черкасов, Россия—Чечня: цепь ошибок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М, 1998, С.126.

〔3〕Валерий Тишков, Война и мир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е//Либеральная идея, 2001, №1, С.48.

〔4〕В. В. Черноус,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Кавказа,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2001, С.119.

〔5〕Григорий Померанц, Чеченский узел, //Искусство кино, №8, 2003г.

〔6〕А. К. Волин, Чечня. Белая книгам, 2000, С.119.

〔7〕同注释〔6〕, С.126。

〔8〕http://kavkaz.memo.ru/

〔9〕http://chechnya.gov.ru

〔10〕http://chechnya.gov.ru/officials/govment/html

〔11〕http://chechnya.gov.ru

〔12〕Генадий Трошев, Моя война. дневник окопного генерала, http://lib.ru/memuary/chechinya/troshew.txt

〔13〕А. Гушер, Чечня: узел трудных проблем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0, №11, С.5.

〔14〕В. В. Черноус,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Кавказа, Ростов – на – Дону, 2001, С.139.

〔15〕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 Чеченские маршру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http://evrazia.org

〔16〕Людмила Аверина, http://www.aif.ru/online/aif/, http://evrazia.org

〔17〕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 Точка бифуркации чеченского маршрута, http://www.evrazia.org/

〔18〕http://kavkaz.memo.ru/

〔19〕http://kavkaz.memo.ru/

〔20〕http://kavkaz.memo.ru/

〔21〕http://www.ossetia.com/russian/index.php

〔22〕Г. Чеджемов, беслан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причины и уроки, http://www.mc-master.ru/beslan.htm

〔23〕http://kavkaz.memo.ru/

〔24〕Ольга Ильинская, Бесланский след ведет на Запад, http//www.utro.ru

〔25〕Путин отказался от публичного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еракта в Беслане, http://kavkaz.memo.ru/

〔26〕http://www.watchdog.cz

〔27〕http://kavkaz.memo.ru/

〔28〕Северная Осетия: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погибших в Беслане провели митинг во Владикавказе, http://www.kavkazweb.net/news

〔29〕Последняя тайна Беслана, http://www.sobkor.ru/

〔30〕来源：新华网。

〔31〕Financial Times. 9. 21 2004

〔32〕http://kavkaz.memo.ru/

〔33〕来源：新华网。

〔34〕Андрей Крушинский, Китайский козырь “Москвы//Парламентская газета, 14 Октябрь 2004”.

第十二章

大国在高加索的争夺：现状与前景

高加索地区紧邻或本身属于俄罗斯南部边疆，是东西方文明交汇地带。按照宗教信仰，除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奥塞梯信仰基督教以外，几乎所有俄罗斯共和国都信仰伊斯兰教，属于伊斯兰世界。高加索群山埋藏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邻近的里海地区就更是蕴藏石油天然气的巨大宝库。高加索地区还是连通欧亚的重要通道。无论是交通、外贸、资源、民族、文化、战略乃至地缘政治等各个方面，高加索地区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控制了高加索地区，不但对俄罗斯构成环形的战略围堵态势，还可以轻松地控制土耳其、近东国家、中亚地区。高加索地区距离中国似乎遥远，但却是中国与欧洲、中近东联系的重要通道，对于中国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是中国向西部发展的战略通道。

车臣在高加索的链条上

如前所述，车臣问题不能孤立、单纯地看待。如果我们将车臣问题放到今日高加索地区的国际政治现实中来审视，则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角度，眼界就会更

加开阔，对于车臣问题也就会有新的认识。车臣问题反映着整个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也影响着该地区的前途命运。车臣问题，可能是大国在高加索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争夺和对抗的个案，是大棋局中的一步。高加索是重要的交通通道，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欧亚大陆的许多游牧民族都曾在这一通道来去征战。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再加上该地区盛产石油、天然气，蕴涵着丰富的资源，从17世纪开始，高加索地区就是该地区各大国争夺的对象，曾先后属于俄罗斯、伊朗、土耳其某个单独的国家，或同时被几个国家所瓜分。19世纪，高加索战争、俄罗斯—土耳其战争以及俄罗斯—伊朗战争，都是这种争夺加剧的表现；到20世纪初期，英国与俄国在高加索的冲突，以及苏俄内战期间英国等列强对俄罗斯的干涉，都具有这种意味。总体上说，俄罗斯基本上一直在高加索地区占据优势。在沙皇俄国时期乃至苏联时期，高加索都是俄国或苏联的重要组成部分，别国不得染指。但是，每到俄罗斯国内因发生革命、战争等其他情形导致急剧转折的时期，高加索总是会出现大国争夺的形势。一位学者指出，车臣问题提醒人们：俄罗斯周边新独立国家是脆弱的；美国对这些国家的独立怀有浓厚兴趣[1]。

19世纪高加索战争期间的俄罗斯将军法捷耶夫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他曾经详尽地论述了高加索对于俄罗斯帝国的重要意义：如果俄罗斯地平线向南囿于高加索山脉的雪山峰顶，整个亚洲西部将脱离我们的控制。高加索山脉乃是俄罗斯帝国南疆的一道天然屏障，有了这道屏障，俄罗斯就占领了战略制高点，易守难攻；而以此作为跳板，向东进入中亚地区就势如破竹。如果失去高加索，中亚就难以保全[2]。事实上，19世纪俄罗斯的殖民扩张，就是按照如此方略完成的。为了得到这一地区，俄罗斯帝国纵横捭阖，动用大量军队，进行了几百年的战争，付出巨大代价，才最终将这一地区纳入其版图。还在16世纪，卡巴尔达人就因不堪克里木汗国和土耳其的欺凌和侵扰，向俄罗斯称臣。信仰基督教的格鲁吉亚在许多世纪里一直依附于别的大国，但是，因为遭受穆斯林国家的迫害和种族清洗，多次提出要加入俄罗斯帝国，受其保护。1801年，格鲁吉亚东部率先加入俄罗斯帝国。随后在19世纪上半期，格鲁吉亚的其余部分，以及亚美尼亚东部，也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1813年，外高加索的阿塞拜疆被俄罗斯占领。高加索战争前后，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不限于外高加索，她还延伸到了西亚和近东地区。1878年，卡尔斯州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军队还占领了亚美尼亚高原库尔德人居住地区的一部分，甚至还渗透到了美索不

达米亚平原。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在“世界革命”的旗帜下，苏维埃俄国开始向南发展，连近东地区都成立了向苏维埃俄国看齐的“波斯红军”。当然，由于西方国家的因素，苏联向南发展的势头被遏制。

戈尔巴乔夫改革，客观上使苏联减弱，并逐步丧失了对高加索地区的影响。随着苏联解体、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化”，高加索地区脱离俄罗斯卵翼的决心日益坚定。同时，在苏联解体后的初期，俄罗斯也将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区视为包袱，决心摆脱。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决策者中，占上风的观点认为，俄罗斯应该离开所有前苏联国家，不应介入其民族矛盾和地区冲突，并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国际化方面提供协助。还有一些亲西方人士则认为：不应太关注与中亚和高加索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关系，俄罗斯应该努力与西方实现一体化，而不是待在独联体内。来自这些欠发达国家的推动因素只会强化俄罗斯的“亚洲特性”[3]。但是，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受到很大冲击。经过短期的政策摇摆，俄罗斯对其外交政策做了修正，开始重新重视高加索；而且，正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高加索和中亚的积极活动，以及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建立起亲西方体制，促使俄罗斯重新重视外高加索。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日渐重视前苏联地区，特别是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并试图恢复与这些地区的传统联系，实际上与俄罗斯国内的欧亚主义思潮相契合；但是，车臣问题悬而不决，对于俄罗斯恢复与外高加索三国的传统联系、实现与外高加索三国的一体化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而且，为了与大西洋主义的西方世界对抗，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国家伊朗有可能是俄罗斯的可靠盟友。俄罗斯还可借此在反西方的基础上，实现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合作，而位于高加索中部的车臣的持续危机，将使俄罗斯与伊朗结盟形成“莫斯科—德黑兰轴心”成为泡影[4]。

加入高加索地缘政治游戏的国家中，除了如土耳其、伊朗、俄罗斯等地区大国之外，还有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如前所述，西方国家介入车臣危机和高加索事务，有其历史传统。按照俄罗斯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杜金的说法，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这种地缘政治对抗，其实质就是大西洋主义与欧亚主义的对抗[5]。今天，大国进入高加索的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原因何在？能源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血液，能源是最大的政治——是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许多争端和冲突都是由于争夺能源而产生的，而任何蕴藏能源的地方都会有大国在其中发挥作用。美国是现在世界上能源争夺的主角，也是地缘政治游戏的主角。有人说过：只要嗅到石油的气味，美国就会马上设法控制这个地方。

苏联解体以来，包括车臣危机在内，高加索地区接连不断的民族间冲突和危机，也是大国对抗的具体反映。俄罗斯在车臣持续多年的军事行动打破了地缘政治平衡，对于该地区的未来发展影响深远。如前所述，1994 年俄罗斯发动对车臣分裂武装的军事行动，其中有对外政策的因素，标志着俄罗斯对西方在高加索的渗透和对俄罗斯地缘政治空间挤压的主动积极的同应。在俄罗斯发动车臣战争期间，积极与西方国家接近的格鲁吉亚和与土耳其靠拢的阿塞拜疆感到巨大压力。俄罗斯的这些举措未必不是对这些国家的某种警示，甚或警告；反过来，这些举措进一步使这些国家感到威胁。他们认识到：俄罗斯仍然会动用武力将整个高加索控制起来。从这种判断出发，又使他们进一步投向西方国家的怀抱，寻求保护。同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与土耳其一起，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中打出“车臣牌”，支持车臣非法武装与俄罗斯对抗，借以牵制俄罗斯。

北高加索是俄罗斯政治控制最为薄弱的地区，也是牵扯俄罗斯政治家精力最多、最为头痛的地区。车臣问题持久不决，而其他一些北高加索共和国有可能接下来成为新的“车臣”，其手法完全如法炮制。在车臣之后，达吉斯坦有可能是反俄势力将穆斯林的北高加索地区从俄罗斯分离出去的下一个目标，而车臣分裂派首领也试图在车臣以外的地区开辟反俄新“战场”。达吉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共和国，共和国管理机构中的民族平衡机制极端复杂，长期以来深受外来伊斯兰教影响，伊斯兰教团组织活跃，在财政预算上对俄罗斯联邦中央的依赖最强，在俄罗斯所有的行政主体中，达吉斯坦对俄罗斯中央的依赖程度占第二位[6]。鉴于达吉斯坦的人口、领土面积等方面的分量，以及该共和国优越的地理位置：拥有里海出海口，以及俄罗斯的大部分里海大陆架；通过陆地和里海，实际上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五国相邻，必将是车臣分裂派及其支持者们战略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车臣战争就是因分裂派的类似计划和行动引起的。美国等国家早已在北高加索地区展开活动。有资料表明：中央情报局成立了专门的分支机构，从事北高加索地区的工作，任务是“切断俄罗斯对该地区施加影响的渠道”和“控制石油勘探”[7]。同时，2004 年，该共和国内部的政治对抗愈演愈烈。哈萨维尤特市长萨伊希德帕沙·乌玛汉诺夫（阿瓦尔人）及其支持者，开始分发武器，建立队伍，并在阿瓦尔的群山中建起地下状态的训练基地，试图发动一场“天鹅绒革命”，不惜采取武力手段推翻共和国国务会议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穆罕默多夫（达尔金

人)。[8]。这种形势也为外来势力插手提供了可能性。2006 年春天，共和国将举行首次大选，有了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等国家的前车之鉴，那么，可以判定：这将是外部势力插手的机会。

就受外来伊斯兰激进主义影响的意义来说，也许，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将是另一个潜在的“车臣”。俄罗斯学者判断，该共和国已经形成了伊斯兰的双重政权。当地伊斯兰激进反对派要求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按照教法生活，穿着阿拉伯人的服装[9]；但是，这种“新潮”的教派及其组织引起当地传统派的反对，于是就在二者之间产生矛盾。2004 年 12 月 14 日，一伙匪徒袭击了共和国强力机关，打死几名工作人员，抢走 200 多件射击武器。随即，听命于巴萨耶夫等人的当地伊斯兰激进组织“雅尔穆克”宣称对事件负责。此外，如前所述，卡拉恰依—切尔克斯共和国的瓦哈比派异常活跃，并且与车臣分裂派盘根错节，值得重视。对于此种趋势，北高加索宗教管理局没有现实的手段和足够的资金加以遏制，激进教派地位逐渐巩固并继续扩大影响。

至今为止，车臣的分裂势头已经暂时得到遏制；但是，对于北高加索其他共和国如果不采取措施，未雨绸缪，那么，这些共和国、州将是从俄罗斯分离链条上的新的环节。

高加索：大国角逐的前沿

苏联解体前后，外高加索进程或称南高加索三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获得独立，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并努力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独立因素；但是，如同中亚国家那样在归并沙皇俄国之前，那里多数是一些游牧的部落或民族，且其生存和活动的地域范围也与独立之后的领土范围并不一致。高加索三国多半没有独立建国的历史，是苏联时期人为地以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创造了这样一些民族政治单元。在所有的前加盟共和国之间，几乎没有不存在疆界问题和矛盾的。由于这些新独立国家国力贫弱，依靠自身力量难以独立存在，就为外来力量进入这一地区提供了机会。苏联的解体过程，伴随着俄罗斯的衰落过程。在解体后的初期，俄罗斯在对高加索的政策方面力不从心，一时形成了权力真空。随着俄罗斯势力从外高加索地区收缩，西方大国以及地区大国自然而然地进入，填补这一空白；而外高加索三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也积极地引入外来因素，解决自己的内政外交问题。高加索地区实际上已经形成大国激烈争夺的形势。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传统的地缘政治对手，如伊朗、土耳其等开始发挥重大影响，并与俄罗斯展开了争夺。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也进入该地区，成为高加索地区没有共同边界的新“邻国”。但是，在该地区，真正能够展开全方位争夺、同时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和美国的争夺。俄罗斯与美国争夺高加索，两者之间的性质是不同的：俄罗斯是守卫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保障南部边疆的安全，至少使高加索成为中立的缓冲区，不至于成为敌对势力和国家向俄罗斯扩张和渗透的跳板。俄罗斯在争夺高加索这一重要的地缘政治空间方面当仁不让，对有些相对其他对手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在高加索地区历史形成的地位难以摇撼。美国是参加高加索地区地缘政治游戏的新手，意在获得新的势力范围、新的能源产地；除了保证稳定地获得里海石油外，还在于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当然，其外交辞令则是“支持外高加索国家的独立”；阻止俄罗斯与前苏联地区实现“再一体化”进程，并继续向中近东、中亚渗透，排挤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当俄罗斯持续衰弱的时候，美国却在高加索地区加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是防守性的，而美国则是进攻性的。法捷耶夫曾指出：如果说，控制黑海和里海对于西方是一个赢利问题，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则是一个生存问题。如果失去对这些地区的控制，那么，俄罗斯在亚洲的边界将会受到威胁，守卫这些边界将耗资巨大，并将蒙受巨大损失[10]。同时，与俄罗斯相比，美国与高加索地区虽无地理上的共同边界，也没有俄罗斯所具有的传统资源，如共同的历史命运、民族、语言等；但却具有俄罗斯与之无法比拟的现实资源：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拥有可以影响高加索社会政治、社会经济进程的丰富多样的手段，且影响增长最快。当然，俄罗斯也有许多现实手段可以选择，如通过与亚美尼亚、伊朗，甚至欧洲国家实现地区合作，从而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维护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等等。

美国政府已经在不同时期和场合，宣布高加索地区乃是自己的战略利益区。美国前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伯特曾经强调指出：美国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于推进民主，调解政治和民族冲突，建立民主的市场经济，使该地区与国际社会实现一体化[11]。1999 年 11 月，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峰会，签署了《伊斯坦布尔宣言》，随后在一份专门声明中，明确表达了美国在高加索地区的政治和战略目标，其主要内容是：巩固里海地区新独立国家的主权和独立；通过保障里海的能源资源不受伊朗的任何干预，自由进入国际市场，从而加强美国和土

耳其及其盟友的能源安全；消除里海能源资源运输对惟一经由俄罗斯境内的、从新罗西斯克到巴库的运输线路的依赖性；为美国国家和公司的商业活动创造新前景；形成并恢复里海地区新独立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以便解决该地区存在的冲突；保护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生态安全（实际上是专门为了限制俄罗斯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除制订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外，美国还通过各种手段巩固自己在高加索—里海地区的地位。美国借口反恐，加强了在外高加索的军事存在。美国宣布，废除对外高加索三国提供军事援助的限制；迄今为止，美国已经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三国派驻了军事顾问，并与三国签署了双边协议，开展军事合作。阿塞拜疆武装力量实现了在美国主导下的现代化，阿塞拜疆军官到美国军校接受培训；格鲁吉亚甚至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很好的合作关系[12]。2001 年 3 月，在格鲁吉亚多次邀请下，以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导人约翰·特内特为首的代表团访问格鲁吉亚，会见了谢瓦尔德纳泽以及格鲁吉亚国家安全部领导人，并与美国驻格鲁吉亚大使进行会谈，随即前往中亚国家。由此，格鲁吉亚观察家认为：美国与格鲁吉亚已经形成了特殊关系。在所有外高加索国家中，都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机构在活动，收集包括北高加索在内的整个地区的情报：车臣局势对这些国家局势的影响、政权更迭；等等。美国设法在外高加索三国培植亲西方的领导人，从而，美国不仅可以获得影响俄罗斯的重要手段，还可以控制石油管线的走向。中央情报局甚至还参与格鲁吉亚的政治进程。最初，美国支持谢瓦尔德纳泽当选，但是，当其发现谢瓦尔德纳泽不能完全执行美国意志的时候，最终通过支持亲西方的反对派而更换了代理人。

石油、天然气管线走向不仅是地缘政治争夺的对象，而且还可以作为地缘政治争夺的手段。1999 年 11 月，在伊斯坦布尔签署了关于敷设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和跨里海天然气管道的协议，为此成立了赞助商小组，而曾经参加里海油田勘探的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没有进入该小组。美国联合自己在高加索—里海地区的盟友土耳其、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参加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方案。经过几年的论证和争吵，2002 年 8 月，该项目已经正式开工。该方案眼下看来似乎亏本，但是长远来看却对美国非常有利，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没有俄罗斯参加的地带，从而迫使俄罗斯接受美国主导下的方案，在确定里海的法律地位时有利于美国；另一方面，该方案还针对美国的另一个竞争敌手：伊朗。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个方案，都将削弱伊朗在该地区的

地位，并最终将伊朗排挤出去。美国已经料到：如果将俄罗斯排挤出去，那么，伊朗就会马上填补这一空白，而这也是美国所不情愿的。

美国文化在外高加索国家的影响增大。作为美国“软实力”的一部分，在美国电影、音乐、快餐等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培养起了该地区国民对美国的好感和向往。三国中，阿塞拜疆本身是穆斯林国家，而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穆斯林也很多，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又基本上属于穆斯林地区，但是，这不妨碍其对美国文化的向往。由于高加索新独立国家属于初创阶段，各种社会政治机构刚刚建立，尚未完善，因此，在这些国家中，来自西方国家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异常活跃。这些组织服务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和战略目标，实际上是西化的一种形式。它们在高加索国家中灌输“自由社会”的理念，致力于发展当地的公民社会，实质上是在逐渐剥夺这些国家的政府机构的功能，如控制媒体和出版事业，操纵舆论，在当地国民中培养亲美、亲西方情结；支持反对派，操纵该国政治进程。最终结果，这些非政府组织操纵新独立国家的社会运转。

此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高加索的活动还不限于外高加索的独立国家，还包括属于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各个行政主体。如前所述，西方国家通过几个环节间接支持和操纵车臣分裂活动，但是，车臣还不是外部势力分裂俄罗斯的惟一环节，可以完成类似功能的，还有达吉斯坦、印古什、南奥塞梯、阿布哈兹等。像车臣一样，这些地区同样是俄罗斯南部边疆，并存在着各种不稳定因素，外部势力容易渗透其间。俄罗斯学者估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有可能仿塞尔维亚旧例，挑唆事端，然后借口这里“局势不稳定”或“打击恐怖分子”，对这些地区出兵，入侵俄罗斯。这并非一种幻想或美国大片中的情节，而是实实在在的，并且是在一两年之内就可能发生[13]。

对高加索感兴趣的，还有欧盟国家。与美国一样，获得高加索—里海地区的能源，也是欧盟国家走向高加索的原始动力。瑞典外交部长安娜·林德和欧洲外交委员会成员克里斯托弗·帕亭访问南高加索后，曾经写到：高加索和中亚都有巨大的天然气储量，这对于深感能源匮乏的欧洲国家来说是个好消息。高加索走廊是从南欧到中亚以远最近的通道，“欧盟从一开始就认为，帮助南高加索在从里海地区和中亚运输商品方面实现其潜力具有重大意义”[14]。在欧盟国家中，对与高加索地区建立良好关系最为积极的是英国、法国、德国等。英国与阿塞拜疆在1998年签署了建立友好和伙伴关系的共同宣言，阿塞拜疆境内有100多个英国公司从事经营活动，超过了美国公司的数目，而且，英国对地区的投资

数额也较为巨大。在建设拟议中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线的投资份额中，英国所占的份额巨大：占25%；相对而言，美国则只占7.48%。

德国与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商业往来较为密切。一些重大的石油、天然气方面的项目，以及巴库机场的修建，都由德国公司承揽。

法国与亚美尼亚之间的经济联系较为紧密，法国还投资纳—卡共和国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法国境内也有大批亚美尼亚人。在政治方面，法国也对亚美尼亚予以支持和声援。2001年3月，法国议会通过专门决议，谴责1915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的种族灭绝行为。此外，法国还承担着阿塞拜疆许多大型企业的重建任务。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欧盟关心高加索地区的安定，并就纳—卡冲突、阿布哈兹危机、南奥塞梯危机等都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方案，但是，这些解决方案往往被搁置起来。例如，欧洲政治研究中心曾经提出，让纳—卡作为阿塞拜疆的行政主体，但是给予其高度自治地位；或建立纳—卡和阿塞拜疆的邦联，等等。这些方案曾于2001年3月在巴黎进行讨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总统都参加了谈判，法国总统以及俄罗斯、美国的代表都曾经参加会议。但是，没有取得明显进展。

与美国略有不同的是，欧洲在参与高加索竞争的同时，尽力推进与地区各国如俄罗斯、伊朗等之间的合作，并在解决该地区因民族冲突而产生的大量难民问题上投入很多，先后拨款将近10亿欧元。此外，在保护环境、消除污染方面，欧盟国家也做出很大努力。

外高加索国家概观

苏联解体，冷战的结束，导致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外高加索地区在苏联解体后获得了独立，这对于外高加索民族来说是全新的经验。此前这些民族没有独立建国的历史，或建国历史短暂，或所建国家的范围与现在不一致。

在阿塞拜疆归并俄罗斯帝国之前，境内并没有任何统一国家，而是存在着15个汗国和许多更小的封建领地，甚至“阿塞拜疆”这个概念都出现得很晚。不过，它与20世纪20年代组成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所涵盖的领土范围是一致的。十月革命爆发后，1918年5月28日，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宣布成立，这是阿塞拜疆建立独立国家的首次尝试。1920年初，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驱散了制宪会议，阿塞拜

疆民主共和国停止存在。阿塞拜疆的现有边界，是由1921年3月16日苏俄与土耳其之间签署的协议确定的。1922年到1936年之间，阿塞拜疆成为“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1936年之后，成为独立的加盟共和国。1991年8月30日，阿塞拜疆宣布独立。

1918年5月，格鲁吉亚宣布独立，苏俄政府接受其独立。但是，1921年苏俄红军占领了格鲁吉亚，1921年2月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格鲁吉亚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1991年4月9日，格鲁吉亚宣布独立，但是，直到苏联解体之后，1991年12月31日才被承认为独立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美尼亚实现复国理想。1918年5月28日，宣布成立亚美尼亚第一共和国，一直存在到1920年11月29日。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亚美尼亚加入苏俄。1922年3月12日，苏维埃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联合为跨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的一部分。1936年在亚美尼亚重组之后，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一样，再次成为单独的共和国。1988年，亚美尼亚境内出现了亚美尼亚全民族运动（这是苏联境内较早出现的政治运动），1988年底，亚美尼亚爆发了毁灭性地震，两万多人死去，半个国家遭到毁灭。1991年9月21日，亚美尼亚宣布独立。

外高加索三国获得独立是由于苏联迅速解体、中央政府控制削弱导致的。对于整个前苏联境内来说，苏联解体都是一场浩劫和灾难，前苏联地区从此进入了境况艰难的转折时期。外高加索三国走向独立的历史起点很低，这些新独立的年轻国家缺乏建设独立国家的政治和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缺乏立国的基础。在苏联解体后，高加索以及中亚国家只是获得了法律上的独立，而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都要依赖俄罗斯或其他国家。在“破旧立新”，即苏维埃制度已经崩溃，而新制度尚在初创的过程中，高加索三国国民都经历了痛苦的阶段，有人曾做了这样的描述：“……一切都在瞬间失去。没有国家，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府，没有能够管理社会的机构，没有警察，没有保护免受罪犯的侵害，没有社会服务部门，没有有组织的医疗部门，也没有排水设备，什么也没有。”[15]

三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都开始转型，经济上实行了私有化，政治上则仿效西方建立起了民主制度，但只是建立起了类似民主制度的东西。高加索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原本都是旧体制中的官僚，都是苏联时期的领导人或干部，如盖达尔·阿利耶夫、谢瓦尔德纳泽等，

因而，其统治方式在新的情况下也很难有重大超越：通常都实行集权的统治方式，政治、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极大地依赖外国，经济上则成为西方的原料供应地和倾销市场；军事上无力保证自己的安全，只好求助于外国。可以说，是拥有“不完全主权”的国家；或者说，是一些“准国家”。按照季诺维耶夫的说法，是建立起了一种所谓“殖民地民主”的制度[16]。

按照国际标准，苏联时期外高加索各加盟共和国各项最重要的指标均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准——格鲁吉亚的生活水平接近或达到法国的水准。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由于缺乏因地制宜地解决自身问题的经验，一时难以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一度沉湎于迅速得到巨额外来投资的空想，结果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独立后的三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生产衰退、失业率上升、国民普遍贫困化。如：阿塞拜疆的国民生产总值到1996年比解体前下降了62%，亚美尼亚下降了66%，格鲁吉亚则下降了72%。三国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有优势的生产部门：阿塞拜疆的石油加工、石油化工、石油开采机械等；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国防工业和机械制造业；三国的葡萄酒酿造、园艺等都大幅度衰退。同时，小手工生产开始复苏，这实际上是一种生产力倒退。社会发生急剧分化，有良好专业技能的知识精英大批外流。外高加索三国迫切需要借助外国投资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

在意识形态方面，新独立的三国更是捉襟见肘。实际上，从追求独立直到苏联解体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们用以凝聚和号召国民的意识形态，往往就是民族主义，对阿塞拜疆来说，除了民族主义以外，还认同了泛突厥主义；并且，也人为地制造许多政治神话，既为了统一国民的思想，也为构建其政权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北方强邻，俄罗斯往往被视为威胁，并被刻画成国家的敌人。其实，渲染“俄罗斯侵略”，乃是包括高加索国家在内的新独立国家常用的手段；因此，这些国家在获得独立后义无反顾地向西方靠拢，与西方国家向这里扩展的战略正好一拍即合。

高加索地区存在着许多政治危机和民族矛盾。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使原来潜伏的问题被释放出来。车臣危机是苏联解体前后高加索地区最为严重的政治危机，严重影响着地区安宁。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导致原本统一的经济、政治空间发生分裂，三国都产生了许多尖锐而复杂的社会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危机和矛盾，成为一个类似巴尔干地区的新的“火药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因纳戈尔诺—卡拉巴

赫地区而产生持久冲突；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还保留着氏族部落结构，国家形成的进程还没有最终完成。格鲁吉亚境内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都有严重的分裂主义倾向。这些危机在格鲁吉亚境内造成紧张局势，并且爆发了内战。危机不仅仅是内政问题，还影响到了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等国家的关系，格鲁吉亚解决危机的能力为此而受到严重考验。阿塞拜疆境内还存在着对塔雷什人和库尔德人伊朗语居民的歧视，列兹金人也一直有分离倾向。

三国也都有一些自身的便利条件和优势，如：该地区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可以发展旅游业；国民受教育程度高；高加索民族有经商的天赋，还在苏联时期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等等。三国中除了格鲁吉亚以外，其他两国都没有出海口，难以独立地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需要完善旧的交通网络、建立新的通道；同时，他们的未来还有赖于伊朗、土耳其和俄罗斯等邻国的善意和稳定，经由这些国家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商品运到国际市场。总起来说，在苏联解体以后，外高加索三国与近东的外缘连接，但是，其商品由于成本高而没有竞争力。这些国家缺乏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经验和能力，需要倚赖俄罗斯。亚美尼亚处于地缘经济方面被孤立的状态，只有与伊朗合作，才能保障其能源和大众消费品供应。三国之间的国界至今都没有确定。这些国家存在许多问题，依靠自身难以解决，她们只有加强与外部世界的合作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外高加索三国的地缘政治现状

1.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是基督教国家，与俄罗斯在宗教信仰方面较为亲近。从历史上看，格鲁吉亚乃是俄罗斯帝国征服高加索地区的支柱，格鲁吉亚—俄罗斯关系对于俄罗斯推行对高加索地区政策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从苏联解体、格鲁吉亚实现独立之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发展较为曲折，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互相猜疑、不信任，并在某种程度上走向敌对：格鲁吉亚直到 1993 年初都拒绝加入独联体，而格鲁吉亚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俄罗斯的影响。

格鲁吉亚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和刻意疏远，应该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苏联社会政治生活方面发生的那些变化。格鲁吉亚有着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民族发展道路，同时，戈尔巴乔夫改革对于格鲁吉亚人的民族

意识的嬗变是一个现实的催化剂。在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日益强烈的情况下，格鲁吉亚人也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民族意愿。格鲁吉亚的民族精英迎合大众的热情，提出脱离苏联、建立独立国家的政治主张。这种需求具有全民族性质，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

1989 年 4 月，苏军开入第比利斯，镇压了格鲁吉亚的示威游行，该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格鲁吉亚的反苏、反共情绪和分离情绪迅速增长，开始走向独立之路。

格鲁吉亚对许多历史问题开始重新评价，但是，多半并无深入的学理分析，其实质是打破了旧的政治神话，创造了新的神话，而这些神话多半是与格鲁吉亚—俄罗斯关系相关联的。比如，在苏联时期，1801 年格鲁吉亚归并俄罗斯这一历史事件，通常都被认为是俄罗斯拯救了格鲁吉亚，使其免于被土耳其奴役；但是，到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却受到怀疑，有人提出：是格鲁吉亚的王朝被推翻之后，其领土被迫归并俄罗斯。而对于归并俄罗斯、苏联之后格鲁吉亚取得的历史进步，评价非常低，认为俄罗斯 200 多年的统治使格鲁吉亚发生了倒退："今天，文明的格鲁吉亚所引以自豪的一切，都首先是在罗曼诺夫王朝之前所取得的，而其次才是在她之后取得的。"[17] 在格鲁吉亚人的民族意识中，走向独立乃是恢复历史上的独立国家，特别是存在于 1918 年到 1921 年期间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格鲁吉亚历史中的苏联时期遭到全盘否定。格鲁吉亚有一种深深的意识，认为自己是在苏联极权主义体制下受害最深的，格鲁吉亚把现实问题与苏联时代联系在一起，相信苏联的政策是特意分裂统一的国家，因此为格鲁吉亚留下了许多隐患：如阿布哈兹、阿加尔等。格鲁吉亚对苏联时期是如此反感，以至于 1990 年格鲁吉亚激进领导人哈姆萨胡尔迪亚上台后，提出废除 10 月 7 日（十月革命节）、5 月 9 日（胜利日）等节日的时候，格鲁吉亚社会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而当谢瓦尔德纳泽试图纠正前任的偏颇，向议会提出在卫国战争胜利 45 周年前夕恢复这些节日的法律地位的时候，竟有大批议会成员表示反对。

谢瓦尔德纳泽对议会决定的解释是："一些议会成员对这些岁月有不同理解"，他们认为"这些人（指苏军中的格鲁吉亚人）不是为格鲁吉亚而战，而是为别的国家或别的体制的利益而战"[18]。同时，格鲁吉亚人还对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有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属于欧洲文明：就历史和社会结构来看，格鲁吉亚是欧洲的一部分；与自己的北方邻居不同，格鲁吉亚永远都渴望加入欧洲，而俄罗斯文明则既不属于亚洲文明，也不属于欧洲文明。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格鲁吉亚人弥漫着一种

反俄情绪。而激进反对派领袖兹维雅德·哈姆萨胡尔迪亚及其支持者们提出的政治目标，就是恢复独立，并以1918年到1921年间的“第一共和国”的继承者自居，建立了半合法的“第二共和国”（存在于1990年到1992年）。随后，1991年12月到1992年1月间，兹维雅德·哈姆萨胡尔迪亚在一场政变之后被推翻。政变得到俄罗斯军人的支持，也有当时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背景。被称为“格鲁吉亚之父”的谢瓦尔德纳泽执政。与哈姆萨胡尔迪亚的沙文主义者、“独裁者”面目不同，谢瓦尔德纳泽是以民主派的面目出现的，格鲁吉亚从此开始了较为理性的政治进程，而哈姆萨胡尔迪亚则在车臣、在杜达耶夫那里找到了避难所。

·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相似，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在能源方面深深地依赖外部。格鲁吉亚还是一个农业国，迫切需要外部市场以销售自己的农产品。1996年，格鲁吉亚通过了关于农业土地所有制的法律，农业生产实现了增长；但是，因为没有足够数量的加工企业和稳定的市场，格鲁吉亚的经济处境艰难，国家面临着经济和财政危机。国内债务已经达到允许的极限，而对国际援助的利用效果很不理想，存在着财政管理不善、贪污腐败等现象，以至于1999年世界银行被迫停止对其许多项目的资助。格鲁吉亚国内居民贫困化现象严重，人均月收入只有不到50美元，失业人口增多，在500万人口中，多数人没有工作[19]。

格鲁吉亚作为俄罗斯的邻国，相互之间保持着长期的历史联系，至今也还是独联体成员，在很多方面要依赖俄罗斯：依靠俄罗斯提供的天然气，格鲁吉亚每年可以节约几千万美元；70万格鲁吉亚人在俄罗斯打工，可以为其赚取大量外汇；向俄罗斯出口自己的传统商品；在出现国内危机的时候，须借助俄罗斯的维和力量，否则难以解决境内的民族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迄今存在诸多复杂的问题，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消极地影响着俄罗斯—格鲁吉亚关系。

两国之间存在着历史遗留问题，如梅斯赫廷人。这个民族是突厥语民族，原来居住在格鲁吉亚。1944年与北高加索的车臣等民族一起，被流放到了中亚，主要安置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1957年赫鲁晓夫为被镇压民族平反，但是他们没有返回格鲁吉亚。1989年5、6月间，中亚爆发民族冲突，梅斯赫廷人成为难民，涌入俄罗斯南部边疆地区，主要居住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以及罗斯托夫州等地；但是，多数梅斯赫廷人想回到格鲁吉亚。1999年，格鲁吉亚在加入欧盟委员会的时候，被责成在两年内就梅斯赫廷人返乡问题进

行立法，并在近 10 年内完成；但是，由于担心国内民族形势复杂化，格鲁吉亚借口难以为阿布哈兹难民提供保障，竭力逃避对该问题的解决。

出于种种考虑，格鲁吉亚政府对境内的车臣难民及分裂派武装则表示容忍，甚至还提供支持，对俄罗斯打“车臣牌”。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后，格鲁吉亚与车臣的关系走向紧密。1997 年，格鲁吉亚境内开设了一个“伊奇凯里全权代表处”，该代表处实质上是协调经过格鲁吉亚向车臣提供援助的机构，至今都存在并积极活动。该机构利用当地的亲车臣机构，以及当地车臣人的网吧进行宣传工作，其领导人是格鲁吉亚公民、车臣族人哈·阿尔达莫夫。格鲁吉亚成为车臣共和国周边最重要的支持者，是车臣非法武装资金、人员、物资的重要输入通道，车臣武装还在格鲁吉亚从事洗钱等活动。从 2002 年 6 月份以来，俄罗斯政府一直指责在潘基希峡谷有大批车臣战士躲藏、盘踞，格鲁吉亚矢口否认；但是，俄罗斯的情报表明：车臣恐怖分子正是从那里对俄罗斯领土发起进攻的，并向联合国和欧洲安全组织提交申述信。迫于压力，格鲁吉亚当局承认确实有车臣战士在潘基希峡谷，但是，格鲁吉亚政府又做了一些手脚，即提前通风，让武装分子及时撤离或逃到外国。结果，格鲁吉亚没有将车臣武装分子抓住并交给俄罗斯方面。2002 年，格鲁吉亚在潘基希峡谷发起反恐行动，被俄罗斯方面讥讽为是一场反恐作秀。

格鲁吉亚对维持车臣非法武装的生存和活动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另一方面，格鲁吉亚支持车臣分裂武装也等于养虎遗患。因为当这些恐怖分子得不到外来补给的时候，就开始偷盗和抢掠，已经实质性地危害当地社会。支持恐怖武装对于格鲁吉亚的国家形象与格鲁吉亚—俄罗斯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因此，支持车臣恐怖分子对于格鲁吉亚来说无疑是缺乏远见的。从格鲁吉亚与美国和北约的亲近关系来看，格鲁吉亚的这些表现无疑也得到美国等国家的默许，甚至支持。

格鲁吉亚利用自己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地位，在加入 WTO 的问题上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并提出一些条件，如：要求俄罗斯断绝同阿布哈兹的经济和交通联系，等等。2002 年 12 月，格鲁吉亚政府通过决议，反对俄罗斯加入 WTO[20]。

出于对安全的考虑以及反恐需要，2000 年 12 月 5 日，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开始实施严格的签证制度。鉴于许多格鲁吉亚人在俄罗斯打工并向格鲁吉亚寄回外汇，签证制度使许多格鲁吉亚人前往俄罗斯的门槛被抬高，对于一个经济脆弱的小国来说，该制度的实施对于格鲁吉亚经济上的打击是巨大的，双方为此进行了持久谈判。

格鲁吉亚的国内政策也影响到两国关系。格鲁吉亚是个多民族国家，其境内民族状况复杂，格鲁吉亚人占该国总人口的70%，还有30%的人口是其他民族。格鲁吉亚独立后，民族主义意识高涨，其第一任总统哈姆萨胡尔迪亚提出“格鲁吉亚为格鲁吉亚人”的口号，打破了各民族间的脆弱平衡，民族地区的离心倾向加剧：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安加尔等地都表示要独立，或加入俄罗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国内要求保护境外侨民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俄罗斯在舆论压力下，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形象，保护境外、特别是前苏联地区，侨民的立场越来越强硬，举措越来越积极。2003年，鉴于土库曼斯坦境内对俄语居民的歧视和清洗，俄罗斯威胁说，有可能用核打击来保护境外俄侨。由于格鲁吉亚的民族分离地区有大批俄语居民，因此，俄罗斯一直反对并谴责格鲁吉亚对这些地区动武；而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交恶的时候，俄罗斯也可以借此对格鲁吉亚施加压力，打“阿布哈兹牌”、“南奥塞梯牌”等，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的冲突愈演愈烈。格鲁吉亚一直指责俄罗斯对分裂地区提供支持。阿布哈兹的局势非常严峻、危险。现在，阿布哈兹当局拥有5000—7000人的武装民兵组织，而且，阿布哈兹人的独立意志也越来越坚决，以格鲁吉亚自身的武装力量来看，武力解决阿布哈兹问题非常困难。

实际上，无论是车臣危机还是阿布哈兹冲突，不但对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其中一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威胁，对另一方也没有任何好处。对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来说，本国境内的持续对抗对于对方都是潜在或现实的威胁，俄罗斯—格鲁吉亚对抗导致俄罗斯、格鲁吉亚“双输”局面，因为两国从对方的政治危机中得到的好处是暂时、有限的。但是，当美国因素夹杂在其间的时候，俄罗斯—格鲁吉亚关系便成为人质。

两国之间的另一个问题，是俄罗斯在格鲁吉亚的军事基地的问题。按照1995年9月签署（但是没有得到批准）的《俄罗斯军事基地条约》，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境内拥有四个军事基地：阿哈尔卡拉基、巴统、瓦基安尼、古达乌达，后两个基地现在已经撤除。1999年11月，两国在伊斯坦布尔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从2000年4月就军事基地问题进行谈判；但是，两国在撤出基地的期限问题上意见相差很大：格鲁吉亚提出俄罗斯应在3年内撤出，俄罗斯最初坚持在25年内撤出，随后又提出在11年内撤出。迄今为止，两国之间没有签订一个根本性的双边条约对诸如不在其领土上布置第三国军事基地、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上不使用武力等问题作出规定。这是一个重要的表象，反映出两国之间存在

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缺乏必要的协商。

今天，在大国争夺高加索和里海的背景下，格鲁吉亚主动引入美国因素，允许美国和北约在其境内建立军事基地、驻军等等，就具有了极其敏感的性质。允许美国进入格鲁吉亚，危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也激起了俄罗斯民意对格鲁吉亚的反感，恶化了两国关系。格鲁吉亚试图加入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军事政治组织——北约；但是，谢瓦尔德纳泽也曾经表示：格鲁吉亚有可能转向中立，并称，与俄罗斯发展睦邻关系，是格鲁吉亚地缘政治方面的绝对优先方向。

在所有的独联体国家中，按照生理规律或社会政治规律，苏联时代的旧领导人都面临被新领导人取代，从而实现政权更替。迄今为止，谢瓦尔德纳泽是独联体国家中惟一一个被通过政变赶下台的领导人。格鲁吉亚国内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急剧变化，在独联体国家中是最为独特的。格鲁吉亚的“天鹅绒革命”以及与之类似的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成为一种经典模式，并向其他国家输出和推广[21]。政变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美国为什么需要谢瓦尔德纳泽下台？格鲁吉亚国内存在着无政府状态，官僚的腐败问题难以解决，社会危机和矛盾日趋严重，民族矛盾加剧。但是，令美国人感到不满的，却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

对于美国来说，格鲁吉亚的价值何在呢？2003 年 12 月 25 日，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写到：对于合众国来说，格鲁吉亚是不平静的高加索和中亚国家链条上的一个关键性枢纽。华盛顿鼓励格鲁吉亚独立，一是要遏制俄罗斯，二是改善获得里海石油矿藏的通道。过去 10 多年中，美国已经向格鲁吉亚提供了超过 10 亿美元的援助。近年来，出于对格鲁吉亚腐败的不满和反恐战争的全球性需要，美国的援助额有所缩减。90 年代中期，美国就提出敷设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目的地是土耳其的地中海港口）石油管道（撇开俄罗斯控制的里海区域），预计每天可以运输 100 万桶石油。此外，还准备敷设天然气管道，经里海地区向土耳其出口。而格鲁吉亚是重要的管道过境国家。

谢瓦尔德纳泽一度满足了美国的利益，2001 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在格鲁吉亚的存在急剧上升，而在美国完成了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之后，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但是，善于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的谢瓦尔德纳泽也想保持地缘平衡，以免动摇国家的基础，这就妨碍了美国在该地区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而有关格鲁吉亚电力系统的控制权问题，成为美国对格鲁吉亚谢瓦尔德纳泽政权态度改变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开始扶植谢瓦尔德纳泽政权的反对派。2003 年 7 月 16 日，俄罗斯《生意人

报》一篇文章称：美国已经选定了格鲁吉亚总统。格鲁吉亚议会发言人尼诺·布尔贾那泽称：格鲁吉亚需要发动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性变革”。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驻格鲁吉亚大使理查德·麦尔斯发挥了独特作用。2003年夏天，理查德·麦尔斯宣称：必须为政权更替做好准备。这些情况表明，美国对格鲁吉亚的政局巨变早已洞若观火。11月，议会选举结果揭晓，谢瓦尔德纳泽继续当选，美国政府立即明确表示，对该选举结果不予支持：我们对这一结果和格鲁吉亚领导人深表失望。这些结果没有反映格鲁吉亚人民的意志，相反，它反映的是大规模的操纵选举。美国的表态对谢瓦尔德纳泽造成巨大压力。谢瓦尔德纳泽准备实施紧急状态，但是，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同时向其施加压力[22]。此后，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不断发生街头集会，反对派要求重审投票结果，反对派的活动最终改变了事件的进程。11月22日，形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谢瓦尔德纳泽被迫宣布自动下台。最初接任的是“三驾马车”：尼诺·布尔贾那泽、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祖拉布·日瓦尼亚，随后，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成为格鲁吉亚总统。按照萨卡什维利的看法，这是近300年世界历史上“最漂亮、最迷人的革命，没有任何人因之而流血”；但是，从许多方面看来，政变留下了明显的“美国痕迹”，反对派的行动自始至终都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美国媒体报道这一事件的时候，称其为“民主革命”。俄罗斯对该事件极为担忧和不安，认为这是西方策划的一个阴谋，而政变后上台的领导人是美国的傀儡。在11月22日当天，俄罗斯外交部长伊万诺夫飞赴第比利斯，试图居间调停，但是于事无补。谢瓦尔德纳泽被推翻这一事件，表明美国与俄罗斯在高加索的争夺加剧，反过来，还将使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美国关系，乃至整个地区形势更加复杂化。

出身反对派的新总统从执政之初就宣称：我不是一个亲俄的总统，也不是一个亲美的总统。新总统很快就出访了俄罗斯，这不仅是因为俄罗斯对于格鲁吉亚的重要性，而且还在于当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之后，俄罗斯国内的舆论沸腾，俄罗斯—格鲁吉亚关系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萨卡什维利的这些举措，绝大多数格鲁吉亚国民表示肯定并做出积极回应。但是，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萨卡什维利政府上台本身就是俄罗斯、美国在高加索争夺加剧的产物。作为一个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几乎难以走独立发展的道路，必须做出自己的地缘政治选择，并在大国之间周旋，维持平衡。亲西方的萨卡什维利与普通格鲁吉亚人的亲西方倾向正好具有某种契合。2004年1月29日，萨卡什

维利称：北约已经批准与格鲁吉亚的单独合作计划，而这是格鲁吉亚“与欧洲—北大西洋空间实现一体化的重大步骤”[23]。

格鲁吉亚的对外关系反映着大国因素的消长。如前所述，格鲁吉亚在诸多方面都要受制于俄罗斯。得不到俄罗斯的支持，格鲁吉亚的许多国内外问题无法解决。从传统上说，俄罗斯要推行自己的高加索政策，必须有一个基地和支点，特别是北高加索的车臣和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是最重要的，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互相需要。俄罗斯首先在车臣问题上陷入泥潭，而格鲁吉亚向西方大国投靠之后，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将失去另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美国因素使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关系复杂化。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矛盾可以被外国利用，服务其政治和战略目标；但是，格鲁吉亚是美国—格鲁吉亚—俄罗斯三国地缘政治游戏中最弱的一方，如果处置失当，格鲁吉亚就有可能首先成为俄罗斯、美国关系恶化的受害者，甚或受到夹击。2004 年 9 月，因连遭大规模恐怖袭击而感到愤怒的俄罗斯政府宣称：有可能对恐怖分子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可以想见，俄罗斯的这一表态，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格鲁吉亚最明白其中的分量。在经受多次恐怖袭击之后，俄罗斯受到重大伤害，俄罗斯政府的立场日益坚决和强硬，这种直白的表达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2. 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被称为“通向东方的大门”，是南高加索的另一重要国家。在俄罗斯与南高加索三国的国家关系中，矛盾和冲突的调停人角色，构成了俄罗斯在这些国家中的国家形象。对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来说，俄罗斯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决定着俄罗斯在这些国家中的形象。

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不同，阿塞拜疆直到 1991 年“8·19 事件”之前都并不追求独立。但是，在苏联解体前夕和之后发生的一些事件，导致阿塞拜疆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 1990 年到 1991 年间的纳—卡冲突中，俄罗斯支持阿塞拜疆，反对亚美尼亚；但是，1990 年 1 月发生的事件导致阿塞拜疆的反俄情绪增加。阿塞拜疆极力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向土耳其靠近，争取土耳其的支持。而俄罗斯和伊朗都反对阿塞拜疆与土耳其靠近。在这期间，俄罗斯—伊朗关系显著改善，而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关系则急剧恶化。1992 年 2 月，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发生流血冲突，特别是霍加拉事件[24]之后，原来的亲俄领导人穆塔利波

大下台，阿布尔法扎·艾里乞别依当选为阿塞拜疆总统，阿塞拜疆与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纳—卡冲突中，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指责俄罗斯支持自己的敌方，认为是俄罗斯为自己的对手提供了武器和人员。这些参加冲突的俄罗斯士兵是驻扎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当地的军人，而且他们是以志愿者或雇佣军的身份参加战斗的。断定俄罗斯政府已经卷入其间，似乎理由并不充分。较为特殊的情况，是俄罗斯的366摩托化团，该团成建制地参加了1992年的霍加拉冲突，正是该团（其中有许多是亚美尼亚人）的参加，导致亚美尼亚最终取胜，而且该团直到3月份才被召回。当该团从卡拉巴赫撤出的时候，大部分军人都留下来，加入刚组建的卡拉巴赫—亚美尼亚军队[25]。

俄罗斯积极介入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纷争，以及阿塞拜疆的国内斗争。在纳—卡冲突中，正是由于俄罗斯，特别是104空降师的援助，阿塞拜疆军事领袖苏列特·古塞因诺夫对亚美尼亚占了上风；但是，由于阿塞拜疆领导人拒绝加入独联体，并且执行了疏远俄罗斯的政策，来自104空降师的援助迅速减少，古塞因诺夫在军事上便难有作为。1993年2月，古塞因诺夫出人意料地从前线撤回军事力量，回到驻扎地；似乎已经达成默契，与此同时，俄罗斯104师也提前撤出驻地移防，但是将大部分武器装备留给了古塞因诺夫。当艾里乞别依政府的军队试图控制该军事基地时，国内发生了叛乱。这些情况表明：俄罗斯决心借古塞因诺夫之手推翻艾里乞别依政府。古塞因诺夫回师巴库，艾里乞别依政府也就走到尽头。但是，他在下台前使出最后一手：从纳希切万召回盖达尔·阿利耶夫。阿利耶夫随即上台，但是仍然任命古塞因诺夫为总理。俄罗斯政府迅速做出姿态示好：俄罗斯议会通过决定，禁止阿塞拜疆境内列兹金分裂组织的非法活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阿塞拜疆同意加入独联体。俄罗斯政府随即对亚美尼亚发出威胁：如果不停止其势头积极的军事活动，就予以惩罚；同时，俄罗斯派出一批军事顾问，提供优良武器装备，帮助阿塞拜疆方面。盖达尔·阿利耶夫在与俄罗斯的周旋过程中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既避免激怒俄罗斯；又尽力保持政策的独立。但是，随即就一改之前的承诺，拒绝俄罗斯军人留在其境内，称104师的撤出是永远的。阿利耶夫还不让俄罗斯在卡拉巴赫问题上主导谈判进程，也不允许以俄罗斯为主导的维和部队存在。与此同时，阿塞拜疆政府不顾俄罗斯的一再抗议，恢复与西方石油公司有关经营如“阿泽里”、“齐拉格”、“居涅什里”等里海油田问题的谈判（早在90年代初就进行

过类似的谈判）。同时，阿利耶夫还挫败了针对他的政变，这些政变和反对活动似乎都有俄罗斯背景，最终将俄罗斯支持的古塞因诺夫赶下台。古塞因诺夫得到俄罗斯的保护，经由俄罗斯控制的检查站离开阿塞拜疆，乘直升机到了北高加索。在这种政治斗争情况下上台的阿利耶夫政府，对俄罗斯怀着深深的警惕和敌意。

由于现实原因，阿塞拜疆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人认为，对于阿塞拜疆民族来说，19 世纪阿塞拜疆加入俄罗斯帝国乃是一个巨大的不幸。不仅该国的史学家这样认为，连政治家们也公开表明这种看法。1998 年 3 月 26 日，阿利耶夫发布了“关于对阿塞拜疆人的种族灭绝”的命令，其中指出：1813 年和 1828 年俄罗斯与伊朗签署条约之后，就开始肢解阿塞拜疆民族并瓜分其土地。而在公开出版物中，更加明确直白地表达了类似观点，如：“俄罗斯夺取了阿塞拜疆北部的领土，导致阿塞拜疆民族失去国家独立。结果阿塞拜疆变成了沙皇贵族和俄罗斯企业的原料基地，以及俄罗斯商人的倾销市场。阿塞拜疆的经济具有鲜明的殖民地性质。”[26] 第一次车臣战争之后，俄罗斯媒体开始报道说，一些武器和资金经由土耳其、阿塞拜疆进入车臣。同一时期内，格鲁吉亚的对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这是由于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俄罗斯遭到失败。这些国家看到，俄罗斯已经衰弱，对俄罗斯能否捍卫自己的国家都没有把握。

阿塞拜疆资源结构比较单一，但是油气资源储量巨大，石油开采、加工部门成为阿塞拜疆国民经济的支柱：石油收入占国家收入的 75%，其余的来自其他部门的收入；农业所占比例不超过 5%。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高加索—里海地区就发现了一些储量巨大的油气田，一些知名的外国石油公司就将目光投向这里。由于苏联解体、技术落后（阿塞拜疆的石油天然气开采设备是苏联时期的，且多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设备）等原因，在解体后的最初几年，阿塞拜疆石油开采部门的情况非常糟糕，石油开采开工不足，开采量下降，直到 1997 年西方投资之后这一势头才得到控制[27]。由于传统生产部门的急剧衰退和下降，阿塞拜疆国民生活水平显著降低，国民大规模贫困化，生活水平比解体前下降了 4 倍，据说，90% 左右的国民生活在贫困边缘，而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急剧上涨，粮食和食品主要来自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国，而价格则是莫斯科的二到三倍。在这种情况下，阿塞拜疆居民大批流向俄罗斯等国。1988 年，阿塞拜疆的人口大约为 700 万人，而现在，尽管阿塞拜疆的人口出生率很高，人口却只有原来的一半左右：360 万人。有 300 万人常

住俄罗斯，主要在莫斯科打工挣钱，这些打工收入定期汇到阿塞拜疆，成为该国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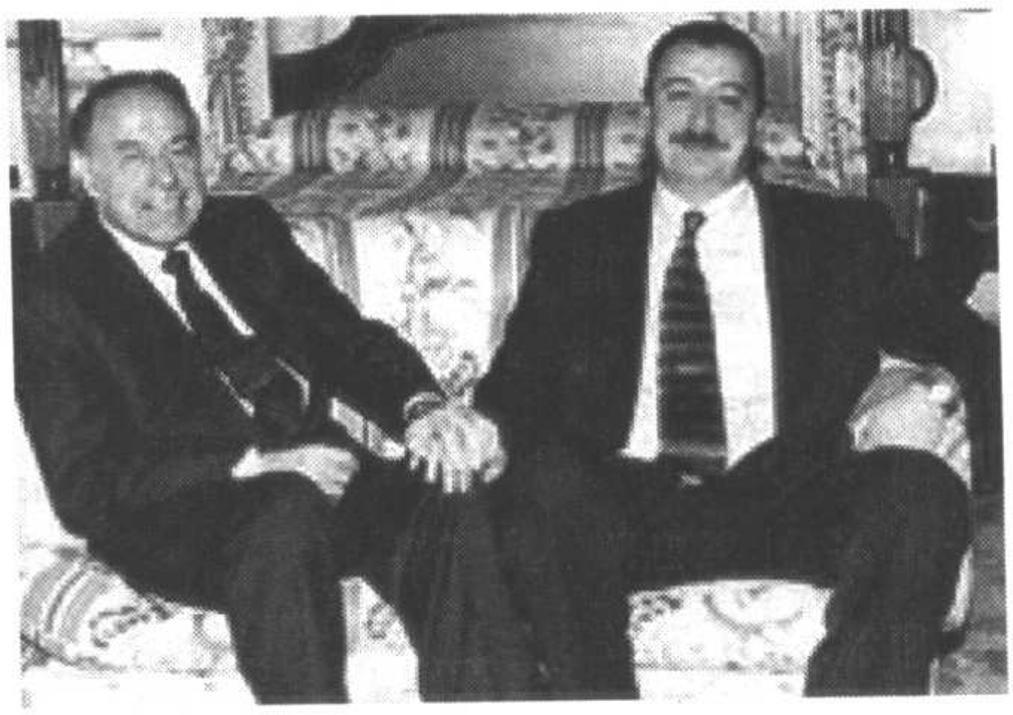
石油和天然气不仅是阿塞拜疆国民经济的支柱，是立国的根本，而且还是阿塞拜疆参加高加索地缘政治游戏的一张好牌。苏联解体后，里海沿岸各国就里海法律地位问题争执不休。像所有里海沿岸国家一样，阿塞拜疆也希望利用里海石油吸引外国石油公司的投资。阿塞拜疆现任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曾经说过：我们利用石油的目的，是为了达到自己的基本目标……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28]。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到2005年之前，阿塞拜疆每年的石油收入可达50亿美元。在里海沿岸的阿塞拜疆、俄罗斯、伊朗、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国中，阿塞拜疆在里海油气资源的分配问题上的立场，与俄罗斯的立场最为对立，与俄罗斯在里海的利益最为冲突。俄罗斯一直主张五国共同拥有对里海资源的主权，并主张排除外来因素共同合作开发，反对任何形式的划分。但是，阿塞拜疆则主张五国平均、彻底划分里海的水面和海底，并且通过立法加以规定。1995年11月12日阿塞拜疆通过新《宪法》，其中规定：属于阿塞拜疆的里海部分是该国领水。一方面，对于阿塞拜疆国家来说，国内经济恶化、就业率低、社会局势紧张，开发里海资源是一个生存问题；另一方面，阿塞拜疆的立场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和授意，成为美国对抗和排挤俄罗斯的一个步骤。1994年9月20日，阿塞拜疆与来自美国、英国、挪威、土耳其、沙特阿拉伯、日本六个国家的石油公司签署被称之为“世纪协议”，勘探里海大陆架的石油，使里海油气的争夺加剧。如果说，此前各国的争执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那么此后，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划分方案并实施开发就已经提上日程。阿塞拜疆开了先例，其他国家也起而仿效。由于各国立场缺乏充分协调，这种争先恐后的开发必将导致恶性争夺，从而出现危机。俄罗斯政府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文件，发出严厉警告：任何对里海的单方面行动都是非法的，将不被俄罗斯认可；俄罗斯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但是，从90年代以来，由于俄罗斯国力衰弱，导致在外交上色厉内荏，说得很多，而可展示的现实手段和反制措施很少，俄罗斯最终不得不向阿塞拜疆的方案靠拢。里海法律地位问题，成为阿塞拜疆解决自己内外问题的有效手段。阿塞拜疆主动引入外国因素，意在平衡俄罗斯的影响，却导致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关系更加复杂化。

阿塞拜疆人属于突厥语族，且大多数国民都信仰伊斯兰教，属于穆斯林国家。由于语言、人种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原因，阿塞拜疆外交

的优先方向是土耳其。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关系有时被称为“藩属关系”，两国常常共同出现在国际舞台，并建立了统一的经济、国防、外交体系。土—阿之间签署了军事协议，而且据说也包含一些战略性质的秘密协议[29]；而这是针对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之间签订的类似协议做出的反应。由于存在这样的协议，对双方都是一个很大的约束，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绑在一起，阿塞拜疆要摆脱土耳其几乎是不可能的。两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结成土耳其—阿塞拜疆同盟，就如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一样。在俄罗斯、土耳其、阿塞拜疆的三角关系中，阿塞拜疆要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必须征得土耳其的同意；另一方面，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也想要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包括两国外交方面的独立性，以及土耳其—阿塞拜疆同盟的独立性。当然，为此还要顾及美国的反应。对于土耳其来说，与伊斯兰国家的紧密关系使其在国际舞台上增添分量，在与美国和欧盟发展关系的时候就增加了筹码。同时，土耳其和俄罗斯也互相需要，两国敌对都不符号自身利益。土耳其国家的经济实力有限，且经济发展长期低迷，需要俄罗斯，乃至独联体的市场；两国甚至也在进行一定程度的军事合作。这些都是阿塞拜疆与俄罗斯改善关系的前提和动力。俄罗斯想恢复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并作为阿塞拜疆的边防军回到高加索，而且还想在阿塞拜疆的石油财富中得到自己的份额。另外，在土耳其—阿塞拜疆关系中，“亚美尼亚因素”日益增长。如果阿塞拜疆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继续下去，土耳其—亚美尼亚关系、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敌对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改善。阿塞拜疆长期对亚美尼亚实行封锁，使地理位置不佳的亚美尼亚经济蒙受巨大损失。2004 年 8 月，阿塞拜疆、土耳其、格鲁吉亚三国的交通部长在安卡拉会晤，商讨建设联结三国的铁路，可将货物与乘客从巴库运送到土耳其、欧洲。阿塞拜疆的目的是，将亚美尼亚从地区铁路网络中排除出去，绕开原来经过亚美尼亚的路线，从而使亚美尼亚处于不利地位，而俄罗斯军事支持亚美尼亚以对抗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对于阿塞拜疆来说，这种前景简直是一场噩梦；而且，不仅俄罗斯在打“亚美尼亚牌”，别的一些国家如美国、伊朗等也在打，结果往往损害了土耳其的国家利益。

2003 年 12 月 12 日，盖达尔·阿利耶夫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而辞世，其子伊利哈姆·阿利耶夫（“小阿利耶夫”）继任。2004 年 10 月 15 日，阿塞拜疆举行了毫无悬念的总统选举，小阿利耶夫以约 80% 的得票率当选，确认其合法继任。到此为止，外高加索三国在政权更迭方面分别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一种是“和平政变”，或称“玫瑰革命”方式，如格

鲁吉亚；另一种是世袭，如阿塞拜疆；最后一种，如亚美尼亚，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实际上，盖达尔·阿利耶夫早已为确保小阿利耶夫继任事宜做好安排。2002年8月，阿塞拜疆就修改某些宪法条文的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盖达尔·阿利耶夫预留的伏笔：总统因种种原因不能继续执政时，由总理继任，而不是像原来规定的那样，由议会主席继任；随即，2003年8月4日，小阿利耶夫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同时，盖达尔·阿利耶夫也早已将政府内部的精英人物和既得利益者们安排妥当。



2003年12月，美国，盖达尔·阿利耶夫逝世前夕

在阿塞拜疆举行选举期间，反对派发动了一系列抗议活动，甚至发生了骚乱，并酿成与警察的流血冲突；但是，该选举结果基本上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俄罗斯对阿塞拜疆的大选都非常关注。美国为这里敷设的石油管道已经投入亿万美元，担心该国政治不稳定，损害自己的利益，而阿利耶夫家族恰恰是美国在阿塞拜疆利益的保证。因此，美国支持这种王朝世袭式的权力更迭，并且对阿塞拜疆的反对派施加压力，让他们不要采取激进行动。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事先知道，即将发生被挑动的反对派的抗议活动，意在使政治经验不足的小阿利耶夫明白：没有西方国家的参与，他将很难控制国内局势[30]。俄罗斯对小阿利耶夫继承总统位置给予极大的支持。在大选之前，普京行政机构的领导人亚历山大·沃罗申访问了阿塞拜疆，从而就保证了阿塞拜疆境内的17万俄罗斯族投票给伊利哈姆·阿利耶夫[31]。俄罗斯还是最早祝贺小阿利耶夫当选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对与阿塞拜疆发展关系有所期待，小阿利耶夫的当选也为俄罗斯进一步扩大与阿塞拜疆的合作提供了机会；而阿塞拜疆新总统也表示：他对普京总统祝贺他当选赋予重大意义，两国是战略伙伴，与俄罗斯发展关系具有优先性，并且表示："我们对俄罗斯人民感到最深厚的好感"[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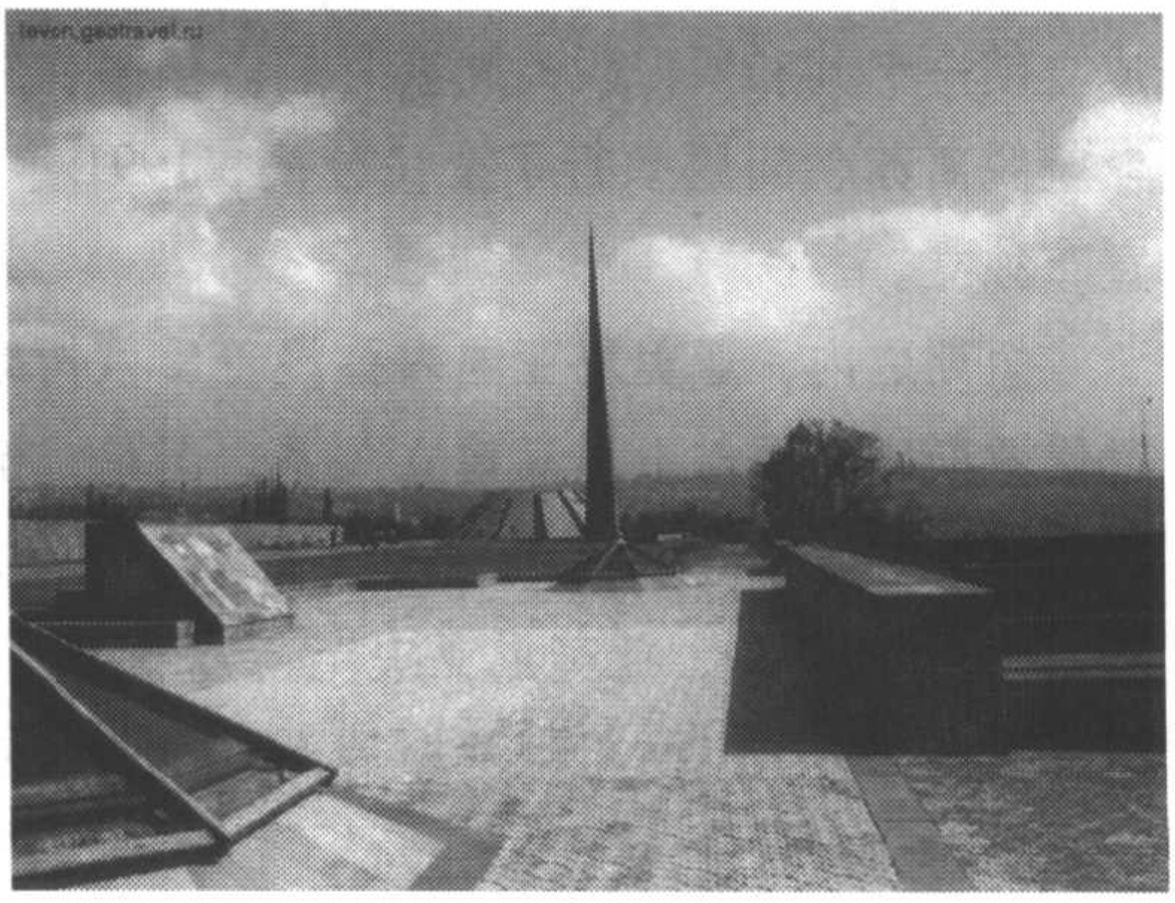
3. 亚美尼亚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亚美尼亚人一直处于大国对抗的夹缝中，并且

常常成为大国争夺的受害者，是世界上苦难最为深重的民族之一。也许，其所遭受的苦难只有犹太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到 14 世纪，亚美尼亚人丧失民族独立，失去国家认同。现在亚美尼亚的领土在历史上大部分处于奥斯曼帝国境内，当时亚美尼亚人的人口大约 250 万人，分布在 6 个省，但在每一个省都不占多数，经常遭受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统治者的凌辱和迫害。在加入俄罗斯帝国之后，亚美尼亚人生活在外高加索的巴库、第比利斯等地，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复国的理想。从 19 世纪下半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开始复国运动。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向议会派去一个代表团，要求在亚美尼亚人聚居的土耳其东部省份任命信仰基督教的总督，以便能够顾及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的利益。此后，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多次起来反抗土耳其当局的迫害，但是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美尼亚仍然没有实现民族自决的梦想，直到 1917 年十月革命后，亚美尼亚人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愿望才成为现实。1918 年 7 月 22 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人率先宣布独立，并成立了政府。1920 年 4 月 28 日，阿塞拜疆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向纳—卡的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撤销独立。鉴于苏维埃俄国政府不支持亚美尼亚，亚美尼亚被迫与苏俄签署协议，放弃独立；但是，有关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领土争端只是被搁置起来。1921 年，苏俄与土耳其签署协议，将卡尔斯让给土耳其，但是，在亚美尼亚人看来，卡尔斯在历史上却是属于亚美尼亚的领土。

苏联后期，亚美尼亚人开始追求国家独立，这一进程开始于 1988 年，开始于纳—卡危机。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亚美尼亚走向独立之路的特点，并不是强调“反对苏联极权主义”或“俄罗斯侵略”，而是看起来似乎是由卡拉巴赫冲突引发的。在其走向独立的初期，其民族领导人并不直接与中央对抗，而是强调在苏联范围内解决领土争端。一方面，亚美尼亚要求无须苏联中央的批准来解决领土问题，这种政治运动本身有可能催化



纪念 1915 年对亚美尼亚人种族灭绝的建筑群

亚美尼亚的独立，加快苏联解体进程；另一方面，亚美尼亚日益强烈地意识到：在苏联体制内解决卡拉巴赫问题已经不可能，于是就开始了争取独立的斗争。也就是说，亚美尼亚社会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独立问题，而是领土问题；独立只是作为解决领土问题的手段。

1988 年，纳—卡自治州发生了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流血冲突。此后，自治州内就纳—卡地区的归属问题举行了全民公决，结果，绝大多数人赞成从阿塞拜疆分离出去。为此，纳—卡的人民代表会议决定请求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批准纳—卡脱离阿塞拜疆；但是，阿塞拜疆坚决反对，苏联政府也不予支持。1988 年 7 月 15 日，亚美尼亚通过决议，批准纳—卡脱离阿塞拜疆，加入亚美尼亚，而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认定这一决议为非法。但是，在此之前，纳—卡已经与阿塞拜疆的经济和政治脱离了联系。苏联政府开始介入危机。1988 年 11 月 22 日，亚美尼亚议会被解散，并在埃里温实施了紧急状态。1990 年，亚美尼亚举行了议会选举，彼得罗相担任新议会主席，随即发表了主权宣言，标志着共产主义统治在亚美尼亚结束。1991 年 3 月，亚美尼亚抵制了就是否保留苏联而举行的全民公决，开始走向分离。当时，阿塞拜疆仍没有独立的愿望，而亚美尼亚对戈尔巴乔夫签署新联盟条约的思想显然不抱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持反亚美尼亚的立场，并动用军队，这也是苏联在崩溃前夕最后一次动用军事力量：1991 年春夏间，苏军对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村庄实施民族清洗，军事行动直到“8·19 事件”之后才告结束[33]。1991 年 8 月 31 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恢复 1918 年到 1920 年间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主权宣言。亚美尼亚人将此视为对纳—卡在苏联时期所拥有的自治地位的合法性的否定；作为回应，纳—卡州和亚美尼亚人聚居的邵武勉地区决定成立纳—卡共和国，脱离阿塞拜疆。该事件结束后一个月左右，亚美尼亚就脱离苏联问题举行了全民公决，1991 年 9 月 23 日，亚美尼亚正式宣布独立。

短期之内，亚美尼亚国内弥漫着反俄情绪，亚美尼亚领导人开始疏远俄罗斯，试图与土耳其建立关系；但是，土耳其却对亚美尼亚抱有敌视，在卡拉巴赫问题上不可能支持亚美尼亚，亚美尼亚被迫改变路线。从 1992 年初开始，亚美尼亚决定与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方面与俄罗斯展开合作。在外高加索三国中，亚美尼亚最先加入了独联体，并且还签署了相互安全协议[34]。

从 20 世纪 90 年代独立之初，亚美尼亚开始了大规模私有化进程。

这些私有化措施导致的后果是生产大规模缩减，平均减少了80%。在整个90年代，有色金属的生产规模下降到原来的1/9，机械制造下降为原来的1/11，化学工业、轻工业、食品工业下降为原来的1/15[35]。亚美尼亚国内缺乏自然资源，完全无法自足；而最严重的问题，是由于经济状况恶化而引起的人口外流。在解体之前，亚美尼亚境内居住着360万人口，但是，由于人口大量外流，现有人口只有130—150万之间，这是灾难性的状况。2001年，仅仅1—5月间，就有45685人离开了亚美尼亚：其间有18万人次离境，只有13.47万人次回国。虽然这并不表示45685人永远离开了亚美尼亚，但亚美尼亚人口连续几年的外流量为平均每年5万人[36]。人口出现严重危机，本身是社会经济原因引起的，同时也预示着整个国家处于危机前的状况——连国家安全都无法保障。

俄罗斯在解决纳—卡问题的立场和作用，对于亚美尼亚—俄罗斯的关系至关重要。1915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通常称为“种族灭绝”，构成了亚美尼亚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部分。在苏联时期，由于两大阵营的对立，苏联政府允许研究该时期的土耳其—亚美尼亚关系历史，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关系问题自然属于禁区，而针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就成为较普遍的题材。这些研究的结论多半是：俄罗斯使亚美尼亚人免于完全灭绝。因而在亚美尼亚人的意识中，土耳其是自己的历史敌人，而俄罗斯则是自己的拯救者。亚美尼亚人的亲俄倾向直到苏联解体后都存在。在多数亚美尼亚人看来，俄罗斯与亚美尼亚的利益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尤其是在地缘政治利益方面，因而其命运也相互关联。亚美尼亚知识分子主张，亚美尼亚应该与俄罗斯团结起来，对抗土耳其等国家的泛突厥主义：“今天，在基督教民族与大图兰的对抗中，地缘政治力量的配置不仅取决于强大的俄罗斯的命运，而且也取决于弱小的亚美尼亚的命运”[37]。亚美尼亚知识界将俄罗斯、亚美尼亚共同抵制泛突厥主义扩张，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和政治问题对待。俄罗斯的亚美尼亚族学者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于1994年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中心，出版学术著作，对该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中心领导人认为该中心的任务是：“在现存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利益的基础上，寻求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切实接近的途径”，甚至提出建立一个俄罗斯—亚美尼亚—伊朗（同时格鲁吉亚也极可能参加）轴心的思想。亚美尼亚积极评价历史上俄罗斯与亚美尼亚的关系，同时也认为：1917年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指十月革命）对亚美尼亚民族来说很不幸，因为此后俄罗斯就改变了外交路线，站到了土耳其方面[38]。值得一提的是：亚美尼亚学者否定

20 世纪 20 年代苏维埃俄国与土耳其改善关系的外交政策，强调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主要敌人乃是突厥人。有人甚至提出：1919 年以后斯大林之所以推行武装凯末尔政府的政策，原因在于斯大林本身是个间谍，害怕土耳其主子揭露自己[39]。

亚美尼亚政界和知识界总是有大量的亲俄派。有人提出方案，仿照俄罗斯—白俄罗斯结盟的模式，建立一个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联盟；另一方面，同时也存在着制衡的因素。有人担心，过分的亲俄罗斯政策，会使亚美尼亚成为大国地缘政治争夺的人质。这样，亚美尼亚不仅不能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卡拉巴赫问题上执行有效的政策，而且还可能被在该地区竞争的大国夹击[40]。对于俄罗斯来说，由于车臣问题悬而未决，北约东扩，土耳其积极向高加索地区拓展，俄罗斯—亚美尼亚关系就具有了极高的价值。到今天为止，亚美尼亚成为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甚至整个前亚地区最可靠、最稳定、最宝贵的伙伴和盟友。俄罗斯利用自己在亚美尼亚境内的军事基地，可以粉碎任何将其从高加索地区排挤出去的阴谋。俄罗斯政界同样有主张与亚美尼亚建立紧密关系的亲亚美尼亚人士和派别，如俄罗斯前驻亚美尼亚大使弗拉基米尔·司徒比申。他本人对亚美尼亚充满感情，他表示：亚美尼亚自始至终都是俄罗斯的战略盟友，而俄罗斯也应该给予应有的对待。如果没有亚美尼亚，“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就没有任何地位”[41]。当其卸任后，一直为发展俄罗斯—亚美尼亚友好关系、公正解决卡拉巴赫问题而努力。

伊朗在亚美尼亚的对外关系方面占重要地位。尽管亚美尼亚和伊朗在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但是，两国贸易往来却非常活跃，伊朗是亚美尼亚最主要的外贸伙伴。在独立之初，由于地理位置不利，加上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对其长期封锁，亚美尼亚处境困难，而伊朗为亚美尼亚提供了大量生活必需品和燃料等[42]，对亚美尼亚克服困难、维持生存，起了重要作用。经由伊朗、亚美尼亚可以与外部世界，包括中亚、近东、中国等建立联系。此外，伊朗对亚美尼亚投资积极，占亚美尼亚吸收外资总额的 26%。伊朗北部居住着大批阿塞拜疆族，一直从事分裂活动，要求建立独立国家或与阿塞拜疆联合。而这些分裂活动得到了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支持。在对抗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方面，伊朗和亚美尼亚两国有共同利益。2002 年 3 月，两国外交部签署备忘录，宣称此举意在保持地区平衡，不针对任何他国。但实际上，其目的恰恰是为了防范土、阿两国的军事政治合作导致地区力量失衡。

对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来说，纳—卡问题是最为核心、同时也是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它严重影响着两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以及两国关系、两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各种尝试、各种方案都归于无效。现状是：纳—卡共和国事实上处于独立状态，回到阿塞拜疆已经不可能，但是，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不愿意接受这一现实，而纳—卡共和国的独立也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承认，政治调解纳—卡问题已走入死胡同。真正能够调解纳—卡问题的是俄罗斯和美国，但是，俄罗斯对于和平调解并最终解决纳—卡问题并不感兴趣：该地区一直存在冲突，这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当然，这种冲突应该维持在可控制的水平，否则，其对于俄罗斯的冲击和消极影响也是巨大的。作为居间调解人，俄罗斯可以借此控制局势，并以此做交易，与阿塞拜疆实现关系正常化，巩固自己在该地区的地位。2001 年 9 月，普京总统在访问亚美尼亚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全部政策都是为了保障亚美尼亚有可靠的国防；另一方面，普京也表示：俄罗斯不能用自己不谨慎的行动打破现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存在的平衡[43]。这表明，俄罗斯更希望该地区保持现状。

对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问题的解决，美国人和欧洲人也并不十分热心。纳—卡的地位不涉及美国在地区的根本利益。该问题悬而未决，惟一能够引起他们不安的，那只是担心该地区冲突动荡的形势会破坏他们拟议中的运输管道的安全。美国和欧洲都没有就纳—卡问题对亚美尼亚施加任何重大的政治压力，是因为他们的管线安全得到了保证，而且，外国石油公司还逐渐明白：纳—卡共和国甚至还是保障外高加索安全的极其重要的因素。美国人认识到：对于他们来说，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关系并不重要，亚美尼亚—土耳其关系才是该地区的关键。美国甚至有意扶植亚美尼亚，以便未来土耳其的自主性增强时，用亚美尼亚制约土耳其。

亚美尼亚也积极地与美国发展关系，但是，伊朗、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紧张，成为亚美尼亚和美国发展关系的障碍。美国希望亚美尼亚在经济上独立于伊朗和俄罗斯，并为此与俄罗斯展开竞争，借助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美国设法战胜竞争对手俄罗斯公司，控制亚美尼亚的经济命脉。作为亚美尼亚主要贷款来源的世界银行，明确反对亚美尼亚电力供给部门让俄罗斯公司控股 51%，称这将在埃里温和西方投资者之间“竖起一道墙”。同时，世界银行还提醒亚美尼亚，正是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和美国的无偿援助，弥补了亚美尼亚的财政亏空[44]。该案例直观

地表明俄罗斯与美国在亚美尼亚的利益冲突。同时，美国和西方国家还极力拉拢亚美尼亚加入美国庇护下的高加索地区安全体系，使其在军事—政治方面脱离俄罗斯。这样一来，即使俄罗斯在亚美尼亚有军事基地，也不能阻碍亚美尼亚和西方的接近。在美国主导下，开始建设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线（尽管经过亚美尼亚境内会更廉价）。同时，美国还对伊朗打算敷设通向亚美尼亚境内的天然气管道而耿耿于怀，认为伊朗此举目的是为了加强其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位，而这是美国所不希望的。

对于美国来说，其境内150万亚美尼亚人都是守法公民，已经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有机成分，这是其推行对亚美尼亚政策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众议院中还活跃着亚美尼亚的院外集团，他们在美国对外高加索的政策，特别是对亚美尼亚的政策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在他们的影响下，美国国会通过了“907号修正案”，即“对外民主援助法”的修正案。根据此修正案，美国政府不能给阿塞拜疆政府以经济援助，原因是阿塞拜疆政府因纳—卡问题而“封锁”亚美尼亚；但是，与亚美尼亚院外集团对抗的，还有支持其对手土耳其的石油垄断组织，因此，美国对亚美尼亚的政策常常前后矛盾，缺乏连贯性。

亚美尼亚在与美国和北约发展关系的同时，始终顾及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2002年7月11日，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宣布，亚美尼亚不打算加入北约。他说：亚美尼亚从不利用俄罗斯和北约的矛盾来为自己渔利。但是，亚美尼亚也加入了北约伙伴关系计划。2003年6月16日，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代号为“最佳联合行动2003”的军事演习。俄罗斯派出军官小组和摩托化步兵班，首次参加北约的军事演习。俄罗斯政府表示：演习目的是加强北约成员国与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参加国在维和行动中的合作，协调行动，共同应对挑战。随即不久，俄罗斯与亚美尼亚就在阿斯特拉罕州阿舒鲁克靶场举行“战斗独联体—2003”联合演习；9月13日，俄罗斯与亚美尼亚在亚境内的“巴戈拉米扬将军”靶场举行联合战术演习。

俄罗斯国家的总体利益决定着，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紧张关系不可能持久继续下去，两国最终还要建立正常关系；但是，普京总统在缺乏与亚美尼亚充分沟通的情况下访问了阿塞拜疆，引起亚美尼亚人对俄罗斯政府的不满，伤害了亚美尼亚人的感情。在亚美尼亚人看来，这些做法似乎正好印证了某些人的判断：即俄罗斯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与阿塞拜疆改善关系而牺牲亚美尼亚。因此，在特定的条件下，美国因素会在亚美尼

亚政治生活中增长，亚美尼亚投入美国怀抱也不是不可能的。

亚美尼亚—土耳其关系和俄罗斯—格鲁吉亚关系是外高加索的核心问题。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处于敌对状态，这种形势不利于美国在该地区推行自己的政策，亚美尼亚极有可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或在俄罗斯的授意下封锁交通和运输线路。美国和北约则想通过向格鲁吉亚提供政治和财政支持使其更加疏远俄罗斯，同时，设法调解土耳其—亚美尼亚关系，从而将俄罗斯从该地区排挤出去，还可完全控制伊朗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并控制外高加索地区。在外高加索三国中，亚美尼亚是唯一有能力发展高科技，并且拥有战斗力很强的军队的国家。有人将亚美尼亚在外高加索的重要地位与叙利亚在中东地区的地位相提并论：叙利亚没有多少资源，但地缘政治地位极其重要，既捍卫了阿拉伯世界的利益，同时还是地区大国和世界性大国如美国、欧洲、伊朗、俄罗斯等争夺的对象[45]。法国承认 1915 年土耳其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行了种族灭绝政策，就使得美国对土耳其执行更加强硬的政策。美国也准备承认该政策为种族灭绝，从而与欧洲国家一起控制土耳其。

从独立以来，亚美尼亚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其中既有其国内原因，同时，未必就不是俄罗斯、美国争夺的结果。1999 年 10 月 27 日，亚美尼亚政界发生了惊天血案。一批武装分子冲进议会，对正在召开会议的政要扫射，包括总理萨尔基相在内的许多高官被打死，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恐怖袭击者乌纳尼扬交代说，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国内经济恶化、官员腐败等问题的不满；但实际上，这是亚美尼亚国内形势，以及外部因素共同激发的矛盾所致。亚美尼亚经济形势不佳，人民贫困化，贪污腐败严重，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对于矛盾进一步激化来说，外部因素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美国试图担当中间人，调解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冲突，从而控制亚美尼亚，尽快建起从巴库到土耳其的石油管线，而袭击事件客观上破坏了这一进程。该危机之后不久，《华尔街日报》称："我们的人"在亚美尼亚被杀。美国和西方国家担心俄罗斯会借口介入亚美尼亚事务，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克林顿总统亲自参加会议，美国代表并且迅速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协调立场[46]。但是，当时俄罗斯正在车臣展开以反恐为主题的军事行动，已经被束缚了手脚，在亚美尼亚问题上难有作为。

亚美尼亚国家也面临领导人更换的问题。西方国家照例会设法操纵这一进程，支持亲西方的候选人，并将其推上总统宝座。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已经成为美国地缘扩张的经典模式，2004 年 10 月以来，与

“玫瑰革命”模式相近的“橙色革命”已经在乌克兰再次上演。萨卡什维利、尤先科们成功的秘诀在于其军帐中有许多美国的战略顾问，他们谙熟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曾在科索沃、波斯尼亚、阿富汗、伊拉克等地试过身手。在战术上，静候政治敌手犯错误，消耗敌手，并逐渐扩大战果，发动心理战、进行挑唆等[47]。看看亚美尼亚国内，罗伯特·科恰良的政治反对派一直很活跃，其中未必没有外部势力支持。而一旦机会成熟，那么，以理度之，格鲁吉亚的一幕也会同样搬到亚美尼亚上演。

问题与前景

大国在高加索的争夺，是大国关系的一部分、一个方面，也是大国之间总体关系在高加索地区的反映。苏联解体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摇摆，俄罗斯开始坚定地捍卫自己在高加索的利益，但是，至今为止，俄罗斯与外高加索三国的关系却并非成功。在这方面，除了俄罗斯领导人以外，外高加索三国领导人也有失策的地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俄罗斯自身国力衰落，存在许多问题，难以使外高加索国家回到自己的经济、政治、战略轨道。同时，俄罗斯国内政治斗争也对俄罗斯推行在外高加索的政策带来消极影响，与他国争夺高加索就显得力不从心。此外，苏联时期对这些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民主运动的镇压，以及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对这些地区政治进程的操纵和一些秘密活动，导致这些国家对俄罗斯不信任，反俄情绪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外高加索三国经济恶化，国民贫困问题严重，大批人口前往俄罗斯寻求较好的生活；另一方面，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极力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援助并渴望加入西方的经济共同体。

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的外交实践中，对高加索的政策缺乏长远考虑，没有连续性，对与外高加索国家发展关系一直缺乏准确定位。在解体之初，俄罗斯认为：外高加索国家获得独立是由于俄罗斯一时衰落而导致的某种“暂时的历史误会”。[48]这一判断成为俄罗斯对高加索三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俄罗斯一度仍对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提供许多无偿的经济援助以及各种优惠。但是，当这些国家与别国建立政治、经济关系时，俄罗斯国内往往对此消极对待，甚至常常引起一些病态反应。反过来，外高加索国家独立已经 10 多年，一代新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并不了解苏联时期的生活，而是拥有了新的国家认同，认为自己是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公民，这样，就与俄罗斯政治家之间产生认识上的分歧。

在俄罗斯国内，有许多人仍然持苏联时期的旧思维或者说，是俄罗斯的“大国情结”、“帝国思维”在作祟，将外高加索视为自己的一部分。俄罗斯一直觉得，似乎只要宣布了自己是苏联的继承人，就自动地在苏联原来的空间内占据了所有地位，而这些新独立国家应该服从俄罗斯并加入其“责任区”[49]。在国家间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一些政治家和政治派别在一些场合散布针对外高加索个别国家的不友好言论。2004 年 9 月 30 日，日里诺夫斯基前往苏呼米庆祝阿布哈兹独立，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称萨卡什维利为美国豢养的一条狗[50]。这些言论本身反映了俄罗斯—格鲁吉亚交恶后俄罗斯国内的部分民意。同时，也导致这些国家的国民对俄罗斯产生忧惧和反感。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许多党派拒绝批准在 1994 年 2 月签署的俄罗斯—格鲁吉亚的基础性条约，其实该条约完全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相应地，1998 年与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俄罗斯—亚美尼亚的类似协议，也照例没有得到批准。俄罗斯应该认识到：要保障自己在高加索地区的利益，必须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政治现实，去制订对高加索的政策，与这些国家发展长期友好的关系。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应该允许这些国家自主、自愿地与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去。

外高加索国家向西方靠拢，渴望借助西方解决自身问题。但是，十几年来的政治实践表明：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破灭了。西方国家与外高加索国家发展关系，同样是为了追求能源、地缘政治、交通枢纽等自身利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贷款、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使这些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外债，因而在政治和外交方面须仰人鼻息，受制于人。外高加索需要与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但是，也需要调整与俄罗斯的关系。作为强大邻国的俄罗斯，至今与外高加索国家保持着除了经济、政治以外，还有许多跨境民族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外高加索各国无法回避的现实。

外高加索个别国家在大国之间玩弄地缘政治游戏，希望获取最大利益，对自身却是极为危险的，因为这些国家始终都是大国棋局中的一个棋子，而该地区的小国将成为俄罗斯和美国交恶的受害者，受到一方侵害或被夹击。10 多年来独联体本身的发展，以及俄罗斯和南高加索三国的外交实践，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在该地区参与政治角逐的国家都需要调整自己的方针和政策。

迄今为止，外高加索三国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各有不同，并且还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有人判断，未来外高加索三国与俄罗斯、美

国等国家的关系可以大致分为三种模式：1. 亚美尼亚：与俄罗斯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并与西方国家保持有限的经济、政治联系；2. 阿塞拜疆：优先发展同土耳其的战略合作关系，同时也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3. 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并保持中立地位[51]。

该地区各国未来的地缘政治取向，将取决于大国实力在该地区的消长，俄罗斯—美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一进程：俄罗斯与美国在高加索和中亚的争夺，导致这些地区持续紧张。现在，美国与俄罗斯几乎在所有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展开争夺，俄罗斯一度处于防守，美国则主动进攻。在与俄罗斯争夺高加索和中亚方面，美国有许多战略和策略可以选择，而俄罗斯则采取守势，甚至可以说是捉襟见肘。这种情况能否有所改观，将取决于俄罗斯国力是否能够尽快复兴。同时，俄罗斯在高加索和中亚也都有许多无可替代的政治、地缘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潜在和现实的资源，这是任何竞争者都无法忽视的。俄罗斯复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西方势力利用俄罗斯短期的不利状况，绕过俄罗斯或竭力排挤俄罗斯，实际上是不明智和缺乏远见的做法。如果争夺成为恶性的，那么，将会为未来留下许多隐患，导致该地区动荡不安。2004年5月8日，在车臣共和国举行盛大集会的主席台上，发生了爆炸事件，包括车臣总统卡迪罗夫在内的一些军政要人被炸身亡，导致车臣政权机构短期内陷于瘫痪。有人曾指出：应该将该事件与整个地区的形势变幻联系起来。在几个月时间内，高加索地区同时发生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事件：印古什总统加吉科夫遇刺；格鲁吉亚将谢瓦尔德纳泽赶下台；亚美尼亚发生骚乱；阿布哈兹将阿巴希泽推翻。俄罗斯人认为：这等于是将阿布哈兹的亲俄派别打掉了，而该事件背后一定有西方背景[52]。这些发人深省的事件提醒人们：大国在高加索地区明里或暗里的争夺，有时将付出血的代价。

调解该地区的紧张形势、解决存在的问题，避免高加索地区的“巴尔干化”，将主要取决于大国关系是合作，还是争夺、对抗。过去10多年的政治实践表明：大国在地区的争夺，不仅地区小国深受其害，大国也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这是“冷战”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如果大国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采取有远见的政策，积极合作而不是对抗，将不仅有利于地区的发展和繁荣，还有利于大国自身。

注　释：

〔1〕Ю. Н. Глущенко, А. Д. Собянин, Исламский фактор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США, http://profi.gateway.kg/glushenko

〔2〕Р. А. Фадеев, Кавказская война, 2003, М, С. 33.

〔3〕Пламен Димитров,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ША, http://cge. evrazia. org/

〔4〕Хожа – Ахмет Нухаев, Ведено или Вашингтон?, http://ryadovoy. vif2. ru/geopolitika

〔5〕А. Дугин, Кавказский вызов, http://www. arcto. ru/

〔6〕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 Кавказский вызов, http://www. arcto. ru/

〔7〕В. В. Черноус,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на Юге России: новые вызовы. Ростов – на – Дону, С. 99.

〔8〕Александр Крылов, Северный Кавказ – трагедия России. Итоги 2004 года, http://kavkaz. memo. ru/analyticstext/

〔9〕Марина Чернышова, Кавказские пленники ваххабизма//Парламентская газета, 14 Октябрь 2004

〔10〕Р. А. Фадеев, Кавказская война, 2003, М, С. 22.

〔11〕Языкова Алла, Страны Кавказа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е, http://europe. rsuh. ru/journal/journal2. 2001/10. htm

〔12〕Мурадян Игорь, Ге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в развит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оцессов в Кавказско – Каспий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Ереван, 2001, С. 130.

〔13〕Деньга Халидов, "Поджечь" Кавказ чтобы развалить Россию!?, http://www. sovross. ru/2004/

〔14〕Языкова Алла, Страны Кавказа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е, http://europe. rsuh. ru/journal/journal2. 2001/10. htm

〔15〕Александр Искандарян, Эскиз не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го сектора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на Кавказ, http://kavkaz. memo. ru

〔16〕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蒿新生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3 年 1 月出版，38 页。

〔17〕А. Аймермахера,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М, 1999, С. 164.

〔18〕同 1, С. 164.

〔19〕Александр Чепурин, Семь вопросов российско – Грузинской повестки дня//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04, №3, С. 24.

〔20〕Александр Чепурин, Семь вопросов российско – Грузинской повестки дня//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04, №3, С. 25.

〔21〕如果说，从一定意义上说，苏联解体是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的结果，那么，发生在前苏联范围内新独立国家的“天鹅绒革命”就是对这些国家的再西化，是新一波的西化进程，它对于面临西化的国家中的政治反对派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和号召，对不服从西方意志的旧领导人是一个警示，宣示了美国或西方世界的巨大能量。而在“革命”后的初期阶段，其象征意

义要大于实际政治意义。

〔22〕Владимир Волков, Уход Шеварднадзе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арены Грузии открывает новый период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и борьбы завлияние на Кавказе, http://www.Left.ru

〔23〕http://kavkaz.memo.ru/

〔24〕霍加拉事件也被称为霍加拉悲剧。最初的说法是：1992 年 2 月，亚美尼亚军队和俄军 366 团共同采取行动，杀害了纳—卡地区的几百名阿塞拜疆族平民；但是，后来表明：这是阿塞拜疆领导人艾里乞别依挑动的，是针对前领导人穆塔利波夫的一个阴谋。

〔25〕Дмитрий Фурман, Азербайджан и Росс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М, 2001, С.455.

〔26〕А. Аймермахера,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их, М, 1999, С.100.

〔27〕Дмитрий Фурман, Азербайджан и Росс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М, 2001, С.384.

〔28〕С. С. Жильцов, И. С. Зонн, Ушков А. М.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Каспий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М, 2003. С.208.

〔29〕Мурадян Игорь, Ге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в развит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оцессов в Кавказско－Каспий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Ереван, 2001, С.85.

〔30〕А. Гушер. ,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власти//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4, №2, С.8.

〔31〕Яков Боровой, Алиев Ⅱ//Огонек, 2003, №38, С.20.

〔32〕同注释〔30〕, С.7。

〔33〕Старовойтова Гали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е: подходы и изучение случаев, http://www.vehi.net/politika/starovoit

〔34〕Дмитрий Фурман, Азербайджан и Росс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М, 2001, С.455

〔35〕Языкова Алла, Страны Кавказа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е, http://europe.rsuh.ru/journal/journal2.2001/10.htm

〔36〕来源：新华网。

〔37〕А. Аймермахера ,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М, 1999, С.98

〔38〕同 2, С.99.

〔39〕同 2, С.99.

〔40〕Заложница чужой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0, №8, С.8.

〔41〕Владимир Ступишин, Как нам сохранить Южный Кавказ, http://www.armenianhouse.org/stupishin/

〔42〕Гаянэ Новикова, Ориентир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Армении, http://www.spectrum.am/rus

〔43〕同注释〔41〕。

〔44〕Заложница чужой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0. № 8, С.9.

〔45〕Мурадян Игорь, Ге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в развит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оцессов в Кавказско－Каспий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Ереван, 2001, С.111.

〔46〕Станислав Меньшиков, Генеральный план Запада изгнатьРоссию с Кавказа, http://www.fastane.ru/smenshikov/slovo/slovo6.htm

〔47〕ДеньгаХалидов, "поджечь" Кавказ чтобы разваливать Росси!?, http://www.sovross.ru/2004/

〔48〕В. В. Черноус,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Кавказа,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2001, С.170.

〔49〕Агалар Аббасбейли, Кавказ в сфере гео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реалий, http://www.nasledie.ru

〔50〕http://www.abkhazeti.ru/pub/rusge/rossia_dobraia_dusha/

〔51〕Мурадян Игорь, Ге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в развит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оцессов в Кавказско－Каспий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Ереван, 2001, С.132.

〔52〕http://www.rg.ru/tema/reg－yug/index.html

第十三章

高加索统一：构想、实践及前景

在20世纪里，世界上既存在着走向分离的趋势，如苏联解体，1个国家分裂为15个国家，也存在着走向联合的趋势，如欧洲走向统一；各地区出现了包括已经运转及正在拟议中的各种经济贸易合作组织；俄罗斯—白俄罗斯结盟等。而在高加索，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曾经有走向联合的愿望和尝试。但是，这种理想和实践可以分为内容、性质和目标完全不同的几个层次。在历史上，高加索各族人民为了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殖民侵略者和封建大公的压迫，渴望团结对敌，同时，高加索地区发展经济，也必须加强自身内部的经济联系；另一种情形，则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在争夺高加索地区方面占上风，人为地操纵高加索的政治进程，以便达到排挤竞争对手，控制该地区的目的。而苏联解体前后，又产生了另一种独特现象：那就是高加索地区的民族精英，以建立独立于俄罗斯联邦以外的民族国家为号召，发起的实现高加索联合的政治运动。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十多年来，高加索的社会意识以及媒体中，经常可以遇见这样一些关键词，如："高加索家园"、"全高加索"、"大高加索"、"高加索邦联"、"高加索思想"、"高加索

统一思想”、“泛高加索”等等。这些关键词是解读高加索各民族政治生活的内容和实质的密码。当然，这几个方面尽管动机、性质不同，但是有互相交叉、重合的地方，在特定条件下，就会融为一种潮流。今天，大国因素在高加索的政治生活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国要扩大在高加索地区的活动范围，同时还要战胜竞争对手。因此，设计对自己有利的高加索统一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大国对高加索实现统一感兴趣的真正动力。考察高加索统一的历史与现状，内容与实质，理论与实践，有助于了解今日高加索地区的政治进程、地缘政治现实，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高加索统一：思想及其历史回顾

“大高加索”或“高加索家园”、“高加索邦联”等思想的提出由来已久。这种“高加索意识”，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多半不是，或不仅仅是高加索人民自身愿望驱动下的自发自愿联合的产物，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外部灌输的思想，是外力推动的结果。

高加索走向联合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实践，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据说，最早提出高加索统一思想的，是19世纪英帝国首相帕默斯顿。1830年，帕默斯顿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北高加索各民族邦联”，以对抗俄罗斯。在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期间，他进一步宣传这一思想[1]。当然，在帕默斯顿提出这一政治主张之前，已经具备某种必要的思想前提。高加索联合的构想，多半要依赖土耳其实现，而帕麦斯顿的主张正好与当时日渐兴起的泛突厥主义思潮形成某种吻合，两者互相呼应，或者说，正是英帝国鼓励了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以便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当时的泛突厥主义思想家、克里木鞑靼人伊斯马伊—加斯普林斯基提出：要将奥斯曼帝国和欧亚大陆上的突厥—鞑靼民族联合起来。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对实现这一构想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并在政治、外交方面给予土耳其支持，行动非常积极。在各帝国的政治家们看来，如果听任亚美尼亚被俄国占领，则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广大地区，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但是，经过几番较量，俄罗斯终究在该地区占据上风。从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俄罗斯与土耳其和伊朗为争夺高加索地区的控制权，发生了多次冲突和战争：与土耳其四次，与伊朗两次，俄罗斯都战而胜之。1853年到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中，俄罗斯帝国虽然战败，但是，却没

有动摇其在高加索的地位。到1864年高加索战争结束，俄罗斯已经成为高加索惟一的主人。因此，让高加索实现统一，并非为了让高加索各民族获得独立，而是俄罗斯帝国的竞争对手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土耳其等，试图削弱俄罗斯帝国在中近东的影响和进攻势头，将俄罗斯从高加索排挤出去。1864年，整个高加索地区都最终归并俄罗斯帝国，由西方国家和土耳其为主导实现高加索统一的构想最终落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认为实现自己民族理想的时机已经到来，为此加入了世界大战。泛突厥主义思想家对未来的统一蓝图作出了大胆畅想：要建立一个从直布罗陀一直到中国的所谓“大图兰”，而高加索乃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重要环节，其战略重要性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加以表述：“高加索——走向图兰之路。”[2]战争形势激化了各种危机和矛盾，俄国爆发了革命。沙皇政权灭亡后，高加索地区陷于无政府状态，这对于高加索各民族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高加索先后成立了几个政治组织：北高加索成立了山民共和国、艾米尔国等；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也都成立了独立的共和国。战争爆发后，土耳其首先关注的是夺取高加索，并立即将军队派向卡拉巴赫、达吉斯坦、巴库方向展开军事行动，帮助北高加索山民。1917年，在弗拉季高加索的第一次山民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在俄罗斯之外的、全高加索的独立国家。大会通过决议，建立“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山民同盟”，阿布哈兹民族也成为全权成员。11月，“山民联合同盟”组建了以车臣人切尔莫耶夫为首的山民政府，该政府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全高加索国家——“高加索邦联”；1918年5月11日成立独立的山民共和国并宣布脱离苏维埃俄国，是在这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在这期间，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也都插手高加索地区，并采取行动，试图让高加索各民族脱离俄罗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土耳其等国家的失败而告终，德国和土耳其的势力从外高加索退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随即，苏俄爆发内战，美国政府派军事代表团到格鲁吉亚等国家，提出：如果格鲁吉亚自己提出要求，那么，美国可以对格鲁吉亚提供援助[3]。美国甚至研究过占领高加索的可能性。英国在南亚地区利益重大，如果别的国家在外高加索立足，对英国将极为不利，英国计划将外高加索作为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平台，对高加索各民族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从中渔利。法国、日本等国家也试图进入高加索地区，而吸引他们

进入这一地区的，除自然资源外，就是高加索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西方国家还向邓尼金等领导的“白色运动”提供军事援助，甚至直接出兵干涉，企图推翻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但是，内战的结果，布尔什维克最终将“白色运动”消灭，外国干涉也被完全击退，苏维埃政权逐渐稳固。随即，红军开入高加索，山民的政治组织被推翻，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外高加索的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共和国也都加入苏联。高加索联合的计划就此搁浅，高加索地区被纳入苏俄的版图，从此进入了苏维埃时期。

从20世纪2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高加索统一，确切地说，就是建立高加索各民族邦联的构想和实践，主要是通过高加索民族的海外侨民代表，以及西方外部势力的推动来实现的。在该时期，西方国家敌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并对其进行围困和封锁。苏联在20世纪20、30年代推行镇压富农、大清洗等政策，迫使许多苏联公民流亡到西方国家，其中许多流亡者来自高加索地区。这些苏联侨民对斯大林政府抱有深深的怨恨，而西方国家试图借他们的力量分裂苏联，这样，许多苏联侨民就与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或军事机构结合起来。通常是由西方政府支持，甚至主持所谓“高加索统一”的活动，并自始至终都将这些活动纳入西方国家的轨道，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1934年7月1日，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签署了关于建立“高加索各民族邦联”的协议，参加者是北高加索、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侨民中心的代表。协议宣布了如下原则：

邦联是代表所有签署《成立协议》者的全权机关；邦联对外政策通过赋予其相应权力的机构来实现，并为所有参加者的利益服务；捍卫邦联边界的任务，由邦联的武装力量承担；武装力量由各民族军队组成，有统一的指挥；协议签署者之间的所有分歧都经仲裁或提交邦联最高法院裁决，这些分歧必须加以解决；协议各方成立专家委员会，着手筹备邦联宪法草案，该草案将交由其代表大会讨论；等等[4]。

成立高加索邦联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完全被土耳其、德国等大国控制。在支持成立邦联的国家中，最卖力的仍然是土耳其，土耳其的如意算盘，依旧是建立一个以突厥语为基础的国家。同时，静候苏联在对外冲突中失败，从而借口援助突厥语民族，将外高加索据为己有。当然，最好是“高加索邦联”主动向土耳其求助。土耳其甚至希望阿塞拜疆民族自己表示想归并土耳其，必要时，土耳其可以动用武力。但是，“邦联”成员都各有打算，并不将“邦联”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

且，当所有这些成员以民族为单位建立联合体的时候，各自的民族意识开始上升：格鲁吉亚担心这样会危及自己的完整；同时，另一重要成员亚美尼亚则拒绝参加“邦联”。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对“邦联”的前景产生怀疑，随着形势发展，在高加索联合的问题上，土耳其开始后退。高加索侨民的活动家在与土耳其政府会晤之后，后者明确表态：土耳其不可能在官方立场上从事类似活动，土耳其不愿意因此而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土耳其对在土境内从事这种活动不加反对，但是，如果“高加索邦联”的活动家与日本合作的情形被苏联得知，则土耳其将被迫采取宣示性的禁止措施。

在高加索联合的问题上，亚美尼亚态度最为消极，由于历史原因，亚美尼亚人向来不信任土耳其。1940 年，土耳其委派 19 世纪北高加索领袖沙米尔的孙子萨伊德·沙米尔说服“亚美尼亚民族中心”加入“全高加索联邦”阵线。沙米尔向他们表明：如果高加索作为一个统一战线行动的话，土耳其会给予支持，但是，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1942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政府对境内的苏联侨民高度重视。1942 年秋天，德国在高加索的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德国人决定实践建立全高加索政府的计划，以便日后帮助占领当局遴选警察、铁路工人、石油专家等。柏林甚至召开“各民族侨民组织会议”，该会议受命建立高加索邦联政府。在希特勒看来，最终占领高加索只是几天或几星期的事情；然而，斯大林格勒一役德国失败，成为希特勒分子被驱逐出高加索的开端。1943 年 9 月，德国人最后一次召集侨民参加邦联会议，最有意思的是会议的参加者都是最高指挥部的军官们，成立高加索政府的问题已经禁止讨论，主要议题是：让侨民组成民族军团或进行宣传服务。1944 年，苏联政府把曾与德国军队合作的北高加索居民，流放到遥远的中亚和西伯利亚，而将其他地区的人口迁入。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建立一个反苏的高加索邦联的计划，就失去了任何可能性。

一体化的现实需求

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目前总共有十个俄罗斯联邦行政主体：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罗斯托夫州、车臣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卡拉恰依—切尔克斯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亚迪格共和国、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以下是北高加索地区各共和国、边疆区的人口、民族成份等概况[5]（依据 2002 年

全俄罗斯人口统计结果)。

自治单位名　称	行政中心	面积	人口	主要民族构成
亚迪格共和国	麦科普	7600平方公里	447109人	10多个民族：亚迪格人22.1%、俄罗斯人64.48%、亚美尼亚人3.41%，以及乌克兰人、库尔德人，等等
达吉斯坦共和国	马哈奇卡拉	50300平方公里	2584200人	70多个民族：阿瓦尔人27.5%、达尔金人15.6%、俄罗斯人9.2%，等等
印古什共和国	纳兹兰	4300平方公里	468900人	60多个民族：印古什人77.27%、俄罗斯人1.19%、车臣人20.42%，等等
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	弗拉季高加索	8000平方公里	709900人	近100个民族：奥塞梯人62.7%、俄罗斯人23.19%、印古什人3.02%，等等
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	纳尔奇克	12500平方公里	900500人	70多个民族：卡巴尔达人55.32%、俄罗斯人25.14%、巴尔卡尔人11.64%、阿巴金人7.36%，等等
卡拉恰依—切尔克斯共和国	切尔克斯克	14100平方公里	439700人	90多个民族：卡拉恰依人38.5%、切尔克斯人11.28%、俄罗斯人33.65%、阿巴金人6.5%、诺盖人3%，等等
车臣共和国	格罗兹尼	15000平方公里	1100300人	车臣人93.47%、俄罗斯人3.68%、库梅克人0.80%、阿瓦尔人0.37%，等等

自治单位名　称	行政中心	面积	人口	主要民族构成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克拉斯诺达尔	76000平方公里	5124400人	俄罗斯人86.56%、亚美尼亚人5.36%、乌克兰人2.57%，等等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斯塔夫罗波尔	66500平方公里	2730500人	90多个民族：俄罗斯人81.6%、亚美尼亚人5.46%、乌克兰人1.68%，等等
罗斯托夫州	顿河—罗斯托夫	100800平方公里	4406700人	俄罗斯人89.35%、乌克兰人2.69%、亚美尼亚人2.50%，等等

鉴于高加索的南北两部分属于同一地区，但却属于不同国家，高加索走向统一的第一步，应该是北高加索各个行政主体先完成统一或联合，然后作为一个整体，如“北高加索共和国”等与外高加索三国实现统一或联合，历史上即是如此。但是，外高加索各独立国家之间，以及北高加索各自治共和国、自治单位之间，外高加索独立国家与北高加索自治单位之间，都存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如果说有一些原因使高加索地区需要联合起来，那么，一个首要因素就是：在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外高加索）存在着因各种原因而导致的危机形势和民族冲突。

北高加索地区存在着民族危机或社会冲突的形势。印古什人和奥塞梯人之间存在争端，其原因来自历史。在1957年以后，被强制迁徙的车臣人、印古什人等民族得到平反，陆续回到北高加索地区，但是，在1944年迁出后，印古什人的原居住地早已被奥塞梯人、俄罗斯人等民族占据。在1957年印古什人回来之前，奥塞梯人就已经准备对抗印古什人的迁回；这样，民族矛盾终于导致了1992年的流血冲突。在暴力冲突之后，仇视和敌意已经深入到这两个民族的心灵中。

其他民族矛盾也与此类似。在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政府曾将北高加索地区的卡拉恰依人、车臣人、印古什人等的几乎所有穆斯林民族流放。斯大林的意图，是要将这些民族永远迁徙到流放地，不许其返回。但是在随后的岁月里，这些被流放民族经历了三次平反过程。1957年，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同时为这些在斯大林时期被

镇压的民族平反。随即，开始了全苏境内的移民浪潮：大批前“特别移民流刑犯”从流放地返回，就导致一些民族之间因领土、居住地而发生纷争。苏联解体前后，苏联政府（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以及随后的俄罗斯联邦政府（叶利钦）继续开展平反运动，一直到1994年后，带来了极为复杂的后果。在所谓为“政治镇压的受害者”，以及为“被镇压民族”平反的进程中，除了政治平反、法律平反之外，其中还有一项内容是实现“领土平反”，这主要涉及斯大林时期因强制迁徙一些民族而引起的领土变更。如果说，斯大林流放一些民族，其错误的性质是单纯的，那么，流放事件与平反进程结合起来，其后果却更为严重，等于引爆了一些民族问题的“定时炸弹”。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主持的为“被镇压民族”平反，有相当的社会需求，有其拨乱反正的一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平反本身也是出于政治需要，特别是苏联解体前后的平反进程，完全服务于打击共产党的政治需要。最重要的是：平反缺乏深思熟虑，并不考虑目标和手段如何统一。例如，领土和划界是最棘手的问题，需要专门的委员会经过仔细研究论证，尊重历史和现实，照顾各方的利益，妥善解决。但是，平反的主持者们多半只是停留在“领土平反”这一空洞、鼓动性的政治口号上，本身什么也做不到。正是在恢复“历史公正”的口号下，高加索地区爆发了许多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

北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危机，还表现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分离倾向——由车臣危机集中表现出来。这些复杂棘手的矛盾成为一个难解的死结，在俄罗斯的机体上出现深深的裂痕。

外高加索国家同样存在类似危机和矛盾。格鲁吉亚处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其境内民族危机最为严重：阿布哈兹危机、阿加尔危机、南奥塞梯危机，等等。潜在冲突的民族包括：阿塞拜疆北部的列兹金人、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加尔人，等等。在外高加索（南高加索）的三个独立国家中，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为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争得不可开交，双方之间的战争持续多年，至今也还经常爆发边界战斗；而格鲁吉亚境内的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危机已经持续多年，这些地区都要求脱离格鲁吉亚；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矛盾；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关系也存在许多问题；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边境的卡拉巴赫问题等。

整个高加索地区都存在着的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苏联解体前后这一地区难以遏制、无法控制的移民浪潮。高加索地区人口从来就有

向俄罗斯腹地，特别是莫斯科等地迁移的传统；加上苏联解体后该地区经济形势恶化、生存竞争激烈、谋生艰难，该地区人口大量迁徙。1994 年以来的车臣战争，许多人成为难民，涌入车臣周边共和国或外高加索国家、俄罗斯腹地、土耳其等。



1990 年，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边境：卡拉巴赫。

苏联解体使该地区各民族之间原来存在着的经济、政治联系割裂，成为以上问题产生的根源。外高加索各个共和国的独立进程，以及北高加索某些自治共和国，如车臣的分离倾向，将原本存在着的联系人为地割断。在出现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总体危机的时候，这些很小，但却相互独立的民族单元，有可能出现类似巴尔干地区那样的形势，如果该进程失去控制，甚至可能在无休止的冲突和战争中灭亡。

经济原因，是推动高加索走向一体化或统一的内在动力。北高加索的经济综合体，是建立在同乌克兰东南部，以及外高加索的生产企业广泛合作的基础上的。苏联解体使北高加索地区失去了与外高加索经济联系的 70%、同乌克兰经济联系的 50%、同俄罗斯腹地经济联系的 30% 到 35%，以及北高加索地区成员内部经济联系的 85% 到 90%[6]，从而导致了消极后果：工业生产的下降速度超过俄罗斯的平均速度。此外，北高加索工业生产专门为合作企业提供产品或半成品的专门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北高加索地区 75% 的生产总值是与其他地区的企业合作实现的，包括提供原料、材料、电力等。北高加索必须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恢复原来的内部经济联系。鉴于北高加索地区各民族单位的微型、弱小，因此，北高加索统一必须有一个民族作为共同体的核心。从各方面看来，车臣或许适于担当这个核心，但是，在俄罗斯对车臣发动两次军事行动之后，车臣的经济、政治地位已经大大下降，北高加索的这只领头羊已经被打掉；而且，车臣的持续冲突本身还危害着北高加索地区的经济合作和联合。

由于缺乏财政等资源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俄罗斯中央财政又无力提

供支持，或支持力度不够，导致这些地区只能自己加强一体化。现在，已经存在这样几种合作形式：各共和国、州之间；共和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签订双边条约和商贸协议；同周边独联体国家合作；建立地区间如“北高加索”、“俄罗斯南方城市”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协会；在社会经济领域通过立法，建立如亚迪格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卡拉恰依—切尔克斯共和国议会间委员会；在“高加索共同市场”组织内实现全高加索一体化等。

北高加索地区首先须与周边的独联体国家合作，恢复传统的经济联系。与独联体国家的贸易额占北高加索地区全部贸易额的30%，但是，还有很大潜力。该地区应优先发展与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的经贸关系。

1998年，以马斯哈多夫为首的车臣当局曾提出建立“高加索经济同盟”的方案，目标是在高加索地区建立统一的经济空间；北高加索各共和国和州、外高加索三国对该倡议表示赞同。1999年4月，“北高加索协会”还提出建立一个“环黑海沿岸自由经济区”，或“里海自由经济区”，其功能和任务，不仅在北高加索范围内，而且还在俄罗斯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之间联合起来，共同解决经济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外来因素：一些地区大国或世界大国将经济触角伸向高加索地区，但却并非简单的经济活动，其中往往包含着政治目的：为了使这些地区在经济上摆脱俄罗斯、依赖外国。当然，如果高加索建立起类似欧洲那样的经济统一体，现有的许多问题也许就会迎刃而解。苏联解体后，各新独立国家重新感到恢复苏联时代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需求。北高加索致力于加强内部一体化，本身是为了克服苏联解体所导致的消极后果，同时也表明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实力下降。俄罗斯必须正视这些地区的正当需求，并将其放到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加以对待。

“高加索邦联”与高加索统一方案

苏联解体前后，开始了追求高加索统一的政治运动。苏联解体既是土崩，也是瓦解。而高加索统一，如同车臣危机的爆发，都是苏联解体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这种形势的出现，是由许多因素导致的。如前所述，高加索统一运动，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历史上高加索有过统一的尝试，并且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短期内成功地脱离俄罗斯而获得独立。在某种程度上说，苏联解体前后出现的统一运动，是这种历史意识在当

代的余绪和回响。

如前所述，解决高加索各行政主体内部社会经济问题和冲突的需要，是高加索实现某种联合的内在驱动力：民族冲突、犯罪率上升、移民问题、生态问题等，这都不是这些民族自治单位能够独立解决的。苏联后期推行的政治改革，是产生类似政治运动的现实因素。由于民主和公开性原则的推行，在苏联这个原本是一党制的社会中，成立各种政治组织和社团成为合法。正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改革，使类似“高加索邦联”这样的全高加索性质的政治组织合法地成立并发展起来。苏联解体，使高加索这一统一的政治空间分裂，随即产生了许多矛盾和危机。“高加索统一”开始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被提了出来。民族精英推动的高加索统一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似乎符合解决这些矛盾和危机的需要。苏联解体，本身表明了苏联对高加索地区的失控。同时，这种变局也为高加索地区的“统一”运动提供了可能。

外部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高加索联合的政治运动。1984 年 5 月 9 日，即山民共和国（1918 年5 月 11 日成立）周年纪念日前夕，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份致高加索各民族的呼吁书，其中包括一份“关于北高加索各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斗争”的历史手册[7]。美国公开支持并策动这种思想和运动，以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考虑到高加索地区的外部因素，那么，高加索统一运动等同于高加索独立运动，从而也就等于将高加索地区从苏联分裂出去的运动。到苏联解体前夕，有人明确提出高加索统一的思想（文章刊载于苏呼米出版的《高加索报》1990 年第 1 期，作者是著名车臣裔学者阿弗托尔汉诺夫）：“高加索人应该明白，相互厮杀，任何时候都不会获得自由和独立。在外部世界看来，这种地区理应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应该被强国及其武装力量永远占领。我提议高加索所有的自治单位应该联合为一个共和国，我们已经有过这样一个共和国，名叫山民共和国”[8]。在当时苏联各民族主权化浪潮中，这种分裂思想得到广泛回应。到苏联解体前后，外部势力对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就更为巨大。车臣危机的外部因素已经为人所共知，而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运动，“高加索邦联”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也都是高加索地区的民族激进主义者。杜达耶夫等车臣分裂派领导人积极支持并参与该运动。除了车臣民族的杜达耶夫之外，高加索地区还有许多其他民族的“杜达耶夫”，如格鲁吉亚的哈姆萨胡尔迪亚等，都曾参与“高加索邦联”运动。鉴于车臣的经验，“高加索邦联”运动的外部因素同样不应低估。

“高加索邦联”的宗旨，与高加索的社会需求有一定重叠和交叉，

但是具有人为操纵的性质，其领袖人物希望在统一了的高加索范围内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对于车臣分裂派来说，“高加索邦联”乃是一个外围组织，杜达耶夫等人想要加以利用，并明确将“高加索邦联”视为未来的伊斯兰帝国的核心。

1989 年 7 月，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之间的冲突，以及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之间的冲突升级，北高加索各民族迅速走向联合，直接促成了“高加索山地民族大会”这一组织的成立，其初衷就是要解决这些棘手问题。1989 年 8 月 26 日，“高加索山地民族大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有沙普苏格、切尔克斯、卡巴尔达、亚迪格、车臣—印古什六个山地民族政治运动的代表加入其间。到 1991 年中期，已经有 16 个民族运动性质的政治组织加入“高加索各民族大会”，大会站在阿布哈兹一边。大会宗旨在于帮助高加索弱小民族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如历史问题，恢复山民共和国等；民族争端，特别是领土争端；政治问题，如为各被镇压民族平反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解决一些经济问题。

1990 年，在纳尔奇克召开了第二次山地民族代表大会，“大会”议事日程上的首要问题，是成立北高加索以及阿布哈兹的国家机构。在两年间，“大会”的任务是实现民主、保护文化。但是，由于苏联迅速解体、俄罗斯当局不稳定的政策，“大会”迅速改变了宗旨和策略。1991 年 11 月 1 日，在苏呼米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北高加索 14 个民族的 211 位代表以外，还邀请了来自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卡尔梅克、俄罗斯和鞑靼、爱沙尼亚的代表参加。大会宣布成立“高加索山地民族邦联”，稍后更名为“高加索各民族邦联”，其主体不是各共和国，而是高加索各民族。通过了《关于高加索山地民族联邦委员会宣言》，并决定成立“高加索各民族邦联”的国家机构，成立了所谓的议会、国防委员会、高加索共同体委员会等。邦联的首都是苏呼米，达吉斯坦首府马哈奇卡拉被作为第二首都。“邦联”还确定了自己的象征物：国旗、国徽、国歌等。其中，“邦联”的国旗采用了 1918 年 5 月 11 日成立的北高加索共和国国旗的图案。从这一时期开始，“邦联”形式上建立起了各种比较健全的体制，具有某种国家组织的外貌和意味。

1992 年 11 月，“邦联”特别会议之后发表《宣言》，称：所有加入“邦联”的民族认为，联邦条约没有效力，并提议建立“邦联”自己的武装力量，随即开始筹备全民公决。“邦联”选举出自己的议会，每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派出三名代表，议会领袖是车臣共和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尤素甫·索斯兰别科夫，邦联主席是来自纳尔奇克的穆萨·沙尼

波夫。

“邦联”从一开始就有分离倾向，车臣危机爆发后，这种倾向就更加明显。在其领导成员中，车臣分裂派和阿瓦尔人的民族激进派占一定优势。1992 年 6 月之前，“邦联”的主要目标，是对抗“俄罗斯的帝国统治”和格鲁吉亚对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的镇压，反俄、分裂色彩浓厚。1992 年 3 月，“邦联”支持一部分黑海沿岸的亚迪格人（沙普苏格人，该民族在当地不占多数）建立民族自治地区，引起当地俄罗斯族的极大不安。“邦联”领导人沙尼波夫明确声称：“有人对我们说，请在俄罗斯的内部联合起来。我们的回答是：不，我们和俄罗斯在一起，但要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对那些又想把我们变成省的人宣布：各民族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团结起来，是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9]

1992 年 6 月，南奥塞梯局势恶化，俄罗斯领导人的声明：俄罗斯反对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动武，但是，不愿意介入干涉，引起了“邦联”领导人内部分裂：一部分人是温和的亲俄派；另一部分则是激进的亲车臣派。此外，车臣总统杜达耶夫和格鲁吉亚总统哈姆萨胡尔迪亚的接近也加剧了邦联领导人内部的分化。在北高加索民族看来，哈姆萨胡尔迪亚与 1944 年对北高加索各民族的流放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结果，大多数北高加索的“邦联”领袖们都加入亲俄派，剩下的亲车臣派也拒绝派志愿者到南奥塞梯。此后，“邦联”领导人及其成员只关注自己的内部事务，照管自己的边界，并致力于成立自己的国家，对邻族的事务不闻不问；而且，多数北高加索领袖都要看俄罗斯政府的眼色行事。

杜达耶夫激烈批评阿布哈兹领导人弗拉基斯拉夫·阿尔金巴企图同俄罗斯领导人建立联系，结果，杜达耶夫受到完全孤立。1992 年，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发生武装冲突，许多山民作为志愿军支援阿布哈兹。俄罗斯发布命令，禁止北高加索人到阿布哈兹参战，并向格鲁吉亚政府表明：“高加索邦联”是一个非法组织，并试图逮捕其领袖。其实，支援亲俄的阿布哈兹，符合俄罗斯的利益。“邦联”发布命令，宣布格鲁吉亚为“灾难区”，等于是对格鲁吉亚宣战。正是由于“高加索邦联”的武装力量对阿布哈兹的增援，据估计到阿布哈兹参战的北高加索人达 2000—3000 人，格鲁吉亚军队最终被击退。1993 年 9 月，“高加索邦联”的军队与哥萨克军队共同攻占了苏呼米[10]。俄罗斯借助“高加索邦联”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高加索邦联”也因阿布哈兹事件而大出风头，政治影响达到顶峰；但是，俄罗斯对“邦联”表现出来的军事积极性感到不安。考虑到与格鲁吉亚的关系，俄罗斯政府最终站在格鲁吉亚

的立场上，采取措施，积极制止“邦联”的行动。俄罗斯政府所采取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使“邦联”领袖的光环消失。



士兵保护下的足球赛：1993 年阿布哈兹—格鲁吉亚冲突期间的巴统。

1994 年车臣战争爆发，导致“邦联”领导人进一步分化。在这前后，俄罗斯联邦政府与北高加索一些行政主体签订划分权力的条约，实施安抚，并确立了垂直的行政关系；同时也采取各个击破，避免这些行政主体之间实现某种联合。1996 年，尤素甫·索斯兰别科夫当选为“高加索各民族邦联”主席（此前，他一直严厉抨击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但是，从这时起，“邦联”已经丧失权威，高加索统一就化为泡影（尤素甫·索斯兰别科夫本人曾在马斯哈多夫政府担任副总理，但是无力左右车臣政局，1999 年前往莫斯科寻求政治出路[11]）。

俄罗斯没有赢得第一次战争，并且几乎是与车臣方面签订了战败协议，于是，“高加索邦联”派再次活跃起来。1998 年 5 月 11 日到 12 日，除印古什和车臣外，北高加索所有民族都派代表参加在苏呼米举行的纪念山民共和国 80 周年活动。这大约是“高加索邦联”运动的回光返照和一点余烬。会议议题是：必须在北高加索建立独立国家，遵照 1991 年 11 月“高加索山地民族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建立一个高加索主权国家联盟，形式为“高加索邦联”；同时还召开圆桌会议，参加者们一再强调各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只有在高加索所有民族都完全统一的条件下，高加索才可能获得并保持自己的自由；高加索人只有在自己的政治联合体内，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才能解决争议问题，调解北高加索的冲突[12]。大会的主题报告对高加索的民族形势，以及高加索联合的前景做出判断和评价，认为：由于存在着各种矛盾——政治矛盾、领土矛盾、宗教矛盾，以及缺乏联合性的意识形态，将高加索各国和各民族立即联合为邦联，是一个空想；但是，在现阶段，建立邦联的核心还是完全可能的：组成这个核心的，可以是三个国家（原文如此——作者注），如格鲁吉亚、阿布哈兹、车臣。此后，随着“邦联”思想在高加

索各民族中间的极大普及，印古什、达吉斯坦、南北奥塞梯、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安加尔、亚迪格、卡巴尔达、卡拉恰依—巴尔卡尔、切尔克斯也可以加入这个三角。报告还提出“邦联”发展不同阶段，各主体（各国和各民族）间的政治法律关系：不是垂直的，而是横向的。这可以解决一个问题：一起、还是分开？看起来，这种关系多半“既一起，又分开”。这种机构在现阶段是必须的，它有助于成员之间建立平等信任关系。报告甚至还断言：在未来，邦联完全有可能演变为联邦。不能获得自由的，仅仅是高加索的某一部分，而整个高加索将是自由的！

报告还提出在高加索地区成立维和力量的问题。有人向大会提交了《高加索各民族维和力量的原则草案》供大会讨论，该草案的作者是“高加索邦联”前武装力量参谋长阿·泽霍夫。草案的前言中指出：“现在，在高加索发生了，并且正在发生着残酷、血腥的民族冲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北奥塞梯、印古什、俄罗斯—车臣战争，这些战争是对高加索各民族追求自决、保持主权的回应，是从高加索外部挑动的”[13]。《草案》称：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已经自我逃避了其在调解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和奥塞梯—印古什冲突中的责任。因此，为防止高加索各民族之间的军事冲突、对抗外来侵略、调解民族间冲突，并在紧急状态下提供援助，须建立高加索各民族维和力量。《原则草案》解释了维和力量的目标和任务，规定了人员和资金的配套原则，拨款和物质保障机制，以及纪律、章程等等。但是，在经过两次车臣战争之后，俄联邦军队对车臣发动军事打击，以车臣为中心的北高加索联合便失去可能性，而“高加索邦联”之类的组织更加凸显其非法性质，到今天为止，该运动已经式微。俄罗斯媒体曾报道说，“高加索山地民族邦联”曾派代表到阿塞拜疆。2004 年 10 月，阿塞拜疆驳斥这一说法，指出：众所周知，“高加索山地民族邦联”是一个不存在的组织。这从侧面表明：“高加索山地民族邦联”对地区的社会政治生活影响已经消失，或接近消失。

高加索统一的另一个版本来自欧盟。出于种种考虑，欧盟国家关注高加索地区的政治稳定，欧盟的智囊们出台了种种方案，解决高加索现存的危机和矛盾：纳—卡问题、阿布哈兹问题、南奥塞梯问题等。在其他方案都被一一否定的情况下，欧洲政治研究中心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在照顾到俄罗斯利益的前提下，在南高加索地区，或更大的范围建立一个没有俄罗斯参加的“南高加索共同体”；但是，该方案明显不切实际，

结果无人响应。

还有许多战略家提出高加索统一的方案。就北高加索地区而言，按照实现统一的指导思想来划分，有两大分野：亲俄罗斯的和反俄罗斯的，而所有这些方案，最终目标都不限于北高加索，还致力于整个高加索的统一。除了全高加索方案外，还提出“大丝绸之路”、“黑海经济合作区”等方案，以及一些在“里海石油”的名义下实现统一的方案和计划。对这些方案，各方的态度极为不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政府是高加索统一思想的热情支持者，并且，照例得到美国和一些国际组织的首肯和支持。大多数亚美尼亚人认为，所有全高加索“游戏”，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地区合作的倡议，都是对俄罗斯在该地区政治、军事存在的威胁，以及加强阿塞拜疆、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区影响的手段。欧洲国家多半将地区一体化措施视为一个稳定因素，促成欧洲在保护交通方面发挥作用，并有利于欧洲；美国则将其视为非稳定因素，在客观上可以导致高加索的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增长，从而就会造成该地区对伊朗、俄罗斯、欧洲的长期交通封锁。俄罗斯的态度则是双重、矛盾着的。一方面，俄罗斯近来与欧洲大陆形成了战略伙伴机制，高加索地区出现了欧洲—俄罗斯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俄罗斯担心，高加索不考虑俄罗斯的利益而加入欧洲，俄罗斯就面临着被从该地区排挤出去的危险[14]。

高加索统一：现实性及其前景

高加索确实有其历史和文化上的同一性。杜达耶夫在当年发布的《车臣伊奇凯里共和国民族国家政策的观点》的前言中，就曾宣称：“我们，既不是亚洲人，也不是欧洲人，我们是高加索人。我们的历史、文化、精神，我们的人，都是独特的……”[15]高加索各民族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一致：许多传统和礼仪，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个别民族所独有的典型特征，实际上是所有高加索民族都具有的。从地理和地缘政治方面来看，高加索是真正统一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高加索各民族还具有共同的“高加索意识”。尽管通常人们将高加索分为南高加索和北高加索，但是，每个民族——不论是生活在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还是北高加索的车臣人、阿布哈兹人——都自认为是高加索人。苏联解体后，各种外部因素渗透到高加索地区，使该地区产生许多问题和危机；但是，外部势力并没有给高加索地区注入新的文明因素，只是为了石油、地缘政

治而展开残酷的、损人利己的争夺。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在未来，高加索实现某种形式的一体化必将是一个趋势；但是，要实现高加索统一，需要解决许多问题。首先是：按照何种原则和以什么为基础建立一个“大高加索”？有人提出：按宗教的原则实现统一；也有人认为：应按照共同的经济生活，等等。以共同的宗教作为统一的前提和基础，似乎是有道理的。在整个高加索地区，宗教状况比较整齐划一。在整个高加索地区，总共有三种宗教处于主导地位：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除了奥塞梯人以外，北高加索地区几乎全部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如果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导信仰的邦联，难免会让人与泛伊斯兰主义联想起来，而且在内外宗教派别的影响下，不免会走向激进。这样，会引起许多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担心，也不符合俄罗斯等国的利益，甚至也不符合高加索民族自身的利益。如果以经济生活为基础实现统一，那么，高加索内部的经济联系不够，且各国和各行政主体的经济发展程度也不同。按照欧盟等共同体的实践来看，该地区必须有一个能够成为地区经济发展中心的国家，而这些条件看起来都不具备。

实际上，在现阶段，高加索各民族并没有表现出对统一的现实渴望，统一的动力多半来自外部。在大国争夺高加索的现实条件下，对高加索统一的任何设计和安排，都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使高加索民族中立化，将高加索统一作为大国政治对抗的一个步骤、环节；另一种是：让高加索地区现有的外部势力维持平衡，而对于高加索各民族来说，后一种方案已经是无可选择的政治现实。操纵统一进程的，并非高加索统一的主体——高加索民族自身，而是争夺高加索的大国，而统一的最根本的阻力同样来自俄罗斯等国家。高加索统一存在着方针问题：是坚持亲西方的，还是亲俄罗斯的方针？二者对抗极为尖锐。

从俄罗斯的利益出发，类似“高加索山地民族代表大会”这样的组织，如果其目标不是要建成具备主权国家的一切特征的一个政治实体，也不承担国家功能，而是类似“地区各民族协会”这样的组织，那么，俄罗斯应该对其活动予以鼓励和支持，因为她可以为解决该地区的各种问题做出贡献。“高加索各民族邦联”未经任何政府授权，也未在感兴趣的民族中进行普选，甚至更为蹊跷的是：对于高加索统一的问题，俄罗斯媒体报道得比北高加索媒体还要多，也就是说，俄罗斯对该运动的担心超过高加索民众自身。“高加索各民族邦联”在北高加索民族中的威望如何呢？许多人对该组织了解很少，甚至很少听说过，知道其目标、

纲领和活动的人中，5% 到 10% 的人对其观念模糊，评价不一[16]；而且，只有在高加索地区出现危机时，如：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在车臣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等等，“高加索各民族邦联”的知名度才会相对提高。“高加索各民族邦联”的机会也取决于俄罗斯国内形势：越是危机的时候，其机会相对就多；否则就少。但是，作为一个政治组织，面对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印古什—奥塞梯等冲突，“高加索各民族邦联”表现得苍白无力，缺乏必要的政治资源来控制局势和解决高加索民族面临的重大问题。当这些冲突和危机并不能为该组织提高威望带来好处的时候，本身就是对其所主张的“高加索统一”构想的打击。此外，最致命和最脆弱的地方在于：该组织基本上只代表高加索的部分民意，主导该运动的，是一批知识分子。这样看来，曾经活跃一时的“高加索各民族邦联”运动只是由一些特定阶层和集团人为推动的，其前期活动只有宣传效果，与一些外部势力的主张相呼应，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他们从来没有举行过类似全民公决之类的活动，缺乏必要的合法性。俄罗斯政府多次谴责该组织的活动，而北高加索各主体的领导人也持相同态度。

俄罗斯国内有人提出：俄罗斯应该实施“大高加索战略”。不论周边国家，还是距离这里遥远的如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都对高加索一里海地区感兴趣，这些地区迟早会发生冲突或战争，所以，应在该地区及早实现非军事化。将高加索看作一个整体，建立统一的高加索安全体系，这样，一切危机的局势立刻就会成为整个体系关注的对象[17]。这种看法的实质，是建立起一个多边合作机制，解决地区所存在的各种危机和矛盾，同时也满足各方的地缘政治利益。但是，鉴于美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地位日渐稳固，而俄罗斯步步后退的现实，俄罗斯国内许多人已经对局势感到不很乐观，担心出现一个亲美的“高加索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应该早为之谋，应对可能发生的变局。俄罗斯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杜金明确提出具体对策：俄罗斯应该扶植民族主义领袖，如亲伊朗、反美的原教旨主义者、苏非派等，使其成为新成立的亲美、亲土政治组织中的破坏分子；也可以利用“已经在高加索的政治生活中扎根了的亚美尼亚人”；此外，还可以利用一些民族组织，如：支持将达吉斯坦和阿塞拜疆境内的列兹金人成立国家组织，等等[18]。在反对美国和土耳其进入并控制高加索的问题上，俄罗斯与伊朗有共同利益，两国可以加强合作，抵制西方国家的渗透。可见，作为一个破坏性因素，俄罗斯的手段将非常有效，其作用不容低估。

另一方面，高加索地区的经济发展，关乎俄罗斯国家的整体形势。北高加索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于俄罗斯平均水平。当俄罗斯联邦中央与各行政主体划分权限之后，联邦中央对这些地方的控制主要通过财政和税收手段来实现，而这些行政主体多数都在财政上倚赖联邦中央。如果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俄罗斯平均水平，就有实力走向分裂，这是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该地区社会经济落后状况持续下去，就为恐怖主义和犯罪现象在南部边疆滋生提供了土壤，而该地区也可能寻求外来的经济、财政援助，这样一来，经济问题就变成政治问题，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都难以保障。

如果俄罗斯政府与北高加索地区仅限于垂直的行政隶属关系，无疑已经落伍，不符合时代要求，必须重视高加索各民族在新形势下的需求。俄罗斯不应该鼓励旨在脱离俄罗斯的类似“高加索邦联”这样的政治运动。从自身利益考虑，北高加索各行政主体无力、也无意脱离俄罗斯；否则连生存都难以维持；但是，俄罗斯政府应该积极推进该地区的经济联合，特别是：北高加索地区与外高加索国家有天然联系。当然，一些客观条件制约着俄罗斯政府实现这些计划，如缺乏资金等。

由于俄罗斯对推进北高加索地区与外高加索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迟疑不决，外高加索共和国与北高加索的俄联邦行政主体开始自行行动。2001 年，在北奥塞梯共和国总统阿·加索霍夫和印古什总统阿乌舍夫的倡议下，外高加索各国总统，以及北高加索各自治单位、边疆区、州的领导人在格罗兹尼召开会议，就防止武装冲突、稳定高加索地区局势、打击犯罪、与恐怖主义作斗争、打击劫持人质等方面协同行动。该会议要解决高加索地区所有棘手问题，而这些问题本来应该是独联体的机构解决的。该协商会议的产生和活动表明：俄罗斯政府没有对这些最迫切的问题作出回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外高加索国家之间应该发展合作。阿塞拜疆可望在本地区为实现石油方案建立良好环境；而格鲁吉亚有可能变成一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中心。阿塞拜疆需要经由格鲁吉亚境内运输石油，格鲁吉亚则因此而获得收入；巴库到苏普萨的石油管道将两国距离拉近，两国境内都有许多跨境民族。而对于亚美尼亚来说，格鲁吉亚可能是自己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重要过境国家；反过来，亚美尼亚可以为格鲁吉亚供电，2004 年 10 月 30 日，亚美尼亚已经开始为第比利斯等地供电，解决格鲁吉亚在高峰期的用电缺口。

但是，如果高加索统一是按照联邦的模式，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

国家完整、国家制度的单一性将受到威胁。亚美尼亚一方面担心土耳其—阿塞拜疆在高加索统一进程中占主导地位后自己被孤立；另一方面又受到联邦化进程加速的诱惑，并打算利用民族单一性的优势，提高自己在该地区的政治分量，分享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所有好处。北高加索担心被拖入混战——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如车臣—达吉斯坦冲突就会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是，他们希望在高加索实现统一后，加强政治独立、促进经济繁荣。

高加索注定是大国的地缘政治争夺对象。这些大国需要高加索的土地、资源，而并不需要这里的人民，以及这些民族所代表的文化形态。在高加索前途问题上，各种势力之间不可能很快达成一致，对高加索的某种安排，只是实现大国利益的筹码。美国打算通过土耳其控制高加索和中亚，将俄罗斯排挤出去，同时不许欧洲进入，不允许高加索交通枢纽发挥作用，其策略就是在高加索地区实现破坏性一体化，就像1917年或苏联解体前后高加索的形势。现在，这种趋势已经占了上风。土耳其希望实现夙愿，经高加索进入中亚，加强自己在世界上的地缘政治地位；但是，可能在高加索与俄罗斯—欧洲集团发生冲突或者在黑海地区感到地缘政治压力。伊朗担心在地区不稳定，或土耳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在阿塞拜疆南部产生破坏性能量，威胁自身安全。同时，还希望在边境地区与俄罗斯、欧洲建立战略协作区。

如果高加索实现统一，将会改变高加索各民族的命运。高加索地区将成为统一的经济、文化、地缘政治单元，并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但是，必须明确以下几点事实：一、历史上高加索从来没有真正走向完全联合和统一，独立地决定自己命运，统一缺乏必要的历史前提和基础。特定时期的局部联合，多半是在外敌入侵，以及俄罗斯或苏联发生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如1917年的十月革命、1991年的苏联解体，等等。对于高加索各民族来说，这都曾是走向独立的历史时机，但是，高加索各民族没能把握、也无力把握。其次，由于民族、宗教等原因，高加索各民族内部存在着许多尖锐的矛盾和问题，实现统一有许多现实困难。必须恢复加入高加索共同体的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从而恢复相互信任。如果车臣问题、纳—卡冲突等问题不彻底解决，高加索统一难以实现。恰恰是在俄罗斯帝国时代以及苏联时代，由于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高加索才真正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经济、政治一体化加强，发展进程加快。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那么，高加索统一将永远只是一种构想。而且，如果北高加索各行政主体从俄罗斯分裂出去，

那么，该地区有可能进一步陷于无休止的冲突和危机中，前景是危险的。

就现阶段来说，高加索国民自身也未必真正愿意实现统一，因为在各方面都没有对统一做好准备。各国本身存在许多消极问题，外高加索三国都属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列。2004 年 10 月，国际组织就腐败问题发表年度报告，在 146 个国家中，按腐败程度排序，排在第一位的、最廉洁的政府是芬兰；而排在最后一位的、最腐败的国家是海地共和国。阿塞拜疆排 140 名，格鲁吉亚排 136 名，亚美尼亚排 82 名。另外如经济崩溃、犯罪率高、边境冲突等。这些国家的军队状况堪忧，无法捍卫国家安全，即使建立一支维持全高加索秩序的武装力量，也无法得到大众信任。国民习惯了自己的政府，未必会忍受外来人的治理。此外，在苏联解体后，发生了普遍的道德滑坡，几乎所有前苏联国家都竭力清除外来人，特别是难民，将其视为自己的敌手和竞争者。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的高加索”就成为政客们玩弄的一个抽象概念，只具有宣传意义；真正将统一付诸实施，其困难比在纸上谈兵要大得多。

高加索是一个美丽、独特的地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未被工业文明污染的净土之一。但是，因为处于文明交汇处，所以成为文明冲突的战场。摧毁这种趋势，促进欧亚对话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高加索各民族肩负的使命。所有外高加索国家都应与北方邻国俄罗斯加强固有联系，并发展友好关系。同时，也需要与其他国家交流往来，积极加入，并参与到世界经济、政治进程。最重要的是：高加索民族自身还应该开放，改变国民心态，摆脱历史在人民心灵中投下的阴霾，成为国际政治进程中自觉、自主的因素。正如一位作者所写的那样：“交通网络不只应该经过我们的领土，还应该经过我们的身心。我们应该袒露心扉和思想。我们应该叫自己的名字，唱自己的歌曲，我们应该将每一个路人，还有他的心灵留驻在心里，留存在记忆中。如果他从事善举，就为他的事业成功而祈祷；如果有人起了歹念，也要果断地使他回头。”[19]唯其如此，曾经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高加索，才能为文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注　释：

〔1〕А. Малащенко, Б. Коппитерс, Этнически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Еврази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М, 1997, С. 132.

〔2〕同注释〔1〕, С. 134。

〔3〕Ментешашвили, Грузин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и западые державы//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6, №9, С. 130.

〔4〕Лев Соцков, Неизвестный сепаратизм, М, 2003, С. 128.

〔5〕资料来源：http://www.wgeo.ru/russia/

〔6〕http://kavkaz.memo.ru/

〔7〕А. Г. Плиев, Кавказ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м мире, http://www.inci.ru/vestniki/vest02.html

〔8〕同注释〔7〕。

〔9〕В. Березовский, Конфедерация гор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Кавказа, http://www.nasledie.ru/oboz/

〔10〕Заложничество: Кто виноват и Что делать, http://kavkaz.memo.ru/

〔11〕http://www.utro.ru/articles/politics/

〔12〕А. Дзадзиев, А. Плиев. От Гор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к Кавказской Конфедерации. Бюллетень № 19, Июнь 1998

〔13〕А. Дзадзиев, А. Плиев. От Гор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к Кавказской Конфедерации. Бюллетень № 19, Июнь 1998

〔14〕Ара Недолян, Единство Кавказа не может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ть его бытию, http://kavkaz.memo.ruhtml

〔15〕Б. Н. Зенькович , Тайны уходящего века, М, 2000, С.527.

〔16〕К. С. Гаджиев,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Кавказа, М, 2001, С.81.

〔17〕http://www.redstar.ru/

〔18〕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 Кавказский вызов, http://www.arcto.ru/

〔19〕Ара Недолян, Единство Кавказа не может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ть его бытию, http://kavkaz.memo.ruhtml

车臣历史大事记

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出现了乌拉尔图国家。

公元1世纪阿兰人出现在高加索，阿兰人建立部落联盟，瓦依那赫人加入其间。

372年，匈奴人入侵车臣—印古什。

7世纪，地理学著作中首次提及瓦依那赫人的先祖。

5到8世纪是阿兰人国家存在的时期，瓦依那赫人加入北高加索阿兰人的封建国家。

1222年，以哲别和速不台为首的蒙古军队攻占车臣—印古什平原，车臣各部退到山中。

1238年，鞑靼—蒙古攻占位于车臣—印古什平原的阿兰国家首都玛哈斯。

1239年8月3日到1240年7月22日，蒙古王子卡当和布里远征车臣。

1240年，车臣—印古什的草原和平原部分并入金帐汗国。

1395年，西穆西穆（Симсим，相当于今车臣—印古什的范围）各族反对帖木儿。

1567年，在捷列克河左岸、松日河河谷附近建立了第一个俄罗斯的要塞捷列卡。

17世纪，伊斯兰教在车臣西南地区传播。

1722年7月15日，彼得一世开始东征，前往今车臣—印古什境内。7月28日，由于对彼得一世的敌对行动，俄罗斯军队摧毁了恩德列依村。

1785年3月到6月间，车臣和北高加索山民在曼素尔领导下，发动了民族解放运动。

1791年7月22日，北高加索民族解放运动遭到失败，伊玛目曼素尔被沙皇古多维奇将军的军队俘虏。

1794年4月13日，曼素尔在施莱塞尔堡要塞去世。

1798年，沙米尔在吉木拉村出生。

1801年1月18日，格鲁吉亚归并俄罗斯。3月5日，格鲁吉亚改为俄罗斯的一个省。

1818年5月20日，叶尔莫罗夫在报告中称：征服边疆必须从征服车臣人开始，车臣人是最强大，也是最危险的民族。

10月，叶尔莫罗夫建立格罗兹尼要塞。

1834年9月19日，沙米尔被推举为达吉斯坦的伊玛目。

1840年3月7日，沙米尔被推选为车臣伊玛目。达尔哥村成为伊玛玛特的首都。

1859年8月，高加索东北部的山民民族解放运动遭到失败，伊玛目沙米尔在贡尼布被俘。

1871年，格罗兹尼要塞改为格罗兹尼市。

1901年3月18日，废除对山民在格罗兹尼的居住限制。

1902年11月，在沙玛—禹尔惕的市场上，因哥萨克试图夺取车臣人的武器，双方发生冲突。

1905年，格罗兹尼工人罢工。车臣—印古什农民起义。

1917年，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境内出现了工人、士兵、哥萨克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的双重政权。7月26日到8月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确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8月17日，宣布建立车臣—达吉斯坦伊玛玛特。

1918年3月，车臣建立了苏维埃政权。3月11日，成立了塔帕·切尔莫耶夫领导下的山民共和国。

5月11日，北高加索宣布独立并脱离俄罗斯联邦。

1918 年 6 月，谢赫乌孙—哈吉领导的宗教解放运动爆发。

1920 年 2 月，邓尼金被迫从北高加索艾米尔国的领土上后退。

8 月，在沙米尔的孙子萨伊德—别克的领导下，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的山区爆发了反苏武装暴动；到 1921 年 9 月，被红军镇压，布尔什维克占领了车臣。

1921 年，苏维埃政府通过决议，车臣、印古什、奥塞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卡拉恰依被并入山民自治共和国。

1922 年 11 月，建立了车臣州。

1932 年秋，国家安全局在车臣大肆搜捕，仅“车臣民族主义中心案件”就逮捕了将近 3000 人，罪名是“建立车臣的反革命民族主义中心，准备并进行武装暴动”。

1934 年秋天，车臣和印古什联合为车臣—印古什自治州。

1936 年 12 月 5 日，按照新宪法，车臣—印古什自治州改为苏维埃自治共和国。

1937 年 7 月 31 日到 8 月 1 日，内务人民委员会按照原先编订的名单，在车臣的所有村庄和各区进行清查，即所谓“清除反苏分子总行动”，格罗兹尼的两座监狱都人满为患。

1940 年，宣布建立了以哈桑·伊斯拉伊罗夫为首的临时政府。

1942 年春天，苏联空军对整个车臣—印古什山区发动了两次空袭。

1944 年 1 月下旬，大批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种部队抵达格罗兹尼。2 月 23 日，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集体流放，自治共和国被废除。

1957 年，车臣人、印古什人从流放地返回，车臣—印古什的民族自治地位得到恢复。

1990 年，召开了第一次车臣民族代表大会，选举出了以乔哈尔·杜达耶夫为首的“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

1991 年 9 月 15 日，政权转到“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手中。

1991 年 10 月 25 日，乔哈尔·杜达耶夫非法当选车臣总统。

11 月 9 日，俄罗斯政府武力控制车臣局势的尝试失败。

1992 年 6 月 4 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组建俄罗斯联邦成员的印古什共和国》的法律。

1992 年 7 月 7 日，俄罗斯军队撤出车臣。

1994 年 11 月 26 日，得到俄罗斯政府支持的车臣反对派发动武装进攻，遭到失败。

1994 年 11 月 29 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呼吁解散非法武装。

1994 年 12 月 7 日，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31 日，俄罗斯军队开始强攻格罗兹尼。

1995 年 3 月 11 日，俄罗斯军队攻占格罗兹尼，并向车臣南部进攻。

1996 年 4 月 23 日，乔哈尔·杜达耶夫被俄罗斯军队导弹击中，数天后死去；泽利木汗·扬达尔比耶夫继任车臣总统职位。

1996 年 8 月 5 日到 6 日，车臣军队夺回格罗兹尼。

1996 年 8 月 31 日，经过谈判，列别德将军和阿斯兰·马斯哈多夫在哈萨维尤特签署协议，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

1996 年 11 月 22 日，叶利钦签署命令，俄罗斯军队撤离车臣。23 日，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与车臣政府首脑马斯哈多夫签署《关于俄罗斯联邦与车臣共和国关系基础的临时协议》。

1997 年 1 月，阿斯兰·马斯哈多夫当选为车臣总统。

1997 年 5 月 12 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签署关于和平和双方关系原则的条约。

1999 年 8 月 2 日，车臣—达吉斯坦非法武装侵入达吉斯坦境内。10 月 1 日，俄罗斯军队开始了在车臣的反恐军事行动，或称第二次车臣战争。俄罗斯政府宣布：马斯哈多夫政府为非法。

2002 年 10 月 23—24 日，莫斯科一个音乐厅发生了车臣恐怖分子劫持 700 余名人质的事件。

2003 年 3 月 23 日，车臣就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并获得通过。10 月，车臣举行大选，卡迪罗夫当选为车臣共和国总统。

2004 年 5 月 9 日，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地那摩体育场发生爆炸事件，包括卡迪罗夫等人在内的数十人伤亡。8 月 23 日，俄罗斯两架民航飞机几乎在同时坠毁，伤亡 90 余人。8 月 29 日，阿卢·阿尔汉诺夫当选为车臣新总统。9 月 1 日，恐怖分子袭击了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第一中学，劫持大批人质；在解救过程中，包括许多儿童在内的 300 多名人质死去。随即，阿卢·阿尔汉诺夫担任车臣总统。

2005 年 3 月 8 日，俄罗斯宣布：分裂派头领马斯哈多夫被击毙。

参考文献

一、中文文献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1992年出版。

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大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出版。

汪晖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万俊人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刘军宁主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鲍里斯·叶利钦：《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曹缦西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

威廉·奥尔森：《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王沿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1分册，王铁崖、陈体强

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出版。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出版。

Б·Д·格列科夫，А·Ю·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册，田大畏译，群众出版社1996年出版。

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刘振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谢·米·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

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王建平等著：《当代中亚伊斯兰教及其与外界的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内部报告），2000年7月。

二、中文期刊

《关于1925年车臣事件的档案》，郑异凡译，《世界历史》2000年3期。

三、英文文献

Ben fowkes. Russia and Chechnia: The Permanent Crisis. Essays on Russo - Chechen Relations. New - york, 1998.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and New - york, 1996.

四、俄文文献

В. П. Алексеев.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народов Кавказа. М, 1974.

С. Г. Агаджанов. Наиональные окраи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М, 1997.

Лев Анинский, Русские плюс. . . , М, 2003.

Г. З. Анчабадзе, Вайнахи (чеченцы и ингуши). Тбилиси, 2002.

Арин, Мир без России,

А. С. Ахиезер. Россия: крит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2 издание, том 1,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7.

А. Аймермахера.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М, 1999.

Светлана Алиева. Так это было: Репрессия народов в СССР 1919—1952г., М, 1993.

М. Д. Бутаев. Союз обьдиненных гоцев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и Дагестана. 1917—1918. Гор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1918—1920гг, Махачкала, 1994.

Бердяев.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М, 1991.

А. Бли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чечня: война 200 ле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0.

В. Г. Бабаков. Кризисные этносы. М, 1993.

Н. Ф. Бугай.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М, 2000.

Н. Верт.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1991. М, 1995.

К. С. Гаджиев.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Кавказа. М, 2001.

Яков Гордин. Кавказ: земля и кровь,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0.

Л. С. Гатагова. Россия и Северный кавказ: война 400 лет войны? М, 1998.

А. Ю. Даниэль. 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олдаты кавказкой войны. М, 1997.

Юсуп Дадаев. По тропам Шамилевских сражений, Махачкала, 1997.

Н. Данилев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5.

В. Дергачев,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Киев, 2000.

В. В. Черноус,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Кавказа,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2001.

Л. М. Дробижева. Конфликтные этносы и этносн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М, 1994.

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 Основ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М, 1999.

И. Н. Еременко. Россия и чечня: Документы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1990—1997. M, 1997.

С. С. Жильцов, И. С. Зонн, Ушков А. М.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Каспий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М, 2003.

Б. Н. Зенькович, Тайны уходящего века, М, 2000.

А. Искандарян. Чече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провал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кавказе. М, 1995.

Борис Ключков, Исламизм, США, и Европа, М, 2003.

С. Г. КиселевОсновной инстинкт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ызовы России, М, 2002.

В. А. Козлов. 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кдки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е. 1953—начала 80 годо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9.

Б. Б. Крупнов. История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18 века. М, 1988.

Е. Н. Кушева. Народы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и их связи с Россией в 16—17 вв. М, 1963.

А. Малашенко. Исламск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1998.

А. Малашенко. этносны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конфликты Евразии. М, 1997.

Адраник Мигранян. Россия в поисках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М, 1997.

Г. В. Миронова. Ислам и политика. М, 2001.

В. А. Михайл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 1997.

Мурадян Игорь, Ге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развит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Ереван.

С. А. Модестов,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ислама, Москва, 2003.

Ф. Х. Мухаметшин. Суверенный Татарстан. М, 1997.

Орлов, Черкасов. Россия—Чечня: цепь ошибок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М, 1998.

Лев Остерман.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власть в России. 1985—1996. М, 2000.

Н. И. Покровский. Кавказские войны и имамат Шамиля. М, 2000.

Б. Б. Пиотровский. История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18 века. М, 1988.

А. Н. Сахаров. Россия 20века. Историки всего мира спорят. М, 1994.

А. Н. Сахаров. Россия 20 века. Судьба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М, 1994.

А. Н. Сахаров. Россия в 20 веке. Проблемы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 1999.

А. Н. Сахар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оссия. 20 век. , М, 1999.

А. Н. Сахар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ии С начала 18 до конца 19века. М, 1996.

Лев Соцков, Неизвестный сепаратизм, Рипол классик, М, 2003.

Е. И. Степанов.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терроризм: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а. М, 2000.

А. Н. Тогешвелл.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народов Кавказа. , Тибилис, 1988.

Р. А. Фадеев, Кавказская война, Москва, 2003.

В. А. Федор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начала 20вв. М, 2000.

Дмитрий Фурман. Чечня и Росс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М, 1997.

ПавелХлебников, Крестный отец Кремля Борис Березовский или История разграбления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Детектив – пресс, 2001.

Джеффри Хоскинг.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17—1991. М, 1995.

П. В. Чернов. Этно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аз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 1999.

В. В. Черноус,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Чечни: социаль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Ростов – на Дону, 2001.

И. Р. Шафаревич.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 в переломе тысячалетия. М, 2000.

Т. М. Швецова. Репрессированные этнографы. М, 1999.

Журналисты на чеченской войне. М, 1995.

五、俄文期刊文章

А. В. Бирюков. Российско – чече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18 века до

середины 19 век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2.

Н. Ф. Бугай. Правда о депортации Чеченского и ингушского народов//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0. №7.

А. Гушер. Чечня: узел трудных проблем вопросов//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0. №11.

Ант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 в Чечне//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0. №11.

А. Гушер. Кавказский узел//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0. №2.

А. Гушер.,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власти//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4, №2.

Э. Ле.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дискурса язык статей о чеченской войне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есс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01. №2.

А. Малашенко. Северный кавказ: исламский фактор//Либеральная идея. 2001. №9.

А. Малашенко. Исламский фактор: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идея. 2001. №11.

Д. И. Олейников. Шамиль//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6. №5、6.

Валерий Тишков. О нации и нациоанализме//Либеральная идея. 1996. №3.

Валерий Тишков. Забыть о нации//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8. №9.

Валерий Тишков. Война и мир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е//Либеральная идея. 2001. №2.

Заложница чужой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0. №8.

А. П. Циганк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 политик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тратегии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01. №10.

Алла Язькова. Чеченская война: неизвлеченный урок//Открытая политика. 2001. №3、4.

后记

这本专著是我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年；如果从开始撰写学位论文算起，已经过去了五年；而对车臣危机产生兴趣并不断关注，则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这是我的第一部专著，如果将其视为一项工程，那么，可以说，其图纸、材料、装饰等都是由自己独立完成的，这件工作极大地满足了我的个人兴趣。写作以及出版过程中的艰辛和曲折，不足为外人道。此刻，我可以说，我对所有这些都表示由衷的感激和赞叹。造就我们的，恰恰是那些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历练。对于生命中一切的丰饶与苦难，都应该表示感恩，这是我们普通人也应该具备的德行。

此时此刻，我只想表达自己内心的感谢。

感谢导师。对我的写作悉心指导，牵挂我的成长、成熟。

感谢同事、朋友们。

感谢出版社的编辑，为本书的最终成型付出心血。

感谢所有这些智慧的人们。